

非暴力行动的 政治 (第二册)

吉恩·夏普

198种

非暴力
行动方法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二册）

——198 种非暴力行动方法：有效的政治柔道

吉恩·夏普



中國權利在行動翻譯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二册）

——非暴力行动方法：有效的政治柔道

非暴力行动发挥作用的方法非常特殊，要想理解、评估和有效地运用这一技术，就必须掌握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与人们通常关于冲突和斗争的观点——尤其是认为只有以暴制暴的斗争才有效的观点——相距甚远。

非暴力行动的目的是对付那些愿意使用暴力，而且能够使用暴力手段的对手。非暴力行动并不假设对手在面对非暴力行动时会放弃暴力，或者会约束自己始终不使用暴力镇压手段。

但是，使用非暴力方法对付暴力镇压会制造一种特殊、不对等的冲突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双方依赖的斗争方法或者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一个依赖暴力行动，另一个依赖非暴力行动。为了使非暴力行动成功的机会最大化，行动者必须始终坚持使用非暴力行动方法。广泛、坚定、灵活地运用非暴力行动，会妨碍或者阻挠对手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力量。然后，非暴力行动者就能使用某种类似柔道运动中借力打力的手段，打破对手的政治平衡，让镇压行动产生反作用，从而削弱对手的权力。此外，非暴力行动者在保持非暴力的同时继续斗争，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

有些人认为，非暴力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高的曝光度，使行动者容易受到镇压。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这些方法。在非暴力行动者人数很少，缺乏主流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情况确实如此，行动者可能正好处于显眼而且易受攻击的处境（使用暴力会使他们更加显眼和易受攻击）。然而，如果非暴力行动者的行动是为广大民众争取权利，而且行动者人数众多，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因为在法不

责众时，某个行动者被单独挑出来进行惩罚的可能性会大幅降低。当然，对手也不可能轻易善罢甘休，所以镇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对镇压感到惊讶或气馁，因为镇压正是对手认识到非暴力行动对自己的政策或者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而采取的手段。非暴力行动者必须甘愿承担镇压的风险，并将镇压作为胜利的部分代价。镇压的可能性和严厉程度会因情形而异。不过，并不是只有非暴力行动才有遭受镇压的风险。暴力行动者也存在风险，但是暴力行动者与非暴力行动者面临的风险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暴力行动者的风险是在企图伤害或者杀害对手的过程中招致的，非暴力行动者则不是这样。有些人错误地以为，这意味着非暴力行动者软弱无能，情况并非如此。非暴力行动和暴力行动的不同，只是方法上的不同。非暴力行动者必须坚信：非暴力行动使行动者更有可能控制局面，降低对手暴力镇压的能力，从而增加取得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镇压不一定会带来屈服。暴力镇压要发生效力，就必须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制造恐惧，制造服从的意愿。然而，克服恐惧，具有某些高于一切的信仰或者目标，可能会使行动者即使遭到镇压也要将非暴力行动坚持到底。（在军事斗争——战争或者暴力行动中也是如此）如果行动者将非暴力行动坚持到底，对手面临的问题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严重。通常对手采用的镇压手段是用来对付暴力反抗和叛乱的。由于暴力和非暴力斗争的动力和原理不同，镇压非暴力行动者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例如，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在非暴力斗争中入狱的人（无论是甘地、马丁·路德·金、杜布切克，还是美国民权运动中静坐占领午餐柜台的大学生）仍在“前线”，没有离开“战场”。**非暴力行动者不是试图避免招致镇压，而是设法耗尽对手的镇压手段**（比如填满监狱的方法），以此证明，即使采用镇压手段，对手也没有能力统治国家。当然，镇压非暴力行动也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镇压也可能是无效的。如果镇压无效，对手就会感到棘手。当然，镇压无效可能并不是让对手感到棘手的唯一原因。

如果对手难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如果非暴力行动把高质量的行动和大量的行动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在面对镇压的时候，非暴力行动者能够始终保持非暴力纪

律，坚定不移地坚持非暴力行动，对手就可能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反抗十分普遍，或者特别大胆，对手就无法真正无视反抗，因为无视反抗就意味着自己无能，就会使反抗扩散。镇压也不是只会加强对手的力量，在一定情况下，暴力镇压会进一步削弱对手的合法性。这些问题可能会使对手希望行动者选择暴力而不是非暴力的方法，因为镇压暴力行动不会给对手带来这类困境。

非暴力行动使对手难以应对的原因并不是非暴力行动出乎对手的意料，或者对手不了解非暴力行动的运作方法。了解非暴力行动并不足以使对手有能力战胜非暴力行动。这和战争一样，双方都可能在斗争中学习对手使用的方法。非暴力行动的对手在了解更多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狡猾，表现得不那么残忍。非暴力行动者也可能在斗争的过程中学到如何让自己的行动方法更加灵活有效。

对手难以对付非暴力行动，主要与这一技术特殊的动力和原理有关，与这一技术会增强非暴力行动者的影响和力量有关，与这一技术有能力破坏对手的影响和力量有关。例如，对非暴力行动者采用极端残酷的镇压手段，会使对手为自己辩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与镇压暴力叛乱相比，对非暴力行动的镇压效果可能较为有限。此外，对非暴力行动者进行暴力镇压，可能不仅不会削弱反抗者的力量，反而会让镇压者的权力来源产生反作用，从而削弱镇压者的权力。因此，对手可能会故意刺激反抗者使用暴力，比如通过严厉镇压破坏非暴力纪律，或者通过密探和特务煽动暴力。

如果非暴力行动者仍然坚持非暴力纪律，继续进行斗争，而且吸引了足够多的民众和足够有影响力的人参与，非暴力行动带来的结果就不只是少数“烈士”的牺牲，而是可以有效地削弱对手的意志，使对手无法执行镇压计划。**逮捕运动领导人之后，如果运动仍然能够继续，就证明运动没有领导人也能发展。**对手可能通过立法把非暴力行动者使用的方法规定为非法，那他们就不得不对付越来越多“违法”的反抗行为。就在对手试图镇压某种反抗行为的时候，另一种反抗行为可能又会涌现出来，直到这些反抗行为扩大到足以挑战对手统治能力的程度。对手可能会发现，大规模镇压不但没有能迫使人们合作和服从，反而不断发生拒绝屈服或者逃亡的情况。事实反复证明，镇压无法带来屈服。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可能

会使对手的镇压机器瘫痪，因为有太多的反抗者要控制，对手自己的军队也可能哗变。所有这些可能的结果说明了政治柔道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非暴力行动者有意拒绝使用对手擅长的暴力手段挑战对手。以暴制暴只会强化暴力。非暴力行动者不仅不需要使用暴力，而且必须避免使用暴力，以免加强对手的力量，削弱自己的力量。非暴力行动者必须坚持使用自己的非暴力武器系统，因为非暴力行动往往会让对手的暴力和镇压对他们自己的权力来源产生不利影响，在削弱对手的权力来源的同时，加强非暴力行动者的实力。由于暴力行动和非暴力行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原理，会给社会带来不同的变革力量，因此，如果非暴力行动者能够维持非暴力纪律并且坚持斗争，那么对手的镇压永远无法真正摧毁非暴力行动者运用的力量。甘地将这种情形比作一个人狂暴地用剑击水，断掉的只会是他自己的胳膊。

这就是为什么对非暴力行动者来说，即使面临残酷的镇压，也要坚持非暴力纪律的部分原因。非暴力行动者就是要通过使用非暴力手段与对手使用的暴力手段形成反差，来证明镇压吓不住民众，从而破坏对手现有的支持力量。这会削弱对手继续镇压以及捍卫自己的目标和权力的能力或者意愿。

总而言之，镇压一个仍然坚持斗争并且坚持遵守非暴力纪律的运动，可能会产生以下效果：对非暴力行动者的镇压越残暴，对手的政权在民众眼中越可鄙，而对非暴力行动者的同情和支持就越多。民众就越可能疏远对手，支持反抗运动。镇压也可能使其他国家的民众对受害者表现出更多的支持。虽然国内和国际舆论影响各不相同，但国际舆论有时也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残暴的镇压非暴力行动者，也会使对手自己的公务员、警察、军人等感到不安，他们可能会开始怀疑政权是否合法和正义。最初的不安可能会演变成内部异议，有时甚至会发展成罢工和哗变之类的行动。因此，如果镇压使非暴力行动者的人数增加，使反抗扩大，使对手的支持者中间产生足够多的内部对立，降低对手对付反抗的能力，那么显然，镇压已经产生了反作用。这说明政治柔道正在发挥作用。

镇压是否能够实现反作用，取决于非暴力行动者使用自己的武器继续斗争的能力。这些武器是指具体的斗争方法。这些方法能够改变某些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关系，

无论斗争双方力量平衡上的变化是不是由政治柔道带来的。此类斗争方法有很多，它们共同构成了非暴力行动的技术。本书的重点是对这些方法进行分类。

这种分类在许多方面都是有意义的。首先，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非暴力技术的本质，清楚地揭示其存在的重要特质。其中一些方法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行动，另一些方法是停止特定类型的合作，还有一些方法主要是在冲突情境中进行直接干涉。其次，非暴力技术所包含的行动方法数量非常大，种类非常多。本书提供的清单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对于具体方法术语的定义进行完善和改进，也使我们将来有可能对不同方法的运作情况和相同方法在不同情境中的运作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再次，详细分类也给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人们已实践过的主要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清单。这一清单可以帮助行动者选择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最适合使用的方法，还可以让对手了解非暴力行动者会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法，这或许能够减少对手的焦虑和过度残暴的行为。最后，这一清单还可以让研究者和对非暴力技术的政治潜力进行评估的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非暴力斗争方法的武器库。

本书把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粗略地分为抗议与说服、不合作、干涉三大类。这不应视为一种严格的分类，而应视为一种一般有效的分类。在特殊情况下，把一种方法放到一个不同的类别中，或许比遵照本书中的分类更加准确。在某些情境中，一种方法在行动过程中可能变成另一种方法，二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在某个特殊案例中，两种不同的方法可能紧密结合，不可分离，即使是为了分析的目的也是如此。

我们永远不应该认为给具体方法制作清单的工作已经完成。毫无疑问，这些清单中的某些方法已经被人们遗忘，这些清单中还有一些方法存在许多未被列入的变体。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开发或者创造新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比如逆向罢工（人们不拿报酬做额外的工作）的使用可能只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这些分类提供的具体方法应被视为举例说明，它们并不一定具有地理上或者历史上的代表性。本书列举的案例既包括成功的案例，也包括不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显示，在迥然不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人们都使用过这些非暴力行动技术。进一步的研究无疑能够提供更多本书没有提到的方法。

在某一具体案例中，人们使用何种方法，以及使用多少种方法，会因以下因素而存在巨大差异：1) 本国人民的传统；2) 普通民众、非暴力行动者和运动领导人掌握的非暴力行动方法的知识 and 经验的广度和深度；3) 社会和政治环境；4) 普通民众、非暴力行动者和运动领导人能够承受的镇压程度；5) 对手的目标；6) 对手能够支配的资源（包括行政系统，用于镇压的人员等）；7) 对手准备采取的镇压行动的残酷程度；8) 对手对非暴力行动者群体的依赖程度；9) 参加非暴力行动的人数和得到民众支持的程度；10) 非暴力行动者和运动领导人的素养（能力、技能等）；11) 造成民众不满的问题的性质；12) 计划采取行动的具体情境和具体细节。

现在，我们开始介绍非暴力行动中的第一个大类：非暴力抗议与说服。

一、非暴力抗议与说服

介绍

非暴力抗议与说服¹主要是通过象征性的行动，和平表达异议或者说服对方。这个大类中的方法超出语言表达的范围，例如游行、守夜、纠察，横幅、海报和印刷品，讨论会、公开悼念、公共集会等等。

使用这些方法可以是表达行动者反对某些议题，例如，纠察可能是反对政府的某个政策。使用这些方法也可以是为了提出某些诉求，例如，团体游说支持一项在议会待决的清洁空气法案或者海外援助法案。使用这些方法还可以对一个社会或者政治议题表达深切的个人感情和道德谴责，例如，美国民众在广岛核爆纪念日守夜，可以对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这座日本城市表达忏悔。非暴力行动者关心的议题，可能是具体的行动、法律、政策或者一般性问题，也可能是整个政权或者制度。

这类行动方法主要是为了影响对手，唤起民众对现存问题的重视，动员民众对运动的支持，说服对手接受变革。或者警告对手，民众在这些问题上的关注程度，如果对手不进行变革，可能会发生更加激烈的行动。这类行动方法也可能是为了直接或者通过宣传手段，向民众、旁观者或者第三方表达自己的观点，唤起人们关注和支持行动者期望的变革。这类行动还可能是为了影响对现存问题不满的群体（受现存问题直接影响的人群），劝说他们采取行动，比如参加罢工或者经济抵制。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方法还可以与其他类型的方法相结合。这类行动中的某些温和的方法是为了说服民众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例如，散发传单、小册子和书籍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呼吁民众积极抵抗，在抵抗的同时和占领军士兵交朋友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劝说他们哗变，等等。

总之，讨论非暴力抗议与说服方法的时候，重点可以放在支持或者反对某些议题方

1 同一种方法在不同情境下可以用于抗议与说服这两个目的。——作者注

面。民众的不满可能多种多样，行动主要针对的群体可能各不相同，行动产生影响
的类型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说服或者施加压力——编者注），预期的结果也可能有
很大差异，可能是独立的行动方法，也可能与其他某个或者某些非暴力行动方法紧
密结合。

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中的某些方法无论是从行动的集体性来看，从行动的方式来看，
还是从个人行动赋予集体意义的情境来看，都明显超出用语言表达观点的范围。通
常情况下，非暴力抗议与说服（除非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是用行动表达观点，或者
企图用行动影响他人接受某种观点或者采取特定的行动。这与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或
者非暴力干涉施加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压力有所不同。在一些政治环境下，某些形
式的非暴力抗议——比如进军——是非法的。在采取非法行动的时候，使用非暴力
抗议与说服就是把它与公民不服从和政治不合作中的一些方法结合使用。

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中的方法产生的作用取决于它们对某些人群的态度产生的影响，
例如某种特定的方法在某种场合很常见，那它产生的影响可能就会比在这种方法很
罕见或者不为人知的场合产生的影响要小。行动发生时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会对行动
的作用产生影响。独裁体制会使发生非暴力抗议行动的可能性降低，使非暴力抗议
行动更加危险，更加罕见。因此，独裁体制下，非暴力抗议行动一旦发生，可能就
会比在这类行动更常见、不会受到惩罚的地方更具戏剧性，更引人注目。非暴力抗
议与说服可能是其他非暴力不合作或者非暴力干涉行动的开始，或者与其他非暴力
不合作行动或者非暴力干涉行动一起使用，也可能只是单独使用。

在本书中，我们将非暴力抗议与说服分为十个子类，共 54 种方法。

（一）正式声明

一般来说，个人、团体发表的书面和口头声明，都属于语言表达观点、异议或者意
图，不属于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类别。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这类声明可能会产生
比平常更大的影响，这种行动就应属于非暴力抗议与说服。是否属于此类，取决于
发出声明时的政治环境，个人、团体的身份，声明本身的性质，政见的一致或者不
一致程度，以及发出声明要承担的风险。像许多非暴力行动一样，这种声明主要是

为了支持或者反对某些议题、政权、制度、政策。声明可以采取各种方法，我们在本节将它们分为6种方法。这6种具体方法主要针对对手或者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也可能间接影响更广泛的民众。

1. 公开演讲

有些公开演讲可能会成为有重大意义的非暴力抗议行动。它们可能会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可能是正式演讲，也可能是宗教仪式上的布道。例如，1934年，德国纳粹党还仅仅是总理希特勒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一个党派，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并不属于纳粹党。1934年6月17日，帕彭在德国马尔堡大学发表演讲，对希特勒就任总理以来的形势发展提出警告，呼吁结束纳粹党的恐怖行为，恢复新闻自由。这是一个出乎人们预料的反抗行动，而且行动者是副总理。尽管存在审查制度，但这一演讲仍然在德国普遍传播，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另一个事件发生在1941年11月11日，当时六十五岁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主教区教长利希滕贝格在柏林圣海德维希大教堂布道时宣布，他和那些被驱逐到东欧的犹太人站在一起，分担他们的苦难，为他们祈祷。

还有一个事件发生在1943年11月18日，担任纳粹宣传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保加利亚首都在为一次炸弹袭击的受害者进行葬礼时，索菲亚主教发表了演讲，严厉抨击了保加利亚政府。”

2. 写信表达支持或反对

写信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是写给特定的人或者机构的私信，目的是传达特定的政治观点或者宣布某种意图。写信人可能是个人或者团体，也可能是许多人发出相似或者完全相同的信件。有时候，私信可能有意通过某种方式让公众知道。信件也可能以公开信（写给某个特定的人，但同样或者主要是为了影响公众）的形式发表。

信件作为一种非暴力抗议方法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是因为信件上签名者的身份和数量，或者发出相同或者类似信件者的数量，或者当时政治局势提升了这种行动的意义。例如，1941年12月，荷兰有超过四千名医生签署了一封致德意志帝国

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的信，要求他放弃成立强制性国家社会主义医生组织的计划。1941年5月，纳粹占领下的挪威，德意志帝国总督约瑟夫·特博文收到一封有四十三个组织和协会的代表签名的信件，信中列举了吉斯林²政权的一系列具体行动来支持对该政权的指控：“代理部长们在一系列事例中发布的命令和做出的决定，公然与国际法、挪威法律和全体挪威人民对正义的理解相冲突……”。1942年，不仅拒绝加入新的法西斯主义教师组织的挪威教师给挪威宗教和教育部写正式抗议信，学生家长也给该部寄去了数万封抗议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人民也有许多抗议纳粹反犹太政策的事件。例如，政府反犹的《民族保卫法案》提出后，国会、内阁部长、政治家及社会和政治领导人收到了洪水般的抗议信和电报。除了个人写的信件之外，保加利亚作家工会也给政府和国会写信，反对这一法案成为法律，因为这会“让一部分保加利亚人成为奴隶，还会玷污保加利亚的现代史”。保加利亚作家工会执行理事会和保加利亚医生协会执行理事会也表达了类似的反对意见。

当代历史也有许多这样的案例。例如，1968年8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³的代表发出一封公共信，对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该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⁴表示支持。就在同一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驻布拉格大使也收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议会和政府的一封信，抗议其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天后，即8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常务委员会致信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要求苏联工会呼吁苏联和华约军队立即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类似的信件也寄给了苏联官员和苏联公民，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主席致苏联科学院主席的公开信。

3. 机构和团体发表宣言

2 维德孔·吉斯林是纳粹德国占领时期的挪威傀儡政府首脑。——译者注

3 此次大会是在苏联及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天召开的。大会谴责了入侵。后来，这次会议被定为非法，其决议被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档案中剔除。另一次“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5月召开。——译者注

4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1968年1月至1969年4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主张“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推动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结果导致苏联与华约军队的武力干涉，杜布切克于1969年4月17日被迫辞职。——译者注

包括主教或者神父致教区信众的信，以及类似的教会正式宣言。例如，1942 年 8 月至 9 月，在维希政权⁵统治的法国，图卢兹和里昂教区的神父在布道讲坛上宣读反对驱逐犹太人宣言。1941 年 2 月 16 日，一封牧师致教区信众的信在挪威大多数布道讲坛上宣读（并且以印刷形式广为流传）。该信抗议法西斯分子违背法治政府的原则，抗议吉斯林政府干涉牧师为教区信众忏悔保密的义务。该信劝告当局“结束所有与上帝对于正义、真理、良心、自由和美德的神圣原则相冲突的做法，让一切完全建立在上帝的的生活法则之上”。1943 年 2 月，荷兰归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一份宣言和致教区信众的信中，敦促信众开展公民不服从行动，将拒绝合作作为宗教义务。戈培尔称其为“一封特别傲慢无礼的牧师信。”在纳粹统治时间，德国国内的教会也多次发表过反纳粹宣言。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领导的华约军队占领后，许多机构和团体都发表了支持改革的杜布切克政府，反对入侵的公开宣言。这些宣言是苏联无法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很快建立傀儡政权的原因之一。在华约军队跨过边界的第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就对五个入侵国政府和议会发表宣言，公开谴责入侵行动，要求立即撤军。还有许多机构也发表正式声明，支持杜布切克政权，反对入侵。⁶

4. 签署公开声明

发表以公众为主要目标，或者同时以公众和对手为主要目标的联署公开声明，也是一种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方法。联署者可能来自特定的组织、职业或者专业，也可能来自社会各界。

1905 年 1 月 9 日，俄罗斯圣彼得堡血腥星期日⁷之后，十六名科学院院士发表联署

5 1940 年 6 月，德国占领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1940 年 7 月，德国扶持的法国政府从巴黎迁至法国中部维希，因此被称为维希政权。——译者注

6 发表支持杜布切克政权、反对入侵声明的机构还包括：反法西斯战士协会、捷克斯洛伐克记者联盟常务委员会、中央工会理事会、国民议会、共产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民族阵线布拉格市委常务委员会、国家安全部门主要行政机关中的共产党各部门委员会、共产党官方报纸《红色权利报》和其他报纸的编辑、中央工会理事会和工会组织中央委员会、中央工会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共产党大学委员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作者注

7 1905 年 1 月 22 日，在乔治·加邦神甫的领导下，三万多名俄罗斯工人聚集在圣彼得堡冬宫广场，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一份有关改革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请愿书，要求选举民意代表，实施农业改革，减轻农民沉重的负担，实行宗教自由等。沙皇政府下令进行镇压。军队以武力驱散工人，造成一千

公开信称，这一事件说明政府需要进行改革。随后又有三百二十六名大学的著名教授和讲师发表了《三百四十二人声明》，该声明宣布，只有在“从自由选举中产生的人民代表，拥有立法和监督行政当局的权力”时，俄罗斯才能从教育中受益。俄罗斯一千二百名著名学者也联署了这一声明，声明被称为“促使知识分子感到急需变革的最杰出，或许也是最有效的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华约军队入侵大约十四个小时之后，在许多政府官员被捕的情况下，十四名政府官员仍然签署并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宪法和合法政府，谴责入侵的非法行为。

5. 发布起诉书和意向书

某些书面的控诉书，或者陈述未来新局面的意向书，或者两者相结合的声明，被认为具有如下特征：文件本身可以获得巨大反响，能够影响人们的忠诚和行为。《美国独立宣言》就是这样一份文件。该文件 1776 年 7 月 4 日由第二次大陆会议⁸通过。

《南非自由宪章》也是这样一份文件，该文件 1955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由南非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南非民主大会和南非有色人组织等四个团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小城克勒普敦联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艾伯特·卢图利写道：“在南非解放运动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启发民众的想象，就连反抗运动也无法与之相比。”《南非自由宪章》在列举了非暴力反种族隔离运动激动人心的社会、政治愿景之后总结道：“我们将要肩并肩，毕生为这些自由而斗争，直到赢得胜利。”

6. 团体或者群众请愿书

团体或者群众请愿书是为具体的不满寻求救济的书面要求或者请求，有大量个人联署签名，或者少数个人代表各自的组织、机构、群体签名（个体的请愿书一般不属

多人死亡。这一天被称为圣彼得堡血腥星期日。自此，俄罗斯工人对沙皇作出改革的希望彻底破灭，大大小小的罢工、集会和暗杀行动开始层出不穷。官方对这一事件的报告是：“乔治·加邦煽动演说，藐视宗教权威，鼓动工人聚集在皇宫前，拒绝服从警察命令，导致了血腥的冲突。”——译者注

8 指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在 1774 年至 1789 年组成的联合议会，是美国国会的前身。——译者注

于非暴力抗议与说服，因为它们通常只是个体的说服行动，不过也可能有例外）。我们从大量事件中选择了几个不那么有名的案例，说明使用这一方法时的多种可能性。请愿书事件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公元 183 年到 185 年，罗马帝国康茂德皇帝执政时期，非洲一处皇家地产的佃农向皇帝提交请愿书，要求免除他们承担的大量劳役。该请愿书由一位罗马公民作为全权代表寄给康茂德皇帝，表达了对皇帝的信任和对压迫他们的人（包税人⁹和代理人）的不满。此次请愿取得了成功，但其他向康茂德皇帝的请愿并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古代史上另一个类似事件是吕底亚（小亚细亚）阿迦贝伊一处皇家地产的佃农向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提交请愿书。该请愿书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免除市政义务（他们并不居住在城市，却要承担市政义务），二是免除其他形式的义务。佃农们用停工威胁皇帝，结果他们的市政义务被免除了。

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¹⁰描述了公元 201 年法国南部城市阿莱拉特的船东向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提交请愿书的事件。在第二次远征安息帝国¹¹期间，这些船东为罗马帝国运输军队和物资。罗斯托夫采夫写道：船东们在请愿书中抱怨“他们履行国家义务时遭遇的烦恼和承受的苛捐杂税。”船东还威胁要进行罢工。最终塞普蒂米乌斯皇帝改变了做法，甚至给予这些船东某些特权。

北美殖民地人民曾反复向英国政府请愿，这些请愿有时以殖民地议会的名义，有时以商人的名义。例如，1766 年 11 月，纽约市二百四十名商人向英国下议院请愿，要求对贸易和海事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北卡罗来纳安森县的二百六十名贫穷农民则向殖民地议会请愿，反抗该省的权势集团。请愿书列举了他们要求解决的问题，并且表示：“我们在无情的压迫面前俯首称臣已经太久了。”

1774 年 5 月 25 日，马萨诸塞湾省的非洲奴隶向总督盖奇将军、地方议会和众议院

9 包税制始于罗马帝国。是国家将某一种捐税按一定数额承包给私人或者团体征收的制度。这一制度由国家司库与一个或者多个私人、团体签约，与国家签约人称为包税人。包税人预先一次将税额交给国库，取得国家税收权后，再向纳税人征税。——译者注

10 俄罗斯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著有罗马和希腊历史的重要著作。——译者注

11 指公元 197 年，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入侵美索不达米亚。——译者注

请愿，要求立法给予他们自由，特别是允许他们的孩子在年满二十一岁时获得自由。请愿书声称：“自由是我们天然的权利”。

在更晚近的时代，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外国统治者（比如芬兰和埃及），在反对共产党政权时，都使用过请愿书的方法。例如，1898年，五十万芬兰人（芬兰总人口只有三百万）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抗议俄罗斯一项征募芬兰青年加入俄罗斯军队，并且服五年兵役的新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二百万人联署请愿书，要求组建埃及国家代表团，获得参加凡尔赛和平大会的权利。¹²

1953年7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耶拿蔡斯工厂一千五百名工人签署请愿书，要求释放埃克哈特·诺克斯（他在东德起义¹³后被判入狱三年），还要求在三天之内释放所有受到刑事指控的罢工者。

1956年11月初，一份有数十名匈牙利共产党作家和艺术家精英签署的备忘录，要求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制止官员使用“令我们的文化生活陷入瘫痪的反民主手段”。该备忘录还表达了以下观点：“……消灭困难和错误观点的唯一基础就是‘满怀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自由、真诚、健康和民主氛围。”像本章中的其他方法一样，请愿的案例无穷无尽。

（二）向广大受众传播信息

这一子类别中的方法是为了向广大受众传播思想、观点和信息，赢得第三方的同情和支持，或者为非暴力运动争取参与者和支持者。该类别既包括视觉方法，也包括语言方法。

7. 标语、漫画和象征符号

非暴力抗议最常见的象征符号包括书写、绘画、印刷、模仿、动作或者语言。波兰

12 当时埃及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参加凡尔赛和平大会的权利。——编者注

13 1953年6月16日，东柏林三百名建筑工人进行罢工，反对国有企业提高工作定额而不加薪。这一消息经位于西柏林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RIAS）播报后，迅速发展成遍及东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参与者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等。起初东德警察进行了镇压，随后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出动坦克上街屠杀，酿成五十五人死亡的流血惨案。——译者注

的犹太历史学家伯纳德·马克教授指出，从1941年夏天到1942年5月，柏林犹太青年抵抗团体鲍姆小组一直从事此类行动，期间没有一个人遭到逮捕。

“半夜带着颜料桶和刷子出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不过，鲍姆小组的年轻抵抗战士依然满怀热情地张贴传单，在墙上刷标语。该团体认为，这种行动可以考验其成员的革命激情，也是提升他们的革命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最佳方法。”

在墙上、大石头上和栅栏上涂画象征符号，常常用于表达抗议。例如，在纳粹占领期间，代表流亡的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的HVII符号随处可见。核裁军运动的标志和纳粹德国的万字符号在各个国家也都能看到。1943年初，慕尼黑学生抵抗组织白玫瑰团体的青年成员在墙上涂满“**打倒希特勒！**”的标语。1942年，纳粹占领下的波兰，一个自称小狼的青少年抵抗团体成员用擦不掉的颜料在德国占领军卡车、汽车、住宅，甚至在德国人的后背刷上“**波兰在战斗！**”的标语，这些标语每天早上都出现在首都华沙街头。这些行动者也会张贴漫画和海报。据一名波兰评论员说：“这一小伙淘气而且有着魔鬼般效率的行动者，对于培育蔑视德国人的心理氛围和抵抗精神起到了很大作用。”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首都布拉格的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列宁，醒来吧！勃列日涅夫疯了！**”

8. 横幅、海报和印刷品

书写和绘制印刷品——比如横幅、海报——十分相似，可以归为一类，不过它们也有可能相当不同。1916年12月4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对国会发表演讲时，妇女选举权倡导组织国会联盟的五名成员在旁听席上拉开一条黄色织锦横幅，上面写着：“**总统先生，你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做了什么？**”

1930年到1931年，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街道的地面成了印度国大党的公告栏。德国鲁尔抗争¹⁴期间，德国抵抗战士撕下法国占领军的公告，换上自己的海报。

14 1923年至1924年，由于德国未能及时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战争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德国民众对占领行动进行了反抗。在反抗斗争中，大约有一百三十名德国平民被占领军杀害。1924年7月至8月，在英国和美国的压力下，法国和比利时从鲁尔撤走了军队。——译者注

1942 年，荷兰鹿特丹市墙上贴满海报，敦促人们尊重被纳粹逼迫佩戴黄色六角星的犹太人。1960 年，英国蒙克顿委员会¹⁵访问其位于中非的保护国罗德西亚（今天的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天的马拉维）联邦¹⁶（非洲黑人痛恨该联邦，认为它是欧洲控制非洲的工具）的时候，当地村镇和城市经常出现呼吁人们抵制该委员会的海报。

1968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晚上，华约军队占领布拉格，撕掉呼吁公民爱国和抵抗的海报，贴上自己的公告。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报》曾对此进行报道：“占领军这么做是徒劳的！新的海报第二天早上又贴出来了。布拉格就像一张巨大的海报，要求‘占领者回家去！’”布拉格-沃斯维斯火车站旁边高高的烟囱上也刷上了“要友谊不要占领！”。8 月 25 日早晨，布拉格所有公共汽车上都涂写了“联合国：S. O. S”的文字。市中心的商店橱窗也变成了巨大的海报展示区。一辆小汽车上贴着“他们占领了查理大学！”的海报在街道上行驶。

9. 传单、小册子和书籍

出版和散发传单、小册子和书籍，主要目的是对政府的整体政策，某一具体政策，或者对整个政权表达反对或者支持。在压迫和斗争的政治形势下，这一方法也是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散发传单是异议团体最常用的传播方法，在有审查制度的地方，书籍也可以成为一种传播方法。（与仅仅表达异议的文字不同，呼吁积极抵抗的文字通常属于“政治不合作”。）

例如，在美国费城《独立宣言》发表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一群妇女选举权倡导运动活动家闯进会场，向大会和主席散发《妇女权利宣言》传单。大约 1942 年，在纳粹占领的波兰领土总督府¹⁷，地下组织对一场向波兰人宣传纳粹德国各种成就的运动进行了反击。地下组织制作了外观与纳粹宣传运动几乎一模一样的宣传品，把

15 正式名称为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宪法审查咨询委员会。1960 年英国政府组建该委员会，目的是调查并就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或称中非联邦）的未来提出建议。——译者注

16 又称中非联邦，是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其范围大概包括今天的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译者注

17 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被德军占领的波兰领土中未直接与德国合并的地区。——译者注

内容换成了揭露一系列纳粹实施的暴行和处决行动。1941 年初，挪威各民间组织给德意志帝国总督约瑟夫·特博文的抗议信被人们印刷了成千上万份（文本来自英国对挪威的广播稿）在该国到处流传，据说产生了激动人心而强有力的影响。

1941 年至 1942 年，柏林犹太青年抵抗团体鲍姆小组的成员开展了五个方面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印刷、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他们把这些印刷品寄到私人住宅和办公室，到工厂向工人散发，还在夜里张贴到墙上。慕尼黑学生抵抗组织白玫瑰团体的成员印刷了许多反纳粹传单，在慕尼黑和德国南部其他城市传播。传单通常放在居民门外的信箱里，也在慕尼黑大学公开散发。1959 年 4 月至 5 月，反对核战争直接行动委员会¹⁸在英国诺福克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散发传单行动。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领导的华约军队占领后，要求华约军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坚持忠于合法政府，呼吁抵抗的传单到处流传。一封《致华约士兵的呼吁书！》敦促他们“像朋友一样离开我们的领土，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与此同时，苏联人也用直升机和汽车散发“打着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旗号的”占领军的传单。

在更大的行动和变革的过程中，书籍对于唤醒民众和表达观点十分重要。无论这些书籍是官方允许的，还是被审查制度禁止的，这种影响都有可能出现。在后一种情况下，书籍会以手稿、打印稿或者印刷稿的形式在国内非法出版，或者从没有审查制度的邻国偷运进来。这类书籍中，有一本是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

《怎么办？》，这本书表达了革命民粹主义的重要思想，是作者 1862 年至 1863 年在狱中写成的。因为俄罗斯审查员的疏忽，这本书得以出版。该书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期刊《现代人》上，它“影响了整整一代民粹主义学生和革命者，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蓝图”。该书指出：革命者应该坚决反对专制统治，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大量的书籍对社会、经济、宗教或者政治冲突产生过巨大影响。

10. 报纸和期刊

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报纸和期刊，作为促进出版者拥护的观点和事业的媒介，

¹⁸ 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存在于 1957 年至 1961 年。旨在“协助进行非暴力直接行动，使英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彻底放弃核战争及核武器作为裁军的第一步。”——译者注

都曾反复出现在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历史中。在报纸和期刊非法存在的情况下，这一方法就与公民不服从（第 141 种方法和第 196 种方法）和“政治不合作”的方法合而为一。

公元二十世纪初俄罗斯革命¹⁹期间，出版和散发的非法报纸和期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纳粹占领挪威期间，非法的报纸和期刊也曾广泛出版和传播。在丹麦、荷兰和波兰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政治环境允许的地方，报纸和期刊上的文章和广告也可以用于表达反对的观点。

11. 唱片、电台和电视台

在一定的条件下，唱片、电台和电视台也可以成为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工具。用留声机播放的唱片可以通过录制音乐、演说或者演讲来传达思想。1960 年代，美国许多摇滚乐都用于表达异议和不满。例如，鲍勃·迪伦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

一个人能够多少次扭过头去，假装视而不见？

一个人要听到多少次痛苦的哭声，才能引起注意？

目前的状况要持续多久，人们才能感受到自由？

几十年来，各种政治团体一直通过散发唱片来传播带有明确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的歌曲。1968 年 8 月 24 日清早，许多布拉格人收到了刚刚发行的唱片，其中录有 8 月 22 日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声明。该声明对全国人民呼吁，谴责苏联入侵，拒绝接受对入侵的辩解，要求释放所有被拘禁的政府官员，要求占领军撤离。

“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既不接受军事占领当局，也不接受占领当局扶持的国内傀儡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民众和抵抗者的电台广播在被占领国普遍传播。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占领后，电台广播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案例。地下电台——有些在苏联占领后继续运转了两个星期——不仅报道被占领的信息，也报道

¹⁹ 指 1905 年发生在俄罗斯帝国的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的暴力攻击、罢工、农民反抗、暴动等事件，这些事件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政府于 1906 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并成立国家杜马、实行多党制。——译者注

反对入侵的宣言；呼吁采取具体的抵抗行动，要求人们在斗争中保持和平纪律，对暴力行动发出警告；反对与入侵者合作，提醒人们警惕谣言。同时，电台还承担了一部分应急管理功能。这些电台不是在被苏联占领军控制的正规演播室广播，而是在私人公寓和其他地方广播。

12. 天书和地书

把文字和符号写在天空和大地上，向远方的人们传播信息。1969 年 10 月 15 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进行的反越战集会的上空，有人用飞机书写了一个巨大的核裁军符号。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市附近的牧场主埃德温·弗雷泽则使用了在大地上书写的方法。从米拉玛海军航空站起飞的飞机发出的音爆声影响了埃德温·弗雷泽的正常生活，一开始他用较温和的方法进行抗议，但没有人理他。于是他在自己的牧场上犁出了巨大的**安静**一词。其他类似的方法还有，把两种对比鲜明的农作物或者树木种成想要的图案，或者在山坡、山顶上把石头、灌木排列成文字或者符号。

（三）团体陈述

团体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做出支持或者反对某些政策的立场陈述。本节列举的 5 种方法中，有 4 种需要采取行动的個人或者团体现身于事件现场，有一种则不需要²⁰。

13. 代表团

表达抗议或者反对的方式，可以是一群个体志愿者、一个团体或者多个团体的代表组成代表团一起面见专门负责处理这一问题的官员（或官员的代表）。有时候，代表团也会要求对方考虑或者采纳某种新的政策或者措施。

1890 年左右，在中国北京附近一个地区，纳税人派代表团前往帝都，要求惩处营私舞弊的地方征税员（任意调整铜钱和银子之间的兑换率并从中获利）。派去的第一个代表团没有成功，代表团成员每人还各挨了五十大板，并被罚了款。第二个代表团成功了，征税员随后被解雇，禁止今后在政府部门任职。

20 指模拟选举，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或者网上投票采取行动——编者注

沙皇尼古拉二世曾颁布法律，把芬兰军队并入沙俄军队，还于 1899 年 2 月 15 日发表宣言，称他有权不考虑芬兰国会的意见，并可替芬兰制定法律。此后，一个五百人的代表团带着一封有五十二万三千人签名（大约占芬兰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的抗议请愿书要求面见沙皇。但遭到了沙皇的拒绝。

1958 年 11 月 1 日，伦敦一个名为日内瓦父母委员会的组织向日内瓦派了一个妇女代表团，会见即将召开的禁止核试验大会的代表，要求永久结束核试验。1963 年 12 月 18 日，三百多名在莫斯科留学的非洲学生进行示威活动，抗议莫斯科的种族歧视。非洲学生游行到克里姆林宫，并派学生代表团面见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

1968 年 8 月 24 日，捷共布拉格市委常务委员会向苏联大使馆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释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勃胡米尔·西蒙²¹。苏联大使馆专员一开始说完全不知道西蒙的情况，后来又说西蒙的情况很好，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释放他。

14. 模拟颁奖

行动者可以用讽刺性地给对手“颁奖”来表达不满，也可以呼吁“荣誉”的接受者纠正某些问题。例如，1969 年 11 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有关工业污染的听证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波士顿地区生态行动团体给波士顿爱迪生电力公司颁发了本月污染者奖。此前曾出现大量该公司的发电厂严重污染空气的投诉和诉讼。

15. 团体游说

如果选民个人会见议员，通过游说影响议员在议会的投票，这种游说一般只是用语言表达观点。但是，如果是团体行动，游说就成为一种集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因为团体游说除了说服议员之外，还因游说而聚集起足够多的人群，这本身就可以成为一次示威行动。也可以采取小组游说的方式：一系列人数适中的小组，在某一时间，某一段时间，或者分若干次会见议员，影响他们在议会的投票。例如，1966

21 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经济学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七七宪章》签署人之一。——译者注

年春天，美国贵格派²²国家立法委员会²³发起，若干个人和团体连续数星期，每星期三前往首都华盛顿会见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讨论美国的越南政策。团体游说也可以把重点放在组织大量民众在某一天聚集起来，一起向议员游说，这就成为群众游说。例如，1965年3月8日，伦敦反种族隔离运动对下议院议员进行了一次群众游说，敦促议员采取官方行动，通过武器禁运、联合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表达坚定的反对立场。

16. 纠察

纠察是说服他人不要进行特定行为，也是一种抗议方法。采取的手段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出现在与涉及问题相关的重要地点。纠察时可以站、坐或者来回走动；可以携带标语牌，也可以不带；可以发传单，也可以不发；可以与别人交谈，作为推进目标的手段，也可以不交谈。

纠察通常与罢工有关（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主要是为了防止罢工破坏者接替罢工者的工作，或者防止罢工者在达成协议之前回去工作。劳动经济学学者劳埃德·雷诺兹指出：

“工会发明了一种让工人离开罢工工厂的方法，即纠察。罢工者在工厂大门前巡逻，用标语牌和交谈的方法告诉人们，这里正在进行罢工。请求进入工厂的工人不要去工作。工人下班离开工厂时，一名纠察队员可能会陪他走上几步，劝说他第二天不要来上班。在有经验的行动者的指导下，纠察可以成为一种有效而和平地说服方法，但也可能发生身体冲突。要让纠察充分发挥作用，必然涉及道德压力。纠察是一种以理规劝、羞辱或者警告罢工破坏者的方法。”

纠察也可以成为一种告知民众发生了罢工事件和罢工想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征求民

22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公元十七世纪起源于英国，创始人是乔治·福克斯。贵格派的信徒因受到英国国教迫害，与清教徒一起移民到美洲，随后又受到清教徒的迫害。贵格派支持废除奴隶制，在美国废奴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目前贵格派大约有六十万信徒。——编者注

23 一个公民利益的游说组织，由贵格派成员于1943年成立。该组织致力于社会和经济正义、和平、环境保护和良好的美国政府。——译者注

众的同情和支持的方法。

纠察也可能涉及政治不合作，就像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发动的非暴力斗争那样。1930年，印度非暴力行动者在法院外面纠察，劝说诉讼当事人去找五人长老会（乡镇解决纠纷的传统组织，印度国大党复兴了这一传统）解决纠纷；行动者在公立学校和学院外面纠察，劝说学生加入独立于英国政府的民族机构；行动者在出售遭到抵制的商品的商店外面纠察，劝说消费者不要购买遭到抵制的商品；行动者在政府大楼外面纠察，劝说在政府任职的印度人为了印度的独立事业放弃工作；行动者还在出售烟酒的商店外面纠察（通常由妇女担任纠察员），劝说顾客不要购买这些商品。

纠察也可以用于到某些政府机构的办公室、总部，抗议他们的整体政策、具体政策或者行为。1917年1月10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在白宫外面纠察，纠察行动持续了数日之久。参与纠察的是倡导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活动家，她们用纠察的方法抗议威尔逊总统在妇女投票问题上的不作为。同年3月，有将近一千名倡导妇女选举权运动活动家在白宫外面纠察。1958年10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抵达旧金山市政厅的时候，迎接他的是由二百名北加州废除核武器委员会的活动家组成的纠察线。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阿瑟·沃什科曾写道：在美国北方的一些城市，白人家长在学校董事会办公室外面纠察，要求结束教育系统事实存在的种族隔离。

纠察本身也可能是非法的（就像大多数非暴力行动方法那样）。即使是在议会民主国家，实施纠察行动也会受到限制。例如，英国在1946年之前将近二十年时间都限制纠察行动。朱利安·西蒙斯²⁴在评价1926年英国总罢工²⁵之后颁布的《1927年劳动争议与工会法》中包含的一些条款时写道：这些条款“限制纠察的权利，用词过于含糊，以至于任何形式的纠察都可能遭到起诉”。（《1927年劳动争议与工会法》于1946年废除。）

24 英国作家、诗人，也是社会和军事历史、传记和文学研究的学者。——译者注

25 英国各行业工会为声援煤矿工人“抗议降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而进行的罢工。1926年5月4日开始，持续了九天。高潮时罢工总人数接近六百万。除煤矿工业外，电气、钢铁、铁路、建筑和印刷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英国所有大工业中心都陷入瘫痪。在此情况下，政府多次同工会领导人谈判，各工会的经费也日渐拮据。5月12日，各行业工会决定复工，但矿工工会拒绝复工，单独坚持罢工达六个月之久。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赢得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尊敬和支持，也在英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冲击。——译者注

在公民拥有较高自由度的国家，纠察常常用于公开抗议本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的政策。大使馆、领事馆、法院、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等，都有可能成为包括纠察在内的抗议活动的地点。纠察在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行动持续多长时间，实施何种程度的说服或者阻碍，以及参加的人数的多少——从象征性的一群人到大规模纠察等等。在特殊情况下，纠察还可以与其他方法——比如罢工、抵制和绝食——结合使用。

17. 模拟选举

作为一种抗议手段，反对派团体可以进行法律之外的模拟选举，或者就有关议题进行民众直接投票。模拟选举可以建立专门的投票站，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收集投票，比如挨家挨户打电话。如果正式宪政选举制度的运转受到限制，不让反对派充分参与，或者完全禁止反对派参与，那么较大的反对派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果能够充分参与正式选举制度的少数派认为需要额外的手段让自己关注的议题影响民众，也可以使用模拟选举的方法。

1963 年和 1964 年，美国密西西比州就使用了这种方法。民权团体建立了自由登记站，任何想登记的密西西比州居民都可以登记，无论是否受到法律限制——这一手段²⁶经常被用于剥夺黑人的公民权。（当时，在密西西比州正式选举中，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只有百分之七，也就是说，只有二万三千人进行了合法的选民登记。）大约八万三千黑人进行了自由登记和自由投票，从正式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以及民权团体提名的候选人中选举州长和副州长。美国种族平等大会²⁷前任领导人詹姆斯·法玛尔指出：“模拟选举不仅是一个吸引全国人民注意力的手段，事实证明，它还是一种出色的教育方法，它让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学到了投票的方法和手段。”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阿瑟·沃什科指出：如果黑人在正式的地方选举中都投票给少数派候选人，选票就可能改变选举结果。因此，“模拟选举证明，如果能够参与

26 例如有犯罪记录者不能行使投票权等法律规定。——译者注

27 成立于 1942 年的美国著名非营利组织，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宗旨是“为所有人争取平等，不分种族、信仰、性别、年龄、残疾、性取向、宗教和种族背景。”——译者注

正式的政治制度，黑人拥有十分巨大的力量”。

1964 年秋天，受到黑人广泛支持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在被拒绝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之后，进行了自己的选举。他们邀请所有密西西比州居民参加投票，候选人名单上包括所有正式候选人和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后者在将近八万名选民中取得了胜利。然后，三名新当选的女性自由民主党议员对正式当选的议员在美国众议院中的席位提出了挑战，起诉密西西比州剥夺公民投票权（该州百分之四十三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被禁止参加投票），但未能成功。

（四）象征性公开行动

非暴力行动者用象征性行动表达观点或者不满的方法有很多。这些行动方法已经流行多年，此处列举的具体方法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

18. 展示旗帜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

展示民族、宗教、社会、政治团体的旗帜，展示代表此类团体的颜色，或者展示某种具有其他象征意义的旗帜或者颜色，是一种常见的非暴力抗议方法。展示这些东西的动机常常是为了唤起民众深层的情感。

1865 年 6 月 6 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访问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由于当地民众普遍反对奥匈帝国的统治，支持匈牙利自治，所以只有屈指可数的居民悬挂了帝国国旗。后来在总督帕菲的命令下，整个城市都悬挂了旗帜，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看了非常高兴——直到他发现那些旗帜是象征匈牙利独立的旗帜²⁸。

在许多种场合，黑色旗帜都是抗议和反对的象征。1928 年，印度民族主义者拒绝与来访的英国议会西蒙调查团合作时使用过它，1957 年，泰米尔少数民族在锡兰²⁹使用过它，巴基斯坦民众反对印度吞并克什米尔时也使用过它。

1930 年 1 月 26 日，印度民族主义者庆祝第一个独立日³⁰时升起印度国旗。此后，

28 两种旗帜都有红、白、绿三种颜色。——编者注

29 现在的斯里兰卡。——译者注

30 1930 年 1 月 26 日，印度国大党发表《印度独立宣言》，呼吁人民将这一天定为印度独立日，以此作为印度独立和团结的象征。——译者注

他们在许多示威和庆祝活动中都升起国旗。1956 年 12 月，东德耶拿大学学生在举办冬季舞会的大厅里展示匈牙利红、白、绿三色国旗，表示对匈牙利革命³¹的支持。

1963 年，在南越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佛教危机³²事件中，政府禁止佛教徒展示佛教旗帜成为这场冲突的重要原因。当年 9 月 9 日，西贡市朱文安男子高中的学生在以中国人为主的居住区——堤岸区扯下了政府的旗帜，升起了佛教的旗帜，之后有超过一千名学生被捕。1968 年 8 月 21 日，苏联为镇压布拉格之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天，民众举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走上街头，圣瓦茨拉夫³³的雕像也披上了国旗。学生们还带着一面血迹斑斑的旗帜聚集到瓦茨拉夫广场。四天之后，全布拉格市的国旗都降半旗。

人们有时也会用不寻常的方式展示表明政治观点的旗帜。1969 年 1 月 19 日早晨，一面十五英尺长、六英尺宽的越共旗帜飘扬在二百四十英尺高的巴黎圣母院中心尖塔的顶端。政府派直升机才把它撤下来。

19. 佩戴象征符号

政治异议也可以通过在身上穿戴某种服饰、颜色、徽章、花朵等进行表达。例如，1792 年冬天，自由红帽成为法国无套裤汉³⁴的时髦装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丹麦学生头戴红、白、蓝三色帽——模仿皇家空军的徽章——作为反对纳粹占领的象征。挪威人反对纳粹占领的象征是红帽子。在德国和法国，当纳粹强制犹太人佩戴黄色六角星之后，犹太人的同情者也佩戴黄色六角星。在荷兰，人们对犹太人同情和支

31 1956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匈牙利民众对政府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示威抗议活动。以学生运动开始，以苏联军队入侵，并配合匈牙利国家安全局进行镇压结束。匈牙利革命期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并试图推动自由化改革和退出华约组织的伊姆雷·纳吉等几名主要领导人遭到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处决。——编者注

32 发生在 1963 年 5 月至 11 月。其导火索事件是 5 月 8 日佛诞日，顺化九位平民因抗议吴廷琰的天主教政权禁止悬挂佛教旗帜而遭到越南共和国（南越）军人的枪杀。越南人大多数是佛教徒，吴廷琰歧视佛教徒的政策使民众普遍感到不满。这场斗争导致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吴廷琰政权。在佛教危机发生后，南越外交部部长武文牡宣布辞职，并剃发如僧侣，以示对总统吴廷琰的抗议，因此被逮捕入狱。——译者注

33 捷克历史上普热米斯尔王朝的波希米亚公爵，被捷克人民奉为圣人。——译者注

34 指公元十八世纪晚期法兰西底层百姓。这一名称源于他们的装束无套裤。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和好战的革命者。——译者注

持的方法是将黄色花朵佩戴在衣领上。在挪威，人们佩带国王哈康七十岁生日庆典上同样的花朵和印有“团结一致”的标志表达对犹太人的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苏联入侵的最初几天，市民把红、白、蓝三色国旗做成彩带佩戴在身上。南越人使用的象征性抗议方法是改变自己的外貌。释一行禅师³⁵写道：1963年，在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外交部长武文牡辞职，并且“剃光头抗议该政权的暴力政策。此后，许多教授和大学生纷纷效仿。武文牡剃光头抗议的行动深深影响了大学生和教授开展的运动”。

人们怎样穿戴，是否穿戴，以及何时穿戴某种服装，也能象征性地表达特定的观点。例如，1789年5月5日，在三级会议³⁶开幕式上，法国国王违背不戴帽子的古老习俗，将帽子戴在头上，教士和贵族纷纷效仿。第三等级的平民代表也“挑战性地戴上了帽子”。

20. 祈祷和礼拜

人们可以用祈祷和礼拜等宗教仪式表达道德谴责甚至政治抗议。祈祷或者礼拜的内容、地点、日期，以及当时的情况（比如政府发出了驱散示威者的命令，或者逮捕示威者），都可以使表达道德谴责甚至政治抗议的目的更明确。

弗吉尼亚省伯吉斯议会³⁷在得知英国政府计划于1774年6月1日关闭波士顿港的消息后（英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报复波士顿的抵抗行动），为了声援波士顿人民的斗争，该议会于5月24日做出决议，把6月1日定为禁食、耻辱和祈祷日。美国历史学家亚瑟·史列辛格写道：“总督邓莫尔确信，禁食是让人们做好心理准备，以接受另外一些煽动性更强的决议。因此，他在5月26日解散了弗吉尼亚省伯吉斯议会。”

35 俗名阮春宝，是越南著名的佛教禅宗僧侣、作家、诗人、学者、和平主义者。出版有上百本著作。1960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宗教比较学，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佛学。1963年，他回到越南，协助佛教僧侣开展非暴力和平运动，1973年被迫流亡海外，长期居住在法国，2005年才首度获准回越南访问。——译者注

36 法国人民代表应国王召集举行的会议。参加者分三级：第一级神职人员、第二级贵族、第三级平民。该会议通常是在国家遇到困难，国王寻求援助时才召开，是不定期会议。——译者注

37 弗吉尼亚殖民地立法机构，成立于1642年。在此之前，弗吉尼亚议会只有一院，伯吉斯议院成立之后，弗吉尼亚议会成为两院制机构。——译者注

1942 年，德国占领波兰，毁掉了所有纪念波兰民族英雄和爱国事件的遗迹。“波兰人知道，在被毁掉的遗迹原址附近徘徊会受到监视，但波兰人仍然会到那些地方去，并且在那些地方进行祈祷仪式。”

1952 年，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期间，祈祷是反抗的重要组成部分。利奥·库坡³⁸这样写道：

1952 年 7 月，在审判十名抵抗者的埃滕哈赫市法院外面，成百上千名民众在一位戴着红色披肩的老年妇女的带领下，跪下祈祷。在东伦敦市，法院以没有夜间通行证为由审判八十五名活动家的时候，大约二百五十名民众聚集在外面唱赞美诗和祈祷。大约一千名民众聚集在伊丽莎白港法院外面唱赞美诗，为受审判的抵抗者祈祷。8 月，伊丽莎白港有大约五千名民众为迎接出狱的政治犯祈祷。

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艾伯特·卢图利说：1959 年，非洲妇女在伊索波市进行示威活动，当警察命令她们解散的时候，“她们跪下开始祈祷！警察只能无可奈何地围着她们走来走去”。

1961 年 11 月 12 日，英国纪念战争中死去的军人和平民的国殇纪念日的第二天，大约一千人参加了基督教励行会和基督教核裁军运动团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进行的反对战争、支持核裁军的公开礼拜仪式。

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1962 年 8 月，六名民权活动家跪在美国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市政厅台阶上祈祷。1963 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人们在不同场合进行公开祈祷：

5 月 5 日星期日，日落前不久，大约二千名黑人从新建成的朝圣者浸信会教堂走出来，面对警察，在一名牧师的带领下，安静地跪下来开始庄严地祈祷：“让他们用水枪扫射我们吧，让他们放狗咬我们吧，我们不会离开，主啊，宽恕他们吧。”

38 专门研究种族灭绝的南非社会学家。——译者注

或许有那么一小会儿，祈祷触动了公牛康纳³⁹内心，他同意祈祷者穿过警察的防线，在市监狱附近一个小公园里停留十五分钟，在那里继续祈祷，唱赞美诗，让监狱里关押的成百上千名政治犯能听到。然后祈祷者返回教堂，并且宣布，将在星期一进行一场进军。

1963年，在南越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天主教教徒、顺化大学校长高文伦神父带领学生到慈云寺塔上祈祷，抗议政府对佛教徒的迫害。1966年6月，南越顺化和广治的佛教徒在街道中央立起祭坛，进行宗教仪式，抗议政府军利用街道对城市进行控制。释一行禅师指出：把家庭祭坛搬到街道上阻挡坦克的行为“不亚于尊者释广德⁴⁰的自焚”。他高度赞扬这一行为是使用“传统价值反对暴力”。这种方法不仅涉及非暴力抗议与说服，还涉及非暴力心理干涉。这一年，越南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反对越南战争⁴¹的宗教祈祷仪式。据报道，这些宗教仪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1966年6月30日，美国参议院休会期间，十二名基督教贵格派成员在参议院旁听席进行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安静祈祷，抗议参议院在对北越轰炸加剧之际休会。这次祈祷的参加者因非法闯入议会（在被法警命令离开的时候拒绝离开）遭到逮捕。

1905年，俄罗斯革命中的十月大罢工⁴²期间，中小学学生也用过与此有关但相当不

39 指尤金·康纳，他是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反对民权运动的政治人物。公牛是其绰号。——译者注

40 越南大乘佛教僧人。1963年6月11日为了抗议南越吴廷琰政权对佛教徒的迫害，六十六岁的释广德在西贡市一个十字路口用汽油引火自焚。自焚场面被《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坦记录下来并进行了报道，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译者注

41 越南战争（1955年—1975年），简称越战，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抗受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国）的一场战争。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的战争，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北越击败南越并统一越南。——编者注

42 俄罗斯革命的标志性事件。1905年10月6日，莫斯科至喀山铁路附属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罢工就席卷了莫斯科枢纽站的大多数铁路线。五天后俄罗斯十四条最大的铁路线全部瘫痪。铁路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政府立即召开以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权为基础的制宪会议。罢工工人的要求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很快罢工斗争就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中展开。据估计，参加这次大罢工的工人人数超过一百七十五万。很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全国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沙皇派出军队对罢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人们不屈不挠，顽强斗争，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做出让步，于10月17日签署了一项“赐予”政治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译者注

同的方式进行政治抗议：

沙皇镇是一个小城，绝大部分区域是皇宫。先是当地男子中学的学生进行了罢课，随后女子中学的学生也加入进来；小学学生表达抗议的方法是在老师带领他们读晨祷词的时候，用吹口哨作为回应。

21. 投递有象征意义的物品

为表达自己的观点，抗议者可以用各种方法给与某项政治议题有关的政府官员或者政府机构投递象征该政治议题或者斗争目标的物品。例如，索尔·阿林斯基⁴³写道：在芝加哥，伍德朗组织——一个黑人贫民区的社区组织——要求市长采取行动，应对该社区的恶劣环境。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在市政厅台阶上堆满死老鼠。1961年10月，在伦敦，为了抗议苏联核武器试验，百人会团体的支持者购买了成百上千瓶牛奶，并给每瓶牛奶贴上“**危险——辐射**”的红字标签，然后把这些牛奶放在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门外。

肯尼迪总统在1960年竞选声明中曾经承诺，要消除在联邦资助住房领域的歧视。詹姆斯·法玛尔⁴⁴写道：据可靠消息证明，总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起草了有关这一议题的行政命令，但到1961年总统仍然没有签署。不久，种族平等大会加入了倡导这一议题的广泛运动。“我们估计肯尼迪的笔没有墨水了，所以无法签署命令。1963年，我们发起了一个行动，给白宫寄去了成千上万瓶墨水。”

22. 脱衣抗议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近年又重新焕发生机——的非暴力抗议方法。通常用于表达宗教反对或者政治抗议。公元十七世纪，基督教贵格派“入侵”不宽容的清教徒改革宗占主导的马萨诸塞湾省殖民地，贵格派成员莉迪亚·沃德尔光着身子走进纽伯里教堂进行抗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杜科波尔教派⁴⁵的分支自由之子派成员因进行过“数不清的裸体游行”而著称。在某些案例中，有些妇女还会点燃自己

43 美国作家和活动家，现代社区组织的创始人。因《激进者守则》一书而闻名。——译者注

44 美国民权运动领导者之一，发起和组织了1961年第一次自由乘车运动，这一运动最终导致美国州际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译者注

45 源于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教派。除了上帝之外，该教派不承认任何权威。——译者注

的房子，在燃烧的房子前面脱掉衣服，抗议政府干涉或者起诉她们的丈夫实施的反抗活动(其中包括恐怕活动)。1962年5月28日，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特雷尔市出席政治集会，一些丈夫因实施恐怖活动而待审的杜科波尔教派妇女打断集会，泪流满面地抗议杜科波尔教派遭的不公平待遇，并且把脱掉衣服作为抗议的一部分。

近年来，美国发生了若干起年轻人在反战和社会运动中脱衣抗议的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1969年2月5日爱荷华州格林内尔学院。当时，《花花公子》杂志的一名代表正在该学院演讲，大学生进行脱衣抗议，反对该杂志“在性问题上哗众取宠”。

23. 破坏自己的财产

这是一种不常见的非暴力抗议方法，采取的手段是自愿破坏自己的财产，以证明强烈的反抗意志。如果该破坏行为存在危险，要事先让其他人撤离到安全的地方，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早期北美殖民地的爱国者曾公开销毁包含他们反对的政治内容的信件。1770年7月，纽约商人决定打破殖民地政府禁止进口英国货物的政策，并且把他们的决定邮寄到费城、波士顿及周边地区。“在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麦迪逊⁴⁶和他的同学们身着黑色长袍，伴随着学院敲响葬礼时的钟声，庄严地将纽约商人寄来的信焚烧掉。”“在波士顿，法尼尔会议大厦举行的一个贸易会议一致投票决定：‘应该在愤怒、厌恶和憎恨中，立即将纽约商人的来信撕成碎片，扔进风中，不值得引起丝毫注意。’”

为了支持对英国货物的经济不合作运动，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市的商人成立了一个抵制印度茶叶（无论是否含税）协会。在该协会的动员下，学童们从居民家里收缴茶叶，在1774年11月5日火药阴谋日⁴⁷公开焚烧。1775年3月2日，完全停止消

46 美国开国元勋、第四任总统。因为起草《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而被誉为宪法之父。——译者注

47 1605年11月5日，以盖伊·福克斯为首的一群天主教极端分子试图炸毁英国国会大厦，杀害包括正在其中参加国会开幕典礼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和新教贵族的未遂事件。——译者注

费茶叶行动开始的第二天，人们在罗德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市焚烧了三百磅从居民家里收缴的茶叶。

1775 年 2 月，英国军官莱斯利上校从波士顿乘船前往马布尔黑德港，去没收北美殖民地人民为安保而布置的大炮。

一个星期日的早上，莱斯利上校和他的小分队到达马布尔黑德港。当警报传到最近的教堂时，信众们蜂拥而来，阻挡了莱斯利上校前进的道路。人们拒绝放下吊桥，因为莱斯利上校和他的小分队没有通过吊桥的通行权；莱斯利上校找到了几艘船，但船主们纷纷把船凿沉。士兵们拔出刺刀，刺伤了一些阻止他们的行动者……

加拿大杜科波尔教派的分支自由之子派，有焚烧自己的房子抗议政府管制或者抗议政府镇压抵抗行为（这些抵抗行为有时甚至非常暴力）的传统。

1918 年和 1919 年，美国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活动家在华盛顿特区公开焚烧了威尔逊总统的讲话稿复本，理由是总统没有尽一切努力给予美国妇女选举权。

其他象征性行动的案例还包括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焚烧英国进口布料（象征放弃对英国的依赖，决心建立一个自由和自力更生的印度）；匈牙利革命期间破坏布达佩斯的斯大林像。

在某些案例中，这一方法还包括破坏由政府、政党或者某些组织颁发的文件，政府、政党或者某些组织要求或者期望人们长期持有、携带这些文件——包括通行证、党员证、护照、身份证、征兵登记卡等等。在本方法中，这些文件被视为持有人事实上的个人财产，虽然从法律上来说，它们属于政府、政党或者某些组织。

例如，1960 年，南非黑人民族主义政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动反对《通行证法》运动之后，南非最大的反对派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人们焚烧通行证。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艾伯特·卢图利写道：“我们不想把镣铐留在家中”，“我们想处理掉它们。我烧掉了我的身份证，其他人也烧掉了他们的身份证，篝火的数量越来越多”。

1965 年 10 月 15 日，在纽约市兵役登记办公室外面举行的反战集会上，一名青年

烧掉了自己的征兵证。据《纽约时报》报道，1967年8月16日，全国各地举行反战集会，有五名青年在费城的集会中烧掉了自己的征兵证，有六十七名青年在波士顿阿灵顿街教堂反战集会中烧掉了自己的征兵证。在洛杉矶的反战集会中，至少有八名青年烧掉了自己的征兵证，还有若干名退伍军人烧掉了自己的免征兵证明。全国各地还有许多青年把自己的征兵证退给了兵役登记办公室或者美国联邦检察官。

24. 象征性灯光

抗议游行和进军常常举着火炬、灯笼、蜡烛等，其他类型的抗议活动有时也会使用类似方法。例如，在南非，1953年6月26日，即1952年的反抗运动⁴⁸发生一周年之际，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艾伯特·卢图利呼吁非洲人及其盟友，当晚在自己家外面点起篝火、火炬、灯笼或者蜡烛，“象征我们决心永远留存于心的自由火花，也告诉那些热爱自由的人们，今天晚上我们正在守夜”。

因反抗苏联入侵而自焚的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扬·帕拉赫1969年1月19日去世后，青年们默默举着黑色旗帜和捷克斯洛伐克红、白、蓝国旗，走向扬·帕拉赫自焚的瓦茨拉夫广场喷泉，在那里为他举行烛光仪式。据《纽约时报》记者阿尔文·舒斯特报道：

有成百上千名面容忧伤的青年人把蜡烛和花圈放在喷泉旁，默默地围着它站成一圈。其他人则聚集在五十码外的瓦茨拉夫雕像周围——这个为在苏军入侵中被杀害的人设立的非正式纪念地点也被蜡烛照亮了。

25. 展示肖像

公开展示抵抗英雄或者其他运动象征人物的肖像也是一种表达支持的方法。1930年至1931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甘地、尼赫鲁等人的照片在印度商店和家庭广泛出售和悬挂。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各种建筑上也展示着总统斯洛博达和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的肖像。

48 1952年，为了反抗南非白人政权的压迫，曼德拉等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蔑视不公正法令行动，包括违反宵禁法，进入不允许黑人进入的区域，使用仅限白人使用的卫生间、会客室和交通工具等。这些行动开始之前会知会警察，行动者自愿被逮捕、判刑。——译者注

26. 用颜料抗议

1953年6月17日，东德起义期间，施特拉尔松德造船厂的夜班工人用黑色油漆遮盖了一艘新型小帆船的名字——瓦尔特·乌布利希号。它是用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名字命名的。用黑色油漆遮盖船名的行动使原定于第二天举行的新船下水仪式被迫取消。1962年，在东德艾森巴赫市，有人涂改了一幅巨大的瓦尔特·乌布利希画像，在他脖子上画了一条套住的绳索。

27. 新指示牌和新地名

在没有指示牌的地方竖起指示牌，或者把旧街名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新街名，都是这种方法可以采取的形式（完全移走所有街道、公路、城镇和火车站的指示牌，或者换成错误的指示牌，是一种政治不合作行动，而不是象征性公开行动）。例如，1942年，纳粹占领下的波兰，青年抵抗组织小狼团体的成员偷走了许多华沙最好的咖啡馆、电影院和旅馆门前的“**德国人专用**”指示牌，并且准备了许多复制品。一天早上，这些指示牌和复制品出现在该市成百上千个路灯和树上——德国人经常把波兰爱国者吊死的地方。根据地下组织的命令，波兰人还给大多数街道改了名字。“一夜之间，墙上、街角、路灯柱、铭文和标语牌上都出现了新名字——在这场战争中被波兰人称颂的英雄或者政治家的名字：聂奇亚寇夫斯基大街、拉塔伊道、罗斯福街、丘吉尔路等。”爱国者都使用这些新街名——一个人是否使用新街名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除非是与德国人合作的密探）。

28. 象征性声音

人声、钟声、铃声或者机器声也可以在斗争中表达思想。正如前文引用过的案例：詹姆斯·麦迪逊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将一封他们不喜欢的信烧掉，同时“伴随着学院敲响葬礼时的钟声”。

另一个非常不同的案例发生在1917年5月底，法国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哗变，即使那些表面上仍然服从命令的军人内心也十分不满。“在整个军区，那些即将走向战壕的士兵都模仿走向屠宰场的羊发出的‘咩咩声’，军官们对此毫无办法。”1968年8月26日早上九点至九点十五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都响起了钟声

和汽笛声组成的声音示威。据官方报纸《人民民主报》报道：

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抗议强行占领，抗议占领者的野蛮和暴力。愤怒的汽笛声掺杂着教堂庄严的钟声。捷克布杰约维采教区的主教约瑟夫·休洛奇博士呼吁教区所有教士用敲钟支持我们的政治家在莫斯科的谈判。在首都布拉格的街道上，就连外国游客的汽车也按响了喇叭。

《人民民主报》还报道了苏联人的反应：

声音示威明显对占领军构成了威胁。在布拉格火车总站，苏联军官拿着拉开保险的手枪扑到一名火车司机身上，企图阻止他拉响火车汽笛。

29. 象征性开垦土地

某些类型的行动可以创造性地展示如何改变目前存在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和用途。采用的方法包括种植植物和树木，耕种荒弃的土地和被没收的土地，建造一座预计使用目的与这一地区当前和今后的规划背道而驰的建筑。例如，1962年10月，英国百人会团体的行动者为了抗议开发核武器，在英国霍宁顿皇家空军3V轰炸机基地旁边播种，象征他们希望开垦这块土地用作建设性的民用目的。

30. 粗鲁动作

有许多不同的粗鲁动作和行为可以表达侮辱，虽然这一方法很少在政治冲突和国际冲突中使用。美国记者埃德蒙·史蒂文斯报道了一个中苏边境冲突的案例：

1967年1月，每天早上都有整整一个排的中国士兵走出营房，在冰面上行军，然后脱下裤子，对着苏联方向扭屁股，这是中国人最严重的侮辱。这种操练一直继续，直到一天早上，苏联人在他们这边正对着中国的方向，竖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肖像。中国士兵匆忙穿好裤子，乱成一团地撤退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

（五）给个人施加压力

可以使用若干种方法给对手集团中的个别成员——比如军官或者普通士兵——施加压力。这些行动可以针对具体的个人或者小团体，也可以针对大机构。本节包含的

方法并不是详尽无遗的。非暴力抗议与说服这一大类中的其他某些方法，比如纠察，和非暴力不合作中的社会抵制和非暴力干涉中的禁食，也可以用于给个人施加压力的目的。

31. 跟踪政府官员

为了警告政府官员，镇压非暴力运动是不道德的，也为了证明民众无所畏惧的决心，行动者可以跟踪政府官员，他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以此不断提醒他们民众的决心。例如，琼·邦杜兰特⁴⁹曾提到：1928年，在印度巴尔多利镇，“行动者到处跟踪政府官员，在他们的住宅外面安营扎寨。一旦有行动者被捕，马上就会有其他人替补上。”

32. 嘲弄政府官员

除了安静而有尊严地跟踪政府官员，人们有时还会使用嘲笑和辱骂政府官员的方法，有时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有时是跟踪他们一段时间。例如，1942年夏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河南正面临严重饥荒，征税官和士兵到农民家征收粮食，农民拒绝交出粮食，也拒绝用交纳金钱或者物品的方式代替交粮。结果：

在许多地方，征税官必须带着更多士兵进入村庄，才敢拉走农民的粮食。他们拉走粮食的时候，骨瘦如柴的农民像一群猴子一样跟着他们、讥嘲他们，有时还威胁他们，没有丝毫“服从的美德”。

33. 交朋友

对军人和警察进行社会抵制的替代手段是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了解民众强烈的变革愿望，并对他们进行直接或者间接宣传，或者两者同时进行。这一方法的目标可以是：1) 与军人和警察成为私人朋友，让他们知道非暴力运动对他们个人没有敌意，也不想伤害他们；2) 让军人和警察了解他们服务的政权的目标是不正义和不道德的，而非暴力运动的目标是正义和正确的；3) 说服军人和警察（或者其他实施镇压的人），在执行镇压的命令时应降低效率，最终说服他们拒绝执行命令；4) 让军人和

49 美国作家，著有研究甘地政治哲学的著作《征服暴力》（1958年出版）。——译者注

警察给非暴力运动和民众提供对手的信息。在与军人和警察交朋友的同时，行动者不与政权合作，不服从政权的管理。

例如，1956 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人民使用暴力方法和非暴力方法进行抵抗的同时，也努力与苏联士兵交朋友，对他们施加影响。采用的方法包括与他们交谈，向他们散发俄语传单。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据一名记者报道：匈牙利人与苏联士兵交谈的结果是“某种同情的纽带正在出现”。

1968 年 8 月，苏军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初期，也有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尝试直接影响苏联士兵。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的一名记者报道了他亲历的一次交谈，交谈双方包括一名苏军上尉、一名苏军中校、两名苏军救护车救护员、一名捷克斯洛伐克上尉、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几名捷克斯洛伐克救护车救护员。这是一场“热烈的讨论”：

我们表达了对入侵的看法，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跟对方说：“我们不会和你们说再见；我们不希望你们好运，我们甚至不会和你们握手。”说到这里，我看到苏军上尉的眼里含着泪水，苏军中校的脸也抽搐了一下。在一旁听我们说话的两名苏军救护车救护员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苏军上尉跟着我走了几步，并且对我说：“我会思考刚才讨论的问题。恐怕你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是对的，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报道我这句话。”我说：“如果真是这样，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朋友。”

事实证明，入侵发生第四天，苏军就不得不让入侵部队换防。

34. 守夜

守夜一般需要许多人参与，参与者要长时间待在某个特定地点，有时昼夜不间断，需要熬夜和牺牲睡眠。守夜者必须态度庄严，带有宗教特点。

例如，1917 年，荷兰女权活动家在一座建筑外面坚持守夜长达数个星期（建筑里面正在起草该国新宪法），要求增加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条款。新宪法最终没有加入这一条款，但承诺让妇女选举权成为议会简单多数同意就能通过的议案。1924 年

至 1925 年，印度南部威克姆，行动者在一条阻挡他们（其中包括不可接触者⁵⁰）穿越一个印度教寺庙的路障前面持续守夜了十四个月。1955 年和 1956 年，南非支持黑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白人妇女黑绶带团体⁵¹在政府办公楼外静默站立，抗议南非政府在宪法中新增加更严厉的种族隔离条款。1958 年 7 月至 9 月，英国反对核战争直接行动委员会在奥尔德马斯顿核武器制造厂外进行了连续九个星期昼夜不停的守夜。1959 年 7 月 1 日，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细菌武器工厂外，一群抗议细菌武器研究、开发的和平主义者和活动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沉默的呼吁与守夜行动。1962 年 7 月 13 日，西方倡导单方面核裁军的活动家在莫斯科红场拉起横幅，试图进行反核守夜活动，但未获成功。

（六）戏剧和音乐

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也可以用表演和音乐的形式进行表达。本节描述的方法包括一些变体。

35. 幽默小品和恶作剧

政治幽默如果用某些戏剧形式——比如小品、恶作剧，或者政治讽刺剧——进行表达，也可以成为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幽默和讽刺不再仅仅是用语言表达政治异议（就像独裁国家经常发生的那样，政治笑话在民间口口相传），而是一种公开的政治抗议。

在奥地利和平条约⁵²签署之前，苏联军队一直占据奥地利部分城市和农村地区，一些维也纳学生给斯大林塑像的胳膊系上一个手提箱，表示让他拿上行李走人。

50 又称贱民，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译者注

51 南非反种族隔离团体。1955 年 5 月 19 日由六位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创立，其成员主要是白人女性。该团体正式名称为“妇女保卫宪法联盟”。因其成员在抗议活动中佩戴黑绶带而闻名，因此被媒体称为黑绶带团体。——编者注

52 该条约旨在结束二战期间纳粹对奥地利的统治，以及在战后盟军占领时期，重建一个主权独立的奥地利民主共和国。该条约于 1955 年 5 月 15 日在维也纳签署，1955 年 6 月 27 日生效。参与条约签署的国家除了奥地利，还有二战后占领奥地利的四个同盟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译者注

1956 年底，东德耶拿大学学生给冬季舞会上的卡巴莱⁵³表演加入了幽默小品，滑稽地模仿共产主义宣传，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其中一个小品是关于猎人和狗的故事：猎人给狗戴上嘴套，说是为了保护它不被大黄蜂蛰着。猎还给狗拴上非常短的绳子，上面写着“友谊的纽带”。狗跑开的时候猎人开枪打它，却说是在打蛰狗的黄蜂。有人批评猎人以前殴打过狗，猎人说这些指控“吹毛求疵”。猎还把自己描述为狗的真正保护者，自称他的工作值得后人尊敬。

36. 戏剧和音乐表演

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某些戏剧、歌剧和其他音乐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例如，1923 年 1 月初，在德国人民反对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地区的最初抗争阶段，“埃森市市立剧院上演的戏剧《威廉·退尔》⁵⁴演变成了一场展示民族抵抗意志的示威行动。占领军不得不闯入剧院，驱散观众。”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 1943 年 1 月纳粹占领下的挪威特隆赫姆市。纳粹控制的艺术团体在这座城市演出了三个月，尽管占领军努力想办法让剧院填满观众，但是作为非暴力抗议的一部分，该市的剧院一直门可罗雀。与此同时，挪威音乐家英格堡·格雷斯基维克在夫人教堂演奏的两场音乐会（在教堂演奏不需要纳粹批准），想进去听的观众却拥堵了该市两条主要大街。其中超过二千五百名入场的观众在教堂里聆听了沉重忧伤的音乐会。英格堡·格雷斯基维克演奏的乐曲之一是挪威最重要的民族作曲家格里格的《叙事曲》。正如一位挪威作家描述的：“演出被认为是一场挪威文化示威”。

37. 唱歌

在适当的条件下，唱歌也是一种非暴力抗议的方法——比如人们在一个不受欢迎的演讲正在进行的时候唱民族歌曲或者赞美诗，用针锋相对的歌声抵制对手的演讲。或者在实施进军、公民不服从等抵抗行动的同时，唱社会、政治讽刺和抗议歌曲。

53 是一种 1880 年代起源于法国，后来在欧洲流行的、具有喜剧、歌曲、舞蹈、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表演场地主要在设有舞台的餐厅或者夜总会，观众在餐桌上边用餐边观看表演。这种表演场地也称为卡巴莱。——译者注

54 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根据瑞士独立英雄威廉·退尔的传说创作的戏剧。——译者注

1901 年 7 月在俄罗斯沙皇专制地实行芬兰新征兵法的时候（该法征召芬兰青年加入俄军）——芬兰人认为是违宪地——秘密抵抗组织卡加尔团体发动了公民不合作运动，要求每个芬兰人都拒绝与当局合作，青年人拒绝去军队报到，医生拒绝给新兵体检，公社拒绝为征兵局选拔兵源，牧师拒绝在讲坛上宣传征兵。当多数牧师服从大主教的命令，在讲坛上宣传征兵的时候，“教区信众唱起了赞美诗，用歌声淹没了牧师的声音”。

在纳粹占领丹麦期间，为了抵制德国军乐团演奏的音乐会，丹麦人也组织了针锋相对的社区音乐会，演唱丹麦传统歌曲。

一位名为亚历山大·佩歇尔斯基的前苏联军官讲述了他在二战期间，在波兰东部索比布尔集中营当战俘时通过唱歌进行反抗的案例。1943 年 9 月 24 日上午，他和另一名苏联军官齐布利斯基被送到索比布尔集中营，管理集中营的党卫队队长弗朗茨命令他们唱俄罗斯歌曲。

我说：“我们不知道允许我们唱哪些歌曲”。一名囚监（具有特权地位的犯人）翻译了我的话。弗朗茨回答：“唱你们会唱的歌曲。”高个儿、圆脸的齐布利斯基问我：“我们唱什么歌？”我说：“唱《如果战争在明天到来》。”他说：“你疯了吗？他们会杀了我们的。”我说：“就唱这个，我们不会唱其他歌曲。”于是，齐布利斯基和我开始唱起来：

如果战争在明天到来

我们在明天行军

如果黑暗的力量突然降临——

这时，所有苏军战俘都加入进来：

全体苏维埃人民要团结如一人

为了自由的祖国——起来！

我们的纵队经过的时候，守卫都跑出营房观看。在这个死亡和绝望的集中营里，响亮的苏联歌曲就像一声春雷。我们感到重新焕发了生机，感到欢欣鼓舞，就像我们

已经得到了喜讯，看到了胜利和解放的希望。

1956年12月初，许多南非抵抗运动领导人被捕。预审阶段的第一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进行预审的约翰内斯堡德威尔军事训练营外面。曾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艾伯特·卢图利写道：“就在预审程序马上开始的时候，人们开始唱南非国歌《天佑非洲》，歌声如同天籁一般。”1963年5月，超过三千名黑人学生聚集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闹市区，“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商店里走进走出，唱着‘没有任何人能让我回头’和‘我走在通往自由之乡的道路上’”。

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几名捷克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一名苏联上尉发生了争执。就在这时，一群捷克斯洛伐克人唱起了国歌《我们的家乡在哪里》。三十五分钟后，一队捷克斯洛伐克车辆穿过瓦茨拉夫广场前往老城广场，车上的人们高唱着斯洛伐克歌曲：“塔特洛山上电光闪闪，雷声隆隆……”

1963年，在南越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政治讽刺歌曲和民歌都被用做抗议的工具。释一行禅师写道：

政治讽刺歌曲很容易被记住，也很快就能传唱开。这些歌曲在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被广泛应用，有成百上千首之多。最著名的是《听、听、听！吴廷琰和吴廷琰⁵⁵的丑闻》，这是一首反对吴廷琰政权腐败的歌曲。

实际上，讽刺歌曲作为一种抗议的手段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当然更不是越南人的发明，它们至少能够追溯到公元十四世纪初的法国，甚至可能更古老。研究中世纪音乐的权威亚历杭德罗·普兰查特认为，公元十四世纪初是“法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时代之一”，当时，教士和王室贵族腐败成风，百年战争爆发，教皇流亡法国阿维尼翁，教会分裂：

与宫廷的奢侈浪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饥荒席卷农村，抢劫猖獗。因此，除了宫廷诗人的爱情歌曲之外，我们还有雷鸣一般的政治歌曲，对遍地的腐败进行严厉地抨击。

55 吴廷琰的胞弟。——编者注

政治抗议歌曲留存于许多手稿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是 1310 年至 1314 年热尔韦·迪·比斯创作的一首讽刺诗《福维尔传奇》。福维尔是一头象征性的驴子，它的名字福维尔由阿谀、贪婪、恶行、无常、嫉妒和怯懦几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后来有人根据其他文本的补充，对最初的诗词进行了修改，还为其创作了各种音乐伴奏和改编曲。其中有些采用赞美诗的形式，两段不同的歌词以不同的器乐旋律同时歌唱。其中一段歌词如下：

今天，欺诈和抢劫统治着世界。赫拉克勒斯⁵⁶的战士停下了脚步。教会的戒律名存实亡。暴力把赞美诗消灭殆尽。当权者贪婪和狡诈，靠百姓的血汗发家，大厦失去了地基。这都是因为什么？我们宣布：毁灭就要到来！

（七）列队行进

列队行进（比如进军和游行）也是一种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方法。

38. 进军

进军是指一群人组织的走向一个特定的、被认为与相关议题有内在意义的地点。进军持续的时间可以从一、两个小时到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进军可以携带海报和横幅，也可以不携带；可以向旁观者发传单，也可以不发。1765 年 5 月，五万名英国纺织工人聚集在伦敦斯皮塔佛德区，然后分三路向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英国国会进军，要求减少进口法国丝绸，减轻纺织工人的竞争压力。1905 年，俄罗斯革命期间也发生过数次进军。例如十月大罢工时，塔什干铁路工人向总督府进军，在遇到军队阻拦后不得不返回，进军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十月宣言》（沙皇承诺给予公民自由，给予没有投票权的群体以投票权，确立由国家杜马⁵⁷批准法律和监督官员等原则的宣言）发表后，在俄罗斯帝国的许多城市，人们都向总督府或者市杜马进军，庆祝胜利，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比如释放政治犯。1919 年，三千名朝鲜人分几路同时向首尔的各个外国领事馆进军，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反

⁵⁶ 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是主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他神勇无比、力大无穷，完成了十二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还解救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协助伊阿宋的英雄冒险队取得金羊毛。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勒斯是勇士的同义词。——译者注

⁵⁷ 即俄罗斯国会下议院。——编者注

对日本统治的意志。1930 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甘地发起食盐进军，带领人们前往丹迪海滩，通过制盐发动公民不服从行动。1960 年 12 月 1 日至 1961 年 10 月 8 日，为敦促各国政府裁军，一些和平主义者团体组织从旧金山到莫斯科的六千英里进军。

1943 年 2 月 22 日，保加利亚和德国签署了《驱逐第一批二万名犹太人到德国东部占领区的协议》，开始实施第一阶段驱逐计划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抵抗组织向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人们站到犹太人门前，或者大批涌入犹太社区，阻止当局驱逐犹太人。1943 年 5 月 24 日，索菲亚的大学生组织了一场抗议行动，许多犹太人和非犹太裔保加利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马太·于勒萨利写道：

抗议从城郊一个犹太会堂开始，丹尼尔·锡安⁵⁸和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向民众讲话，要求他们加入大学生组织的抗议行动。随后，民众开始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军——前往王宫，抗议对犹太人的暴行。在大量参与进军的人遭到逮捕后，民众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此次大规模进军让保加利亚国王和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担心社会动荡，于是放弃了第二阶段的驱逐计划——把犹太人送到波兰集中营。在集中营等待犹太人的只有死亡。

1956 年底，古巴巴蒂斯塔政权⁵⁹统治期间，东方省发现了二十九名被谋杀的青年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是政府对参与格拉玛号远征行动⁶⁰的古巴革命者进行秋后算账的结果。在圣地亚哥省也发生了数起谋杀和反谋杀事件。1957 年 1 月 2 日，圣地亚哥市的政府军士兵逮捕了十四岁的男孩威廉·索勒。第二天晚上，人们在一块空地

58 犹太教正统派拉比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59 指 1952 年至 1959 年巴蒂斯塔统治的独裁政府时期。巴蒂斯塔是古巴政治强人，曾多次执掌政权。1933 年至 1940 年，他是古巴实际的军事领导人。1940 年至 1944 年，他成为古巴总统。1952 年，他通过军事政变再次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他的独裁政府招致各方力量的反对，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反对。1959 年，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力量驱逐出境。——译者注

60 1956 年 11 月 25 日，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包括切·格瓦拉、劳尔·卡斯楚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等八十二名在墨西哥接受了一年严格军事训练的古巴革命者，乘格拉玛号船从墨西哥前往古巴，企图推翻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12 月 2 日，当格林玛号船抵达古巴时，遭政府军伏击，仅剩 20 人左右转入山区活动，其余人被杀、被俘或者逃离战场。——编者注

上发现了他遭受过严重酷刑的尸体。罗伯特·塔伯⁶¹写道：

1月4日晚上10点，大约四十名身着黑衣的妇女从多洛雷斯教堂出发，一边沿着阿奎莱拉街慢慢地列队行走，一边手持念珠整齐地祈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威廉·索勒的母亲，和她走在一起的是其他被警察和士兵杀死的青年人的母亲。她们高举着一面巨大的白底黑字横幅，上面写着：停止谋杀我们的儿子。

队伍经过第一个街区的时候，有二百人加入进来，然后是八百人，然后是一千人。她们每走一步，都有更多的妇女加入她们的队伍。她们缓慢而坚定地穿过狭窄、安静的鹅卵石街道。只有她们为自己孩子祈祷和她们的脚步悲哀地敲击地面的声音。许多站在路边观看的男人羞愧地流下了眼泪。几名警察束手无策地站在路口。

突然，一辆载着士兵的吉普车堵住了道路，士兵用机枪对准进军的队伍。妇女们安静地站住了，人数继续增长，直到挤满了附近的街道，堵住了所有的交通。

当士兵们挤进密集的人群，试图驱散她们的时候，妇女们让出一条通道让她们通过，然后人群再次合拢。她们拒绝和士兵发生身体上的冲突，只是安静而有尊严地站在那里，直到士兵放弃徒劳的努力，羞愧地离开。然后妇女们安静地继续走向市政厅和几家报社，提交要求结束恐怖行为，恢复法律的请愿书。

圣地亚哥母亲的抗议行动意义重大，它是古巴人民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第一次公开行动。它标志着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⁶²的旗帜下，大规模、有组织的公民抵抗运动的开始。

61 美国社会活动家和记者，曾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记者前往古巴，亲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军队将古巴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驱逐出该国的过程。著有《M-26：革命传记》一书。——译者注

62 古巴革命领导人，古巴共产党、社会主义古巴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曾长期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2005年6月因病住院，由其兄弟、长期以来的副手劳尔·卡斯特罗接替其职务。——译者注

39. 游行

游行是指一群人组织的行走，目的是唤起民众关注他们的不满或者观点。游行和进军的不同之处在于，游行没有终点，或者有终点但终点对行动不具有内在意义。横幅、传单、海报等可以和游行配合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乐队奏乐和其他类型的活动可以伴随游行使用，也可以不使用。

1913 年，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发起了第一次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游行，有八千人至一万人参与，其中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妻子。游行快结束的时候，游行遭到反对者的攻击，引起巨大的骚乱。印度独立运动也经常使用游行作为非暴力斗争的手段。例如，1930 年 6 月 3 日，孟买的穆斯林进行游行，表达对公民抵抗运动的支持。1956 年 11 月 4 日，伦敦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反对英国入侵埃及的抗议游行。

1958 年 8 月 24 日，洪都拉斯六千名人民统一党的支持者穿过伯利兹街道，进行支持该党提出的让英属洪都拉斯立即自治的游行。1957 年 6 月，南非开普敦大学的数千名教授、讲师和学生穿过开普敦街道，进行抗议《大学种族隔离法案》的游行，该法案禁止多种族教育融合。

游行有许多可能的变体。例如，1769 年 10 月 19 日，北美殖民地人民进行茶叶抵制⁶³期间（反对《唐森德法案》⁶⁴运动的一部分），在马萨诸塞湾省马布尔黑德镇，反对茶叶抵制的商人大张旗鼓地用手推车推着一箱从波士顿进口商那里购买的茶叶，穿过马布尔黑德镇街道，然后再推回波士顿。1960 年，日本反对修订《美日安保条约》运动期间，全日本学生自治团体联合会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形式：

63 1698 年，英国国会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进口垄断权，并立法规定北美殖民地只能从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当时英国对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税，而荷兰政府对进口茶叶不征税，因此，大量茶叶从荷兰走私进入大英帝国（包括北美殖民地）。为了减少走私，1767 年英国国会通过法律，东印度公司出口到殖民地的茶叶全额退税，同时却颁布《唐森德法案》，对殖民地直接征收包括茶叶税在内的各种税，导致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组织起来，对进口茶叶进行抵制。——译者注

64 1767 年英国国会通过四项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法案。这些法案由财政大臣唐森德提出，故合称《唐森德法案》。该法案规定英国税吏有权闯入殖民地民宅、货栈、店铺，搜查违禁物品和走私货物。——译者注

“蛇形游行、手拉手游行、向心游行（游行队伍从许多地点开始，最后聚集到一个中心）……”

40. 宗教行进

宗教行进作为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时，具有进军或者游行的一般特征，加上一定的宗教特征。宗教行进可以采取以下形式：携带宗教图画或者象征，唱宗教歌曲，有相当数量的教士或者僧侣参加。相对于其他行动，宗教行进在宗教虔诚程度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公元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江苏发生严重水灾，江苏高邮市一名绅士号召民众行动起来，要求政府提供救济。“人们聚集起来，拒绝开店做买卖，举着街神的塑像冲进县衙，扰乱政府官员办理公务。”

1905年1月9日，一些俄罗斯请愿者在沙邦神父的带领下，用宗教行进的方法前往沙皇居住的冬宫。几队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按照精心制定的计划，从圣彼得堡的不同地点出发，下午两点聚集到冬宫广场。“信徒在教士的带领下，举着圣像，唱着赞美诗，有尊严地向前行进……”其中一支队伍由沙邦神父本人带领，在做过礼拜和祈祷之后开始行进：

人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高举着圣像、宗教旗帜、俄罗斯国旗，以及沙皇和皇后的肖像，唱着《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啊，你的子民》等赞美诗，跟随神父，沿着彼得霍夫大道前行。他们行进的队伍端庄得体，沿途的警察就像遇到宗教行进时惯常的做法那样，为他们清空道路，围观的人群也表现出尊敬的姿态。

根据官方记载，沙皇军队对这次和平宗教请愿行动进行了镇压，造成一百多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镇压让农民失去了对沙皇的尊重，让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保守派人士组成了反对沙皇政权联盟。

41. 朝圣

朝圣作为一种抗议的方法，具有很强的道德性和宗教性。它通过一个人或者更多人一同行进以达到如下目的：1) 传递信息给民众；2) 为他人或者政府从事的行为、执行政策赎罪；3) 为改变现状做出自我牺牲。朝圣的目的地通常是某个对于基本信

念或者相关政策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

朝圣行动通常持续数日甚至数月之久。朝圣时一般不会使用横幅和海报，但有可能使用传单。有时步行也可以与其他交通工具相结合。1947年初，甘地在孟加拉诺阿卡利地区组织过一次步行朝圣，目的是说服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停止暴力，和平相处。

42. 汽车游行

在现代西方国家，游行或者进军的一个变体是汽车游行。汽车游行也是一种进军或者游行的形式，只不过参加者以非常慢的速度驾驶汽车，汽车外面常常贴有海报或者横幅。汽车游行也可以与步行进军、游行相结合。1959年11月和12月，多个和平主义团体组织了穿越波士顿的汽车游行。游行在选定地点停下来散发传单，并且呼吁人们支持和平与裁军。

（八）公开悼念

有几种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方法涉及悼念死者，对死者表示敬意。被悼念的死者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前的英雄，也可能是最近在某次斗争中逝去的人。

43. 公开哀悼

哀悼死者使用的象征符号也可以用于表达政治反对，或者用于对某些具体事件和政策表达不满。1765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在反对《印花税法案》⁶⁵的斗争中，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公开哀悼。例如，10月5日，当用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马里兰的印花税票从伦敦运抵费城的时候，海港内所有船只都降半旗，费城的钟声敲响了一整天。《印花税法案》生效的第一天是11月1日，人们把这一天作为公开哀悼日，再次敲响钟声。波士顿的反抗团体忠实九人团和自由之子⁶⁶在这一天组织了有秩序的公开哀悼活动。

65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直接征税法案。该法案要求北美殖民地所有印刷品都要缴纳印花税费。——译者注

66 是美国独立革命期间反抗英国统治的民间团体，组织过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由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创建。——译者注

1860年2月至3月，在反抗奥地利企图摧毁匈牙利新教教会自治权的斗争中，许多匈牙利新教牧师和主教遭到逮捕，教堂的聚会也多次被驱散。在被逮捕的神职人员受到审判的时候，许多学生身着黑衣，聚集到审判地点外进行沉默示威。

有时候，公开哀悼可能从悼念死者开始，逐渐演变成为政治抗议。以下案例来自德国入侵后的波兰，一名亲历者在1939年11月写道：

在华沙市中心中央火车站附近，马歇尔林荫大道和耶路撒冷林荫大道的拐角处，大批民众来这里给无名烈士挖墓。铺路石被挖了出来，无名烈士被埋葬在下面。坟墓上覆盖着鲜花，周围放满了点燃的蜡烛。一群哀悼者在旁边跪下祈祷。我后来得知，这一悼念活动从葬礼开始，一直持续了三个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从黎明到宵禁，坟墓旁边一直有哀悼者。逐渐地，这一仪式不再仅仅是哀悼死者，它已成为政治反抗的象征。12月，纳粹华沙大区长官莫泽意识到这个坟墓承载的重大意义，于是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移葬到公墓。但哀悼者仍然不断地来到这个拐角处跪下祈祷，点燃蜡烛，这里已经成为圣地，纳粹士兵的铁锹无法把无名烈士的灵魂赶走。

1943年初，阿根廷反对独裁者庇隆的民众配戴各种象征哀悼的黑色服饰（领带、臂章、翻领、丝带、面纱、头巾，钉在女士裙子上的黑色小手绢等）进行哀悼示威。参加示威的人数迅速增长，给反对运动带来了巨大鼓舞。

1960年3月28日，南非沙佩维尔屠杀⁶⁷发生一个星期之后，正在组织挑战《通行证法》⁶⁸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艾伯特·卢图利号召民众，把沙佩维尔屠杀日作为国家哀悼日。他呼吁：

在这一天，我要求人们待在家里，把它当作祈祷的日子。民众普遍反响强烈，某些中心地区的反响特别大。这是一个多种族哀悼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通

67 1960年3月21日，南非德兰士瓦省沙佩维尔镇五千多名非洲黑人到当地警察局抗议，反对南非白人当局推行种族歧视的《通行证法》。警察朝人群开火，造成六十九人死亡。——译者注

68 1952年南非白人政府在已颁布的各种通行证法令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法律。该法规定，非白人均须随身携带通行证，其内容包括身份证、照片、纳税收据，并且要说明携带者的个人特征、所属种族和雇主姓名等。领取通行证须留手印，供随时检查和核对。此项法令完全剥夺了非白人的行动自由。——译者注

常的盟友。

有几天时间，作为哀悼的象征，艾伯特·卢图利一直身穿黑色缟纱服装，打着黑色领带。

1963年5月8日，在越南古都顺化，八名参加示威活动的佛教徒遭到杀害，引发了佛教徒反对吴廷琰天主教政权宗教迫害的斗争。占这个国家人口多数的佛教徒都身穿白衣——既为了哀悼死者，也为了反对歧视佛教徒的天主教政府。

44. 模拟葬礼

非暴力行动者也可以给某些原则举办“葬礼”，以表达他们对这些原则的珍惜，谴责对手对这些原则的违背。“葬礼”可以用模拟的形式。参加者举止严肃克制，使用某些进行真正葬礼时需要使用的东西，比如黑衣和棺材，以表达抗议的严肃性。

1765年11月1日，北美殖民地《印花税法案》正式生效的第一天，罗德岛纽波特市就进行了一场模拟葬礼抗议。埃德蒙·摩根⁶⁹和海伦·摩根夫妇引用当时的媒体报道描述了这一事件：

11月1日，自由之子团体为了阻止可能发生的暴乱，把民众的情绪引导到一场有秩序的示威活动上去，发起了“为自由举办大型葬礼”活动。一队哀悼者抬着棺材穿过街道前往墓地，棺材上写着“自由”。哀悼者到达墓地之后，开始了一场演出：

“一名自由之子成员从‘绝望的阴霾’中出现，自言自语道：‘噢，自由！我亲爱的灵魂！……**辉煌的自由**！被所有真正的不列颠人欣赏和爱慕！……**自由**死了！但它不能死！’。然后，人们听到一声呻吟，好像从棺材里发出来的呻吟。靠近一点观察会发现，自由只是昏迷了，**自由**没有死——不列颠女神命令一名守护天使将**自由**从濒死的鬼门关抢救回来，送向升起的太阳，使它在暴政和压迫面前刀枪不入。”

这场有趣的表演结束之后，其余的时间用来欢庆：钟声响起，市政厅大楼上

69 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学术权威，1955年至1986年在耶鲁大学任教。——译者注

装饰着各种旗帜。

新罕布什尔朴茨茅斯市、马里兰巴尔的摩市和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市也在同一时间进行了类似的模拟葬礼。

1961 年 11 月，苏联试爆氢弹的第二天，挪威奥斯陆的反核试验运动示威者手持燃烧的火炬和黑旗，用模拟送葬的方式走向苏联驻挪威大使馆。1965 年 3 月，美国阿拉巴马州朗兹伯勒镇一家小教堂（距维奥拉·刘易佐夫人⁷⁰遇刺地点不远）进行完宗教仪式之后，民权活动家组织的汽车送葬队伍载着十口棺材驶往该州首府蒙哥马利市。这些棺材象征着不久前在阿拉巴马州民权运动中被杀害的十位活动家。示威者把棺材从汽车上抬下来，放在州议会大厦附近，并且在那里进行祷告，一名身穿黑衣的妇女献上了鲜花。

45. 示威性葬礼

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下，追悼仪式和葬礼（尤其是为被政治对手杀害，或者在斗争中死于其他原因的人送葬）可以表达抗议和谴责。无论被杀害的是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还是无名的示威者，也无论杀人者是个人、秘密团体，还是代表政府的警察、军队，人们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仪式表达抗议和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偶尔有人会采用更极端的方法，比如用自杀进行抗议（本书不认为这是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示威性葬礼通常采用有尊严地列队行走的方式进行。这方面的案例很多。

1770 年 2 月 22 日，北美殖民地人民在抵制《唐森德法案》期间，波士顿市一些顽皮的儿童，在违反抵制行动的进口商理查森的家门外放置了丑化他的雕像，并称他为臭名昭著的线人。这些孩子和理查森互扔垃圾。理查森没能毁掉雕像，但他数次向这些孩子开枪，造成一名十一男孩儿克里斯托弗·斯奈德死亡和另一名男孩受伤。美国历史学家亚瑟·史列辛格写道：克里斯托弗·斯奈德的葬礼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示威行动。克里斯托弗·斯奈德成为了“崇高事业的小英雄和抵制《唐森德法案》的第一名烈士”。

70 美国民权运动中的白人活动家。1965 年 3 月，她与另外四人一起从底特律前往南方参加民权运动会议的路途中，被 3K 党成员开枪打死。——译者注

1905 年秋天，领导俄罗斯第三届地方自治议会⁷¹代表团的皇室成员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布茨科伊突然去世。早在这年 6 月，该代表团曾敦促沙皇承诺组建国家杜马。反对派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布茨科伊之死作为反对沙皇政权的最佳时机。在圣彼得堡，人们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布茨科伊的遗体运往火车站，准备从那里用火车运送到莫斯科埋葬。在圣彼得堡火车站，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六百名学生和工人与代表团成员一道为遗体送行。在莫斯科，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布茨科伊的葬礼“变成了一场大型政治示威”。许多沙皇政权反对派对民众发表讲话，组织特殊追悼仪式，提出比已故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布茨科伊更激进的观点。哈凯夫描述道：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只要有反政府示威者“在对抗中死亡，人们就会精心安排葬礼，把死者尊为烈士”。1905 年 10 月 20 日，在莫斯科为布尔什维克成员尼古拉斯·鲍曼举行的葬礼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葬礼之一。“超过十万名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甚至还有穿着军装的士兵跟着送葬队伍穿过莫斯科街道，走了将近八个小时，这显然是一场反政府示威活动。”

1917 年 9 月底，狱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托马斯·阿舍和许多囚犯一起绝食抗议，在被强迫灌食一星期后死亡。埃德加·霍尔特这样描述托马斯·阿舍的葬礼：

1917 年 9 月 30 日，托马斯·阿舍的葬礼是迄今为止出现的最为明确的复活节精神的标志……

二万至三万民众和几支乐队一起跟随灵车行进。大多数时候，人群都沉默地观望……

许多参加者穿着被禁止的爱尔兰国民军⁷²和爱尔兰义勇军⁷³制服，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警察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镇压行动……

英国当局也没有对托马斯·阿舍的葬礼采取镇压行动。他们也对托马斯·阿

71 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61 年废除奴隶制等多项改革期间建立的地方政府机构。——译者注

72 1913 年成立于都柏林，是一个由爱尔兰运输总工会的志愿者组成的小型准军事团体，目的是保护工人的示威活动。——译者注

73 1913 年由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建立的军事组织。其宗旨是“确保和维护爱尔兰全体人民共同的权利和自由”。托马斯·阿舍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译者注

舍的死感到震惊，随后政治犯的待遇得到了许多改善。

1923 年，德国鲁尔抗争期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六，十三名克虏伯钢铁公司的工人被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军枪杀，他们的送葬仪式成为一场民族哀悼的示威行动。

1940 年秋天，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抵抗运动领导人鲁迪·阿恩特被党卫队保安局谋杀。1941 年初，这个消息传到柏林，赫伯特·鲍姆⁷⁴在自己家里举办了一个追悼仪式，随后又在魏森塞的犹太墓地组织了一个追悼仪式。波马克教授描述说，这两场追悼仪式在提升鲍姆领导的抵抗团体鲍姆小组的声誉和“提高人民抵抗的愿望”方面都“非常有效”。但其他一些犹太组织领导人认为“这种大型集会太危险”——一般情况下，犹太地下组织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人数最多不超过七人。

1960 年，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全日本学生自治团体联合会进行了一生为斗争中牺牲的烈士焚香的示威活动。1963 年 5 月，希腊议会反对核武器的无党派议员格雷戈里·兰布拉基斯博士被谋杀后，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人们发动了一场有尊严、有秩序的示威行动，以表达对格雷戈里·兰布拉基斯的敬重，并支持他的政治理想。（小说和电影《Z》就是根据这一事件创作的）

1963 年 6 月 17 日，东德警方对东柏林示威者开枪镇压后，人们抬着放置着第一个牺牲的烈士遗体的担架走过彼得大街，围观的民众向血肉模糊的遗体投掷鲜花。

1968 年 8 月 26 日，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在首都布拉格斯特拉斯尼斯火葬场殡仪馆，为一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举行葬礼，他是被苏联士兵开枪打死的旁观者。一群悲伤的年轻人举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和一个写着“**我们来埋葬被你们‘解放’的受害者。**”的横幅走进殡仪馆。人们在葬礼上讲话，发誓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和所有的受害者。据布拉格一家报纸报道：“死者母亲令人心碎的声音‘别离开我，我的儿子……’和国歌的旋律混合在一起。”

1969 年 1 月 25 日，至少有五十万布拉格人参加了为扬·帕拉赫举行的葬礼，悼念这位用自焚捍卫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的大学生。葬礼前一天中午，整个布拉格都停止

74 犹太人，德国抵抗运动的重要成员。——译者注

工作五分钟。成千上万民众流着泪，拿着鲜花，走过摆放在查理大学扬·胡斯雕像下供吊唁的扬·帕拉赫的棺材。扬·胡斯是一名新教改革者，1415年因为“异端思想”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苏联军队被挡在葬礼之外，人们也不需要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维持秩序。葬礼从查理大学开始，然后送葬队伍缓缓走过老城的街道，走向扬·帕拉赫广场⁷⁵，国歌在那里奏响。人群在冰冷的毛毛细雨中站立数小时。镶着黑丝带的国旗从建筑的窗户上垂下。布拉格广播电台和其他电台纷纷报道学生对葬礼的评论。全国各地的工厂、大学和公共大厅都在举行追悼仪式。一名记者写道：“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领导人既害怕他们，又想摧毁他们——一个安静、有纪律的民族，十分低调，却不断地为自由和自尊大声疾呼。”

46. 扫墓

如果死者与当前的斗争事业存在某种关联，或者是被对手杀害的，那么，很多人一起到他/她的埋葬地扫墓，也是一种表达政治抗议和道德谴责的非暴力行动方法。例如，1861年10月4日，在圣彼得堡，一队反对沙皇政权的学生抬着花圈到格拉诺夫斯基墓地扫墓。格拉诺夫斯基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俄罗斯民粹主义创始人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朋友。1866年11月17日，被称为“人民意志恐怖主义”的彼得堡大学学生革命者计划为逝世五周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民粹派伟大领导人）的同志杜勃罗留波夫扫墓，但遭到警察和哥萨克骑兵的阻止。据约瑟夫·科贝⁷⁶的报道：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占领期间，“每到托马斯·马萨里克⁷⁷出生和死亡的周年纪念日，都会有成千上万民众到布拉格附近的拉尼市托马斯·马萨里克的墓地献花”。“人们也会到布拉格老城中心的扬·胡斯纪念碑前献花。”在法国，纳粹

75 原温赛斯拉斯广场，1969年1月扬·帕拉赫在此自焚后，该广场以他命名。——译者注

76 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年轻时曾在法国巴黎留学，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获得法律学位。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前就职于外交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逃亡到英国伦敦，担任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顾问。二战结束后回到祖国，成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并于1946年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加入苏联阵营后，科贝尔流亡美国。此后一直从事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苏联与东欧集团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译者注

77 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1918-1935）。因其在争取独立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国父。——译者注

将他们处决的法国人的尸体分散埋葬在禁止人们进入的墓地，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人们通过大规模扫墓进行示威活动。

1956年12月4日，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月之后，许多匈牙利妇女戴着黑色面纱，步行来到布达佩斯英雄广场的无名烈士墓前献花，向在苏联军队入侵中牺牲的匈牙利人致敬。妇女们唱着匈牙利国歌，朗诵着匈牙利爱国诗人山多尔·裴多菲⁷⁸的诗歌《起来，匈牙利人！》：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起来，还不算太晚！
愿意成为自由人，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
以上帝之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
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

（九）公共集会

当非暴力行动者要向对手或者更广大的民众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最常选择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某种形式的公开集会。

47. 表达抗议或者表达支持的集会

反对或者支持某项政策和行为，可以通过一群人在某些地点——通常是在与议题有关的地点——进行公共集会进行表达。这些地点可以是政府办公楼、法院、监狱等。人们也可以在其他地点举行集会，例如，在英雄或者反面人物的塑像周围。这种集会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如果集会是非法的，这一方法就结合了公民不服从的方法），取决于具体的法律、法规，也取决于人们达成政治共识的程度。

1861年9月24日，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集会，要求与学监对话，这既是抗议，也是想证实新的管理规定将取消大学一切自由的传言是否属实。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长队，穿过横跨涅瓦河的大桥，向学监宅邸进军——这是圣彼得堡历史上第一

78 1848年匈牙利革命领导者之一，1849年在与俄罗斯入侵者作战时牺牲。——编者注

次抗议活动。

1861年8月，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发布解散匈牙利议会的命令，遭到匈牙利佩斯县议会的抗议，随后佩斯县议会也被解散。佩斯县议会无视解散的命令，继续开会，结果被士兵驱逐出县议会会议厅。支持县议会的匈牙利民众先在议会外面聚集，然后行进到县议会主席家。县议会主席发表讲话：“我们被暴政势力解散了——但暴政势力永远无法吓倒我们。”

德国鲁尔抗争期间，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法院外面，声援被审判的抵抗者。在挪威，学童聚集在火车站，声援不与纳粹合作而遭到逮捕的教师——载着被捕教师的火车将经过火车站，然后用船转运到挪威北部的集中营。1943年，在柏林，大约六千名被捕的犹太人的非犹太裔妻子在盖世太保总部附近的临时拘留中心外面集会，要求释放她们的丈夫。戈培尔在1943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幸的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场面，许多人聚集在这里，竟然是为了支持犹太人。”

1956年，反对将南非的通行证制度用于妇女的大型抗议集会在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亚进行，参加集会的有全国各地各个种族的妇女。她们齐声唱道：“斯揣敦⁷⁹，你在以卵击石！”

1962年8月31日，在阿尔及尔，两万名民众聚集在一个广场上，抗议新独立的阿尔及尔国家领导人之间爆发的分裂。抗议者通过一项决议：如果发生内战，将进行无限期大罢工。

48. 抗议性会议

另一种抗议与说服的方法是进行抗议性会议。抗议性会议在规模和性质上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从街头会议到小型地方会议，从组织严密的正式会议到成千上万人自发参加的大规模露天会议。由于大多数这种会议的参加者都对会议的抗议性有共识，所以通常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是次要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作为一种表达观点的手段本身就构成了抗议。各种反对派团体为了不同的目的，都可以进行抗议性会议。

⁷⁹ 绰号北方的狮子，曾在1954年11月30日至1958年8月24日担任南非总理。是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的执政党——国民党内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派系的成员，他在统治期间进一步加强了种族隔离政策。——译者注

抗议性会议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与其他行动方法相结合。

1860年代至1870年代，北美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政府的斗争中，抗议性会议扮演了重要角色。抗议性会议常常与议会的功能相似，在会议召开时，每个有选举权的人都可以发言和投票。例如，海关查封了约翰·汉考克⁸⁰的单桅小船自由号，并指控他非法进口马德拉酒，于是，波士顿的民间反抗团体自由之子号召民众1768年6月13日，在被称为自由之树的地点举行抗议性会议。后来会议延期，地点也改在了法尼尔会议大厦——县议会开会的地方。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太多，后来地点又改到了南教堂。此次会议通过了致总督伯纳德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按照英国宪法给予北美殖民地人民与英国人同样的权利。请愿书宣称：“英国宪法确立了以下原则‘除非一个人自己或者经由公平合法的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意这些法律和税收，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被这些法律所统治，也不应根据这些法律被征税。’因此，我们拒绝并坚决抗议强加给我们的法律和税赋，英国政府已经公然侵犯了宪法确立的上述原则。”

1773年10月、11月、12月，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都举行了大型抗议性的会议，例如，12月16日，尽管天气恶劣，纽约仍然有二千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负责与其他省沟通。12月底，费城一个有八千人参加的会议做出决定，禁止一艘在茶叶抵制期间运抵费城的运茶船靠岸，要求该船立即返回英国。

1905年，第一次俄罗斯革命期间，沙皇政权做出让步，同意重新确立高校的豁免权之后，学生领导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合作，把大学变成了政治会场。每个晚上都有一万多名学生、工人、知识分子聚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各个大学的演讲厅、实验室和礼堂召开会议；小型会议则到处都是。1905年10月14日，圣彼得堡开始总罢工，各大学和艺术学院的建筑和校园到处都在召开大型会议，约有五万人出席，圣彼得堡的各个高中也成为罢工工人和支持者的会场。

1917年5月，起义的法国军人也常常召开抗议性会议，军人起义是为了反对政府将军派到战场上去送死。一天早上，当第一七零步兵团的军人得到通知，当天午

80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曾于1775年至1777年担任大陆会议主席。是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人。
——译者注

夜之后他们就要被送上前线时，一些军人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呼吁士兵拒绝登上运兵的卡车。晚上 11 点，一些士兵喝得烂醉，在苏瓦松（巴黎西北六十五英里处）的街道上乱跑。这时，出现了两辆装满其他兵团士兵的卡车，车上的士兵举着旗帜，大声喊着“反对战争！”的口号。卡车停下来，许多反战士兵都爬上卡车演讲，卡车成为了讲台。

演讲者用酒后沙哑的嗓音大骂：战争是一场屠杀，法国政府掌握在战争贩子手中，他们唾弃和平提议，政客无情地让军人去战场送死，目的只是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入侵。第一七零步兵团与其前去攻打切明德斯达姆斯，不如先打毒蛇窝——法国政府！

卡车四周的人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始发出咆哮：“我们要向巴黎进军！”“把代表们赶出议会！”“反对战争！”转眼工夫，五百名醉醺醺的暴徒就涌上了通往火车站的鹅卵石路。

1940 年初，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只有三百多名黑人获准登记成为选民。为了改变现状，一位黑人工人领导人召集了一系列大规模露天抗议性会议，让受害黑人讲述他们遭受警察暴行的经历，谴责持续不断发生的暴行。这些会议也邀请了警方代表出席。警方代表承诺，要对警察暴行进行调查，也经常会在调查后采取行动，惩罚施暴警察。

1952 年，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运动领导者曼德拉等人组织、领导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也普遍使用了露天抗议性会议。这年 4 月 6 日，当白人庆祝他们来到南非三百周年的时候，索菲亚镇、开普敦市、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市、普利托里亚市和德班市的黑人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性会议。1952 年 11 月 9 日，德班市再次举行了抗议性会议，声援反种族隔离运动。

1957 年 5 月 4 日，在中国政府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期间，北京八千名学生举行会议，庆祝五·四学生运动三十八周年——中国共产党称五·四运动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但是，学生也利用这一会议谴责中国共产党“压制全国各个教育机构中的自由民主”，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中共政权。

1961 年至 1962 年，百人会团体在英国各地举行抗议性会议，这些会议既有小规模，也有大规模的。例如，1962 年 11 月，百人会的分支机构西北百人会在曼彻斯特市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前举行了抗议性会议。1961 年 10 月 29 日，百人会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办如何开展公民不服从行动群众论坛，有大约五千人参加。1962 年 2 月 25 日，当六名公民不服从行动组织者被政府起诉的时候，百人会再次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抗议性会议，反驳政府起诉的理由，包括某些法院不接受的证人证词。

49. 经过伪装的抗议集会

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抗议集会可以（有时是公开的）伪装进行——伪装集会是为了其他某些合法的和经过批准的目的（有时可能人人都知道这是伪装集会）。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专制——既没有自由到允许公开的抗议集会，也没有专制到冷酷无情地禁止人们参加表面上合法、经过批准，但真实目的人人都知道的集会。经过伪装的抗议集会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例如，集会可以由某个与抗议的目的完全不同——比如体育、娱乐或者宗教——的团体举办。集会也可以看起来像社交活动。例如，1847 年至 1848 年，法国不允许举行公开的抗议集会，经过伪装的抗议集会就以宴会的名义举行。王朝反对派及其温和的共和派盟友计划动员公众舆论，迫使政府采取应对灾荒的行动，他们采用的方法是从 1847 年 7 月 9 日开始，在巴黎和各省发动一场宴会运动。1848 年，政府颁发禁令，禁止以宴会的名义举办抗议集会，这一禁令加速了 1848 年革命的到来。

1905 年俄罗斯革命期间，政治宴会也很普遍。这类宴会开始于 1904 年 11 月，组织者是解放同盟（自由派）理事会。当时，很多类似的会议都是非法的。作为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解放同盟理事会把宴会日期定为 11 月 20 日——代表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的《司法法》颁布四十周年纪念日。在解放同盟理事会制定的宴会策划稿中有一段内容号召解放同盟成员“这一天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尽可能多的城市组织宴会，通过宪政和民主决议。决议措词要比从地方自治议会和市领导那里听到的措词更坚决”。也就是说，在宴会上，解放同盟成员必须做出决议，要求全民选举国民议会，以便制定一部民主宪法。这一天，基辅、萨拉托夫、敖德萨、卡卢

加、顿河畔城市罗斯托夫、巴库、科斯特罗马、第比利斯、下诺夫哥罗德和塔什干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宴会。

后来，智慧的自由派找到了更多举办宴会的机会——圣彼得堡医学外科学院创办的周年纪念日，或者莫斯科大学建校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等。几乎任何周年纪念日都为举办宴会提供了借口。举办宴会又为充满激情的长篇反政府演讲和通过措辞强硬的决议提供了机会……

过去，反对派从来没有如此直言不讳，也从来没有如此公开地攻击现政权及其政策。

这类宴会一直持续到 1905 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发生之后。

50. 讨论会

讨论会和抗议集会有许多共同特征，但也有不同之处。讨论会只有一个主题，并且社会上对这一主题存在大量争议。抗议集会只表达一种观点，而讨论会的演讲者和出席者可以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演讲者常常是这一主题的高级专家，或者被认为是不仅能够陈述自己对这一主题的观点，还能提供与这一主题有关的重要事实和背景信息的人。因此，讨论会可能会有许多位演讲者，持续的时间也比抗议集会 longer。讨论会的目的不是抗议，而是承认在某一重大公共主题上存在不同观点，并且给所有观点提供一个充分表达的平台。也就是说，讨论会的主要目的是给人们提供机会，让人们能够倾听各种观点，获得有关信息，以便能够自己做出判断。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向演讲者提问，与参加者讨论，都是讨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 年，讨论会在美国和英国非常普遍，当时讨论会还是一种新出现的方法。5 月 15 日在华盛顿特区，5 月 21 日在加州伯克利大学，6 月 4 日在明尼苏达大学，1965 年 6 月中旬在牛津大学都举办过类似的讨论会。

（十）停止和放弃

非暴力抗议与说服方法中的这一节，包括人们短暂停止，或者以非常有限的方式停止某些常见的行为，或者放弃拥有的荣誉。这些方法具有有限的不合作，尤其是社

会不合作的特征。但其中的不合作元素主要是象征性的，其主要目的仍然是表达抗议与说服。

51. 退场

一群人，一个代表团，甚至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在休会之前退出大会、集会、会议或者讨论，以表达政治异议。例如，1920年，俄罗斯的工会会员（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对政府控制工会及其在工会中的活动程度存在大量不满。他们表达反对的方式是在这年12月联合中央运输委员会⁸¹召开扩大会议期间退场。“为了表达抗议，水运工人党员代表和铁路工人代表一起离开了会议厅。”二战期间，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的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通常被认为是一位唯唯诺诺的人）至少有两次在希特勒面前退场。例如，1940年4月，威廉·凯特尔反对把纳粹占领下的挪威行政机关由德军军方移交给地方行政长官约瑟夫·特博文（此人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派驻挪威的总督），在希特勒当众斥责他之后，他退出了会议室。1940年8月底，威廉·凯特尔提交了反对与苏联开战的备忘录和辞呈后，遭到希特勒愤怒指责，威廉·凯特尔再次一言不发地退出了屋间。

52. 沉默

集体沉默可以是一种表达道德谴责的方法。可以是主要方法，也可以是辅助方法。作为辅助方法可以与其他方法——比如进军或者待在家里表示抗议——结合使用。

1920年，德国卡普政变⁸²期间，一名支持卡普政变的狂热分子爬上波茨坦大桥，发表攻击合法政府的讲话时，他从民众那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沉默。1938年9月27日，反对德国军队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柏林人，也用明显的敌意迎接驶向威廉大街接受希特勒检阅的装甲阅兵车队，他们或者走开拒绝观看，或者完全沉默地站

81 成立于1920年9月，是交通人民委员会、铁路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委的联合机构，由托洛茨基领导。——译者注

82 又称卡普-吕特维兹政变。一战结束时，德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根据该条约，德国国防军要从三十五万人裁军到十万人。柏林国防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兹将军和民族主义者卡普，要求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停止裁军计划，遭到拒绝后，于1920年3月发动了政变。政变导致合法政府不得不放弃柏林，逃到斯图加特。此后德国工人发动大罢工反对政变，最终政变失败，卡普和吕特维兹逃往瑞典。——编者注

在那里旁观。

1953年6月18日，东德起义失败后，至少有二千名东柏林工人排队沉默地走过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驻东德大使馆以示抗议。蔡斯工厂的工人迎接统一社会党代表的演讲和恳求的方式是“像一堵闷不做声的高墙，顽固的沉默”。

1956年10月22日，匈牙利人为了支持波兰波兹南起义⁸³，在波兰驻匈牙利大使馆外进行了一场沉默的示威。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首都布达佩斯的民众在看到海报和传单发出的呼吁之后，参加了下午一点至两点进行的沉默一小时示威行动。许多人在这一个小时里离开街道，待在家里，或者在指定的时间走进家门。1958年，英国第一次向阿尔德马斯顿进军⁸⁴行动，有八千多人参加。在进军进行到最后—英里时，示威者在沉默中走向核武器研究所。

1962年，一份传单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传播，传单号召妇女团结起来，声援阿斯图里亚斯煤矿的一万多名罢工工人。为了响应这一号召，西班牙巴斯克省的妇女聚集在马德里古老的中央广场太阳门，表达沉默的支持。1962年5月，西班牙传统的纪念圣者圣伊西德罗节期间，妇女们单独或者排成一队绕广场行走。秘密警察逮捕了其中的七十人——许多人是著名的女性和公众人物的妻子——并对她们处以一千至二万五千比塞塔⁸⁵罚款。

1966年3月29日至4月8日，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一位斗志昂扬的古巴人鼓吹，要冒一切风险在越南打败美国人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沉默而不是掌声。

1964年10月1日晚，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言论自由运动⁸⁶期间，一群反对言论自

83 1956年6月28日，约十万名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工人聚集在波兰中部城市波兹南市中心时，遭政府武力镇压。造成超过一千人受伤，至少七十四人死亡（官方说法），其中包括一名十三岁的儿童。——译者注

84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英国开展的核裁军运动中的一次反核武器示威行动。进军起点是伦敦，终点是阿尔德马斯顿核武器研究所，距离大约八十三公里。该行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成为核裁军运动中最重要行动。——编者注

85 加入欧盟之前西班牙的法定货币。——编者注

86 1964年至196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发起的争取“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运动。至少有三千名学生持续参与了这一运动，人数最多时达上万人。该运动与美国民权运

由的学生责问和骚扰要求言论自由的学生示威者，并向他们投掷鸡蛋和点燃的烟头。示威者用沉默与反对者对峙了四十五分钟之后，反对者无趣地离开了。

捷克斯洛伐克人在悼念扬·帕拉赫（1969年1月用自焚抗议苏联入侵的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的过程中，沉默也是他们反抗的主要特征。大学生行动委员会宣布：“在这种环境下，完全沉默是表达我们真实感情的最佳方式。”扬·帕拉赫的葬礼也是“以完全的沉默和完美的秩序为特征”，“几十座教堂的钟声在沉默的城市上空敲响”。

53. 放弃荣誉

个人表达观点的方法之一，是自愿放弃自己反对的政府授予的特殊荣誉，或者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新荣誉。包括放弃荣誉称号、奖章、名誉职务，辞去被认为与对手的事业有密切联系的荣誉社团中的职务等。这种放弃是为了削弱政府的权威而做出的自我牺牲。

在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大量锡克教士兵退回了他们的战争勋章，还有成千上万名印度人放弃了自己的头衔，比如印度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放弃了英国爵士称号。1919年至1922年，朝鲜全民示威反对日本统治期间，一些被授予日本贵族称号的朝鲜人也放弃了这些称号。1963年，因为东德政府拒绝释放海因茨·勃兰特——他曾被纳粹和共产党政权长期监禁；1963年被大赦国际评为1963年年度囚犯称号——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退回了东德和平理事会授予他的卡尔·冯·奥西茨基⁸⁷和平奖章，以示对海因茨·勃兰特的声援。

54. 背身

是指在遇到对手或者对手的代表时背过身去（站着或坐着），以表达自己的反对。例如，1771年，马萨诸塞湾省总督哈钦森在禁食和祈祷日发布公告，号召人们感谢“我们特权的延续”——反对派认为这是公开侮辱，因为这暗示对英国政策的支

动和反越战运动联系紧密。——译者注

87 卡尔·冯·奥西茨基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的德国记者、作家、和平主义者。在被纳粹德国政府囚禁于集中营期间，获得193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编者注

持——这一公告原本要求牧师在所有教堂宣读，但是，菲利普·戴维森写道：“彭伯顿是波士顿唯一宣读了这一公告的牧师——他这么做是因为总督是他的会众——他宣读公告的时候显然十分尴尬，因为许多会众都背过身去，或者离开教堂。”

1953年6月18日，东德起义结束的第二天，东柏林的罢工工人虽然返回了工厂，但是拒绝工作。“他们蹲在自己的车床和工作台前，在党的官员走过来时，他们背过身去。”

停止和放弃这一节中的方法告诉我们怎样象征性地停止与对手合作。但是，绝大多数非暴力行动方法都是更加实质性的行动方法，在这些行动方法中，人们拒绝与对手开始某种新合作，或者停止他们之前一直进行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非暴力行动中的第二个大类：非暴力不合作

二、非暴力不合作

——社会不合作

介绍

绝大多数非暴力行动方法都涉及不与对手合作。既行动者故意停止与和自己发生冲突的个人、活动、机构或者政权进行通常形式和通常程度的合作。例如，人们可以完全无视对手，就像他们不存在一样。人们可以拒绝购买特定商品，拒绝工作。人们可以拒绝服从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法律，在街上静坐，或者拒绝纳税等等。行动者斗争的方法，可以是减少或者停止通常的合作，也可以是拒绝新的合作，或者同时采取以上两种方法。这将会造成正常工作的低效或者停滞。换句话说，不合作涉及故意中止、拒绝给予或者蔑视某些现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不合作行动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事先有计划的，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

本大类把不合作行动方法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社会不合作（包括社会抵制）、经济不合作（包括经济抵制和罢工）、政治不合作（也称为政治抵制）。

本节介绍第一类——社会不合作。包括拒绝与从事某些错误或者不正义行为的个人、团体继续保持正常的社会关系（无论是特殊关系还是一般关系），拒绝遵守特定的行为模式或者社会习俗。除了本节列举的社会不合作方法之外，还可能来自行动者的思考、研究、发明的其他不合作方法。这一分类包含 16 种非暴力行动方法，我们又把本节中的方法分为三个子分类：个人排斥；暂停社会活动、不服从社会习俗、不与机构合作；退出社会体制。

（一）个人排斥

55. 社会抵制

社会不合作中最常见的方法是社会抵制，其特征是排斥或者拒绝与一个人、一些人继续保持通常的社会关系。排斥一词源于古代雅典人的惯例：公民投票把那些权力

太大或者太受欢迎的人放逐（放逐时间为十年，后来改为五年）。公民投票的方法是在陶片上写下被放逐者的名字。这种惯例又称为陶片放逐。

在现代英国，工会成员时常对拒绝参加罢工和其他此类活动的工人实施社会抵制。宗教团体也常常采用社会抵制的方法。抵制的实施程度和实施动机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有时候抵制伴随着仇恨和报复；有时候抵制者会公开宣布爱那些受到抵制的人，希望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让抵制团体能够接受他们。社会抵制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受到抵制的社会关系对被抵制的个人、团体的重要程度。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社会抵制通常是一种暂时的做法，很少会持续超过几个月，偶尔会持续超过几年。然而，在一定的社会和宗教背景下，某一特定群体——比如印度的不可接触者——可能会遭受社会抵制长达几个世纪。这提醒我们，**社会抵制就像其他非暴力行动方法一样，也可以用于不正义的目的**。例如，1904年初，爱尔兰利默里克市发生了一起针对犹太人社会抵制，这一抵制行动遭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迈克尔·戴维特的谴责。

社会抵制有三种用途在抵抗运动中特别重要：一、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抵制行动；二、劝说特定个人、团体，停止与对手的某些合作，或者停止为对手提供服务；三、给对手及其代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施加压力——通常是向警察和军队传达强烈的排斥或者仇恨。

在将社会抵制用于动员广大民众中不愿意抵制的人参加抵制行动方面，北美殖民地、芬兰和印度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北美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政府的斗争中，普遍采用了社会抵制的方法，这既是为了鼓励人们参与不合作运动，也是为了惩罚那些亲英国政府的人。这些社会抵制形式多样，常常与经济抵制相结合。这些案例过去一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开始使用社会抵制这个词。当时常用的词是“不赞成”，意指表达责难，使其蒙羞，停止善意和道德上的支持。

例如，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运动中，“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和布里斯托尔县的女仆参与斗争的方式是勇敢地揭发那些《印花税法案》支持者的地址”。后来，北美殖民地人民又将社会抵制——不赞成——的方法，用于抵制《唐森德法案》的运动。

1769年12月2日，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城市议会决定，实施严格的不进口、不消费和紧缩计划，并且抵制（“以最有效但是合法的方式”）任何拒绝签署或者拒绝服从运动决定的人。早在1768年3月，费城民众就决定不购买受到抵制的进口货物，并且“以所有合法谨慎的手段”抵制任何违反抵制决定的人。公布违规者的姓名，也是表达反对和传播遭受社会抵制者的常用方法。例如，1769年7月，波士顿民众把违背抵制决定的人的名字公之于众。

1774年至1775年，社会抵制再次用于让人们服从《大陆盟约》（1774年10月由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的经济和政治不合作计划。例如，1774年12月，马里兰会议（为《大陆盟约》的不进口、不消费、不出口政策寻求实施方法而举行的会议）决定，律师不应代表违背抵制政策的违规者提起诉讼，也不应为违规者任经理的店铺追讨债务。类似支持《大陆盟约》的行动也在宾夕法尼亚省、纽约省、马萨诸塞湾省和新罕布什尔省实施。在马萨诸塞湾省，违反政治不合作政策，接受官方任命，担任地方议会成员的人，会被贴上“臭名昭著的叛国者”的标签，他们的名字作为“反对国家的叛逆者”被公之于众，让他们“带着应得的臭名传给子孙后代……”。

1899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二月宣言》⁸⁸，专制地废止了芬兰宪法之后，芬兰人分裂成两个群体：“顺从者”赞成服从《二月宣言》，“宪法派”则坚决拒绝服从《二月宣言》以及根据《二月宣言》颁布的各种法律和命令。在随后的不服从运动期间，名为卡加尔的地下运动领导小组号召民众对“顺从者”实施社会抵制。

卡加尔出版的《公民问答》呼吁，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像对待瘟疫携带者或者暴力犯罪者那样对待“顺从者”。亲朋好友如果在冲突中持相反立场，他们就会断绝来往；他们在不同的商店买东西，在不同的银行存钱；一个城镇还建了一所新的中学，因为属于相反政治阵营的家庭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同

⁸⁸ 尼古拉·罗曼诺夫，即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沙皇和芬兰大公。1899年，他发表针对芬兰人民的《二月宣言》，内容包括：只允许使用俄罗斯货币与邮票；只允许使用俄罗斯语作为行政官方语言；俄罗斯东正教是国教，诱导东正教教徒为路德教会服务是违法行为；新闻媒体必须服从俄罗斯审查制度；芬兰军队服从俄罗斯兵役管理。《二月宣言》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废止芬兰宪法、剥夺芬兰议会的权力、废除芬兰大公国的自治权。这是芬兰俄罗斯化政策的起点。当时的芬兰大公国俄籍总督尼古拉斯·包布里索夫是该政策的执行人。他不仅下令禁止自由言论，而且解除了上千名芬兰籍官员的职位，任命俄罗斯人替代。1903年，他还正式拥有了独裁权。——译者注

一所学校。

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印度民族主义者也用社会抵制的方法对付那些拒绝参加不合作运动的人。他们采用的方法不是惩罚拒绝参加不合作行动的人，也不对拒绝参加不合作行动的人及其亲属进行人身伤害，而是不断提醒他们，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使他们疏远了社会。只要他们看清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错误，随时欢迎他们“重返”社会。事实上，不合作行动的参加者通常会确保被抵制者的基本需求，比如食物、居所、衣物和水。（甘地强烈谴责 1930 年至 1931 年期间偶尔出现的激进的社会抵制者，尤其谴责他们拒绝给被抵制者提供食物。）

在这场斗争的初期，甘地入狱之后，著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敦促民众，在甘地入狱期间，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社会抵制。1930 年 6 月 27 日，印度国大党全印度工作委员会号召人们“……对所有政府官员和其他直接实施了镇压独立运动暴行的人进行严格的社会抵制”。按照甘地的观点，是否应该进行社会抵制，取决于实施社会抵制时的动机和方法。例如，应该给被抵制者提供食物、水和医疗服务，抵制者不应对被抵制者心怀仇恨或者报复的情感。相反，抵制者的态度应该是惋惜和关心，希望被抵制者停止帮助英国政府，重返印度社会。1931 年，甘地重返圆桌会议⁸⁹时，印度国大党全印度工作委员会修改了之前的决定，提醒人们：“不应实施旨在对政府官员、警察和反民族主义者加以伤害的社会抵制行动，这样做完全不符合非暴力斗争的精神。”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社会抵制的第二种用途。如果己方成员（比如被占领领土上的国民——编者注）为对手服务，尤其是用被视为背叛的方式为对手服务（比如充当政治警察或者傀儡官员），或者公然蔑视特定的不合作行动的决定（比如充当罢工破坏者），这些人常常会受到社会抵制。例如，公元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工会会员常常拒绝与非工会会员一起工作，并且对罢工破坏者（“工贼”）实施社会抵制，采用的方法是不去他们经营的寄宿旅店和餐馆消费。地方工会还会向不同城市中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传播罢工破坏者的名单，防止他们渗透进工会。

89 英、印双方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有关印度未来的会议。第一次圆桌会议于 1930 年 11 月 12 日至 1931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二次圆桌会议于 1931 年 9 月 7 日至 12 月 28 日召开。——编者注

1919 年，在反对英国统治爱尔兰的斗争中，社会抵制针对的是皇家爱尔兰警队成员及其家属。与英国警察不同的是，皇家爱尔兰警队携带枪支，许多成员驻扎在爱尔兰各地的营房中。历史学家查尔斯·莫厄特写道：“抵制政策——包括拒绝向皇家爱尔兰警队成员出售食物——在使警队士气低落方面起到的作用远胜于几起谋杀或者更多的谋杀威胁。社会抵制导致皇家爱尔兰警队成员大量辞职，没有新人再报名加入。”查尔斯·莫厄特将这一社会抵制形容为“1919 年最成功的武器……”。波兰在纳粹占领时期也使用过类似的社会抵制方法。地下政府平民抵抗局（负责清除德国占领期间的波兰叛徒和通敌者）使用声名狼藉的判决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

一名波兰人被判处声名狼藉，因为他没有遵守“对占领者保持强硬态度”的规定。我们允许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时候，他无从辩解。这意味着他将遭到社会抵制，同时也为战后将要进行的刑事诉讼提供依据。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违反地下组织的命令，继续在剧院演出的波兰女演员被判处声名狼藉，她的姓名被公布在所有地下报纸上。

1968 年 8 月底，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通苏者的社会抵制和公开其姓名，是防止建立亲苏傀儡政府的重要手段。大约在 8 月 24 日，捷克斯洛伐克记者联盟在一份印刷传单中呼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抵制叛徒和他们的家庭。”布拉格街头张贴的海报公开列出通苏者的姓名。其中一名被公开姓名的通苏者卡雷尔·梅斯特克给国民议会写信，称自己和占领者没有关系。

社会抵制的第三种用途是抵制外国政权官员、警察和军队。这种社会抵制有时也用于针对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或者委员会成员。例如，1960 年，非洲英属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人不与来自伦敦的蒙克顿委员会合作的行动，就常常超出政治不合作的范围，发展成拒绝与委员会成员有任何社会关系。1881 年 6 月，爱尔兰人在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拒绝给驻扎在爱尔兰基尔马勒克镇的警察提供交通工具，也不理睬他们，这造成了以下结果：

受到抵制的爱尔兰警察很难得到商品供应，甚至连食物都买不到。客栈老板也拒绝给他们提供公共马车，使他们几乎无法到镇外去执行紧急任务。

1923 年，德国鲁尔抗争期间，占领鲁尔的法国和比利时军队遭到了德国人的社会抵制：如果士兵进酒馆喝酒，德国客人会马上离开。纳粹占领期间，丹麦的德国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待遇：有些德国士兵从来没有听到过丹麦人说话；如果德国士兵对丹麦人说话，丹麦人会一言不发地走开；德国士兵进入商店的时候，丹麦顾客或者保持沉默，或者默默离开。在挪威，社会抵制有时会执行到极端的程度：挪威人会直视德国士兵的身后一言不发，就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在有轨电车上拒绝坐在德国士兵旁边也是一种普遍的抵制方法，以至于后来乘客在有空座的时候仍然站着都成为一项罪名。社会抵制有时也被用来对付与德国人合作或者拒绝参加抵抗行动的挪威人。

1959 年，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民采用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抵制措施：洋蓍种植者在工团主义⁹⁰者的领导下，通过禁止向其他地方的种植者供应洋蓍幼芽来提高这种蔬菜的价格。据苏珊妮·白尔杰教授⁹¹的报告：洋蓍种植委员会提议用社会抵制的方式执行禁令。洋蓍种植委员会在写给地方分会领导人的报告中建议，对于违反出售禁令的农民，首先应该有几位邻居上门劝阻，如果他坚持出售洋蓍幼芽，全体邻居都应该上门劝阻。如果这样还不见效，所有农业组织都应该开除违反禁令的农民，邻居应该拒绝向他提供所有的帮助，还应该对他进行公开羞辱。（抵制行动还对抵制措施失败后，最终诉诸某些轻微的破坏财产行为做出了规定，比如给轮胎放气或者往汽油里放糖。）

1968 年 8 月底一段较短的时间里，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与苏联士兵进行了广泛的辩论，随后是对苏联士兵进行社会抵制。捷克斯洛伐克人通过地下抵抗电台广播和散发传单敦促人们进行抵制。8 月 23 日（苏军入侵发生在 8 月 20 日晚）已经有报告说“没有人 and 苏联士兵说话，人们从苏联士兵身边走过，完全不理睬他们。到处都能看到巨大的俄文字母标语：“回家去！”“别向我们开枪！”

56. 选择性社会抵制

⁹⁰ 是以劳工运动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张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使企业由资本家主导变成由工人主导，各领域专家与工人代表共同进行谈判并管理经济。工团主义认为应该通过政治运动与策略来实现这种模式。——译者注

⁹¹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是比较政治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威。——译者注

除了完全或者近乎完全的社会抵制之外，社会抵制也可以仅限于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选择哪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进行抵制，可能是战术决定的结果，也可能是这些社会关系恰好是特定的抵抗者与对手之间的主要关系。例如，店主或者商人可能愿意与占领军交谈，但是拒绝向他们出售商品。这种社会不合作与作为经济不合作手段中的商人抵制不同，因为这一方法不是拒绝出售某些商品，而是拒绝出售商品给特定的人群。因此，这种行为不是经济不合作，而是社会不合作。在德国鲁尔抗争期间，商人曾经联合起来，拒绝向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出售商品。

1956 年，苏伊士战争⁹²期间，英国和法国军队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北端的塞得港市，埃及的街头小贩遵守抵抗运动的要求，不出售商品给英国和法国军人，该市欧洲区的埃及商人也关闭了自己的商店。

选择性社会抵制也可以采取与出售商品无关的方式。例如，1905 年 1 月 9 日，俄罗斯圣彼得堡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商人俱乐部对军人关上了大门，因为军人参与了对和平示威者的镇压。1917 年 1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和内务部长亚力山大·普罗托波波夫（他被认为是进步力量的头号敌人）在冬宫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来，在等待沙皇到来期间，普罗托波波夫靠近罗江科，想和他握手。一位目击者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我看到普罗托波波夫从罗江科的后面走近他，祝他新年快乐，并向他伸出手。

罗江科甚至没有向他转过身就发出宏亮的吼声：“走开！别碰我。”这一事件马上尽人皆知，当天晚上全彼得堡都在谈论这件事。

前苏联历史学家乔治·卡特科夫把这次拒绝握手称为“精心策划的、带有政治意义的无礼”。

1917 年 3 月 7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五天之后，俄罗斯国家杜马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抵达尼古拉二世当时所在的莫吉廖夫市，带来了临时政府决定逮捕他的消息。然后，特别委员会委员和尼古拉二世在十名士兵的伴随下，乘火车从莫吉廖夫市来

92 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发生在埃及，是英国、法国、以色列三国联盟与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战争。——译者注

到圣彼得堡沙皇村。在那里，尼古拉二世邀请特别委员会委员与他一同用餐，但遭到拒绝。

57. 利西翠姐式的社会抵制

古希腊剧作家亚里斯多芬的戏剧《利西翠姐》中讲述的制止战争的秘方——妻子拒绝与好战的丈夫发生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性社会抵制方式，值得单独列出。据斯坦·斯坦纳⁹³的记录，在公元十七世纪初，印地安人易洛魁联盟的妇女曾经进行过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主义“起义”：

1600 年左右，该部落联盟的妇女受够了男人之间不断发生的战争。她们宣布抵制做爱和生育。在男人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交给她们之前，不再生育更多的战士。由于易洛魁联盟的男人相信只有妇女知道生育的秘密，因此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主义“起义”迅速取得了胜利。

1963 年 12 月底，非洲英属南罗德西亚布拉瓦约姆波波玛镇的妇女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协议：拒绝与丈夫做爱和生育，直到他们参与的武装冲突停止。

58. 逐出教会

教会可以采用的一种制裁方式是将信众逐出教会，即把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排除在教会成员以及有关活动和特权之外。这种方法是由教会领导人而不是由普通教会成员发起。虽然这种行动有时是因为纯粹个人因素导致（比如将某个从事了道德上令人反感行为的人逐出教会），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社会不合作方法主要用于政治和社会斗争。

在中世纪的欧洲，逐出教会和停止教权是政治斗争至关重要的制裁手段。当时，教会享有很大的世俗权力，人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宗教方面，最终都忠诚于教皇。因此，将一位世俗统治者逐出教会，可能导致民众不再服从这位世俗统治者，甚至对世俗统治者发动一场革命。

公元十一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以今天的德国和奥地利为核

⁹³ 美国历史学家，其研究领域为美国少数民族社区及其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的关系。——译者注

心）皇帝亨利四世之间发生了一场斗争。亨利四世与被逐出教会者接触（也是一种社会不服从方法）之后，把一位被教皇任命的大主教赶出了米兰；1076年，亨利四世还在沃尔姆斯会议⁹⁴上称教皇为伪僧侣。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回应是把亨利四世逐出教会，并且宣布废黜他的皇位。

亨利四世的撒克逊臣民也发起了对亨利四世的起义，显然，臣民想摆脱这位被逐出教会的君主的统治。亨利四世被迫屈服，在凌冽的寒冬匆匆赶往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在卡诺莎（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⁹⁵的高山要塞之一）找到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为了表示忏悔，他在冰天雪地中站了三天，祈求得到赦免。在第四天，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赦免了他。

然而，1077年，起义的撒克逊臣民另立了一位皇帝。一场内战之后，双方都不接受教皇的介入。1080年，教皇格里高利再次把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亨利四世的回应是任命了另一位教皇克雷芒三世，并在罗马接受了克雷芒三世的加冕。

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废除奴隶制斗争期间，废除奴隶制的一方也将逐出教会作为斗争的武器。奴隶主常常由于蓄奴而被逐出教会，或者被禁止加入教会。

59. 停止教权

停止教权是指根据教会领导人的决定，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某一特定地区暂停宗教仪式和其他宗教活动。

虽然就性质而言，停止教权带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其主要目的是迫使政府或者民众改正某些具体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仅限于宗教方面，也可能（在更多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施加压力的方式是停止在一个地区举行礼拜、圣礼和符合教规的葬礼，或者以上三者相结合。教皇英诺森二世的一条教规把停止教权描述为“停止神圣的庆典活动”。研究停止教权领域的权威爱德华·克雷比尔写道：

……停止教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教会对某些损害社会、教会和神职人员利益，

94 1076年1月24日，英国国王亨利四世召集二十六位德意志和北意大利主教在德国沃尔姆斯举行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译者注

95 1046年至1115年意大利北部一位强大的封建统治者，也是亨利四世与格里高利七世这场斗争中教皇一方的主要支持者。——译者注

或者违背信仰和道德法则的犯罪者提出的要求得到服从。它是通过消极抵抗的方法实现的。这不是一种攻击行为，也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防卫行为——教会停止公共服务，直到社会“公平行事”为止。

因此，1198年至1216年担任教皇的英诺森三世在支持英国国王约翰拒绝《大宪章》之后，对反对国王的贵族领地停止了教权。1031年，利摩日理事会曾威胁要对违背“上帝和平”原则、攻击神职人员的“强盗”贵族停止教权。

（二）暂停社会活动、不服从社会习俗、不与机构合作

60. 暂停体育活动

社会不合作还可以采用取消或者拒绝参加体育活动的方法。其意图可以通过放弃表达抗议（涉及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也可以是通过对抗反对对手（通常是政府）对社会实施新的控制手段（涉及政治不合作）。这种方法之所以放在社会不合作这一分类中，是因为它虽然有政治方面的意图或者结果，但在形式上仍然属于社会不合作。

1940年至1945年，纳粹占领期间，挪威人一直使用各种方法拒绝在体育活动中与德国人和挪威法西斯政党国民联盟合作。德国人想与挪威人举办足球比赛，这样的比赛曾经举办过几场，但1939年挪威国家体育组织通过了禁止与外国队举行比赛的禁令，以支持挪威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政策。该禁令为谢绝德国人的比赛提议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德国军官想加入挪威各体育俱乐部，尤其是网球俱乐部，各地的挪威人都成功地拒绝了这类要求。如果德国人持续施加压力，挪威人准备的解决方案是：德国人可以每个星期征用或者租用网球场一、两天，但是俱乐部成员不会在这些日子出现在网球场，以此挫败纳粹与“北方日耳曼兄弟”建立友谊的企图。

1940年9月，挪威法西斯政党和德国纳粹试图对挪威各体育组织进行控制。10月1日，挪威新任劳工服务和体育部部长阿克塞尔·斯唐下令撤销与外国队举行体育比赛的禁令。但是挪威各体育组织官员坚持体育组织的自由和独立，拒绝法西斯政

党的干涉。11月4日，挪威体育组织年会被劳工服务和体育部下令禁止。挪威体育协会指导委员会就法西斯政党企图对体育组织进行控制向各分会发出通知，宣布该委员会不再继续举办体育活动。11月22日，阿克塞尔·斯唐宣布，挪威体育协会由国家控制，禁止解散其成员组织；各体育组织官员不再由选举产生，国家将指定它们的领导者。此后，挪威各体育组织官员发出一封致阿克塞尔·斯唐的抗议信，随后各体育组织官员纷纷辞职。这封抗议信在全国各地通过传单和地下报纸到处传播。

很快，全国各地体育俱乐部成员都行动起来了。当时，挪威劳工服务和体育部决定在滕斯贝格市和丹麦队举行摔跤比赛，当挪威法西斯政党国民联盟的官员抵达滕斯贝格市时才得知，原定参加比赛的六十四名挪威摔跤手都缺席了。被国民联盟控制之前的挪威体育协会主席奥拉夫·赫尔塞特写道：“从此，体育抵抗前线真正建立起来了。热爱体育的青年不会和所谓的‘新秩序’有瓜葛。现在需要守住前线。”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所有被法西斯政党控制的体育组织举办的活动都遭到了抵制，人们拒绝参与和出席官方举办的体育比赛。罢赛不仅是按照抵抗运动的要求进行的，也来自全国各地体育俱乐部普通成员的自发行动。但是“非法”和非官方的田径、滑雪、足球、网球等体育比赛仍然举行，而且观众非常踊跃，可是官方的体育比赛几乎没有观众。

后来成为挪威陆军少将的赫尔塞特这样描述罢赛：“……无条件地对任何有德国人参加的体育比赛说‘不！’，也无条件地对为了‘新秩序’而举办的体育活动的法令说‘不！’……”。“整个体育抵抗运动的道德意义，既在于它是占领期间第一个反对当局的有组织的行动，也在于只要战争持续，抵抗运动就会继续下去。”挪威政治学家托马斯·韦勒分析了被占领时期的抵抗，他指出，运动员的行动“成为榜样，给后来其他面临抉择——是在‘新秩序’下开展活动，还是放弃活动——的组织指明了道路”。罢赛给整个国家传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挪威人民在斗争。研究这一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马格纳·斯科温写道：

罢赛扩大到整个国家，汇集了大部分青年。当运动员从体育场上消失（也从报纸专栏上消失），当他们完全停止出现的时候，除非是傻瓜，或者活得像

隐士的人才会注意不到。运动员罢赛之后，纳粹和国民联盟遭受了严重的挫败，清醒的挪威人绝不会对运动员做出的榜样视而不见。

罢赛直到德国投降才结束。那一天，全挪威成千上万名运动员和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庆祝了斗争的结束，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的开始（这个案例中一部分涉及政治不合作）。

葡萄牙也采用过这类方法，但形式有所不同。1962 年春天，葡萄牙中部古城科英布拉的学生为抗议政府，暂停了各种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这样做的意图是通过放弃——而不是对抗——反对政府对社会实施新的控制。

61. 抵制社交活动

集体拒绝出席特定的社交活动——比如招待会、宴会、派对、音乐会等——也可以表达抵抗意志。在纳粹占领期间，丹麦人曾拒绝出席德国军乐团举办的音乐会。

1940 年底至 1941 年初，挪威出现了一个观众抵制电影院的罢看电影行动浪潮。行动始于斯塔万格市，起因是当地电影院董事会拒绝挪威吉斯林傀儡政权赫德精英组织的成员免费入场而被免职。此后，这一行动也扩散到了其他地方，1941 年 2 月在奥斯陆达到高潮。（这个案例也涉及经济抵制）在同一时期的波兰，地下组织也要求民众不要光顾德国人经营的电影院和剧院。1942 年，地下组织决定，波兰人经营的剧院和德国人经营的剧院都应遭到抵制。扬·卡尔斯基写道，抵制波兰人经营的剧院是因为“波兰人不应忘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哪怕忘记两个小时去看电影也是无法接受的。民众应该持续不断地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62. 学生罢课

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都可以把暂时拒绝上课作为抗议或者抵抗的手段。学生也可以采用与之相关的方法进行不合作。例如，抵制某些讲课而不是全部讲课；学生也可以去上课，但是拒绝认真听讲，就像 1965 年马德里大学的学生在争取成立独立学生会的行动中所做的那样。与此相似的行动还有很多。（学生罢课也称为学校抵制或者课堂抵制）

长期以来，学生罢课一直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在中国，学生罢课有数百年的历史，

有时为了抗议考官的不公正，采用的罢课方法是拒绝参加考试。例如，1673 年，康熙皇帝在一份圣旨中写道：“省里的年轻学子常常因为与地方官发生争吵而在地方考试中罢考。”1734 年，雍正皇帝也注意到了类似行动。1851 年，广东地区考生为了抗议地方官在财税事务上的贪腐行为进行了罢考。

1935 年 5 月，美国密苏里州第二大城市圣路易斯附近的贝尔维尔镇高中的学生进行罢课，抗议学校因政治原因解雇教师。1960 年，非洲英属北罗德西亚奇库尼的耶稣会中学有半数学生进行罢课，抗议学校开除十四名参加了政治骚乱的学生。1960 年 3 月，北罗德西亚詹姆森堡的中小学学生进行静坐罢课，要求停止对学校“政治性”参观，比如来自英国的蒙克顿委员会的参观。

1899 年，俄罗斯所有大学的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抗议圣彼得堡警方鞭打学生的暴行。1905 年俄罗斯革命期间，学生从 2 月份开始罢课，到秋天结束。之所以结束罢课，是为了让演讲厅能够重新开放给革命者进行演讲和讨论。1919 年，埃及人民针对英国政府的不合作运动⁹⁶期间，学生频繁罢课，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专门颁布一道命令来对付学生罢课。1944 年 6 月，危地马拉推翻军事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的不合作运动始于国立大学学生进行的罢课。1940 年冬天至 1941 年，荷兰代尔夫特市和莱顿市的学生进行罢课，抗议一名犹太教授被学校解聘。1955 年初，东德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学生进行罢课，反对政府把医学系并入一所由人民警察领导的军事医学院。

学生罢课也可以针对某些与学校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1963 年秋天发生在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的案例。孩子到学校上学必须穿过一段没有防护的危险沟渠，因此，父母拒绝让孩子去上学，自己在家里组织课堂教孩子们学习。1964 年 1 月 3 日，美国纽约市学生也进行过类似的罢课，以抗议学校存在的种族隔离和恶劣的环境。这一天，有将近五十万名学生待在家里没有去上学。1964 年 2 月 3 日，纽约

9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战后英国继续维持埃及被保护国地位，激起埃及人民的强烈反对。埃及资产阶级政党华夫脱党提出“通过和平手段”争取埃及完全独立，得到人民的支持。1918 年冬，埃及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领导人扎格鲁尔等人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埃及独立的要求，并组织代表团准备到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1919 年春，英国殖民当局断然拒绝了这一合理要求，并逮捕了华夫脱党领导人，引发了埃及人民的反抗。1919 年 3 月，以开罗学生反英示威为起点，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不合作运动迅速席卷全国。——译者注

市百分之四十四的学生没有去学校上课。在 1964 年 2 月 3 日这次罢课中，一些非政府组织为罢课的学生开办了替代性的自由学校。1963 年 10 月 22 日，芝加哥的二十二万四千名（占黑人学生的百分之九十）学生进行罢课。1964 年 2 月 25 日，也是在芝加哥，十七万二千名黑人学生呆在家里没有去学校上课。纽约市的白人也曾采用短期的罢课行动，抗议学校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1970 年 5 月，美军入侵柬埔寨，美国许多高中和大学都经历了一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生罢课浪潮。根据布兰戴斯大学全国罢课信息中心的报告，5 月 9 日，有四百三十一所大学进行了罢课。5 月 10 日，又有一百四十二所高中正在进行罢课或者准备进行罢课。

63. 社会不服从

包括不服从社会习俗，不服从社会机构（比如宗教团体、俱乐部、经济组织等）的规则、规章等。这种社会不服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破坏工厂的规章制度（不包括罢工），不服从教会的命令，违背演讲、衣着或者行为方面的规范。在另一些案例中，不赞成对某些人进行社会隔离和歧视的行动者采用的方法，是和被隔离和被歧视者交朋友。在印度，拒绝不可接触制度的人经常挑战宗教禁忌和社会习俗，故意和不可接触者交朋友。虽然社会不服从可能完全不挑战政府，或者只是间接挑战政府，但是被这些不服从行动冒犯的群体也可能进行反击。这种反击可能涉及警方的行动，也可能不涉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活动家违背社会禁忌（比如反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平等）的行为，有时会激起种族主义者极端暴力的反应。1964 年 6 月，黑人选民登记运动期间，美国民权运动活动家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史维纳（一名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两名纽约州的白人）在密西西比州费城被谋杀⁹⁷就是一个例证。

64. 退出社会组织

在冲突期间，各种社会组织或者团体的成员可以注销自己的会员资格，也可以停止

97 1964 年 6 月，三名美国民权活动家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史维纳在密西西比州帮助当地黑人选民登记投票。21 日晚，他们驾车行至尼肖巴县时，当地副治安官塞西尔·普赖斯以超速和纵火为由将他们拘留。他们获释后被 3K 党成员劫持，并开枪杀死。——编者注

参与该组织或者团体的活动，但是仍保留会员资格，以此作为表达不同观点的手段。此处所举的案例涉及宗教组织，但是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组织。

1830 年代至 1840 年代，美国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在说服教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废除奴隶制立场的尝试失败之后，许多人采取了退出教会的激进举措。1840 年，一位名叫罗杰斯的废奴主义者在敦促新罕布什尔州朴利茅斯教区教会公开谴责所有蓄奴的信众、牧师，以及他们的团契未果之后，退出了该教会。同年，不抵抗社（一个致力于原则性非暴力抵抗的团体）的总代理怀特在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的教会准备将他逐出之前退出了教会。另一位不抵抗社成员，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的教会执事阿莫斯·伍德也因为参加“反奴隶制礼拜者的小聚会”而退出了教会。（如果成员退出是因为某个政党或者国家已经控制了他们的组织或者团体，就应属于政治不合作方法中的第 128 种方法抵制政府支持的组织。）

（三）退出社会体制

65. 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常常和罢工结合使用，虽然它也可以单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使用。这种形式的不合作——通常出于政治动机——要求大多数民众在一定时间内待在家里。一般来说，待在家里的持续时间很短，比如一、两天。这种方法通常是有组织的，但也可能是自发的。待在家里除了可以降低与军警发生冲突的概率之外，还可以用于向对手展示民众团结一致的决心和严格的纪律。

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曾经数次使用这一方法。例如，1950 年 6 月 26 日，为抗议《种族区域法案》和《镇压共产主义法案》，南非的运动组织发动了待在家里一天的行动。这一行动的效果在约翰内斯堡市、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市非常显著。1960 年 3 月，沙佩维尔屠杀事件之后，南非运动组织也发动过一次待在家里行动。1956 年，匈牙利革命遭到苏联军队镇压，总理伊姆雷·纳吉等人被处决之后，首都布达佩斯的民众也进行了晚间待在家里的行动，街道和娱乐场所空无一人。

66. 完全的个人不合作

在某些非常罕见的案例中，监狱中的囚犯除了呼吸，拒绝做几乎所有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逮捕和判刑在道德或者政治上是不公正的。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科贝特·毕肖普是一名良心拒服兵役者⁹⁸。他最初在为良心拒服兵役者提供替代性服役计划的平民公共服务营工作，但后来他的信仰要求他中止与战争有关的任何形式的合作。1944年9月9日，他因拒绝继续为平民公共服务营工作而被逮捕。科贝特·毕肖普宣布自己的精神是自由的，如果执行逮捕的警察想要带走他的身体，他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配合。在关押期间，科贝特·毕肖普拒绝进食、站立或者自己穿衣服。他被插管强制喂食。八十六天后，他出庭受审，法官同意在无担保的情况下将他释放，直到做出判决。1945年2月20日，因拒绝出庭，科贝特·毕肖普再次被逮捕。在庭审期间，他一直保持“全身无力”状态。他说：“我不会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我是被抬到这里来的。如果你们要关押我，就把我抬出去。战争是错误的，我不想成为其中的任何一部分。”1945年2月26日，他“全身无力”的身体被抬到法庭上，随后被判入狱四年并处以罚款。在服刑期间，科贝特·毕肖普继续进行完全的不合作。一百四十四天之后，根据八六四一号行政命令（特别假释计划）他获得假释，并且不必签署任何文件或者做出任何承诺。但要在合作农场劳动。他拒绝了去农场劳动的要求。同年9月1日，因为违反假释令，他再次被逮捕，并被送进监狱继续服刑。在此期间，科贝特·毕肖普一直“全身无力”的进行完全的个人不合作。1946年3月12日，在报纸大量报道之后，他再次获得无条件假释。回家之后，他才结束了持续一百九十三天的完全的个人不合作。

67. “群飞”

这种方法的前身涉及农民或者工人停止工作，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不说明返回的要求或者条件。在下面讲述的案例中，“群飞”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临时性的。

⁹⁸ 指由于思想自由、个人良心、宗教信仰等缘故而拒绝履行军事服务的人。通常，良心拒服兵役者只存在于征兵制国家。在有些国家，良心拒服兵役者会被要求从事替代兵役的民事服务。——译者注

在古埃及，当农民无法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时，就会“跑到神庙里寻求神的保护，或者跑到沼泽和沙漠里……”。这一方法与第 68 种方法避难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这是“埃及生活中的一大特色”，至少持续到公元二世纪。历史学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写道：

当国家的苛捐杂税让当地所有居民的生活都变成沉重负担的时候，人们就会停止工作，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神庙寻求庇护，直到问题得到纠正，或者国家使用强制力量迫使他们回去工作。

在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的罗马帝国，“……我们经常听说村民拒绝纳税或者从事强制性劳动，他们采用古埃及人的反抗方法，离开村庄，“群飞”到三角洲沼泽地去寻求神的庇护。”康茂德皇帝当政期间（公元 176 年至 192 年），“从埃及的村庄里逃到三角洲沼泽地去逃避征兵、强制工作和税收重负的人数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逃亡者在祭司的领导下，能够挑战帝国政权”。

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群飞”不仅发生在埃及，也曾发生在北非的皇家属地，那里的佃农在《致康茂德皇帝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果令他们不满的问题得不到纠正，“我们就要逃到某个能让我们像自由人一样生活的地方去”。

1860 年代至 1870 年代，俄罗斯的农民工也因反抗极端严苛的工作条件，集体离职回乡务农。例如，1860 年至 1861 年，煤矿工人和修筑公路、铁路、挖掘运河的工人拒绝在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工作：

最严重的案例很少涉及那些有土地，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拉多加挖掘新运河的工人或者其他从事类似工作的工人中间。在 1861 年的一个案例中，至少有五十名工人因为逃离工作岗位而受到鞭刑。

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哥·文丘里写道：只要官方做出“些许让步”，多数抗议行动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特殊的不合作方法在俄罗斯也被使用了很多年。“群飞”显然不是一种个人更换工作的方法，而是一种集体抗议的手段。1870 年至 1879 年，俄罗斯帝国发生过四十九起以有组织的方式擅离职守的案例：“‘群飞’仍然是工人在工作条件太严苛的情况下采取的逃离手段之一。”如果逃离是永久性的，就与后

面提到的抗议性移民的方法类似。

美国的非裔奴隶也曾使用“群飞”的方法。被自己的主人租借给其他农场主的奴隶，有时会从租借的农场主那里逃跑，或者逃回自己主人家，或者藏起来，直到决定回去工作为止。美国历史学家乌利克·菲利普斯描述过非裔奴隶的类似抵抗：

有时候，一群人会一起停止工作，抗议严苛的工作条件。佐治亚州的一名监工在写给农场主的信里详细描述了一次类似事件：“先生：我给您写信是为了让您知道，您的三名奴隶离开了种植园。他们对工作和我不满意，我抽了其中一些人几鞭子。星期三早上他们消失了。我猜他们正在外面露宿，直到看到您或是您的杰克叔叔……”

那时，奴隶不能和监工直接谈判，但是他们躲在树林里的时候，或许能够通过附近种植园的奴隶向监工提出条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他们才会回去工作，或者他们也可以向闻讯急速赶来的农场主投诉，让他解决自己的不满。奴隶的态度可能很谦卑，但是他们通过重复这一行动施加压力的力量不容忽视。

1850年代曾在美国蓄奴州旅行的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⁹⁹也报道过奴隶“群飞”到荒野去，以抗议过份严苛的工作要求或者残酷待遇的案例：

奴隶如果不愿意工作，尤其是在没有得到良好待遇，或者是不喜欢租借他的农场主的情况下，就会装病，或者真的生病。当奴隶认为自己的工作太辛苦，或者对受到惩罚和冷酷的待遇感到愤怒的时候，就会跑到荒野去，直到租借的日期到了才回到自己的主人家。主人发现自己的财产安全的回来，没有死在荒野，也没有逃去加拿大，会很高兴，不会再惩罚他们，而是立即把他们租借给一位新的农场主，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赫伯特·阿特希克强调了“群飞”在奴隶斗争中的重要性，指出“群飞”在生产谈判中的意义：

⁹⁹ 美国景观设计学奠基人。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将其评为影响美国的一百位人物之一。1852年，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经两次在南方长途旅行并发表文章，呼吁废除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译者注

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奴隶逃到偏僻的荒野或者森林里，然后请人捎话给主人，只有在他们的要求（或许是更好的衣食，少挨打，缩短工作时间，甚至换一位新监工）得到满足（至少得到讨论），他们才愿意回去。在内战期间，奴隶增加了一项新的要求——支付货币工资。有时他们也能赢，于是从奴隶成为雇工。

从奴隶成为雇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显示了奴隶通过非暴力斗争实现自我解放的可能性。

美国的非裔奴隶也会把“群飞”作为完全逃离奴隶制的手段，采用的方法是逃离蓄奴州。早期他们逃亡的目的地之一是西班牙殖民地佛罗里达。1730年代，许多奴隶逃到佛罗里达。在那里，他们根据西班牙法律获得自由。1733年，西班牙国王颁布了一道敕令：所有抵达佛罗里达的逃亡奴隶都可以像自由人一样在那里生活。

后来，许多奴隶——常常在废奴主义团体的帮助下——逃到北方各州和加拿大。被称为地下铁道¹⁰⁰的逃亡网络帮助许多奴隶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在北方各州的法律地位根据各州的立法和判例而有所不同。这些逃亡既有“群飞”的特征，也有抗议性移民的特征。

68. 避难

避难是一种不常使用的方法，它指一名，也可能是一群（更经常）对他们的对手十分重要的人从某个地方撤离。对手只有在违反宗教、道德、社会、法律等禁令的情况下，才能接触到他们。而违反禁令又会使对手陷入新的困境。神庙、教堂和其他圣地经常成为避难场所。当古埃及农民像第67种方法“群飞”所描述的那样躲到神庙里时，他们使用的是“群飞”和避难相结合的方法。当他们藏到沼泽地里时，使用的只是“群飞”的方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中都有这样的案例。

在信仰基督教的中世纪欧洲，即使自己承认杀了人或者犯有其他重罪的犯人，也和无辜者一样，能够受到圣殿和圣地的庇护。今天仍然具有权威性的《罗马天主教教

100 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同情者建立的、用来帮助南方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的秘密网络和避难所。公元十九世纪早期建立，1850年至1860年达到顶峰。据估计，有数十万奴隶通过地下铁道网络逃走。——译者注

会法典》（1917年由教皇本笃十五世颁布，以之前的法典和法律为依据）第一一七九条规定了对要求避难者的保护。

1968年，在反对征兵运动的背景下，避难的方法在美国复活。首先是教堂，随后是大学，纷纷给那些不服从征兵令而遭到通缉的年轻人提供象征性的庇护。在波士顿市阿灵顿街唯一神教派¹⁰¹教堂，三百名年轻人把自己的征兵卡交给威廉·科芬牧师，威廉·科芬牧师在随后的布道中说：

如果中世纪的教堂能够为罪犯提供庇护，为什么今天的教堂不能为我们最有良心的人提供庇护？如果教堂宣布自己是良心避难所，那么我们不仅应该认为它是在保护一些公民，更应该认为它是一种使教堂真正成为教堂的行动。

如果国家决定将法律之手伸到教堂内部，那么教徒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避免被逮捕。但是教徒可以证明自己“良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正在遭到亵渎。

1968年5月20日，波士顿教会为不服从征兵令而遭到通缉的两位年轻人罗伯特·塔尔曼森和威廉·切斯提供了庇护。5月23日，正在教堂内演讲的罗伯特·塔尔曼森被逮捕，他“全身无力”地被从讲坛上抬了下来。一位天主教神父安东尼·穆拉尼告诉执行逮捕的警察，他们正在“亵渎一家道德避难所”。安东尼·穆拉尼和另一位神父，还有其他教徒随后在教堂外遭到警察的殴打和逮捕。

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也发生过类似的避难事件。纽约市、底特律市和旧金山市的教堂也宣布向寻求避难者开放。在哈佛神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小教堂宣布为避难者提供庇护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中心也宣布为避难者提供庇护。从纽约到夏威夷，许多大学都提供了避难所。夏威夷大学抵抗团体在提到美国法律不承认欧洲和夏威夷都曾经存在过避难的惯例时说：“今天，作为一种抵抗不公的象征，提供避难所在唤醒人民的良心方面仍然有效。”

最有政治意义的避难发生在1905年至1906年的波斯革命期间，行动者将避难与其他某些方法——包括关闭集市——结合使用。波斯（今天的伊朗）的避难行动之所

101 强调上帝只有一位，否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派别。因为“三位一体”一词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是根据经文的上下文及前后联系推理而来的，到公元四世纪后才得以确立，所以受到唯一神教派的质疑。——译者注

以很有力量，是因为波斯国王的权威被认为来自宗教。因此，波斯伊斯兰教领导人使用避难的方法，事实上动摇了国王统治的宗教基础。

当时，波斯民众对国王穆扎法尔丁·沙¹⁰²的统治有很多不满，其中包括奢侈浪费，傲慢自大；让比利时官员征收关税，国家被有特权的外国人剥削；首席大臣阿博都·哈密德专横暴虐，与比利时人和俄罗斯人勾结，损害波斯的利益。

1905年4月，穆扎法尔丁·沙国王到波斯圣城马什哈德朝圣绕道俄罗斯一事在波斯首都德黑兰引起强烈不满。许多商人到沙阿阿博都阿齐姆（德黑兰附近的一所圣殿）寻求避难以示抗议，集市关闭了五天。

后来，对国王的不满愈演愈烈，其中不满之一是政府官员阿萨夫·道拉命令士兵向在马什哈德反对征收苛捐杂税的抗议人群开枪，以及对一些到伊玛目礼萨圣殿寻求避难的阿訇（古兰经学者）和商人处以鞭刑（抽打脚掌）。

1905年12月，许多商人到位于伊斯法罕市的皇家沙阿清真寺寻求避难。随后有许多大阿訇也加入进来。皇家沙阿清真寺的伊玛目（领拜者）是国王一位富有的亲戚，他根据首席大臣阿博都·哈密德的要求，使用暴力将到皇家沙阿清真寺避难的人驱逐。被驱逐的人们离开伊斯法罕市，到沙阿阿博都阿齐姆圣殿寻求避难。圣殿在性质上比清真寺要神圣得多。随后，又有许多阿訇和古兰经学院学生也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波斯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谢赫·法兹卢拉。这次避难行动的目的是给国王施加压力，罢免阿博都·哈密德的首席大臣职务，因此，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包括王储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三位名人捐出大笔资金，给避难者购买食物和其他供应品。据报道，王储还敦促大不里士市的阿訇也支持避难。尽管阿博都·哈密德极力阻止新的志愿者和物资抵达避难地，但二者还是源源不断地到来。同时，越来越多的阿訇、古兰经学院学生和商人加入避难行列，国王的威逼利诱都未能劝说他们离开沙阿阿博都阿齐姆圣殿回到首都德黑兰。军队司令官巴哈杜尔·章亲王亲自到访也未能说服避难者从避难地返回。

历史学家爱德华·布朗描述这一事件时写道：

102 伊朗北部卡扎尔部落（今属土库曼人）王朝第五任国王。——编者注

最后，避难事件变得越来越严重和麻烦，国王不得不给避难者写了一封亲笔信，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承诺免去阿博都·哈密德的首席大臣职务；同意成立由教士、商人和地主选举的代表组成正义院（相当于议会——编者注），由国王本人主持；废除偏袒某些特权阶层的法律，所有波斯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封亲笔信的复本在全国传开之后，避难者隆重地返回了德黑兰，波斯革命的领导着乘着皇家马车，受到国王的接待，国王口头重申了他的承诺。不过，他很快就企图曲解某些让步：所谓的正义院并不是议会，而是法院。几个星期之后，新的不满再次出现，其中包括货币问题。1906年4月底，德黑兰的阿訇向国王递交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国王实施承诺的改革，依法行使行政权力。请愿书发表在官方报纸上，但仍然没有结果。形势持续恶化。到处都是密探和哥萨克士兵，太阳落山三小时后实施宵禁。针对阿博都·哈密德的抗议越来越多，伊斯兰教领导人公开进行反对专制暴政的演讲。

首席大臣阿博都·哈密德决定镇压。宗教领导人赛义德·贾迈勒在宣教坛上谴责阿博都·哈密德，被恼羞成怒的阿博都·哈密德赶下宣教坛。后来赛义德·贾迈勒避难到了库姆的神学中心。1906年6月21日，阿博都·哈密德派士兵驱逐深受工匠和平民百姓爱戴的著名宣讲师谢赫·穆罕默德，人们听到消息后迅速聚集到谢赫·穆罕默德被监禁的房子外面，阻止士兵将他赶走。一位名叫赛义德·侯赛因的学生冲向房门，企图营救谢赫·穆罕默德。军官下令开枪，但士兵拒绝服从命令。于是，一名军官亲自开枪打死了这名年轻人。人们抬着赛义德·侯赛因的尸体穿过街道和集市，民众和企图阻止送葬队伍的士兵发生了冲突。士兵向人群开枪，打死了十五个人。士兵们清空了街道，占领了城市。许多阿訇、古兰经学院学生、商人、工匠和平民百姓到市中心的礼拜五清真寺为赛义德·侯赛因举行葬礼。在被士兵包围了三、四天后，国王批准了人们到九十英里外的库姆避难的要求。

7月21日，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了宗教领导人从首都前往库姆的队伍。一名波斯历史学家写道：两地之间的道路“就像城里的街道一样热闹”。这就是波斯近代史上著名的大逃亡。“这一行动相当于宗教撤销了对政权的认可，挑战了它的合法性。

国王准许避难者离开礼拜五清真寺前往库姆，条件是穆智台希德们（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高宗教法官）必须单独走。穆智台希德们在前往库姆的路途中发表声明，宣称国王如果不履行承诺，他们就要离开波斯。珀西·塞克斯¹⁰³写道：“由于穆智台希德的离去会让所有宗教法事务停顿下来，因此，这一威胁相当严重，等于整个国家停止教权。”

与此同时，集市和银行也关闭了，首席大臣阿博都·哈密德用武力威胁商人和银行家开业。7月19日，几位商人和银行家得到英国代办的保证，如果他们向位于首都德黑兰的英国公使馆寻求避难，英国将会提供象征性保护。有人马上来到公使馆，并在公使馆的花园里露营。7月23日，露营人数增加到八百五十八人。三天之后达到五千人。波斯革命的领导者提出，恢复集市和银行正常营业的条件是免除阿博都·哈密德的首席大臣职务，颁布《宪法》，将宗教领导人从库姆召回。

7月30日，国王决定满足民众的部分要求，将阿博都·哈密德免职，任命自由派人士米尔扎·纳斯鲁拉汗·纳伊尼¹⁰⁴接替首席大臣职务，请阿訇们从库姆返回首都……

但是民众不同意，他们要求一部正式宪法，一个代议制议会，还要求第三方保证国王兑现承诺。8月1日，已经有一万三千人到英国公使馆避难，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最后达到一万四千人（有人说达到一万六千人）。

据一位英国目击者说，公使馆内到处都是帐篷。人们“用最不同寻常的方式”维护治安，秩序很好。一日三餐用巨大的铁锅烹饪，晚上有人讲述古代传说。有很长时间，避难者拒绝直接与政府谈判。最后，通过英国代表的斡旋，米尔扎·纳斯鲁拉汗·纳伊尼领头起草了一份各方能够接受的文件。8月5日——国王的生日——穆扎法尔丁·沙国王颁布了《波斯大宪章》，批准了避难者的所有要求。

这名英国目击者说，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对这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受到了广泛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鼓舞了波斯人民。他们厌倦了自己的

103 英国历史学家。公元十九世纪后期曾以外交官身份被英国当局派往中东地区。著有多部反映中东地区历史及地理的学术著作。——译者注

104 1906年波斯宪法落实后，担任第一届政府总理。——译者注

统治者，于是以俄罗斯为榜样，开始思考另一种更好的政府形式。”这名英国目击者还描述了学生赛义德·侯赛因被杀后随之而来的冲突和骚乱的形势：

人们无法武装抵抗政府，所以他们采用到英国公使馆避难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成功达到目的的方法。被放逐的阿訇最后都返回了首都，而且是胜利地返回。

英国历史学家珀西·塞克斯写道：“没有流血和内战，波斯人就赢得了他们的领导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国王让步之后不久，宗教领导人返回了首都。这是欢庆“民族胜利”的伟大日子。1906年8月19日，最高宗教领导人出席了国王召开的新议会，国王邀请他们做客三天。几天之前发布的一份公告还宣布建立国家咨商会议。

1906年9月8日，新的冲突再次出现，宗教领导人拒绝接受首相起草的法令，国王则拒绝批准宗教领导人要求的改革。集市再次关闭，许多人再次到英国公使馆寻求避难。国王最终在有关选区、议会议员资格和选举资格的要求上做出了让步。9月17日，国王接受了避难者提出的有关议会组成的条件：成立一个由一百五十六名议员组成的议会，每两年选举一次（首都地区由直接选举产生，各省由选举人选举产生），议会代表的人身不可侵犯。美国伊朗问题学者理查德·科塔姆写道：

“商人和神职人员利用历史悠久、受到尊重，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制度，实现了他们要求的宪政制度。”波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议会宪政从此建立起来。

69. 集体消失

指一个小区域的民众——比如一个村庄的人——切断与对手的一切社会联系，采用的方法是离开自己的居住地。例如，1799年至1800年，印度南部卡纳拉的农民就使用过这种方法反对英国统治他们的企图。英国指挥官托马斯·蒙罗爵士写道：

“……只要我们靠近一个村庄，这里的村民就会搬到另一个村庄去。有时候我在一个村庄待好几个星期，连一个当地村民都看不到……”

公元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巴伯记录了1883年发生在中国华中地区的一起集体消失事件：

据说华中地区一个县官受总督之命进行人口普查。因为不满意下属交上来的结果，县官决定亲自完成这一工作。民众“对县官的决定感到惊恐，害怕他来征收苛捐杂税，于是纷纷从县城逃往郊外”。县官的工作遇到了挫折，为了逃避总督可能的惩罚，他上吊自杀了。他在留下的笔记中写道：

男人……………无

女人……………无

十四岁以下的男女儿童……………无

—————

总数……………无

乔治·泰勒在描述 1939 年日本占领时期中国北方的情况时，也引用了类似的案例：

村民已经组织起来，日本人一靠近，他们就撤离村庄，把粮食埋起来，把所有牲畜和农具都带到山里去。因此，日本人必须随身携带他们需要的每件东西。

70. 抗议性移民（海吉拉特）

抗议性移民在印度被称为海吉拉特，是指抵抗者故意离开一个不公义或者压迫他们的国家，临时或者永久移居国外，用这种断绝一切社会合作的方式表达反对或者抗议。根据这一定义，只有某些特殊的移民案例属于抗议性移民。作家琼·邦杜兰特把这种方法称为自我流放。海吉拉特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先知穆罕默德就曾因为不愿屈服于麦加的暴君，从麦加逃到麦地那。

在印度，海吉拉特也被称为放弃国家，这一方法在印度独立运动和各种反对不公的运动中都曾广泛使用。它是一种自发的运动，是各种不纳税运动的特殊分支。甘地认为，最勇敢的反抗方式是为了坚持真理，欣然承受可能施加给自己的最严重的压迫，相信这是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感化对手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甘地也认为，如果抵抗者和民众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感到压抑，无法获得自尊，如果他们缺乏承受这种压迫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源于内心深处对非暴力斗争的信念，或者源于自己能够，但不愿意使用暴力自卫——那么，抗议性移民不存在任何不道德、可耻或者

怯懦。海吉拉特是肉身撤离某个国家控制的领土，牺牲自己在那里拥有的全部利益。它提供了一种摆脱不能忍受处境的非暴力方法。这种方法曾被解释为“最后的不合作行动”。显然，如果有很大比例的民众参与，这种方法就会成为一种非暴力政治不合作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非暴力抗议的方法。

1930 年至 1931 年，印度古吉拉特邦拒绝纳税运动遭到镇压后，农民就使用海吉拉特方法，移民到该邦的巴罗达（英国在那里没有管辖权）。1928 年，古吉拉特邦巴尔多利的拒绝纳税运动期间，人们也使用过这一方法，从巴尔多利暂时移民到巴罗达。

其他抗议性移民的案例还有：公元前 494 年，罗马共和国的平民为了支持贵族要求改革而进行的抗议性移民；欧洲各种遭受迫害的宗教和政治团体移民到美洲；1956 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也有大量移民逃往国外。克拉伦斯·马什·卡斯写道：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统治期间，有人曾经提议组织“大规模撤离外国租界”作为抗议外国控制的手段。

日本的农民——尤其是在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的江户时代——也曾使用这种手段对付残暴的封建贵族和腐败官员。农民们逃离自己的居住地，移民去其他地方。这种方法在日本称为逃亡。休·博顿写道：

最初，一些人秘密逃到邻近的村庄，以躲避某些令人不满的问题或者受压迫的环境，后来逐渐发展为整个村庄或者几个村庄的人有组织地逃亡。村民一旦逃到邻近的封地，就会向该封地的领主请愿，要求该领主允许他们留在这里，或者要求该领主代表他们进行干预。

逃亡在江户时代（1603 年至 1867 年）最为盛行。其中最大规模的逃亡事件发生在 1853 年，当时盛冈领主南部（“南部”是人名——译者注）封地的农民对官员的整体腐败和商业垄断感到愤怒，于是逃亡到邻近的封地仙台，要求仙台领主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还对南部封地官员提出控诉。据说，当时逃亡是非法的，封建领主会派官员把逃到其他封地的农民抓回去，但不清楚这种抓捕是否需要得到当地封地领主的许可。日本整个封建体制都有赖于农民种植稻米，因此，官员通常不会惩罚

抓回来的农民。有研究显示，江户时代逃亡事件在农民反抗中占据百分之九点二的比例。

除了柏林墙建造之前大规模逃离东德的移民之外，逃离东德的抗议性移民因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也时有发生。例如，1952 年，东德农民因为反对引入苏联式集体农庄制度而大量逃往西德。从这年 1 月到 4 月 22 日，共有八百五十二名农民选择了抗议性移民。

就像前面提到的，大规模抗议性移民可以起到政治不合作的作用。例如，1723 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实施强制兵役制，受到威胁的门诺教（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教徒大规模移民到北美宾夕法尼亚，使政府最终放弃了强制兵役计划。1787 年和 1801 年，俄罗斯政府核查门诺教徒增长情况的新规定引发了新一波移民，使政府最终放弃了核查。这些行动本来的目的是通过与政府断绝所有关系，确保信徒能够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结果却带来了政治让步。

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不合作方式不是社会不合作，而是经济不合作，有时也有政治不合作。

——经济不合作方法

I. 经济抵制

介绍

经济不合作方法比社会不合作方法要多很多。经济不合作包括暂停或者拒绝延续特定的经济关系。本节的第一部分是经济抵制，主要指拒绝购买、出售或者经营商品和服务。第二个部分是各种形式的罢工。这里介绍的重点是经济抵制。

经济抵制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由某个团体组织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抵制都可能涉及停止或者劝说他人停止经济合作的有组织的行动，采用的方法包括限制购买或者销售。虽然抵制一词 1880 年才开始使用——来源是爱尔兰梅奥郡的农民抗议杯葛¹⁰⁵上尉事件——但事实上，这种不合作方法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抵制曾经发生在地方、地区、国家或者国际层面，由直接卷入有关议题的个人或者支持有关议题的第三方实施。抵制的动机和目的从经济的到政治的，从社会的到文化的，不一而足。

经济抵制虽然在其他环境下也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美国很早就将经济抵制方法用于解决劳资纠纷，“经济抵制成为工会最有效的武器。没有一个人因为过于吝啬或者地位显赫而摆脱它的力量。”

在中国，经济抵制经常用于反抗外国势力的民族主义目标。美国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经济抵制的案例借鉴了中国人在经济不合作方面的历史经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抵制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消极抵抗或者非暴力强制方法，商会之类有组织的团体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对官僚施加影响。公元二十世纪，这种方法开始应用于表达排外思想。”他引用的案例有：1905 年，为抗议美国排华政策，广东商会发起的抵制美国货运动；1908 年和 1915 年，为抗议日本对华政策而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 年，香港、广州进行的针对英国政府的长期抵制和罢工。

105 杯葛是抵制一词的英文读音。——译者注

经济抵制分为直接抵制和间接抵制。直接抵制是指直接暂停与对手的交易，或者拒绝购买、使用、经营对手的商品和服务（有时还伴随着劝说他人也这样做的行动）。间接抵制是指对第三方进行经济抵制，以迫使第三方参加针对对手的直接抵制，也就是说，“谁不支持直接抵制行动，自己也会遭到抵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利奥·沃尔曼把间接抵制描述为“联合起来停止惠顾某些人，以迫使某些人停止惠顾与工会有主要分歧的个人和企业。”

1921年，美国发生了一次间接抵制行动，国际机械师协会抵制与其发生冲突的双面印刷公司，也抵制所有继续使用该公司产品的企业。美国另一个间接抵制案例发生在独立战争之前，当时，如果某人不遵守抵制英国商品的规定（这是抵抗《印花税法》和《唐森德法案》运动的一部分），他也会遭到经济抵制。这种行动有时会影响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1766年，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一个团体决定，禁止“给那些臭名昭著的殖民地，尤其是佐治亚和其他任何使用印花税的殖民地”运送物资。1770年5月，波士顿市议会听说罗德岛纽波特的商人从英国和东印度公司进口商品之后，投票决定切断与纽波特的所有商业关系。

本节其余部分不对直接抵制和间接抵制加以区分，而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区分具体的经济抵制。因为往往一种经济抵制既可以用于直接抵制，也可以用于间接抵制。

由于经济抵制这一术语包含许多种具体行动，因此，值得把类别再做细分。最有用的分类法是根据实施抵制行动的团体（至少是主要实施抵制行动的团体）的性质来区分。但这种分类不应过于严格，因为一种类型常常会 and 另一种类型重叠，几种方法或者几个团体的方法常常会结合使用。经济抵制也会和其他许多种非暴力行动方法相结合。

（一）消费者行动

71. 消费者抵制

消费者抵制是指消费者拒绝购买特定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抵制可能有许多理由：1) 消费者认为价格太高；2) 不是所有个人和团体都能以同样的条件得到该商品；3) 被抵制的商品可能为表达更大的不满或者对现状的整体性不满提供了象征性符号；4)

被抵制的商品可能被认为具有某些“不道德”的品质；5)反对商品的生产条件，尤其是劳动条件；6)反对销售该商品盈利的使用方式；7)可能出于其他不那么高尚的动机，包括政治偏见和政治观点差异。因此，经济抵制的动机可能是经济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或者文化性的，或者前述动机相结合。

消费者抵制的案例基本上是随机选取的：1936年，纽约家庭主妇抗议肉价太高而采取的抵制肉类的行动；1907年，美国工会活动家发起的抵制巴克炉灶公司产品的行动；1893年，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发起的长达六年的抵制利格特迈尔斯烟草公司产品的行动；公元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主义者发起的抵制拒绝出租房屋给社会民主党聚会的客栈的行动；1894年，柏林工人抵制酿酒商雇主协会成员生产的啤酒的行动。（利奥·沃尔曼指出，这一抵制行动非常有效，它给社会和劳资斗争增添了新武器。）

其他案例还包括：1934年，天主教和新教在美国共同发起的抵制“不道德”电影的行动；1957年1月，为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西班牙巴塞罗那为期十五天的公交车抵制行动；1955年至1957年，黑人发起的著名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编者注）持续了三百八十一天。抵制行动给公交公司造成每天三千至五万美元损失，还给蒙哥马利市白人商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1959年，布干达（位于乌干达境内——编者注）非洲人抵制所有亚洲商人和少数非洲商人货物的行动；1959年6月至7月，英国商人抵制新加坡一家烧烤店的行动，抵制原因是该烧烤店把名字从伊丽莎白烧烤店改成了伊比鸠鲁烧烤店，并且摘掉了挂在店内的女王画像。

也有许多抵制的案例发生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1941年9月14日至21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市民拒绝购买德国控制的报纸。抵制行动（由布拉格爱国团体策划）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在英国的流亡政府通过伦敦的广播电台号召的。当时正在伦敦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工作的约瑟夫·科贝尔在一封信中写道：“事实证明，这个抵制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占领期间，布拉格的有轨电车也时常遭到抵制，甚至出现完全空驶的情况。为了检验纳粹占领期间波兰人是否遵守抵抗纪律，地下组织有时会禁止波兰人在星期五阅读用波兰语印刷的德国报纸。这一命令在全

波兰都非常有效的得到了执行。（常常是通过敌对的，甚至暴力的行动强制执行的。有时候，人们会在违反命令的购买者的背上或者住宅外墙上画侮辱性的符号。购买者离开报摊时，会有人向他扔砖头。）

在南非，非洲黑人也使用过各种类型的消费者抵制手段反对种族隔离政策。1957年1月7日，约翰内斯堡附近亚历山德拉镇的黑人为了抗议公交车票价上涨，发动了全面抵制公交车的行动。人们使用自行车、搭乘私家便车，或者步行（通常一天要走十八英里）的方法出行。尽管遭到警察的镇压，有大约一万四千人被逮捕，但抵制扩散到了包括南非行政首都普利托里亚在内的其他地方。共有六万名非洲人参加了抵制。白人商会被迫与联合抵制委员会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就公交车票价上涨是否合理展开调查，并就调查期间暂时停止抵制行动达成了协议，持续了十二周的抵制行动才告结束。抵制的全面胜利随后到来——国会通过法案对雇主加倍征税，用于补贴黑人的交通费，使公交车票价降回到涨价以前的水平。南非国民大会党（该组织没有参与发起这次抵制行动）受此鼓舞，号召对白人民族主义者控制的企业及其产品进行广泛的经济抵制。黑人还对他们的主食土豆（主要针对东德兰士瓦等地因为反抗通行证法而入狱的囚犯黑人种植的土豆）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抵制，导致市场上土豆供过于求。

这一方法得到普遍应用的案例数不胜数。1859年，沙皇俄罗斯的农奴试图用经济手段表达对农奴制的不满，采用的方法是“开展禁酒运动，使政府无法从伏特加专营中获得收入”。1923年，德国鲁尔抗争期间，尽管工人进行了抵抗，占领当局仍然运行了几趟火车，但是鲁尔的乘客拒绝乘坐这些火车。1938年，作为黑人争取工作权运动的一部分，纽约市哈莱姆黑人社区的居民每星期二晚上进行“断电抵制”行动：切断电源，点亮蜡烛，目的是抗议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拒绝雇佣黑人在熟练工岗位工作。1960年复活节前不久，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的黑人抵制购买商场的复活节服装，目的是支持大学生采取的静坐行动——抗议六家商场内设餐馆的种族隔离政策。5月10日，位于市中心商业区这六家商场的内设餐馆都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夏天，费城地区开展了一个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反对美味烘焙公司的选择性惠顾行动，目的是让黑人获得平等的工作机会。该行动的组织

者还计划对费城的百事可乐公司和高富石油公司进行抵制，但这两家公司很快妥协，在排斥黑人的岗位上雇佣了他们。

消费者抵制有时也包括出版“不公名单”、“黑名单”、“关闭名单”、“不光顾名单”和“公平名单”，或者使用工会标签作为引导购买的手段。选择性购买行动则鼓励人们光顾采用非歧视性雇工原则的特定企业。与列举“不光顾名单”的企业不同，选择性购买行动有时会被用来规避美国某些州的反抵制法律。

72. 不消费被抵制的商品

拒绝消费被抵制的商品，可以扩大到拒绝使用它们——哪怕一个人已经购买了该商品。拒绝使用商品必须以拒绝购买为前提，因此，拒绝使用不能单独实施，但拒绝购买可以单独实施。拒绝使用的方法有助于对购买该商品的行为施加社会压力，因为这样就没人能找借口说“我已经拥有该商品，所以我可以继续使用它”。虽然拒绝使用被抵制商品的方法很少使用，而且主要是消费者抵制的辅助手段，但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行动类型——例如，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政府的不合作斗争期间，不消费、不进口英国货物以及其他各种“不”一起被列入抵制计划。

《大陆盟约》（1774年9月在费城第一次大陆会议上通过的抵制计划）第一条宣布：

作为一个不消费协议，严格遵守这一协议可以确保不进口政策得到遵守。我们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庄严同意并且联合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不购买、使用任何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或者任何已经或者即将需要为进口纳税的商品。明年3月1日以后，我们将不购买或者使用任何来自东印度的茶叶，不管它是不是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我们，所有为我们工作的人和我们下属，都不会购买或者使用任何我们决定不进口，而且我们知道或者有理由怀疑是在12月1日之后进口的日用品、工业用品和任何商品……除了那些在12月1日和2月1日之间进口，奉地方委员会之命销售，其盈利用于救济因波士顿港关闭而陷入困境的穷人的商品。

73. 紧缩政策

紧缩政策是把自愿放弃奢侈生活作为非暴力斗争的手段，其中既包含了象征性非暴力抗议的元素，也包含了经济抵制的元素。紧缩政策可能会产生一种或者几种结果：向对手和支持者表明行动者的决心；对行动者产生特定的心理影响，比如提高他们对斗争的投入程度；给对手带来经济损失——这就是紧缩政策被视为经济抵制的原因。

使用这一方法的最重要的案例之一发生在北美殖民地。当时，紧缩政策与各种各样的经济抵制（尤其是不进口英国货物）密切相关。1765年至1766年，在反对《印花税法》的斗争中实施的紧缩政策之一，是把丧葬仪式简化到极点——当时的丧葬仪式非常复杂，而且需要昂贵的英国进口货物——比如遗孀或者鳏夫不再穿戴昂贵的丧服，不再给其他哀悼者发花哨的手套和领带。1764年，《印花税法》颁布之前，五十名波士顿商人签署协议，同意实行丧葬仪式简化的紧缩政策和其他紧缩政策。据当时估计，紧缩政策每年节省超过一万英镑。人们不再购买进口蕾丝和褶裥，也不再购买昂贵的羔羊肉。紧缩政策还鼓励使用当地产品，比如美洲亚麻布。若干年后的另一场非暴力运动也要求使用美国产品和采取紧缩政策，那就是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的《大陆盟约》。《大陆盟约》有一段关于紧缩政策的内容：

我们会用我们的各种身份来鼓励日常生活节俭，经济和工业紧缩，促进本国的农业和制造业，尤其是羊毛产业。我们会阻止和劝阻任何一种奢侈浪费的行为，尤其是参加各种赛马、赌博、斗鸡、展示会、戏剧和其他昂贵的消遣娱乐。亲朋好友死亡的时候，除了男士在胳膊或者帽子上佩戴黑纱或者黑丝带，女士佩戴黑丝带或者黑色项链之外，我们和我们的任何家人都不会穿更多的丧服，我们也不会继续在葬礼上发领带。

这些政策在各殖民地被广泛采用，采用的形式包括取消公开的大学毕业典礼，取消木偶表演，取消公开的舞会和宴会，不饮用进口红酒和进口啤酒，取消公开的展览会、赌博和赛马，促进美国制造业。

74. 停止支付租金

这是租赁土地或者地产的人在认为自己有正当理由时，对地主表达不满的一种经济

抵制方法——停止支付租金，直到达成满意的协议为止。有时这一方法也被称为拒付租金或者抗租。停止支付租金可能是短期的，过后会将欠付的租金足额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停止支付租金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抗议。如果停止支付租金者打算就此问题继续施加压力，就必须甘愿面对驱逐和起诉的风险。近年在美国的某些州，为了执行住宅法和其他法律，停止支付租金这一方法在一定条件下已经合法化。

停止支付租金的做法十分普遍，俄罗斯、爱尔兰、威尔士，殖民地时代的纽约和现代纽约都存在这种做法。1766年6月，纽约达奇斯县的四百多名农民和一些奥尔巴尼市和威斯特彻斯特县的民众决定停止支付租金。他们还营救那些因为停止支付租金而入狱的人，并且威胁要向纽约市进军。1861年，沙皇颁布法令解放农奴，许多农奴对于法令没有承认他们对正在使用土地的所有权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他们拒绝向以前的主人支付土地租金，也拒绝为以前的主人提供更多服务或者和他们签署土地使用协议。

爱尔兰的农民停止支付“不公正的租金”，是民族土地联盟（1879年10月在都柏林成立，由下议院议员查尔斯·巴奈尔领导）发起的主要抵抗方法之一，目的是“减少苛刻的地租”和“帮助土地占有者获得土地所有权”。查尔斯·巴奈尔在《致爱尔兰人民》的传单上写道：

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宣战了。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地主所有制压迫的组织被宣布为违法犯罪组织。恐怖统治开始了。我们要用坚定的消极抵抗来应对英国政府的行动。停止支付租金的斗争将要开始，它将证明爱尔兰人民不是懦夫，而是勇士。

不付租金！拒绝土地裁判所。

《致爱尔兰人民》的传单传遍了全爱尔兰。查尔斯·巴奈尔强调，爱尔兰人要独立自主、坚持不懈地斗争，直到赢得胜利：

下次英国议会讨论土地法案的措施的时候，将衡量你们在这个冬天的斗争精神和决心。如果你们停止支付不公正的租金，如果你们拒绝租凭那些驱逐过其他租客的农场，土地问题最终一定会得到解决，而且一定会以让你们满意

的方式得到解决。因此，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你们自己，不取决于任何委员会和政府。

1965年初，二百三十四名从威尔士蒙茅斯郡纳什地区的圣多纳假日庄园租赁了车位的拖车房屋主人停止支付租金，以抗议租金上涨和设施条件的恶化。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美国纽约市哈莱姆区，房客抗议贫民窟极端恶劣的条件和房主不对房屋进行维修。1963年11月1日，有十六栋楼的房客停止支付房租。到1964年1月中旬，有三百栋楼的五千个家庭停止支付房租。据报道，停止支付房租行动还扩散到了纽约市下东区、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1月的早些时候，纽约民事法院法官命令房客把租金交给法院，法院将要求房主把租金用于房屋维修。纽约市市长罗伯特·瓦格纳还提出一项立法建议：如果住房条件不合标准，房客的租金应该支付给一个专门用于维修房屋和提供服务的专项基金。这一政策实际上使停止支付租金成为合法行为。

75. 拒绝租赁

与停止支付租金相对应的是拒绝租赁，作为集体不合作行动的一部分，拒绝租赁涉及潜在的租客拒绝租赁住宅或者土地。例如，1870年代末的俄罗斯，“哪怕是最不值钱的土地也以高得离谱的价钱出租”。于是，俄罗斯农民“集体拒绝租赁土地”。在第74种方法中提到的爱尔兰民族土地联盟领导的停止支付租金行动，也包括拒绝租赁驱逐过其他租客的的土地。

76. 全国性消费者抵制

是指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消费者拒绝购买与该国发生冲突的另一个国家的产品或者服务。这种抵制可以由独立国家、殖民地，受到压迫、正在寻求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实施。

这种抵制的动机包括：1)削弱或者拒绝加强对手的经济力量；2)更多使用本国生产的产品以加强本国经济；3)对外国货物的偏好进行自我纠正，这种偏好可能使一国人民丧失经济独立，进而丧失政治独立；4)象征性地反抗政治压迫或者不公；5)作为反对外国势力，恢复民族独立的政治不合作运动的补充；6)迫使对手纠正具体的

错误，防止今后再次出现此类错误；7) 以上动机相结合。消费者抵制是全国性的，目的是削弱敌国，加强本国，以实现某些国家目标。全国性抵制可能针对具体的商品或者服务，可能针对某个国家的所有商品或者服务，也可能针对所有外国商品和服务。经济抵制这一部分列举的若干种经济抵制方法可以同时使用。

中国是经常进行全国性消费者抵制的国家。1908 年、1915 年和 1919 年，中国对日本货的抵制都是典型案例。公元十八世纪末，美国人也相当有效地大规模使用过全国性消费者抵制的方法（不进口、不出口和不消费结合使用），并藉此实现了废除《印花税法案》和《唐森德法案》（茶税除外）的目标。1774 年 10 月，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的《大陆盟约》中的全国经济抵制计划更加全面，它包括北美殖民地拒绝从英国进口货物，拒绝向英国出口货物，拒绝使用英国货物和其他某些进口货物。大陆会议宣布：这一计划为解决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制定了“最迅速、最有效和最和平的措施”。这些抵制行动不仅在早期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在整个非暴力行动的历史上和在经济抵制的潜力方面都非常重要。（各种措施分阶段实施，不出口条款原本计划在 1775 年 9 月 10 日开始实施，但由于斗争转向了暴力革命，这一计划没有完全实施。）

全国性消费者抵制的动机可能有很大差异。从本书提到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甘地对于这类抵制的思考也体现了这种差异。1920 年，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呼吁商人和市民通过抵制英国商品，积极促进本国商品来切断与英国的贸易关系。1930 年至 1931 年，甘地支持抵制所有外国布料。但是，甘地同时也认为，对手进行全面经济抵制具有强制性，与他提倡的非暴力行为准则相冲突。1930 年甘地入狱后，民族主义运动实施了范围更大、更全面的抵制英国商品和服务的行动，抵制几乎所有英国货物，包括英国人所有的或者经营的电报系统、国营邮局、航运公司、有轨电车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1932 年 1 月，甘地重返与英国政府的圆桌会议谈判之后，印度国大党全印度工作委员会发表声明，再次批准延长和重启对英国货物和服务的全面抵制：

即使是在非暴力斗争中，抵制压迫者制造的货物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受压迫者从来没有义务促进或者保留与压迫者的商业关系。因此，抵制英国货物

和企业的行动应该重新开始，并且大力实施。

此后，甘地同意和支持对英国进行全面经济抵制的行动。

77. 国际性消费者抵制

是指若干国家由于某一特定问题而对某一国家的商品进行消费者抵制。与第 76 种方法相比，这种方法不仅涉及若干个国家的消费者，通常涉及的特定问题也是得到国际关注的人道主义问题。它与本节后面介绍的政府禁运不同。国际性消费者抵制的案例包括：1909 年，多国抵制西班牙货物以抗议西班牙政府处决弗朗西斯科·费雷尔¹⁰⁶的运动。1920 年，多国抵制匈牙利货物以抗议匈牙利政府镇压工人的运动。1960 年开始的抵制南非货物以抗议南非政府种族隔离的运动。

（二）工人和生产商的抵制行动

78. 工人抵制

是指工人拒绝使用某类物资和工具从事生产，因为使用这类物资和工具的“生产条件违背了工会成员的原则，工会成员认为继续生产这些物资和工具对其福利构成威胁”。这种抵制被用于针对外国产品，监狱囚犯制造的产品，被认为对工作岗位构成威胁的新机器制造的产品，非工会成员制造的产品，以及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制造的劣质产品。例如，1830 年，纽约石匠对囚犯开凿的石材进行抵制，还说服其他地方的石匠拒绝加工监狱囚犯生产的石材。1885 年，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杰伊·古尔德¹⁰⁷拥有的西南铁路系统中的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成员拒绝驾驶或者修理对劳动骑士团抱有敌意的沃巴什铁路公司的车辆。1900 年左右，美国石匠协会要求其成员拒绝抛光或者镶嵌机器切割的石材，他们认为机器切割石材会造成许多石匠失业。1896 年至 1910 年，美国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兄弟会成员拒绝安装没有成立工会的工厂以及雇佣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制造的建筑装饰。

¹⁰⁶ 是激进的自由思想家、教育家和无政府主义者。190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 日，以巴塞罗那为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城市工人在社会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下，与西班牙军队发生了一系列暴力冲突，弗朗西斯科·费雷尔被认为是幕后黑手而遭到政府处决。——译者注

¹⁰⁷ 美国早期铁路开发商，公元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译者注

79. 生产商抵制

是指生产商拒绝出售和采用其他方式提供自己的商品。这种方法可能涉及拒绝生产，因为不生产就不可能出售。任何类型的生产商——从农业到制造业——都可以进行这种形式的不合作。抵制的原因可能是希望通过减少市场上供应的商品抬高价格，可能是支持遭到抵制的其他生产商，也可能是针对敌对政权或者占领当局实施的更大的不合作运动的一部分。

生产商抵制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古代罗马帝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的荷兰和日本占领的中国。公元二世纪末，小亚细亚以弗所（今天的土耳其——译者注）面包房的经理（多数也是店主）召开联合会议（这次会议显然与某些共同的不满有关）并做出决定，停止制作面包。这一行动使统治小亚细亚的罗马执政官不得不下达一道专门的法令：禁止以弗所的面包师召开会议，命令他们服从法律，并“永久为城市制作面包”。

公元十一世纪，挪威农民拒绝为国王远征丹麦、瑞典和英格兰的军事行动提供人力和物资，造成战争终止。1765年11月1日，《印花税法案》在北美殖民地生效之后，几家报纸暂停出版，以回避报纸出版必须缴纳印花税的法律规定。

1886年，美国酿酒商协会试图反击工会发起的针对某些酿酒商的消费者抵制，采取的方法是要求该协会所有成员不得向遭到抵制的酿酒商的零售客户出售“啤酒、波特啤酒和麦芽酒”，目的是切断其他供货渠道，迫使零售客户购买遭到抵制的酿酒商的产品。1932年，美国的农场主拒绝出售牛奶和家畜，直到价格上涨为止。

这种经济抵制也发生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1943年4月底，在荷兰，为了声援罢工的城市工人，农场主拒绝向乳品厂供应牛奶。在波兰，“农民发明了许多聪明的办法，把最差的农产品出售给德国人，或者把来不及藏起来的农产品毁掉”。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北方，为了防止日本军队得到足够多的棉花，农民遵照边区政府（一种抵抗组织和平行政府）的命令，把棉花产量降低大约百分之七十。

（三）中间人的抵制行动

80. 供货商和搬运工抵制

是指供货商（批发商、中间商和分销商）及其雇佣的工人拒绝供应或者搬运特定的货物。拒绝的理由可能包括：1) 反对这些货物的用途，比如供应给罢工者抵制的公司，发动战争的国家或者邪恶政权的货物；2) 反对这些货物本身，比如军火；3) 反对这些货物的生产条件，比如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的工厂，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工厂，血汗工厂或者雇佣罢工破坏者的工厂。

使用这种抵制支持罢工的案例很多。例如，1912 年，在意大利，为了支持一个大大理石采石场工人的罢工，附近城镇的工人拒绝搬运被抵制的采石场需要的沙子，致使该采石场无法切割大理石。工会也常常说服生产商和供货商拒绝给他们正在抵制的企业供货。

在某些情况下，供货商和搬运工抵制会发展成同情性罢工。例如，1894 年夏天，美国铁路联盟工会命令其成员拒绝在任何挂有普尔曼车厢¹⁰⁸的火车上工作，以表明他们支持普尔曼公司员工罢工的立场。这一行动很快发展成大型同情性罢工，因为几乎所有火车都挂有普尔曼车厢。

1925 年，英国一家煤矿的矿主决定终止 1924 年签订的全国工资协议——终止这一协议会使工人的工资下降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英国搬运工工会做出的反应是禁止搬运工装卸该煤矿生产的煤炭。

1942 年，英国刘易斯岛纺纱工人进行罢工期间，与纺纱工人同属一个工会的码头工人不仅拒绝搬运进口的机织纱——其售价威胁到了纺纱工人的经济收入——还拒绝搬运由这些便宜的机织纱制成的成品布。1920 年，英国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俄罗斯对付当地革命的武器。1937 年至 1938 年，英国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南安普敦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用来侵略中国的武器。1946 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工会成员拒绝装载用来对付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武器。1943 年，葡萄牙的电影院所有者拒绝放映德国电影。这一事件促使纳粹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得出

108 以其发明者乔治·普尔曼命名的一种装饰着漂亮的红绒布、樱桃木座椅、厚橡胶垫、丝绸灯罩、大理石宽敞浴室和餐车的卧铺车厢，被称为第一个车轮上的卧室。——译者注

结论，德国必须在葡萄牙拥有自己的电影院。这种抵制方法在另两次事件中出现了特殊的表现形式——美国经纪公司拒绝发售对民权活动家实施暴行的南方各州的债券。1964年6月，美国民权活动家在密西西比州被谋杀¹⁰⁹后，纽约市和克利夫兰市的百特公司拒绝出售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债券。1965年春天，美国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宣布，该州没有足够的资金保护塞尔玛进军¹¹⁰的参加者之后，柴尔德安全公司通知华莱士，该公司将不再经营阿拉巴马州的债券，因为华莱士的讲话说明该州存在金融风险。

一个不同寻常的搬运工抵制事件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¹¹¹之前。这是一次造纸厂的搬运工抵制与印刷厂的排字工选择性罢工相结合的案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会完全由共产党控制，“有若干次，如果民主派报纸发表了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政策的文章，搬运工就会拒绝给民主派报纸搬运纸张，或者拒绝装卸他们的报纸，印刷厂的排字工则拒绝为这些报纸排字”。1948年2月——同样是共产党政变前——类似行动再次发生，“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印刷厂工人拒绝印刷民主派的报纸。在波西米亚，造纸厂的工人拒绝为这些报纸生产和搬运纸张”。

1951年至1953年，伊朗对英伊石油公司¹¹²进行国有化之后，国际石油卡特尔¹¹³通知各航运公司，禁止油轮运输伊朗国有化石油公司的石油，否则就不能从隶属于国

109 见 63. 社会不服从。——译者注

110 1965年3月，美国民权运动活动家发起从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到州府蒙哥马利市的五十四英里的进军。这一行动旨在表明黑人公民无视种族隔离政策，争取选举权的决心。3月7日进行的第一次进军因为受到警察镇压而失败。3月9日进行的第二次进军因为法院的禁令而中途停止。直到1965年3月25日，这次塞尔玛进军才胜利完成。——编者注

111 1948年2月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事件。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1948年初，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部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瓦茨拉夫·诺塞克通过非法手段在国家安全部门和警察部门排斥非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2月21日，政府十二名非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部长集体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他们希望用这一方法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其支持者进行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同意十二名部长辞职。2月25日，爱德华·贝奈斯因担心爆发内战和苏联借机干涉，被迫同意了十二名部长的辞职，并授权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组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导的新政府。由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权。——编者注

112 是首家 在中东（包括伊朗）开采石油的英国公司。——译者注

113 由国际石油生产企业组成的垄断联盟。——译者注

际石油卡特尔的公司获得航运订单。结果，伊朗摩萨台政府执政期间（1951 年 4 月至 1953 年 8 月），将伊朗石油运往海外的油轮还不到四十艘。

（四）业主的抵制行动

81. 商人抵制

商人抵制是指零售商拒绝购买或者出售特定的商品。就像生产商和供货商可以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拒绝向特定的企业出售商品一样，零售商也可以为了类似的理由，拒绝从特定的生产商和供货商那里购买商品。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也可以成为实施此类行动的动机。

商人抵制包括零售商拒绝出售他们已经拥有的特定商品。在更广泛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拒绝出售商品可以用来支持对外国货物实施的消费者抵制。例如，1930 年，印度布商除了取消英国订单，有时还会将已经摆在货架上的英国布料下架，因为抵抗运动呼吁消费者全面抵制英国布料。1919 年，中国民众抵制日货期间，中国商人也拒绝购买或者出售日本商品，包括拒绝出售已购入的日本商品。

1774 年，北美殖民地《大陆盟约》宣布，从当年 12 月 1 日起，商人将“……完全中断奴隶贸易，不仅我们自己不参与奴隶贸易，我们也不向参与奴隶贸易的人出租船只，也不向他们出售商品和货物。”

82. 拒绝出租或者出售房地产

房屋、建筑或者土地的业主可以出于各种理由拒绝出租和出售地产给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在美国，这种方法被普遍用于针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公元十九世纪的中国，人们也普遍使用这种方法对付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因为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是蛮夷、洋鬼子。一名传教士说：1868 年 8 月，他想在江苏省扬州市租赁大约三十处不同的房屋，只有一处房主同意租给他，但这位房主遭到暴徒袭击之后悔约了。

83. 封锁工厂

是指雇主（而不是工人）为了迫使其员工就范，而启动的停止某一特定工厂或者企业正常工作的手段。这种类型的停工通常属于非暴力行动。但是，如果雇主封锁工

厂时动用了警察、军队，或者动员了私人武装，就会给封锁工厂行动带来暴力因素，就像工人或者雇主也可能因为行使暴力而给罢工带来暴力因素一样。在具体的劳资纠纷中，有时很难分清停工是始于罢工还是始于封锁工厂。

封锁工厂可以由一家企业单独实施，也可以因为同情或者支持实施封锁的工厂，而由一个地区或者产业内的多个企业同时实施。例如，1860年代，英国雇主协会在某一特定产业发动了大面积的封锁工厂行动，目的是制服少数企业中持不同意见的员工。这种做法在1865年特别普遍，当时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钢铁厂和苏格兰克萊德河上的造船厂都停工了。

封锁工厂通常用于工业行业，但也并不总是如此。1833年至1834年，英国农场工人想要组建工会时，农场主采取的对策就是频繁地封锁农场，其中一次发生在牛津郡的奇平诺顿村附近。1874年，英国农会在争取每周工作五十四小时，最低时薪十三至十四先令的斗争期间，封锁农场行动遍及东部和中部各县，造成一万多名农会成员失业。这些案例清楚地告诉我们，封锁工厂是指雇主暂停经济活动，而不是指雇主仅仅锁上工厂大门。

1886年，美国的雇主也用封锁工厂来对付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造成纽约州一万五千名洗衣工人和二万名纺织工人失业；芝加哥二万名包装工人失业。1905年，当俄罗斯革命的大潮退去的时候，企业主成立了专门组织来对付工会，采取的方法是共同行动，其中包括封锁工厂。

84. 拒绝提供援助

在特殊情况下，经济或者政治反对运动可以采用拒绝向对手提供他们希望的经济或者技术援助的方法。例如，1936年，纳粹德国为了对付私营钢铁企业大幅涨价的趋势，决定成立一家国营钢铁厂。德国大多数钢铁企业反对这一计划的方法是，

“所有私营钢铁企业不提供任何援助”给新建的国营钢铁厂。（但是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和劳士领工程公司与戈林¹¹⁴进行了通力合作。）

85. 商人罢市

114 纳粹德国时期的党政军高官，曾担任经济部长，制定了国营钢铁厂建设方案。——编者注

商人同时关闭商店或者市场，有可能造成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经济瘫痪。这种行动不仅涉及个人和家庭经营的小型商店，也涉及较大的商场和市场。例如，1742年，中国江苏省北部几个地区的商人对地方官员在一场洪水后采取的救济方式不满，发动了商人总罢市。商人总罢市与工人总罢工相结合，可以造成“经济停顿”。

（五）资金拥有者的抵制行动

86. 取出银行存款

取出存在私人银行、国有银行或者政府储蓄系统的存款，既可以表达抗议，也可以是一种帮助推翻或者瓦解政府的不合作手段。例如，1905年俄罗斯革命期间，至少有过两次取出银行存款的号召——第一次是1905年夏天，由全俄农民联盟在其成立大会上号召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镇压该联盟。第二次是1905年12月2日，由圣彼得堡苏维埃委员会¹¹⁵号召的，目的是削弱外国对俄罗斯政府和经济的信心，防止政府从外国获得贷款对付革命。在号召发出后的几个星期内，有大量存款从银行取出，显然是人们响应这一号召的结果。

1966年12月，在支持南非反抗种族隔离运动的背景下，一份《致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储蓄者的呼吁书》敦促人们从这两家银行取出存款存到别的银行去，因为这两家银行为南非政府提供了财政支持，呼吁书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87. 拒绝支付缴费

是指个人、团体或者政府拒绝向某个私人组织、公共机构、政府或者国际机构缴费的行动。1942年，挪威教师拒绝向新成立的，由法西斯分子控制的教师组织缴纳会费。1947年，日本大学生用拒绝支付大学学费作为抗议的手段。最著名的案例是1960年苏联集团国家¹¹⁶、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拒绝支付联合国派驻刚果维和部队的费用，拒付的理由是，这种特殊行动费用不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成员国

115 成立于1905年10月13日俄罗斯革命期间，主要由苏维埃工人和士兵组成，最初成员有四百至五百人，由二十万名产业工人选举产生。圣彼得堡苏维埃委员会与同年在伊万诺沃成立的苏维埃同为世界上最早的苏维埃议会。——编者注

116 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其范围大致包括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编者注

有义务支付的“组织费用”。

88. 拒绝还债和支付利息

拒绝还债（偶尔也涉及拒绝支付到期利息）也可以作为经济抵制的方法。这主要发生在债权人是对手，或者债权人（个人或者公司）所在国的政府是对手的情况下。有时候，人们也会将这种抵制方法用于对付本国政府，敦促人们不要为本国政府纳税，或者警告外国债权人，如果他们贷款给一个岌岌可危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垮台之后，新政府不会偿还这笔债务。1905年12月，圣彼得堡苏维埃委员会发表的《财务宣言》就曾尝试使用这一手段。1906年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之后，杜马大约三分之二议员签署的《维堡宣言》也曾尝试使用这一手段：

政府解散了杜马，因此，人民有理由既不给政府提供金钱，也不给政府提供士兵。如果政府与外国政府签署了贷款合同以获得资金，那么，在没有人民同意的情况下，这些贷款是无效的。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承认这些贷款，也不会认为有义务偿还这些贷款。

拒绝还债最明显的效果发生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尤其是在1765和1766年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当时，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中，英国是主要出口国，北美殖民地欠了大量的货款。停止贸易会给英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停止还款则会导致英国更严重、更迅速的经济紧缩。在《印花税法案》生效之前，还款就完全停止了。1765年8月，英国布里斯托尔市的一名商人说：“我们一直没有拿到货款，我们商会急需资金履行合同，现在已经无计可施。”

英国商人也无法像往常一样利用法院判决追讨债务，因为法院宁愿关闭也不愿为法律文件缴纳印花税。法院也不愿意无视法律，在没有缴纳印花税的情况下继续运转。有时候，做出关闭法院的决定，就是为了防止法院被英国商人用于追讨债务。1765年9月20日，距《印花税法案》生效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乔治·华盛顿明确建议使用拒绝还债这一不合作方法：

我们的法院必然要关闭；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议会的法案不可能得到遵守，而且，如果我们停止司法程序，与殖民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会是最希望废除

《印花税法案》的群体。

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渥波尔描述了这一行动产生的效果：

各殖民地武装自己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拒绝偿还英国商人出口到美洲各省的货物和商品的货款。在与北美殖民地（他们发誓停止与我们的一切贸易，直到可恶的《印花税法案》废除为止）的贸易中，这些债务涉及英国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其他贸易重镇的商人。

劳伦斯·亨利·吉普森¹¹⁷指出：这些债务总计大约四百万英镑，它们“就像一根有力的大棒一样挥舞了起来”。1774年夏天，在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之前，纽约和费城的报纸刊登过关于是否再次使用这一方法的讨论。某些地方机构已经开始拒绝还债，或者不允许使用法院追讨债务。例如，1774年5月25日，英国关闭波士顿港（以报复波士顿的抵抗行动）之后，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市的居民召开会议，会议除了通过不进口、不出口协议之外，还同意“在强制法案¹¹⁸废除之前，不为大不列颠商人追讨任何本省居民所欠债务”而提起法律诉讼。弗吉尼亚省威斯特摩兰县通过的决议之一，是在执行不出口协议期间，该县的律师不应“为追讨债务提起任何诉讼，或者推动任何已经提起的此类诉讼作出判决”。

一个拒绝支付贷款利息但是继续偿还贷款本金的案例发生在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当时，各中产阶级团体的纳粹化领导人不仅发起了反对取消农场赎回权的行动，还发起了农民集体拒绝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的行动。

89. 切断资金和贷款

也可以通过切断对手财源的方法施加经济压力，比如停发工资、停止捐款、贷款或者投资。这种方法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可以使用。在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斗争

117 美国历史学家，其巨著《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大英帝国》系列 1950 年获得班克洛夫特奖，1962 年获得普利策历史奖。——译者注

118 指英国议会 1774 年通过的与北美殖民地有关的一系列法案，其中四项法案是对 1773 年 12 月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直接回应，包括剥夺马萨诸塞湾省的自治权和其他以前一直享有的权利。英国议会希望通过对马萨诸塞湾省殖民地的惩戒性措施，扭转 1765 年《印花税法案》颁布后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的趋势。北美殖民地人民认为，这些法案是对他们权利的专断侵害。1774 年，北美殖民地组成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协调抗议。随着紧张局势升级，次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译者注

期间，他们的议会曾采用停止拨款给总督和法官发放工资的手段，以防止总督和法官做出太多不符合议会政治意愿的决定。

美国南方白人种族主义银行家曾经切断积极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活动家的银行贷款和其他类型的贷款。同样的事也发生在 1955 年 5 月，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教育部门官员在接到合并种族隔离的白人和黑人学校系统（该县学校系统中有百分之五十三黑人学生）的命令后，立即做出一致决定，停止给该县所有公立学校拨款。公立学校没有经费就必须停办，停办后也就不可能合并。1956 年 8 月，弗吉尼亚州议会审议了十三项反合并法案，其中一项法案由州长托马斯·斯坦利提出，内容是州议会停止为已经合并学区的公立学校拨款——州议会拨款占学校运营成本的百分之四十二——该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后来，爱德华王子县教育部门恢复了对学校的拨款，但不是像往常一样按年拨款，而是按月拨款。1957 年 1 月 23 日，联邦法官斯特林·哈奇森在一份判决中写到：“爱德华王子县教育部门公开宣布，如果该县的学校在拨款时已经合并，他们会中断拨款。”不过，随着反对停止给公立学校拨款的舆论持续发展，这种抵抗方法没有继续实施。

美国联邦政府也曾经采用过切断资金或者停止执行合同的方法，但针对的是各种不符合联邦已经确立的标准或者惯例的活动（比如福利和教育活动），尤其是种族歧视的活动。种族平等大会前领导人詹姆斯·法玛尔认为：“停止对任何歧视性活动的财政支持，是联邦政府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他指出：“如果停止经济支持的威胁看得见摸得着，大多数南方顽固派就会改变做法。”也曾经有一些政府和组织将外国投资撤出南非作为迫使南非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手段。

90. 拒绝纳税

这种方法最重要的特征是不给政府提供财政资源。由于纳税是由法律或者法规规定的，因此，拒绝纳税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不合作行动。

拒绝纳税包括拒绝缴纳各种税，比如所得税、财产税、营业税、消费税，也包括拒绝购买法律要求的某些执照，比如养狗执照、驾驶执照、无线电执照、电视机执照，或者为了抗议与某些执照有直接关系的具体不公，或者作为更广泛的抗议政府行动

的象征。拒绝纳税还可以用于抵制销售需要缴纳营业税或者消费税的商品。抵抗者也可以销售需要缴纳营业税或者消费税的商品，但是拒绝为这些商品纳税。如果租赁土地或者房地产的租金是支付给政府的，也可以拒绝缴纳。与此相关的拒绝给政府提供资金（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纳税）的方法还包括拒绝购买政府债券，拒绝在国有银行存款或者取出国有银行的存款，赎回已购买的政府债券。

拒绝购买政府债券或者拒绝在国有银行存款（是给政府提供资金的一种手段）通常是合法的，而拒绝向政府纳税或者支付租金则是非法的（是直接拒绝给政府提供资金）。拒绝纳税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表达反对政府的方法，如果能够大规模实施，就会对政权的存续产生严重威胁——或者因为这一方法威胁到了国家财政，或者因为这一方法暗示了民众拒绝向政权低头的广度和深度。集体拒绝纳税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埃及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

1515 年，挪威农民起义反抗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因为发动瑞典战争而大幅增加税收。¹¹⁹农民拒绝纳税，还杀死了征税员，随后遭到严厉镇压。1630 年代，挪威农民（尤其是沿海地区）普遍拒绝纳税，这种抵抗方法遭致镇压的同时也带来了税制改革。1764 年至 1765 年，挪威发生了几次重大起义，目的是抗议税收过高，征税员腐败，以及政府没收农民和渔民的生产工具抵税的野蛮做法。在挪威的鲁姆斯达尔郡，“农民完全拒绝纳税，并且赶走了征税员。1764 年，整个沿海地区都发生了骚乱，各地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挪威的卑尔根市也发生过大规模抗税，即使在镇压之后，多数地方收上来的税也不到预计的百分之五十。

通过抵制需要纳税的货物拒绝缴纳税收，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尤其是在反对《印花税法》的斗争中）经常使用的抵抗方法之一，相关案例我们已经在其他章节中反复提及。1789 年，法国大革命¹²⁰期间，拒绝纳税和拒绝履行封建义务¹²¹的做法非

119 1397 年 6 月，斯堪地那维亚的丹麦、瑞典（包括芬兰）和挪威（包括冰岛、法罗群岛、格陵兰、设得兰和奥克尼）为主组成卡尔马联盟，共同由丹麦国王统治。——编者注

120 发生于 1789 年至 179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法国历史以及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国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多次转变。1789 年 6 月 20 日，法国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发表《网球厅宣言》，标志着法国大革命揭开序幕，1799 年 11 月 9 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结束。——译者注

121 包括农奴拒绝生产，骑士拒绝保卫领地等等。——编者注

常普遍。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主要是平民，也有某些教士加入——组成了国民议会，目的是保护人民免遭国王的侵害，采用的手段是号召人民拒绝纳税——只有国民议会批准的征税才是合法的。到1789年底，“人人都拒绝缴纳以前的税收”。

中国学者萧公权和张仲礼在他们的研究中记载了1860年左右中国发生的几起有组织的抗税事件。1861年，匈牙利也发生过大规模反抗奥地利法律规定的征税事件，采用的方法是礼貌地告诉征税员“你们是非法之人”。1902年至1914年，英国发生了长达十二年的拒绝纳税运动（该运动反对用税收给教会学校拨款），仅在开始的前两年半时间里，运动的参加者就收到七万张法院传票，其中二百五十四人被捕入狱。

1905年俄罗斯革命期间，企图推翻沙皇政权的民众经常拒绝纳税。例如，在被俄罗斯兼并的格鲁吉亚，人们既不纳税也不缴费。革命者两次正式发起拒绝纳税行动，将其作为推翻沙俄政权这一抵抗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1905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由圣彼得堡苏维埃委员会发表的《财务宣言》号召的，这一行动受到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巴伏斯关于政权经济问题研究的影响。第二次是1906年7月23日发表的《维堡宣言》¹²²号召的，被解散的杜马中有大约三分之二议员签署了该宣言。杜马是人民的代表，只有在杜马授权下，政府才能征税和征兵“……现在政府解散了杜马，因此人民有理由既不给政府提供金钱，也不给政府提供士兵。坚定地拒绝吧！”

拒绝纳税也是印度独立运动期间使用的重要抵抗方式之一。德国纳粹党上台之前，一些亲纳粹的中产阶级团体也曾使用抗税（以及其他手段）反对“不公平”的竞争和取消农场赎回权。1953年4月，尼亚萨兰¹²³的非洲人大会党也将拒绝纳税作为非暴力抵抗斗争的一部分，目的是反对英国殖民者强加给非洲黑人的中非联邦¹²⁴。

122 1906年6月俄罗斯沙皇解散第一届杜马后，由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签署的宣言。该宣言号召人民通过拒绝纳税和征兵来抵制政府。因其在俄罗斯西北部城市维堡签署而得名。——译者注

123 位于非洲东南部。1891年沦为英国保护国，1953年成为中非联邦的一部分，1964年7月6日独立，改名为马拉威共和国。——译者注

124 又称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是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其范围大概包括现在的津巴布韦、赞

1956 年，十名威尔士人因为拒绝支付无线电执照费遭到起诉，他们拒绝支付无线电执照费的原因是英国广播公司威尔士语节目经常在晚间受到严重干扰。1962 年 9 月，非洲一些北罗德西亚人因为拒绝缴纳人头税和没有身份证——他们在 1961 年烧毁了自己的身份证，以表达反抗政府的立场——被逮捕。

1966 年，正在与葡萄牙殖民者展开游击战的安哥拉东部发生了一起拒绝纳税事件。美国和平工作者詹姆斯·布里斯托尔在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与一名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对话：

他告诉我，他们已经组织了一场拒绝纳税运动。很显然，税收系统要求酋长向人民征税，然后交给葡萄牙人。现在因为大规模失业问题，有十二名酋长拒绝向人民征税，他们认为征税不能够给人民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十二名拒绝征税的酋长遭到了逮捕，然后被飞机送到安哥拉的另一个地方。在飞机上，葡萄牙人向酋长指出，葡萄牙人有多么强大，他们有武器，有飞机，而安哥拉人什么都没有。酋长回答，葡萄牙人无论多么强大，也不能迫使安哥拉人去做他们决定不做的事。十二名酋长被投入监狱，并且受到审讯和威胁，但他们仍然拒绝命令人民纳税。最后，葡萄牙人决定释放酋长，条件是这些酋长今后不再参与颠覆活动。但酋长们回答，他们会继续反对不公正的税收和葡萄牙人强加给安哥拉人的其他不公。过了一段时间，葡萄牙人还是释放了他们，并且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村庄。这位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说，葡萄牙人知道怎样对付游击队，但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非暴力联合抵抗。

拒绝纳税也可以采取拒绝缴纳罚款、诉讼费和保释金的形式。例如，1963 年秋天，美国佐治亚州萨姆特县的民权活动家发出呼吁：“不要忘记，我们缴纳的罚款、诉讼费和保释金正在用于为威胁黑人的警察发工资和购买警车。”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政府从缴纳的罚款、诉讼费和保释金中获得的收入从每星期二千美元至三千美元下降到每星期五百美元。

91. 拒绝政府发行的纸币

比亚和马拉威。由于人民的反对，英属中非联邦于 1963 年 12 月 31 日解体，仅维持了十年。——译者注

这是一种政治行动，可以完全拒绝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可以只在大额交易中拒绝政府发行的纸币。在另一些情况下，拒绝政府发行的纸币可能有经济原因，比如防止高通胀。代替纸币的可能是黄金、白银、实物等。为了反抗政府而故意使用这种方法极为罕见。我们在第 90 种方法中提到圣彼得堡苏维埃委员会发表的《财务宣言》，该宣言还呼吁，人们从银行中取出存款时要求黄金支付，人们在领薪水以及所有重要的财务往来中都要求黄金支付。

（六）政府的抵制行动

92. 国内禁运

国内禁运可以简单定义为由政府发起，在本国内部实施的经济抵制。例如，1933 年至 1935 年，纳粹德国就曾采用这种经济抵制方法作为其卡特尔¹²⁵计划的一部分。1933 年 7 月，纳粹政府颁布了两个卡特尔法令：一个法令规定政府有权组建强制性的卡特尔，并对投资进行管制。另一个法令授权经济部长监管卡特尔价格，对付非卡特尔企业。监管的手段之一，是限制非卡特尔企业——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进行煤炭交易，受到限制的企业被迫停业。这些措施加上政府其他措施产生的结果是，两年内原来的五万四千个煤炭经销商中有大约二万个停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无线电产业。在这一时期，无线电设备零售商从六万个下降到三万七千个，无线电设备批发商从一千五百个下降到七百五十个。

93. 贸易黑名单

在战争期间或者实施禁运期间，一国政府可以阻止禁运货物通过中立国的公司或者个人，间接转运到敌对国，采取的方法是禁止与这些间接转运的公司或者个人进行贸易，就像禁止与敌国直接贸易那样。政府采用的方法通常是发布一个贸易黑名单，禁止与名单上的公司或者个人进行贸易。但是有时候黑名单并不公开发布，造成的结果是让黑名单上的公司或者个人“浪费时间等待交易完成”。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惯常做法。

125 一种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垄断联盟。——编者注

94. 国际卖家禁运

国际卖家禁运是指某些国家政府禁止向另一些国家出售某些商品或者所有商品。这一行动可以由一个国家或者若干个国家政府实施。一般来说，实施禁运的范围是全国性的，产生的效果是国际性的。这种行动的动机各异，从反对该政权的存在（由于其政治体制，或者由于其为了掌握权力和保持权力而使用的手段）到反对该政权的具体政策或者行动。有些情况下，国际卖家禁运可能是为了停止或者防止战争，或者打着停止或者防止战争的幌子，通过阻止向较弱的一国出售武器来帮助另一国。

1807年10月17日，英国国王宣布有权强行征用中立国商船之后，美国认为需要采取比当时采取的“对英国商品的进口禁令”更加严格的措施。¹²⁶根据“杰弗逊总统的原则：美国可以采用和平手段强制外国尊重中立国的权利……”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该法案目的是停止向英国的西印度殖民地供应物资和停止向英国出口棉花和谷物。采用的方法是对美国公民拥有的所有船舶实施禁运。杰弗逊成功地让国会通过了这一和平强制手段。（许多共和党人认为，以战争作为强制手段是对人民自由的威胁。）“在杰弗逊总统的政治理念中，断绝往来是战争的替代性方案——一种防卫和强制性武器，既可以避免供养军队的巨大开支和危险，又能让美洲新大陆免遭旧世界（指欧洲——编者注）暴行的荼毒。”但禁运也遭遇到了普遍地问题：很多美国人规避和违反《禁运法案》，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执行该法案，杰弗逊和他的政策变得非常不受欢迎。麦迪逊继任总统后，《禁运法案》被废除，代之以一个类似的《不往来法案》。

其他国际卖家禁运的案例还有：1933年至1936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爆发查科战争¹²⁷期间实施的武器禁运。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期间，国际

126 当时，英国和法国正在进行第二次百年战争，美国是中立国。英国国王宣布“有权征用中立国商船”主要是针对美国。从1805年开始，英国对纽约港进行封锁，所有美国商船只要驶离港口，都必须经过英国舰船的检查。如果运往法国的货物被发现，英国法院有权没收货物，并强迫船主支付大额罚金。——译者注

127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为争夺格兰查科北部而进行的战争。格兰查科位于巴拉圭河以西、安第斯山脉以东、亚马孙盆地以南，潘帕斯草原以北，面积约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对格兰查科北部约二十六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一直存在争执。——译者注

联盟¹²⁸对意大利实施的禁运。1950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访问中国港口，同时禁止某些商品从美国出口到中国。这一禁运政策实施长达约二十年时间。

95. 国际买家禁运

国际买家禁运是指禁止从某个国家购买所有商品或者特定商品。实施国际买家禁运的动机可能各异，有可能希望特定政策的改变，有可能希望政府的改革，也有可能希望政权的垮台。1806年4月18日，（《禁运法案》颁布之前）美国实施的《抵制进口法案》规定，禁止进口英国制造的各类商品，持有这些商品为非法。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指出的：

这一法案本质上是强制性的。国会中的讨论显示，美国政府认为，没有什么比强制更值得反对的了。共和党的历史以及杰弗逊总统、麦迪逊总统和弗吉尼亚学派¹²⁹都认为，禁运是战争的替代性措施。英国应该为干涉美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而受到每年几百万美元的惩罚。

然而，在《抵制进口法案》真正生效之前，美国政府发现他们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因此，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但《禁运法案》在麦迪逊当选总统的1809年3月被废除，代之以《不往来法案》，该法包含把所有英国船只和法国船只赶出美国水域，禁止进口英国货物和法国货物的条款。

96. 国际贸易禁运

国际贸易禁运是国际卖家禁运和国际买家禁运相结合的方法。它指完全禁止与敌国的贸易，或者接近完全禁止——只有医药类贸易可以豁免。例如，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¹³⁰发生之后，英国政府通过了《禁止法案》，以没收所有船只和货物相威

128 简称国联，1920年1月10日成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后组成的跨政府组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1946年4月20日被新成立的联合国取代。——编者注

129 起源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思想学派，主要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编者注

130 1775年4月19日，发生在马萨诸塞湾省的英军与北美殖民地民兵之间的武装冲突。史称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译者注

胁，禁止与起义的殖民地发生一切商贸往来。（如果这一禁令产生效果的原因是人民自愿遵守，或者因为害怕受到经济制裁而遵守，就属于国际贸易禁运。如果使用军事力量强制执行禁令，就属于经济制裁与军事行动相结合。）

多位美国政治领导人都把国际经济制裁视为军事行动的替代性措施。有时候，他们明确提到要完全禁止所有贸易，另一些时候，他们认为禁止的范围和类型可以留有更多的余地。在国际卖家禁运和国际买家禁运中引用的具体措施出现之前，托马斯·杰弗逊就把由政府发起的所有类型的国际贸易禁运视为战争的替代性措施。1793年3月，杰弗逊在致詹姆斯·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欧洲的海军力量封锁法国（当时正值法国革命期间），造成法国供应和物资进口中断，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杰弗逊写道：

我认为应该召开国会，这是正当的宣战理由。既然行政当局不能决定是否宣战，就应该由国会做出决定。但我希望战争不是国会的选择。我想国会将会很高兴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宝贵的榜样。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诉诸经济制裁和诉诸武力一样能够为其他国家伸张正义。我希望国会除了谴责战争之外，还要立即将进行这场侵略行动的国家¹³¹的所有商品和货物、船舶和臣民赶出我国港口。只要侵略继续，我们就要一直这样做，直到实现停止封锁法国的目标为止。这种方法在许多方面都很管用，尤其在安全方面，它给国家之间带来了战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它会把我们从战争的风险和恐怖中解救出来。

1919年秋天，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提到《国际联盟盟约》¹³²中反战条款的执行手段时指出：

如果任何国际联盟成员国打破或者无视这些对于仲裁和协调的承诺，会发生什么事？战争吗？不，不是战争，而是某些……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

131 指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等与英国建立反法同盟的国家。——编者注

132 是为建立国际联盟而制定的规则。1919年4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编者注

运用经济、和平、安静、致命的纠正措施，不需要武力……

代替战争的是抵制。

1932 年，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写道：

经济制裁的优势是，一方面它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它不会诉诸武力——武力是我们的和平目标所厌恶的。

如果能够建立一种机制确保各国遵守放弃战争的盟约，这种机制必须去经济领域寻找。

1960 年 10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宣言，禁止对古巴的出口贸易。1962 年 2 月 3 日，总统发表的公告扩大了禁运范围：对所有与古巴的贸易实施禁运。

事实上，本节提到的三种类型的国际禁运并没有太多显著成功的案例。国际禁运之所以很少成功，有多大程度是因为这些方法的内在限制，有多大程度是因为实施时不够严格或者没有实施的意愿，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彼得·沃伦斯廷指出，少部分成功的案例都发生在 1933 年至 1967 年之间。一个成功的案例发生在 1933 年，英国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其结果是两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制裁被取消，被捕的英国公民被释放。另一个成功的案例发生在 1960 年至 1962 年，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¹³³为谴责多米尼加参与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实施了经济制裁。不过，这一行动的真实目标是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独裁政权的。1961 年 5 月，特鲁希略遭到暗杀身亡之后，制裁还继续了六个月，直到特鲁希略所有家庭成员都离开多米尼加，确保该国开始真正的变革。

133 由三十五个美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1948 年 5 月 5 日成立，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编者注

II. 罢工

介绍

经济不合作方法的第二部分是罢工。罢工是指拒绝继续以工作的方式进行经济合作。罢工是集体的、有意的，通常是临时性暂停工作，目的是向同一个经济、政治，有时也包括社会和文化组织中的其他人施加压力。也就是说，罢工这种行动方法是经济方面的，但导致罢工的原因并不总是经济方面的。罢工是通过集体的力量，给冲突群体之间的关系带来某些变化。罢工通常把满足罢工者提出的某些要求作为罢工者恢复工作的前提条件。罢工主要发生在现代工业组织，但也会发生在农业组织和各种其他组织内部。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雇佣劳动者存在，就有可能出现罢工。

罢工是罢工者为了支持或者反对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理论上，任何数量的员工都可以进行罢工，但是实践中，罢工者的数量必须足够大，才能给该经济组织造成严重破坏，或者使其不能继续运转。与暴力和其他更加有力的非暴力行动方法一样，仅仅以严重的罢工相威胁，有时就足以让对方做出让步。本部分也包含某些以罢工相威胁的案例。罢工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有计划的，可能是“官方罢工”（工会批准的），也可能是“自发罢工”（没有工会批准的）。

罢工的动机可能有很大差异。但主要动机是经济方面的（工资、工作条件、工时，工会得到承认等）。即使是因为经济动机发动的罢工，也可能针对政府部门，虽然直接目标往往是雇主。政治和社会目标可能会伴随经济目标一起提出，也可能独立于经济目标提出。

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提到的，我们给许多非暴力行动方法的分类不应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在每个大类、分类、子分类中，都会有某类方法同时具有另一类方法的一个或者几个特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如此），或者至少在某个方面与这一类别的整体特征有所不同。罢工尤其如此。一般来说，罢工是暂时停止工作，但是在有些方法中，停止工作是永久的，至少在意图上是永久的。也有些方法将经济抵制与

罢工相结合。还有些方法是象征性地停止工作，因此，这些方法也可以归到非暴力抗议与说服这一大类中。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创建一个比本书所给出的更加复杂的分类系统。这件事确实需要做，因为有许多方法至少应该被归到两个类别中。同样，一种特定的方法也会因为使用者所处的情境不同和所使用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和作用。不过，为了本部分的目的，我们将若干种属于不同类别重叠的方法，或者具有几种类别特征的方法，都归类为罢工，原因是，与其他类别相比，它们更接近罢工。这种做法是有益的，同时也令人感到遗憾，因为现实总是比我们用来理解它的智力工具更加复杂和灵活。在罢工这个部分中，有三个子分类属于不同类别重叠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类别相结合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比较新颖的、比较有想象力的方法。由于它们较为不同寻常，或者说由于它们结合了不止一种力量或者人群，因此，它们也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象征性罢工

97. 抗议性罢工

抗议性罢工（也称象征性罢工或者示威性罢工）是指在较短时间（一分钟、一小时、一天或者一星期）内停止工作；罢工不提出要求，目的是证明罢工者对某一特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有着深切的关注，以此警告对手，在必要的情况下，罢工者有力量进行更加有效的罢工。这一方法也可以在以下情况下使用：长期斗争的早期阶段，为了让工人习惯在斗争中使用罢工这一手段；工会不准备进行长期罢工；长期罢工可能招致更严厉的报复，而罢工者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希望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抗议性罢工的形式各异，可以与第 52 种方法沉默、第 65 种方法待在家里或其他方法相结合。可以有抗议性总罢工、抗议性产业罢工、抗议性同情罢工等。

1923 年 1 月 15 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入侵德国四天之后，被占领的鲁尔地区和莱茵兰地区的民众进行了一次三十分钟的抗议性罢工，以表达他们抵抗的意愿。1941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阿姆斯特丹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抗议性罢工，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1959 年 4 月 10 日，英国赫特福德郡斯蒂夫尼奇一家火箭制造厂大约五

百名工人进行了一小时的抗议性罢工，表达对单边核裁军的支持；1962年5月8日上午11点，比利时九百万人（占该国人口百分之五十）进行了十至十五分钟的抗议性罢工，以表达对反核武器运动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各个海事工会进行为期一天的抗议性罢工（正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运兵和救援的船只除外），反对政府不让军人立即回家。

1905年俄罗斯革命期间，抗议性罢工十分频繁。例如，2月，俄罗斯东部城市阿斯特拉罕的有轨电车工人进行了一天的罢工；10月，圣彼得堡的印刷工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以表达对莫斯科印刷工人罢工的声援；11月，圣彼得堡发生了更为频繁的罢工。一名官员这样描述俄罗斯首都的罢工运动：“某一天，理发师罢工了，另一天，餐馆和旅馆的雇员罢工了。这些罢工还未结束，报童又罢工了，然后是商店的售货员罢工了。”

1918年4月23日，爱尔兰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抗议性总罢工，这场罢工波及到除贝尔法斯特以外的全国各地。埃德加·霍尔特写道：“工厂停产了，商店和酒吧关门了，交通停止了。”“当政府把兵役制度强加给爱尔兰人民的时候，人民不相信征兵会带来自治的遥远希望而袖手旁观。”

1968年8月，俄罗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个星期，人们进行了几场短暂的抗议性罢工。8月21日中午12点，入侵发生几小时之后，为了响应创意艺术家工会通过电视台和电台发出的进行二十分钟抗议性罢工的号召，首都布拉格市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第二天中午，北波西米亚地区也发生了一小时抗议性罢工。8月22日早上，公开张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宣言》呼吁：8月23日中午进行一小时抗议性罢工。在一小时罢工期间，人人都要离开布拉格街道，“要让布拉格变成一座死城”。共产党报纸《红色权利报》报道了布拉格市中心的罢工情景：

一队年轻人从国家博物馆走向瓦茨拉夫广场，他们手拉手高喊：“撤离街道！”他们身后只剩下空荡荡的广场。汽笛开始哀鸣，汽车喇叭也加入进来。坦克中的苏联士兵环顾四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查看两边的建筑，观察窗户。有些坦克关上了舱门，机枪和火炮转来转去寻找目标。但是没有

人挑衅他们，所以没有人可以射击。人们响应号召，开始了抗议性罢工。

突然之间，瓦茨拉夫广场就空了，只有灰尘、纸张和海报在空中飞舞。街道上只有苏联坦克和士兵，他们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我们的人民。

98. 闪电罢工（快速退场）

指短暂、自发的抗议性罢工，目的是“发泄”不满，或者抗议某些相对较小的问题。这种罢工在美国称为快速退场，在英国称为闪电罢工。它们通常持续不超过几小时，参加的人数很少超过一家工厂的几名工人。这是自发性罢工可能采用的方式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大规模罢工被禁止的情况下，这种罢工相当普遍。杰克·巴巴什曾经介绍过一家百货公司工人闪电罢工的案例，罢工的原因是工人认为新的工资制度不合理，以及公司歪曲工会对雇佣残疾工人的态度。1963年夏天，巴黎麦德龙也发生了一次闪电罢工。（后来政府企图立法，要求罢工至少提前五天通知资方。）

（二）农业罢工

99. 农民罢工

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农民曾经集体停止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1861年，俄罗斯喀山地区农民受农民政治预言家安东·彼得罗夫的影响，开始了一系列旨在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行动，包括罢工。“农民召开会议，决定集体停止在地主土地上的一切劳动。”1905年俄罗斯革命期间，农会作出决定：“拒绝服兵役、进行罢工”，目的是要求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成立制宪议会。1905年秋天，基辅、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萨拉托夫、萨马拉、奥尔洛夫、库尔斯克、坦波夫、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奔萨和顿河哥萨克地区都发生了农民罢工。

索隆·巴拉克拉¹³⁴写道：在拉丁美洲地区，农民罢工是经常采用的抗议和抵抗方法之一。例如，1952年7月至8月，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拒绝继续在地主的土地上

134 美国学者，农民问题、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领域的国际专家。曾在拉丁美洲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工作。——译者注

劳动。除了罢工，他们还采用了其他非暴力行动方法。1962年，巴西东北部各个农会发动了一场超过二十万名农民参加的罢工，逼迫地主做出了许多让步。罢工还促进了全国性和地区性各种土地改革方案的提议。但也有人认为，这场罢工是两年后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之一。上台的军政府支持大农场主，镇压农会，导致农民领导人纷纷入狱、流亡或者被谋杀。

1960年至1963年，秘鲁拉孔本西翁省山谷也发生了农民罢工。在秘鲁农民联合会领导人雨果·布兰科的领导下，山谷大种植园的农民停止为地主提供廉价劳动。罢工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农民领导人纷纷被捕入狱。不过，罢工也取得了成果，政府颁布了把土地卖给农民的法令，改变了这一地区地主持有大量土地的现象，通过了在全秘鲁进行土地改革的法律。

100. 农场工人罢工

像其他任何群体一样，受雇的农场工人也可以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进行罢工。1929年至193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罢工事件”，罢工是由大萧条中的工资削减和罗斯福新政唤起的期待导致的。研究加州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美国作家凯里·麦克威廉姆斯写道：“毫无疑问，在美国劳工史上这些罢工影响巨大，农场工人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组织，也从未进行过如此社会意义深远的罢工。”外来的农场工人也通过自发的罢工表达他们的不满。

这些罢工经常失败，招致地方政府和资方的严厉镇压。例如，1930年1月和2月，在加州因皮里尔河谷大田工作的墨西哥裔和菲律宾裔工人，以及在包装车间工作的美国工人进行了两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工会组织者因此遭到逮捕和监视。罢工失败之后，工会号召4月20日召开农场工人大会，但是大会召开之前，工会组织者的住处和公共集会地点都遭到突袭。超过一百名农场工人被捕，保释金高达四万美元。被捕的农场工人中有八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犯罪工团主义法案》¹³⁵被定罪，工会陷入瘫痪。

135 1919年威廉·斯蒂芬斯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通过的将工团主义定为犯罪的法律，该法于1991年废除。——译者注

1932年11月，瓦卡维尔的水果工人在罐头与农业工人工会领导下进行罢工，遭到了“可怕的恐吓、殴打和起诉”。六名罢工领导人被绑架，绑架者用皮带鞭打他们，用羊毛剪子剪他们的头发，把红色指甲油倒在他们头上。罢工者还遭遇了一百八十名持枪的罢工反对者和一群拿着煤气管和修枝剪刀的罢工破坏者。这次罢工被破坏之后，1933年4月发生的三千名摘豌豆工人的罢工也遭到了大规模逮捕、殴打和普遍恐吓。镇压中有一人死亡，许多人受伤。尽管如此，罢工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迫使一篮（大约三十磅）豌豆的采摘报酬，从十美分提高到十七至二十美分。

其他农场工人罢工遭到的镇压包括殴打、枪杀、逮捕和起诉，被捕的罢工者被要求缴纳过重的保释金，谋杀罢工者的人却被宣告无罪。罢工者的集会遭到催泪瓦斯袭击，罢工者被强制驱逐，罢工者的营地被烧毁。这一时期，参与罢工的包括各种果树采摘工人和葡萄、棉花、蔬菜采摘工人。1933年，大约五万名罢工者参与了三十七次有记录的罢工（还有许多没有记录的罢工），其中二十九次罢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由工会领导的罢工中，农场工人的薪酬从每小时十五美分增加到了每小时二十五美分。

近年来，美国最著名的农业工人罢工是塞萨尔·查韦斯¹³⁶领导的加利福尼亚德拉诺葡萄种植园工人的罢工。这场罢工从1965年9月持续到1970年夏天，最终迫使葡萄种植园主与工会签订了集体合同。葡萄种植园工人的罢工受到全国消费者抵制的声援。首先是抵制所有加利福尼亚出产的葡萄。在第一个工会集体合同签署之后，转而抵制所有非工会农场出产的葡萄。1966年3月，罢工者进行了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德拉诺到该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二百五十英里进军，以抗议罢工破坏者向纠察队喷射杀虫剂和肥料的行为，并且为罢工做宣传。他们沿途举行晚间集会，每场集会都朗读工会宣言：

我们正在受苦，我们要团结，我们要罢工，我们要胜利！我们的进军将照亮我们的事业。让所有农场工人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让他们也像我们这样做。

136 美国劳工运动领导人和民权活动家。1962年与多洛雷斯·韦尔塔共同创立了全国农场工人协会。——译者注

（三）特殊群体罢工

101. 拒绝强迫劳动

指拒绝某些人强迫另一些人为自己提供劳动。拒绝的目的通常是废除强迫劳动，而不是仅仅改善劳动条件。例如，1921 年，印度戈德格尔地区的农民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纪律的罢工，反对历史悠久的劳役制度。这一制度允许欧洲人以极低的工资雇佣农民从事艰苦的劳动。罢工的结果是农民的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欧洲人强制农民提供廉价劳动的种类受到了严格限制，农民的劳动报酬提高了。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制定法律，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恢复从前法国人实施的无偿劳役制度。1776 年至 1778 年，魁北克省尚布利的农民经常拒绝修筑公路或者从事其他军事运输劳动。后来英国人不得不废除了无偿劳役制度，给已经雇佣的农民发工资。1781 年，中国山东阳谷县的农民响应一名秀才的号召拒绝疏浚河道，还袭击了监狱和税务所。

102. 囚犯罢工

囚犯有时也会拒绝从事监狱当局要求他们从事的劳动。这种拒绝可能有各种动机：反对被监禁，要求改善监狱的具体条件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监狱关押的良心拒服兵役者发起过多次罢工行动。其中一次发生在 1943 年 8 月 11 日，关押在康涅狄格州丹伯里联邦惩教机构的十九名囚犯停止劳动，抗议用餐时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被单独关押一百三十三天，只允许有限的运动、单调的食物和限制探望之后，监狱悄悄引进了自助餐制度。1953 年夏天，苏联沃尔库塔大型集中营内从事采煤劳动的囚犯进行了一场罢工，要求改善监狱条件。由于这次罢工涉及煤炭产业，也是本地区唯一的产业，因此这一案例同时具有产业罢工和总罢工的特征。

103. 行业罢工

指地方、地区、全国或者国际范围内某一行业的一家或者多家企业的工人同时停止工作。按照地理范围区分，可以分为地方行业罢工、地区行业罢工、全国行业罢工等。行业罢工几乎总是发生在工会属于行业工会（而不是把一家工厂或者一个产业中的所有工人都包括在内的产业工会）的地方。1741 年，纽约的面包工人为了反

对市政府对面包的价格管制进行了罢工（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一次罢工）。1825 年，波士顿的木匠为了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进行了罢工。1890 年 1 月，纽约的三千多名斗篷制造师为了反对血汗工厂的工作条件进行了罢工。1909 年 11 月至 1910 年 2 月，纽约的一万五千名女衫和裙子裁缝师为了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了罢工。

104. 职业罢工

指从事某个特定职业的群体为了经济、政治或者其他动机进行罢工。如果动机是政治性的，那么职业罢工在更大的斗争背景下，涉及其他群体和其他非暴力行动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在职业罢工之前进行，与职业罢工同时进行，或者在职业罢工之后进行。

公元 260 年，埃及俄克喜林库斯发生过一次职业罢工。历史学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写道：

……货币大幅贬值导致汇兑银行经理进行了罢工，他们关上大门，拒绝接受和兑换帝国货币。行政机关实施了强制和威胁，将军向银行家和其他货币兑换商下达命令：“银行要开门营业，要接受和兑换除了假币和伪币之外的所有货币。”罢工显然不是第一次发生，因为将军在命令中提到“过去省长阁下已经下令对罢工者施以惩罚”。

公元 200 年左右，从小亚细亚把谷物运往罗马的船长们宣布，如果不满足特定的条件，他们就要进行职业罢工。粮食供应长官在给下属的信中写道：法国阿尔勒五个行会的海船船长“宣布说，如果这些问题继续下去，他们就要暂时停止运输”。

律师也把停止执业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例如，为了抗议《印花税法案》要求北美殖民地法院使用印花税票的规定，律师以暂停执业进行反抗。1905 年 1 月，俄罗斯血腥星期日之后，圣彼得堡的律师拒绝出庭，对“政府的无情之举”进行抗议。同年 10 月，圣彼得堡为海军提供服务的印刷工，港口和海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家银行的雇员也进行了罢工。

其他使用过职业罢工方法的群体还有教师、医生和公务员。1934 年 1 月和 4 月，

宾夕法尼亚州梅菲尔的教师在六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后进行了罢工。1956年12月，海地的公务员，银行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进行罢工，反对总统保罗·马格洛伊尔将军不顾宪法限制，延长总统任期。海地的律师也在罢工期间拒绝代理法院案件。

（四）普通产业罢工

105. 机构罢工

机构罢工涉及同一个管理机构下属的一个或者多个工厂的所有行业，不论其空间分布。1936年2月至3月，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固特异轮胎厂工人进行罢工，要求成立工会。1954年3月至4月，挪威北欧航空公司五百名员工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06. 产业罢工

是指本地或其他地区同一个产业（比如采矿、印刷产业）内的所有企业进行的罢工。1902年，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进行罢工，反对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经营者垄断无烟煤。19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纺织工人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¹³⁷领导下进行了罢工。1959年6月至7月，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译者注）首都科伦坡的码头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进行了罢工。1953年7月至8月，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罐头协会的工人进行了罢工，罢工导致北加州六十八家隶属罐头协会的罐头厂暂时关闭。1923年至1924年，德国鲁尔抗争期间，各煤矿进行联合罢工，抗议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军。1941年2月17日至18日，荷兰造船厂工人进行罢工，“迫使德国占领当局放弃了将荷兰工人运往德国的计划”。1944年9月，荷兰铁路工人响应流亡政府支持盟军的号召进行罢工，罢工持续到1945年。1962年4月至5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煤矿工人进行了罢工。

107. 同情性罢工

指罢工的目的是为了罢工者的利益，而是通过向雇主施加压力，支持其他工人罢工的要求。进行罢工的工人和进行同情性罢工的工人可能属于同一个雇主，也可能

137 一个国际性工会联合组织。——译者注

属于不同的雇主——进行同情性罢工的工人可能认为，自己的参与能够迫使其他雇主、公众或者政府给直接卷入罢工的雇主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其做出让步。据报道，同情性罢工源于 1875 年，但到 1886 年才开始使用同情性罢工这一名称。1927 年至 1946 年，同情性罢工在英国是非法的。

弗雷德·霍尔详细描述了同情性罢工的动机：

同情性罢工，与其说其动机是同情，不如说其动机是唇亡齿寒——普通的罢工者抗议一种压迫，这种压迫影响到了（或者明确威胁到了）某些工人同胞，那么，在将来某个时候，这种压迫也会影响到自己。同情性罢工者反对的不是雇主对待自己的态度，而是雇主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一种对工人抱有敌意的态度。

1886 年，美国铁路工人进行罢工，罢工首先开始于德克萨斯州和太平洋铁路，很快，同情性罢工就扩展到整个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1924 年，挪威造纸厂工人进行同情性罢工，声援遭遇封厂的运输工人的罢工。1903 年 7 月，俄罗斯帝国的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夫和第聂伯罗等城市的工人宣布进行同情性罢工，支持巴库、第比利斯和巴统等城市进行的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的罢工。一个不同寻常的案例发生在 1944 年 6 月底，危地马拉的铁路工人进行同情性罢工，支持国立大学罢课的学生。学生罢课的目的是反对总统豪尔赫·乌维科禁止五项与政治自由有关的宪法条款，罢工和罢课导致豪尔赫·乌维科下台，并流亡海外。

（五）受限制的罢工

108. 精细罢工

精细罢工的原意是指工人一个一个停止工作或者从事其他工作，直到雇主询问他们的不满，并且满足他们的要求为止。1854 年，英国弗林特郡的玻璃工人就实践过这种罢工。工人自己的刊物描述了这次罢工的效果：“工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后来，骄傲自大的压迫者只好甘拜下风，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工人无形的力量。”

根据社会学家欧内斯特·希勒的定义，精细罢工这个术语包含任何卷入争端的雇员

逐个停止工作的方法。在罢工覆盖某一产业（也可以是许多产业）内的许多工厂的时候，精细罢工可以这样组织：在连续几天或者几星期的时间里，一家工厂接着一家工厂，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工人停止工作，逐步扩大罢工规模。但是要为在所有工人都停止工作之前达成协议留有余地。精细罢工的另一个变体是，一家工厂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停止工作，数字逐渐扩大，直到这家工厂的所有工人都停止工作。

这一方法使工会能够把力量集中在特定的地点、工厂或者企业，其他工人仍然照常上班，不会因为这场严格来说他们并没有参与的罢工而失业——在有些国家，这样失业的工人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

精细罢工的案例还包括：1938年夏天，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组织的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模具的技术工人进行的罢工。根据政府的法律，其他因罢工而失业的“非罢工”生产工人可以领取失业保险。1886年，美国雪茄工人工会进行了精细罢工。大约在1914年，纽约服装业工人也进行了精细罢工，第一天是裤子裁缝师罢工，第二天是背心裁缝师罢工，最后是外套裁缝师罢工。作为一种展示工人力量的手段，这些罢工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09. 同行支援罢工

同行支援罢工与精细罢工非常相似——工会在同一时间只在一个产业内的一家企业组织罢工，工会在不同的时间对付不同的企业，让罢工企业受到对手竞争的压力。1946年，英国的无线电产业就进行了同行支援罢工。

110. 减速罢工（怠工）

减速罢工也称怠工，是指工人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也不完全停止工作，而是故意减慢工作速度，使工作效率明显降低。怠工会影响工厂的利润。如果怠工发生在政府机构，会降低政权的统治能力。

在美国奴隶制时代，非裔奴隶就用怠工降低工作效率。雷蒙德·鲍尔和爱丽丝·鲍尔指出：

奴隶们的怠工，一定会给种植园主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我们掌握的估计种

植物园主财政数字的唯一方法，是比较不同种植园和不同的劳动制度下所完成的工作产量。这些数据显示，同一个种植园因为出现怠工，其产量有时会减少超过百分之百。比较南方不同地方种植园的产量，出现怠工的种植园的产量也会减少超过百分之百。

1859年，俄罗斯农奴也采用怠工的方法反抗农奴制。1861年初，在沙皇做出废除农奴制的明确承诺之后，被强迫劳役的农奴也采用了怠工的手段。

农奴们履行职责——他们认为自己马上就可以免除这些职责——的时候越来越慢，越来越不情愿。这是一种自发的罢工，使自己不再毫无保留地屈从于农奴制的束缚，而是经常公开但零星地拒绝服从农奴主的意志。

弗兰茨·纳曼¹³⁸把怠工描述为“工团主义者的一种决定性的作战手段”。他指出，1895年，意大利铁路工人第一次将这一手段用于大规模劳资纠纷。但事实上，早在1889年，格拉斯哥的码头工人在一次罢工失败之后就曾使用过这种方法。

纳粹占领期间，“荷兰工人也曾使用怠工的方法，尤其是在他们被迫去德国工作的时候……”1942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¹³⁹向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工人发出呼吁，要求工人在工作时放慢速度。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认为：“放慢速度这个口号总是比快点干更有效。”1938年至1939年，德国工人也曾非常有效地使用过怠工的手段。在这一时期，煤矿工人的怠工导致产量显著降低，迫使政府提高了工资。1939年9月，工资冻结和其他劳动条件的恶化，以及“政权显然打算在战争爆发之时废除数十年社会斗争带来的所有社会收益”，导致德国工人更加广泛地采取类似行动。弗兰茨·纳曼写道：

大规模的消极抵抗开始了。政府不得不在几乎所有战线上退让投降。1939年11月16日，政府重新实施给节日、星期日、晚间和超时工作发加班费的做法。

138 公元二十世纪德国政治活动家，政治学家和劳工律师。他以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而闻名。——译者注

139 英国政治家，1927年任英国王室法律顾问，1931年成为国会议员，1932年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同盟。1939年因反对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被开除出工党。1940年至1942年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财政大臣，致力于战后经济重建，推行经济紧缩政策。——译者注

1939 年 11 月 17 日，政府重新实施带薪休假，甚至还补偿了工人过去的损失。

1939 年 12 月 12 日，政府颁布了新的工时立法，强调对女工、未成年工和全体工人的保护。

在纳粹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存在普遍的怠工行动，工人或者缺勤，或者减慢工作效率”。

111. 严守规则罢工

指按照规章制度的字面意思服从命令，以达到妨碍生产，减少利润率的目的。工人仍然留在工作岗位上，但是事无巨细地遵守工会和雇主制定的，以及写在合同中的所有规章制度，其结果是，只能完成正常产量的一小部分。因此，这是减速罢工的一种变体，其借口是技术上的尽善尽美。弗兰茨·纳曼指出：1905 年至 1907 年，奥地利铁路工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罢工方法，采取的形式是严格服从所有交通和安全规章。英国 1926 年大罢工之前和 1949 年铁路工人工资纠纷期间，工人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112. “病假”罢工

在罢工被法律、法令或者合同禁止，或者由于其他理由不可行的情况下，工人也可以通过让产量降低到和全面罢工差不多的程度来实现某些目标，采用的方法是装病。在法律或者合同允许请病假，但禁止罢工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

在美国奴隶制时期，南方的非裔奴隶存在大量的装病现象，足以造成经济影响。有时候病假率将近八分之一。奴隶经常在星期六生病，但是很少在星期日出生病，因为星期日不是工作日。要做的工作最多的时候，生病的人数也更多。虽然有许多奴隶是真病，但是明显也有许多奴隶是装病，以逃避工作，避免被卖给不喜欢的主人，或者报复主人（通过在拍卖时假装残疾降低售价）。妇女假装怀孕可以得到轻一些的工作和更多的食物。雷蒙德·鲍尔和爱丽丝·鲍尔写道：

有关装病的广泛程度，存在的疑问可能很小。有些装病相当明显，让人怀疑这种明目张胆的滥用病假行为为何会得到宽容。但是不要忘记：奴隶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投资。大多数奴隶主宁愿相信奴隶真有病，因为他们担心，万一

把真有病的奴隶赶去工作，造成奴隶死亡，奴隶主的损失会更大。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 1952 年底的中国。中国工人虽然没有独立的工会，但人数带给他们行动的力量。

工人逐渐学会了消极抵抗，这种消极抵抗虽然从来都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但它仍然成为一个让政府大感头痛的问题。这种消极抵抗基本上采用的是怠工的方法。表面看来，工人似乎受到当局提倡的劳动热忱的鼓舞，但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显著下降。

抵抗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是缺勤。工人利用《劳动保险条例》中的规定（有医生批准的病假，收入会略有下降），在诊所外排起长队。多数“患者”有无法确诊的症状，医生的处理方法就是批准休几天病假。

医生夹在官员的压力和法律责任中间，如果真正生病的人被医生拒绝批准病假之后出了事故，医生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医生倾向于批准病假。在许多工厂，缺勤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会组织“慰问团”去探望每位生病的工人，以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生病之后，一个面粉厂的缺勤率从百分之十六降到到百分之五。但是，缺勤率在几星期之内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一位“慰问团”成员说：“我们到达的时候，病人看起来总是很痛苦的样子。”

113. 辞职罢工

另一种回避禁止罢工规定的手段（也可以用于其他场合）是辞职罢工。在使用这种方法时，要有相当比例的工人提交辞呈。组织者可以协调好时间，让辞呈分阶段提交或者生效，使辞职工人的总数稳步增长。另一种方法是全体员工同时辞职。1967 年 8 月底，美国马萨诸塞州黑弗里尔市的黑尔医院，在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失败之后，一百七十五名护士中的八十五人提交了辞呈。其中五十八人的辞职立即生效，其余人的辞职推迟到几星期之后生效。这是该州第一次发生工资谈判失败后大规模辞职的案例。黑弗里尔市市长金蒂称，护士的行动“相当于一场罢工”。

114. 有限罢工

指工人继续有效的履行自己大多数工作职责，但拒绝做某些工作（无论是在规定的

工作时间之内还是之外），或者拒绝在特定的时间工作。例如，拒绝超时工作或者拒绝在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时间工作。公交车司机有时会预先约好，同时拒绝开最后一班车，直到雇主与他们达成协议为止。

1870 年，苏格兰法夫区的矿工拒绝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1905 年 10 月和 11 月，圣彼得堡的工人通过“在上工八小时后停止工作这一简单易行的手段”引入了八小时工作制。把罢工限制在特定时间的案例还有：1945 年至 1949 年，英国铁路工人的仅限星期日罢工。1947 年 11 月，阿根廷铁路工人的隔日罢工。1942 年，具有严格天主教信仰的荷兰林堡省的矿工拒绝在星期日工作，他们罢工的理由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反对纳粹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的德国占领军遇到的公开反对和破坏行为越来越多，他们对付的方法是禁止街道上出现五人以上的聚会，以及在晚上八点到早上五点之间实行宵禁。哥本哈根市伯迈斯特韦恩公司——丹麦最大的造船厂——的工人用有限罢工作为回应。1944 年 6 月 26 日，工人集体离开工作场所，给纳粹总部送了一封信，说因为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供应，所以不得不提前下班，以便能照料自己的园地。他们说，这不是罢工，而是园地里的土豆和蔬菜要比德国人的军事工业更重要。这种做法也被称为早下班罢工。

115. 选择性罢工

指工人拒绝做某些特定类型的工作，通常是由于某些政治异议。异议是针对工作本身，而不是针对工时和工作条件。因此，这类罢工的目的既是为了避免完成这类工作，也是为了迫使雇主今后不要让工人做这类工作。

选择性罢工的第一个案例发生在北美殖民地，从 1774 年 6 月第一次大陆会议任命代表到 10 月 26 日会议休会期间。美国历史学家亚瑟·史列辛格写道：“最惊人的事件是，两个主要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工会拒绝向波士顿的英国当局提供劳动。

1774 年 9 月初，总督盖奇要雇佣波士顿工人为波士顿地峡构筑防御工事，但遭到了拒绝。”罢工者还说服纽约工人不要去波士顿为英国当局构筑防御工事。一开始盖奇总督取得了成功，波士顿的木匠和石匠干了几天构筑防御工事的活儿，但随后

他们就辞职了。随后，马萨诸塞省十三个城镇的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劳工抵制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任何人如果为波士顿的英军提供劳动或者物资，都会令其他公民“感到厌恶，或者以某种方式感到痛苦”，会被认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应该被“阻止和击败”。参加会议的主要城镇任命了观察和预防委员会从事这项抵制计划的执行工作。他们把决议发到马萨诸塞省所有城镇。结果“劳工抵制发生了效力”。英军设施直到当年 11 月才完工——盖奇总督从新斯科舍省（在今天的加拿大——译者注）和新罕布什尔省找到了工人。

其他选择性罢工的案例还有：1923 年至 1924 年鲁尔抗争期间，德国铁路工人拒绝把运煤火车开往法国，煤炭运输公司的员工也加入了罢工者的行列。1923 年 3 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当局接管鲁尔铁路期间，入侵发生之前的十七万铁路员工中只有四百人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1943 年 8 月，丹麦欧登塞的码头工人拒绝修理德国船只。1963 年夏天，瑞典哥德堡的码头工人为了声援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拒绝卸载一百八十吨来自南非的罐头水果。此前，丹麦哥本哈根市和奥胡斯市的码头工人也曾拒绝做类似的工作。

（六）多产业罢工

116. 广泛罢工

如果若干产业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同时罢工，但是罢工者在这一地区重要产业的工人当中不占多数，这样的罢工称为广泛罢工。例如，若干个产业同时受到政府某项经济政策的影响，可以同时进行罢工。例如，1926 年和 1927 年，发生在挪威的金属、纺织、制鞋、采矿和建筑产业抗议降低工资的罢工。1931 年，挪威再次发生席卷若干个产业（报纸、酿酒、烟草产业等）的罢工。

117. 总罢工

指工人普遍停止劳动，目的是使一个特定地区的经济停滞或者完全停滞，以实现罢工者想要实现的目标。这一方法可以用于地方、地区、全国或者国际层面。威尔弗里德·哈里斯·克鲁克把总罢工定义为“某一地方或者地区比较重要的产业中大多数工人的罢工”。如果罢工局限于一个城市，可以称为地方总罢工。例如，1919

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和加拿大马尼托巴温尼伯市的罢工，以及 1927 年发生在奥地利维也纳市的罢工。虽然总罢工通常会计划进行全面罢工，但是某些生死攸关的服务可能必须继续运行，尤其是那些维持身体健康所需要的服务行业，比如牛奶、饮水、食物供应，污水处理和医疗服务。威尔弗里德·哈里斯·克鲁克把总罢工分为三类：政治性总罢工、经济性总罢工和革命性总罢工：

政治性总罢工的目的是迫使现政府做出某些明确的政治让步，比如比利时要求普选权的总罢工。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是，罢工的目的是拥护现政府，反对可能的篡位者，比如 1920 年德国反对卡普政变的总罢工。经济性总罢工是最常见的类型，至少在罢工开始时是这样，典型的案例是 1909 年瑞典的总罢工¹⁴⁰。革命性总罢工旨在推翻现政府或者工业体系，罢工的目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革命性的，也可能是在罢工的过程中变成革命性的。革命性总罢工更有可能出现在那些长期没有或者普遍没有工会的国家，或者有影响的工人领导人主要是工团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比如 1905 年的俄罗斯、西班牙和意大利。

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提倡总罢工。英国、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南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进行过总罢工。

总罢工的案例很多，其地理和政治差异相当大。1893 年、1902 年和 1913 年，比利时的总罢工要求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男性普选权。俄罗斯帝国早期的总罢工发生在 1902 年的罗斯托夫市和 1903 年的敖德萨市。1905 年，俄罗斯革命期间，总罢工也被广泛使用。其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总罢工是 1905 年的十月大罢工，这场罢工席卷了俄罗斯帝国大多数工业城市，其中莫斯科市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

一星期之内，莫斯科几乎与世隔绝，大多数重要的公共活动都停止了，所有火车运营都中断了，大多数电报都发不出去，只有中央电报总局还在运转，

140 1909 年 8 月 4 日至 9 月 4 日，瑞典全国三十多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罢工的原因是经济衰退对许多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瑞典雇主协会决定降低工人工资。纺织业、锯木厂和纸浆业的八万名工人率先开始罢工。瑞典工会联合会响应号召，进行了总罢工。据估计，此次罢工造成雇主经济损失约为二千五百万瑞典克朗。瑞典工会联合会由于资金短缺，在一个月后结束了罢工。——编者注

保持与外界通讯，罢工者正在计划关掉它。

1920年，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众为了反对卡普政变也发动了总罢工：

1920年3月14日下午，这场全世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罢工开始了。该国的经济生活陷入停滞。卡普政变的领导者企图破坏罢工，把纠察列为一项死罪。但是最后他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

1921年挪威的总罢工是为了反对降低工资。1925年中国的总罢工是为了经济和民族问题。1926年5月3日至12日英国的总罢工¹⁴¹从煤矿工人的不满，发展成为工人阶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对决。

1941年2月25日至26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市进行了一场总罢工，抗议对犹太人的虐待。1943年4月至5月，荷兰大多数产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席卷全国，抗议将荷兰退伍军人扣押在德国的计划。

1944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纳粹占领期间，哥本哈根也进行了总罢工，目的是迫使德国占领军停止戒严状态，并要求令人痛恨的丹麦法西斯沙尔堡军团离开该国。罢工使纳粹占领军做出了部分让步。

1953年6月，东德起义期间发生的总罢工在许多城市和城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57年，海地的总罢工罢黜了临时总统皮埃尔·路易斯。

（七）罢工与经济抵制相结合

118. 联合休业罢工

联合休业罢工是印度人经常使用的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它指一个地区的民众为了表明对某些事件、政策或者现状的极度不满，在自愿的基础上，让该地区的经济暂时停止。使用这一方法不是为了发挥经济影响力，而是为了对有关问题表达悲痛、决心、憎恶，以及道德或者宗教感情。这一方法在形式上是经济不合作，但其效果是象征性抗议。联合休业罢工的时间通常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

¹⁴¹ 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是由英国工会总理事会发起的，目的是反对给煤矿工人降薪和工作条件恶化。约有一百七十万各行业的工人参加了罢工。——编者注

会延长到四十八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联合休业罢工的范围通常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城镇，虽然它也有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整个国家发生。一般情况下，与总罢工相比，联合休业罢工更强调自愿性，工人是在获得雇主许可之后放弃工作。店主和商人也会自愿关闭企业和工厂。

联合休业罢工在古代印度就是广为人知的非暴力行动方法之一，他们利用这一方法反对国王，让国王知道某条法律或者某些措施不受人民欢迎。联合休业罢工也可用于全国哀悼。甘地经常在他领导的一场斗争开始的时候使用联合休业罢工，以净化斗争的参与者，检验他们对问题的感情，唤起民众和对手的印象。例如，1919年，在印度反对《罗拉特法案》¹⁴²的非暴力斗争期间，1930年至1931年，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都使用过这一方法，尤其是在抗议重要的运动领导人被捕时经常使用。

119. 经济停产

在工人罢工的时候，管理者、商人、商业机构和小店主也同时停止经济活动，这时就会发生经济停产，造成经济瘫痪。这种方法既有罢工的特征，也有经济抵制特征。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在总罢工的政治目标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的时候。经济停产在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停产程度上，以及在管理者、商人、商业机构和小店主等参与程度上会有所不同，就像总罢工的参与情况会有很大差异一样。

1905年底芬兰发生的全国性经济停产，是芬兰人民要求从俄罗斯统治下恢复自治而采取的手段之一。芬兰的雇主们表达声援的方法，是给进行罢工的工人发工资。汉普顿·杰克逊写道：

火车停驶，电报机静寂无声，工厂空荡荡。接着，全国各地的店铺、办公室、学校、餐馆都关门了。警察也加入了罢工。大学生组成纠察队维持秩序……没有流血事件发生，只有全国一致消极抵抗。

六天之后，俄罗斯沙皇终于同意芬兰举行自由选举，并建立宪政政府，虽然几年之后，沙皇再次试图将芬兰俄罗斯化。

142 英属印度政府1919年3月通过的法案。该法案授权政府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有权将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所有嫌疑犯逮捕入狱。实际上，这是英国殖民当局压制革命活动的具体措施。——译者注

1943 年 7 月 11 日，一场经济停产行动在丹麦埃斯比约市爆发，“不仅是工人，甚至公职人员也回家去了，商人纷纷关闭了商店”。1956 年 12 月，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一场针对总统保罗·马格洛伊尔修改戒严法的经济停产行动开始了，几乎所有企业——汽油、石油企业，码头、公共市场，市中心的商店、学校和银行等都关了门，律师拒绝受理法院案件，公务员停止工作，甚至有些医院也停业了。“抵抗完全是消极的，海地人只是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12 月 12 日，保罗·马格洛伊尔辞去总统职务后，经济停产继续，民众要求他也辞去军职。辞职的要求得到军队和教皇大使的支持后，保罗·马格洛伊尔不得不也辞去了军职，并于两天后离开海地，流亡牙买加。

1963 年，在越南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顺化的多数商店至少有两次停业，以支持反对运动。虽然尚不清楚顺化市停业的程度如何，以及经济的其他部分是否也停产。

罢工也常常用于实现政治目标。在某些案例中（比如公务员也参加罢工的时候），罢工本身就包含政治不合作因素。在某些罢工方法属于非法的情况下，或者在所有罢工都属于非法，但是罢工仍在进行的情况下（比如以推翻政权为目标进行的经济停产），就会出现经济不合作和政治不合作相结合的方法。

——政治不合作方法

介绍

政治不合作，有时也称为政治抵制，是非暴力不合作中的第三类。它是指拒绝在现有体制下进行通常形式的政治参与。这一分类虽然也可以由个人和小团体实施，但是政治不合作通常是指广大民众团结一致，暂时停止正常的政治服从、政治合作和政治行为。政治不合作也可以由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政府本身进行。政治不合作的目的可以是抗议，或者个人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与道德上、政治上令人反感的東西脱离关系。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政治不合作是为了给政府或者企图夺取政府控制权的非法机构施加压力，也有些时候是给另外一个政府施加压力。政治不合作的目标可以要求一个特定的有限目的，也可以要求对广泛的政府政策进行改革，还可以要求改变政府的性质或者构成，甚至可以要求政府下台。使用政治不合作方法反对篡位者的时候，其目标可以是捍卫或者恢复合法政府。

政治不合作的参加者所占比例越大，政治体制运转需要人民提供的合作越多，这些方法的政治意义就越大。在实际斗争中，这类方法常常与其他非暴力行动方法相结合。

根据具体情况，政治不合作可以采取无数种方法。这些方法基本都源于人们不愿通过从事特定类型的政治行为帮助对手。本分类包含的 38 种方法分为六个子分类：拒绝授权；公民不与政府合作；除了服从之外，公民还有哪些选择；政府工作人员的行动；本国政府的行动；外国政府的行动。还有其他许多种可能的不合作方法没有纳入本书。比如本书没有专门列举那些只与某个特定领域的行为有关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拒绝接受保释；拒绝缴纳保证金；在面临限制的时候停止出版报纸；拒绝参加监狱的假释评估；藐视限制令或者禁止令；拒绝购买没收的财产，等等。

（一）拒绝授权

120. 拒绝或者停止效忠

指拒绝承认某个政权在法律或者道德上值得效忠。在公元十九世纪匈牙利抵抗奥地利统治的斗争中有许多这样的案例。例如，匈牙利人民表示，只要弗朗茨·约瑟夫一世¹⁴³不遵守匈牙利宪法，未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我们就不承认他的统治。因此，匈牙利议会拒绝承认弗朗茨·约瑟夫解散国会命令的合法性。佩斯县地方议会在抗议解散国会的命令之后，它自己也被下令解散，但是它同样拒绝承认解散命令的合法性，并且继续履行议会职责。在地方议会普遍被解散之后，地区议会议员也都拒绝效忠奥地利皇帝。

公元十六世纪，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人民也有意识地拒绝效忠统治者。例如，1565年，“讽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文章到处流传，称他为侵犯人民权利的伪国王，荷兰人民拒绝对他效忠”。1581年夏天，荷兰国会在海牙通过决议：

鉴于腓力二世残暴统治和践踏国家的权利，荷兰国会决定罢免其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这一决议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军队指挥官等采用新的誓言，宣誓效忠荷兰共和国……

荷兰国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表达了坚定的自由传统。

北美殖民地人民拒绝承认英国政府对他们的统治，这也正是美国独立的关键原因。1774年，托马斯·杰弗逊写道：“我们宣布英国议会法案无效的原因是英国无权对我们行使权力。”这种拒绝向英国政府授权的做法产生的影响，就是后来约翰·亚当斯宣布“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爆发之前，革命就已经存在于殖民地联盟及人民心中”的重要理由。

有时候，停止效忠也可以用象征性行动进行表达。例如，1905年11月13日，俄罗斯巡洋舰奥恰基夫号“升起象征革命的红旗，表示对政府‘不承认’……”同一个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国民议会二千名代表宣布，不承认俄罗斯政府统治他们的合法性。”

143 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年至1867年)，奥匈帝国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年至1916年)。——译者注

在鲁尔抗争期间，德国人民也拒绝承认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当局颁布的法令和命令的有效性。1923年1月19日，德国政府宣布：“德国各级政府禁止服从占领当局发布的任何命令，只服从德国政府发布的命令。”拒绝效忠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德国警察拒绝向占领当局的官员敬礼。

美洲印第安人经常用各种方式拒绝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对他们的统治权。玛格丽特·德马尔科收集了许多这类案例。她写道：1921年，六部落联盟¹⁴⁴中的易洛魁人¹⁴⁵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土地拥有主权，拒绝成为加拿大公民，并且向国际联盟递交了反对加拿大政府统治他们的请愿书。1946年，齐佩瓦人¹⁴⁶要求联合国就他们提交的条约案举行听证。1960年，他们要求在联合国拥有席位。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初几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官员和公民都拒绝承认苏联对其国家的政治活动拥有任何权力。例如，8月24日，布拉格市市长拒绝会见前来与他谈判的占领军代表。两天之后，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捷共党员宣布，他们只承认本国官员的权力，不承认苏联官员的权力：

布拉格萨多瓦大街国家安全部各部门委员会宣布，国家安全部完全支持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和党务机构，他们只接受内政部部长约瑟夫·帕维尔的命令。

121. 拒绝公开支持

在有些政治环境下，不公开表达对现政权及其政策的效忠，也是一种政治不合作行动。在人们被组织起来表达一致意见，被强制要求表达政治热情的情况下，沉默也会引人注目，而且相当危险。即使在政权并不是完全极权制的情况下，也有些人会被期待或者被命令公开表达对政权的支持，拒绝这样做会被视为一种反对行动。例如，1963年，南越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政府发动的支持吴廷琰政权的游行失败了。至少有一次，一位将军没有出席事先安排好的新闻发布会，这位将

144 北美印地安原住民结成的联盟，包括莫霍克人、奥奈达人、奥农达加人、塞内卡人、卡尤加人和塔斯卡洛拉人。——编者注

145 指使用易洛魁语的印地安人。——编者注

146 北美印地安人的一支。——编者注

军本来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己对政府突袭佛塔和寺院的支持。显然，他的“支持”并不积极。

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匈牙利作家表达自己不支持苏军入侵的方法是沉默，不发表任何东西。在这种环境下，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意味着作者消极承认或者积极支持新政权。相反，如果他们保持沉默，民众就会知道，作家拒绝向新政权效忠。1957年1月底，弗朗索瓦·费吉托¹⁴⁷写道：“在任何一份官方报纸和期刊上找到著名作家的名字都是徒劳的。发行量很大的《人民自由报·圣诞特刊》上找不到一篇在世的著名作家撰写的文章或者诗歌。”

1968年春天，苏联加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宣传。据报道，在莫斯科为苏联电台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播音员拒绝广播批评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问题的文章。报道还提及，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向莫斯科派了一名法律顾问，向那些为苏联电台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雇员提供法律帮助。但苏联政府发言人否认了这一报道。

122. 用演讲和文章倡导抵抗

在很多情况下，发表和传播呼吁人们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演讲和文章也是一种抵抗行动。尤其是在那些呼吁抵抗是非法行为或者煽动行为的国家。

例如，1959年12月，英国反对核战争直接行动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因为散发传单，号召人们非法进入哈灵顿火箭基地而入狱。1959年6月18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十四名来自穆尔西亚省的活动家因为散发传单，号召工人进行全国总罢工，被控煽动军事叛乱，被判处六个月到六年不等的刑期。

（二）公民不与政府合作

123. 抵制立法机构

在非民主制度下，为了体现民主的假象，立法机构会被用来装点政府的门面，支撑政府的影响力。抵抗运动需要长期或者短期抵制参与这样的立法机构。不参与立法机构的目的可能包括：1) 揭下民主的假面纱；2) 提高不与政权合作的程度；3) 让那

147 研究东欧问题的匈牙利裔法国记者和政治学家。——译者注

些原本把时间浪费在无法带来任何变革的立法会议上的政治家积极参加抵抗运动；4)持异议的少数派在立法机构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辞职进行象征性的、有新闻效应的抵抗。当然，退出立法机构的风险是对手可以在立法机构完全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运行。

少数民族同样可以抵制参加“压迫民族”的多民族议会或者帝国议会。民族主义者可以基于原则（拒绝承认和接受自己的国家与侵略国家的政治一体化）进行这种形式的抵制，也可以基于策略进行这种形式的抵制——作为抗议或者达到某个特殊目的的行动，或者作为让外国统治无法继续下去的不合作运动的一部分。例如，1861年，选举产生的匈牙利国会议员拒绝出席维也纳的奥匈帝国议会，坚持只出席匈牙利议会。1882年初，塞尔维亚激进派议员在要求调查一起铁路丑闻遭到拒绝后从议会辞职，导致了一场宪法危机。1914年，俄罗斯杜马就沙皇政权的战争贷款问题举行投票前，社会民主党代表退出了会议。

1930年至1931年，印度独立运动期间，运动领导层动员国家立法机构和各省立法机构的议员辞职。1967年3月18日，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在新德里主持新议会开幕典礼时，一百多名反对派议员因总理英迪拉·甘地领导的政府阻止拉贾斯坦邦组建一个非议会党派部门而抵制此次会议。这是自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以来发生的首次抵制立法机构的行动。

1961年12月，希腊一百多名新当选的反对派议员抵制国王保罗一世主持的议会开幕典礼，以唤起公众关注他们质疑选举中出现的舞弊行为。1962年5月，西德联邦议院许多议员退出了一次全体会议，使会议达不到法定人数，目的是阻止议会批准内阁削减外国汽车关税的决定。

124. 抵制选举

如果反对运动有理由相信选举不会公平进行，或者拒绝承认举行选举的政权的权威性，可以拒绝提名候选人，也可以敦促民众拒绝投票。这种抵制的目的是拒绝用选举欺骗民众，不为现政权的民主程度背书；或者防止“更重要”的问题被“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掩盖。反对运动也可以用抵制选举使当选政府失去合法性，使其更加

容易遭到各种后续手段（包括游击战）的抵抗。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¹⁴⁸为了平息政治上的不满，将一部宪法付诸公民投票——该宪法宣布，紧急状态结束之后，法国人民可以重新选择政府形式——百分之七十五的公民拒绝投票。在后来举行的选举中，法国人民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798 年果月¹⁴⁹选举成为一场闹剧。实际上，所有温和派都放弃了投票。如果督政官¹⁵⁰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投票又有什么用呢？”

1905 年，俄罗斯沙皇发表宣言（包含有限扩大芬兰地方自治权的措施）之后，芬兰社会民主党提出召开制宪议会，并且抵制芬兰新的国会选举。1906 年 1 月，俄罗斯社会革命党召开会议，要求追随者抵制杜马选举，但追随者中的多数人还是在杜马选举中投了票。

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多年来一直抵制选举，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控制该岛并操纵了选举。

1961 年 11 月，葡萄牙反对派退出了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并且敦促公民不要投票，以免给选举戴上公平的假面具。1962 年 4 月，非洲乌干达境内安科拉、布尼奥罗、托罗和布乔加的统治者都威胁要抵制乌干达选举，目的是让自己的领土获得完全的联邦地位。在同一个月，非洲中非联邦所有主要反对派政党也都抵制选举，这是抵制中非联邦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最终成功地使中非联邦解体。1962 年 4 月，萨尔瓦多的反对派政党拒绝参加总统选举，因为 1961 年政府推举的候选人赢得了所有席位的选举涉嫌舞弊。

1966 年 8 月中旬，南越佛教领导人号召其追随者不要在 9 月 11 日的制宪会议选举

148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派的政治团体。主要领导人有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圣茹斯特等。——译者注

149 又称果实月，是法国共和历第十二个月。相当于公历 8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法国共和国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采用，目的在于割断历法与宗教的联系，排除天主教在民众生活中的影响。——译者注

150 1795 年 8 月法国热月党控制的国民公会颁布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立法机构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元老院，由二百五十人组成，下院称五百人院，由五百人组成。根据五百人院提名，元老院选举五名督政官组成督政府。督政官在 1795 年 11 月 2 日至 1799 年 10 月 25 日法国大革命期间，是法国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译者注

中投票，抵制总理阮高祺企图利用选举“组建为外国利益服务的独裁政权”。

1959 年，英国大选期间的选民否决运动是这种方法的变体。在这场运动中，人们不反对任何被提名的候选人，也不反对选举，但是拒绝支持任何没有声明将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无条件单边核裁军的候选人。这实际上意味着选民抵制多数选区的候选人。

125. 抵制政府工作和职位

指人们拒绝从事某些工作或者担任某些职位以支持政府。人们或者辞去现有职位，或者拒绝接受新职位——可以是所有的职位（比如独裁政权或者外国占领政权中的职位），也可以是与某个引起反对的政策有关的特殊职位。抵制政府工作和职位通常比罢工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遭到抵制的职位范围可以很广，从最基层的公务员一直到各政府部门负责人。

这一方法导致人们停止向政府提供服务、技能和其他支持的程度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有时候，辞职或者拒绝提供支持的行动会逐渐扩大到所有部门和层级，这种行动也可能是某个共同抵抗战略的结果。但这种方法与罢工不同，罢工一般是为了满足特定的要求而短期（或者暂时）停止劳动，而不是自愿放弃对手提供的工作。抵制政府工作和职位不是在被政府雇佣期间有条件地或者暂时地停止活动，而是辞去或者拒绝接受政府的工作。这种不合作是长期的——可能是永久的，可能有关政权或者政策存在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也可能在某场特定的抵抗运动期间持续几个月。

这种方法可以由个人进行，可以考虑政治后果，也可以不考虑政治后果——只是单纯的为了让自己与不道德的体制脱离关系。但是，如果把这种政治不合作当作一种共同的抵抗战略，目标就应该是减少愿意执行政策或者支持残暴的政权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因此，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采取行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才能、技能、职位或者影响。

这一方法的案例相当广泛。1861 年，匈牙利人拒绝向奥地利统治者缴税，当奥地利当局没收货物充当税收的时候，匈牙利的拍卖商拒绝出售没收的货物。1920 年 12 月 9 日，苏联水运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反对政府的方法是从联合中央运输委员会

辞职。

纳粹德国发生过一系列个人辞职、威胁辞职和不成功的辞职行为，目的是反对希特勒的某项政策、行为，或者不再继续承担特别令人不快的职责。采取这一行动的既有下级官员，又有著名高官。非洲殖民地也曾计划大规模使用这种方法。1962年8月31日，作为瓦解中非联邦总体战略的一部分，统一国家独立党主席肯尼思·卡翁达（后来成为赞比亚总统）号召北罗德西亚一万一千名联邦政府雇员辞职。但后来形势变化，不再需要继续执行这一总体战略。

由于政治理由辞职，特别是为了抗议政府对大学的干涉而辞职的事件也发生在政府资助的大学。例如，1911年，莫斯科大学大约一百名教授和雇员辞职，抗议教育部部长逼迫校长和副校长辞职。1963年，越南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四十七名顺化大学教职员辞职，抗议校长高文伦被免职。高文伦校长也是一名支持佛教徒的天主教神父。

有些时候，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会因为反对政府的某一行为或者某一政策而全体辞职。例如，1770年，因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禁止十三个高等法院监督政府其他分支的工作，巴黎高等法院全体成员辞职，随后国王路易十五下令对他们进行镇压。1942年2月至4月，纳粹占领期间，挪威的主教、教长和牧师纷纷辞去国家教会的职务，抗议挪威宪法遭到侵犯和教会遭到政府干涉。但他们继续担任圣职和履行牧师职责——这实际上是政教分离，使教会成为独立机构。

因为反对政府的政策，高级官员和部长都可能辞去职务，新的候选人也可能拒绝接受任命。1560年代，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就有这样的先例。当时，奥兰治亲王¹⁵¹、埃格蒙特伯爵¹⁵²和荷恩伯爵两次退出国务委员会，迫使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纠正各种令人不满的政策。1943年8月9日，丹麦首相埃里克·史卡维尼斯发表声明说，如果德国占领当局要求丹麦法院审判反德罢工和骚乱后被逮捕的人，他将辞去职务。8月28日，在镇压和抵抗愈演愈烈的政治背景下，埃里克·史卡

151 领导荷兰起义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主要领导者，曾任荷兰共和国第一任执政。——译者注

152 荷兰政治家和军事家，荷兰反对西班牙侵略政策的早期领导人。——译者注

维尼斯和他领导的政府集体辞职。独立前的肯尼亚立法会非洲议员也曾拒绝担任部长职务，尤其是在 1960 年 3 月反对英国强加的伦诺克斯-博伊德宪法期间。1963 年夏天，越南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双双辞职，以支持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甘地多次呼吁政府工作人员辞去职位，无论是乡村的村长还是首都的高级官员。1930 年至 1931 年的非暴力斗争期间，许多印度人辞去政府职位。有一个计划通过普遍辞职推翻政权但未能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可以代替政变和弑君的方法，因此值得探讨。1938 年，德国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担心爆发欧洲全面战争，因而反对德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贝克不仅自己决定辞职，还希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在陆军最高指挥部全体会议上呼吁将军们集体辞职，并带头反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在得到布劳希奇的支持后（这至关重要），贝克还说服其他高级指挥官和联合政府中的保守派成员（经济部长沙赫特、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财政部长科洛希克和司法部长居特纳）集体辞职。贝克辞职了，但是布劳希奇未履行他的承诺。

126. 抵制政府部门、机关和其他机构

反对运动在拒绝承认政府的合法性，或者拒绝支持政府某个具体政策的时候，可以拒绝与所有的政府部门合作，也可以拒绝与某个引起反对的具体政策的政府机构合作。进行这种政治不合作有时会给行动者带来经济损失。这种抵制可能是拒绝新的合作，也可能是中断现有的合作，还有可能涉及拒绝接受政府的贷款和资助款等。

这种方法常常被运用于反抗殖民统治。1919 年，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¹⁵³前往埃及，准备为英国殖民地埃及制定宪法时遭遇了完全抵制。米尔纳爵士在埃及停留了三个月，没有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埃及人愿意与他交谈。1928 年，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对来访的英国议会西蒙调查团进行了完全抵制。西蒙调查团访问印度的目的，是就印度的未来地位提出建议，但调查团成员中没有印度人，所以印度人拒绝与该调查团合作。“回去吧，西蒙！”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在印度不合作运动期间，印度

153 英国政治家和埃及殖民地行政官，在 1890 年代中期至 1920 年代初期对制定英国外交和国内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民族主义者敦促律师和当事人抵制英国法院，鼓励私人仲裁——包括乡村五人长老会等解决民事争端的替代机构。

1950年代初，英国人首次提出中非联邦（又称为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这个概念的时候，其组成领土上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就发动了不合作运动。虽然不合作运动没有阻止中非联邦的建立，但是却最终导致了中非联邦的解体。这场反对中非联盟的不合作运动，为这一方法提供了三个案例：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的非洲人拒绝参加1952年4月和5月在伦敦召开的拟定中非联邦计划的会议，也拒绝参加1953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最终确定中非联邦计划的会议。1960年，英国蒙克顿委员会访问中非联邦，收集相关信息，准备为审议中非联邦宪法提供建议时，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各个非洲政治组织拒绝在该委员会作证，对该委员会进行了有效的抵制。

这一方法被广泛用于各种政治背景下，包括发动政治革命、抵抗外国占领、开展游击斗争和抵抗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1905年，俄罗斯革命期间，格鲁吉亚库塔伊西省的孟什维克¹⁵⁴组织了一场针对俄罗斯行政当局、法院和学校成功抵制。德国鲁尔抗争期间，尽管食品严重短缺，德国人仍然拒绝使用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当局建立的施粥所和商店。1964年9月至11月，越南广南省佛教徒多次拒绝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¹⁵⁵合作，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最终只好放弃了与他们合作的计划。

这种抵制方式的另一个案例发生在纳粹德国。1935年，纳粹党创立的德意志劳工阵线企图对各商业组织进行全面控制。6月13日，德意志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颁布法令，组建国家劳工工会和十八个地区劳工工会，目的是建立从属于纳粹党的产业工会，控制私人企业。莱伊命令所有产业的员工都要加入劳工工会成为个人会员，还要求战争部部长派遣官员出席地区劳工工会会议。但是，许多商业组织对劳工工会进行了抵制。抵制非常成功，导致德意志劳工阵线对私人企业进行有效控制的企图失败了。

154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别。孟什维克是俄语少数派的音意，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俄语多数派的音译。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信奉社会主义。但布尔什维克执行列宁路线，孟什维克则反对列宁路线。1917年10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颁布法令，称孟什维克为非法组织，大部分孟什维克高级干部逃亡海外。——译者注

155 又称越共，是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劳动党在南越成立的反抗南越政权的统一战线。——译者注

1970年7月，美国众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要求一百七十七所大学向其提供左翼演讲者和主办者的姓名，演讲的报酬和资金来源等信息，这一要求遭到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拒绝。塔夫茨大学副校长约翰·希茨发表声明：

这一要求让我们立即产生了严重和不祥的联想，它涉及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其它自由权利，大学在传统上一直享有和保护这些自由权利。为了防止这些我们所有人都深深关切的自由遭到可能的侵犯，塔夫茨大学选择不对委员会的要求作出答复。

查尔斯·惠特洛克则代表哈佛大学做出了比较温和的回复，他说哈佛大学没有学生组织邀请来校园演讲者的信息。《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社论，将这些不合作称为“支持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新风”。

这种政治抵制方法有时也用于各种非政府国际组织。例如，1966年6月22日，发生了一起针对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短暂抵制——在讨论有关成员国政府履行国际劳工组织义务的委员会报告时，非洲代表退出了会场，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也跟着退出了会场。这些非洲和其它国家的代表之所以退出会场，是为了抗议葡萄牙拒绝承认非洲殖民地独立，反对葡萄牙在非洲强迫当地人服劳役。同一天，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代表团则宣布，结束对国际劳工组织的抵制，继续出席6月23日该机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此前，劳联-产联抵制了三个星期的会议，抗议国际劳工组织年会选举一名来自波兰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成员首次当选。

127. 退出政府教育机构

在抵抗政府的大规模反对运动期间，儿童和青少年永久或者无限期从政府所有的或政府控制的学校退学也是一种政治不合作方法。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就曾经使用过这一方法。退出政府教育机构可能产生四重效果：1)为建立和发展独立于当局的“民族”学校和学院做贡献；2)抵制当局和教育界效忠现有体制的影响，防止他们给学生灌输忠于现政权的思想；3)给抵抗运动提供年轻的生力军；4)为从整体上打破现状，提高不与政府合作的全面性做贡献。1954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民众，

只要南非政府仍然实施种族隔离的《班图教育法》，就要对教育机构进行抵制——这意味着无限期抵制。

128. 抵制政府支持的组织

这种政治不合作的表达方式是拒绝参加或者决定退出那些依附于政府的组织。1942年，挪威的教师拒绝参加吉斯林政权新组建的教师组织，该组织是国家给儿童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在吉斯林政权推进国家总体计划，企图控制挪威原有的各种民间组织时，大量成员退出了这些组织。据估计，仅1941年夏天，退会人数就占各组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1953年6月，东德起义被镇压后，东德工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制——集体拒绝向政府控制的工会缴纳会费。

129. 拒绝帮助执法人员

有些地方的民众对犯罪分子怀有同情或者恐惧心理，他们会拒绝向警方提供犯罪信息，或者拒绝透露通缉犯的行踪。同样，生活在外国占领下或者国内独裁统治下的普通民众，也可以拒绝向警方提供政治抵抗者和爱国抵抗者的信息。这也是一种政治不合作方法。

北美殖民地人民经常拒绝告发各种因破坏英国财产或者抵抗英国政府而遭到通缉的人。其中有两个著名的案例。1771年底，一群戴假面具的人夺取了一艘在下特拉华被海关巡逻艇没收了货物的船只，尽管副总督理查德·潘悬赏二百英镑捉拿罪犯，但没有任何人提供相关信息。1772年6月8日，海关巡逻艇加斯佩号在罗德岛水域搁浅，一群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公民登上巡逻艇，打伤了指挥官，制服了船员，烧毁了巡逻艇。尽管殖民地当局发出公告，提供大笔赏金，还成立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但“罪犯”却“受到公民同胞和殖民地政府的充分保护，调查委员会无法获得任何对他们不利的证据”。

这一方法也包括拒绝提供其他类型的帮助。例如，作家琼·邦杜兰特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1928年，印度巴尔多利镇开展拒绝纳税运动期间：

农民们见到收税员就关上大门，或者对收税员大声朗读帕特尔演讲中的内容，用辩论来说明他们不应缴税。在警察准备上门搬走生产工具抵税的时候，农

民会把工具拆掉，把零件藏在不同的地方。

1881 年夏天，爱尔兰的佃农采取各种行动，不给没收佃农财产用于支付欠租的政府执法人员提供帮助。一位目击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午饭以后，执行吏在大量武力的保护下，再次动身前往默南农场，准备没收那里的财产充当到期租金。我们到达那个看来还值点钱的农场时，发现一头牲口都看不到。事实上，所有能够移动的东西都被转移了。

执行吏和他的手下不得不空手离开。但是几天后，他们在佃农意料不到的时候再次回到农场，这次，他们没收了没来得及转移走的牲口。

1964 年 1 月至 2 月，爱尔兰的吉普赛人带着马匹和大篷车在都柏林市郊扎营时遭到当局驱逐，他们的抵抗方式是拒绝把马套到大篷车上，执法人员只好用手把每辆大篷车拖走。

有时候，被逮捕的人也会在被逮捕时采用“全身无力”的方法拒绝与执法人员配合。马丁·奥本海默和乔治·莱基¹⁵⁶这样定义这种行为：

“全身无力”就是词语的字面意思。即以的一种身体不合作的方式完全放松，执法人员只能把不合作者拖到或者搬到当局想让他们去的地方。采用这种方法时行动者可以把手放进口袋里，在暴力攻击下可以改为弯下身子（就像踢足球那样），用胳膊遮住头部和其他敏感部位。

130. 移走指示牌和地标

移走、修改或者更换门牌号码、路标、地标、火车站标志、高速公路上的方向和距离标志等，可以暂时性误导、阻碍或者耽搁外国军队和警察的行动。这种拖住对手的行动在军队或者警察对有关地区不太熟悉，街道布局错综复杂，或者民众拒绝提供准确方向的地方最有可能产生效果。这种方法的潜在用途是拖住政治警察，让被通缉的人有时间逃亡，或者让抵抗运动总部或者设备有时间转移。在有些案例中，通过这种方法赢得的时间可能很少，但是可以给占领军和抵抗民众造成心理影响。

156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作家和活动家。他创立并领导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正义与和平运动。——译者注

1968年8月23日星期五下午五点二十五分，苏军占领布拉格的第三天，捷克斯洛伐克电台报道说，预计晚间将会发生逮捕事件，呼吁人们将路标和家门口的门牌涂掉或者摘除，重画全国高速公路上的方向标志。事实上，在前一天晚上这一行动就已经开始了。许多路标被涂掉，主要高速公路上的方向标志也被修改。星期五下午，布拉格到处都是传单，这些传单敦促人们摘掉或者涂掉路标以及重要的办公地点和工厂的标志。据《工作报》报道：“这一呼吁带来了闪电般的行动，布拉格街道立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据《人民民主报》报道，有数十万民众参加了这一行动：

布拉格的姓名和号码消失了。为了不请自来的“客人”，布拉格已经变成了一座匿名城市。任何不是在这里出生和长期生活的人，都会在一百万居民中迷失方向。让我们跟随这句口号：邮差能找到你，作恶者不能！布拉格和其他向布拉格学习的城市万岁！

据共产党报纸《红色权利报》报道，许多小男孩参加了摘掉或者涂掉路标和指示牌的行动，“以确保入侵者找不到全城的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严密监视的列车》（拍摄于苏联入侵前很多年）反映的是纳粹占领期间人们修改火车站的站名产生的破坏作用。这一行动与铁路工人的破坏活动相结合，可以让某些列火车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晚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131. 拒绝接受委派的官员

政府单位有时会拒绝接受被委派到本单位任职的官员。在下面的案例中，人们说服了被委派的官员立即离开。如果被委派的官员不肯离开，可以拒绝承认该官员担任的职务；如果该官员履行职务，可以拒绝与他合作。这个案例来自一名西方传教士的报告：1940年代，中国湖北省平房镇，当地百姓反对该镇被任命的新的地方官，因为这名地方官在他之前管理的另一个地区以腐败和专横著称。该镇选派代表去向湖北省总督反映当地百姓的意见，但未能使总督撤销这一任命。

之后，代表们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大会。会议决定，不允许新的地方官就职，要文明地把他赶出去……

新上任的官员刚一进入公堂，该镇的市民代表就来请见。代表们跪下，其中

一个人走上前，彬彬有礼地向他宣布，我们代表本镇全体市民请求你立即离开，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本镇不接受你。

地方官先是努力安抚造反的市民，然后是威胁，但都徒劳无益。代表们非常平静地告诉他，我们不是来讨论问题的，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你不能在本镇过夜。本镇会给你提供旅费，还会提供护卫，安全地将你护送回去。

在门外喧闹的人群鼓动下，这名官员让步了，他在该镇代表的护送下离开了。随后代表们再次去见总督，并递交了平房镇所有人签名的请愿书。总督读了请愿书之后表示，百姓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应该听取。

132. 拒绝解散现有机构

当政府企图消灭独立机构，以便更好地控制民众，打击特定的反对运动，或者企图根据某些意识形态重建社会的时候，政治组织、教育组织、劳工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许多类型的组织可以拒绝解散。然后公开或者秘密地继续运转，尽可能让更多的正常活动继续下去，集体抵抗以摧毁政府的企图。广泛保存独立机构，也是抵抗企图控制社会的外国占领者的重要方法。拒绝解散独立机构，可以和前面介绍的抵制政府支持的组织相结合。在利用非暴力行动捍卫合法政府和社会机构时，这两种方法也都可以使用。

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亲王错误地把德皇威廉二世遭遇的两次行刺未遂事件与社会民主党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借口，说服议会在 1878 年 10 月 19 日通过了

《反社会党人法》。根据该法，政府在八个月内解散了许多工会、协会和合作社，禁止了大量出版物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集会，监禁和驱逐了社会民主党人，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组织。警方还对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人进行各种形式的骚扰。三年后，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开展抵抗，再次开始秘密集会，传播从瑞士偷运进来的报刊，组织和提名候选人参加选举。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埃利斯·巴克写道：

“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付社会民主党，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付社会民主党，所以在 1881 年后的每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都显著增加。” 1890 年，俾斯麦被德皇免职，《反社会党人法》被撤销，社会民

主党的选票从 1878 年的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上升到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巴克指出：“《反社会党人法》及其各种实施手段的效果与俾斯麦的期望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变得更加有影响力了。”

（三）除了服从之外，公民还有哪些选择

133. 勉强缓慢的服从

反对政权或者反对具体政策的民众在感觉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无条件抵抗时，可以在某些时候尽量推迟服从，最后以明显缺乏热情和不严谨的姿态服从。这种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阻止政权执行他们的政策，但是执行的速度会变慢，执行能力会受到某些限制。例如，1952 年 7 月，东德首位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宣布所谓的农业自愿集体化计划后，农民反对的方式是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西方，普遍拒绝加入新的集体农庄。“党代表在各村举行集体农庄成立大会时参加者寥寥，党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常常被农民的喊声打断，有时还被农民驱赶。”有一个村庄的村长和村委书记都拒绝加入合作社。虽然四个月后有二千个集体农庄建立起来，六个月后集体农庄达到五千个，但政府的计划还是没能按期完成。

这种方法也经常被用于抗税。但在抗税的案例中，人们使用这种方法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在公元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士绅阶层经常故意推迟向政府缴纳地租和米贡作为税收，或者用潮湿不洁的米代替干燥清洁的米，或者缴纳的米少于所要求的数量，甚至把米倒在粮仓外面表示抗议。有时候，管理粮仓的官员或者办事员一句问话，就可能激怒农民拒绝缴纳税米贡，或者向地方官投诉。

1943 年 10 月 14 日，被关在波兰索比堡集中营的犹太囚犯暴动并逃出集中营。当天晚上，德国军官通过铁路电报系统发出紧急通知：“**立即派军队增援追捕逃犯。**”海乌姆火车站一名年轻的女电报员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封电报扣留了四个多小时才交给德国官员。

134. 阳奉阴违的服从

另一种政治不合作方法是民众在没有直接监督或者执法的情况下，不服从法律、法

令和规章。例如，有士兵在附近监督某个命令是否得到执行时，民众就服从，只要士兵一离开，人们就恢复不服从。在中国，这种方法常常被用于对付不受欢迎的政权和外国侵略者。但是这种行为很少有文献记载。

135. 民众不服从

指普通民众或者一部分民众有意无视法律或者违反法律，但还没有发展到公民不服从的程度，这样的案例很多。民众不服从可能缺少各种公民不服从的一个或者几个特征。例如，人们并不认为他们不服从的法律是不正当的。这种方法主要是无视或者不理睬法律，而不是公然反抗法律，抵抗者不张扬自己的不服从行为。这种不服从行为可能是公开的或者不加掩饰的，但抵抗者不会大肆宣扬，以便能够继续参与大规模抵抗运动而不致于遭到惩罚。这一方法会被许多人采用，采用的形式通常是不引人注目地无视有关法律，就像这些法律不存在那样。

1686 年，挪威-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准备把位于挪威的克里斯蒂安桑建成一座主要城市。由于里瑟尔、阿伦达尔、曼达尔和弗莱克菲尤尔等沿海地区的居民拒绝服从在六个月内搬到克里斯蒂安桑去的命令（以严厉惩罚相威胁），这一规划遭到部分挫败，“居民继续安静地生活在兴旺发达的各个沿海城市”。1789 年秋末，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个恢复谷物自由贸易的法令颁布后无人服从。1792 年 6 月 20 日，巴黎人违抗示威禁令，在议会前集会，庆祝网球厅宣言¹⁵⁷发表三周年，然后闯入杜乐丽花园，找到国王路易十六，对他进行咒骂和威胁。

1848 年 6 月，法国临时政府撤销了国家工场，准备把其中一些工人送回农村，以避免欧洲革命蔓延到法国，但是，工人们拒绝离开。“6 月 22 日，工人列队行军穿过巴黎城，用单调的声音有节奏地吟唱：‘我们不要被送走，我们不要被送走……’”几天后工人遭到镇压。¹⁵⁸1905 年，俄罗斯革命期间，许多人采取了民众

157 1789 年 6 月 20 日，法国三级会议的五百七十六名第三等级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签署的宣言。因其签署地点在法国巴黎皇家网球厅而得名。网球厅宣言通常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标志。——译者注

158 1848 年，法国发动二月革命，巴黎人民推翻了七月王朝，但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果实，成立了临时政府，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设立国家工场，收容失业工人，驱使他们从事铺路、挖土等劳动，只付给低微的工资，还借口供养国家工场的工人而向农民增税，挑拨农民同工人的关系。与此同时，临时政府在流氓无产者中间组织别动队，对付巴黎工人。等到这些阴谋策划就

不服从的直接行动，获得了事实上的新闻自由——人们无视新闻审查条例，报纸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有着激烈政治观点的新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工会也无视禁令公开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许多民众不服从的案例。例如，荷兰民众拒绝服从德国占领当局关于上交金属硬币的命令和收听英国广播的禁令。1944年6月，丹麦哥本哈根几个地区发生了罢工，德国占领军宣布宵禁，但是民众无视宵禁令。1942年11月，被驱逐出比利时的部分犹太人从衣服上摘下纳粹要求他们佩戴的代表犹太人身份的黄星。1942年6月，法国出现了各种不服从佩戴黄星的行动：

有些犹太人不佩戴黄星，另一些人用错误的方式佩戴。还有些人佩戴好几个黄星。有些犹太人给自己的黄星加上额外的文字。还有许多非犹太人也佩戴黄星或者看起来像黄星的东西，表示对犹太人的支持。德国占领军愤怒地逮捕了某些违法的犹太人和支持他们的法国人，把他们关进了集中营。

1950年至1958年，中国禁止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地区的法规也经常被“那些想要离开农村的农民集体无视”。

136. 带伪装的不服从

人们在不服从法律、法规和命令的时候，还可以让不服从有服从的假相。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废除《印花税法案》的不合作运动期间，商人和承运商公然拒绝给运输文件贴上法律要求的印花税票。1765年11月1日《印花税法案》生效之后，商埠普遍停止运营。但是在费城，人们使用了一种更巧妙的不服从方法，让船只继续通行几个星期，没有贴讨厌的印花税票：

在殖民地各个港口，11月1日之前商船都开走了。但在费城港口，10月的最后几天，无论商船载货多少都得到了出港许可证，虽然整批货物申报之前是不允许放行的。由于一艘商船装完货物一般要三至四个星期的时间，因此，直到11月底，费城港口的商船都在不贴印花税票的情况下离开了港口。

绪后，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国家工场。6月22日，愤怒的国家工场工人进行游行示威，爆发了六月起义。23日起，激烈的巷战持续了四天。最后，六倍于起义工人的政府军队和别动队镇压了起义。——译者注

被查封的报纸也可以采取一种经过伪装的不服从——迅速换一个新名字重新出版。在德国鲁尔抗争期间，被禁止出版的报纸甚至会使用其他没有被禁止出版的报纸的名字继续出版。1905年，俄罗斯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例。1929年春末，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印度加尔各答《前进报》出版，随后出现了《新前进报》，《新前进报》被查禁后，又出现了《自由报》。

理查德·福克曾经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美国传到德国的爵士乐遭到纳粹禁止，演奏爵士乐的乐手遭到盖世太保追捕。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爵士乐迷就给美国爵士乐曲改个毫不相干的德国标题。于是，《电子琴大师摇摆乐》变成了《后院宫廷音乐会》，《老虎拉格泰姆》变成了《黑豹》，《黑人扭摆舞》变成了《黑土》，《端庄淑女》变成了《德国淑女》。德国爵士乐迷朱塔·希普回忆说：“我们演奏美国乐曲，但纳粹要求我们提供曲目单，我们就把曲目单翻译成德语……我们用最傻的方法翻译，因为我们认为禁止美国音乐的想法很傻。纳粹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他们听了我们的演奏还鼓掌，我们在心里偷笑。”德国国防军乐团甚至还演奏了其中一首曲子！

纳粹德国的一些年轻人不愿应征入伍，但他们也不想进行直接抵抗，于是就把健康不佳当作免除兵役的“标准手段”。年轻人可以从“早安大夫”（他们迎接病人时说“早安”而不是说“希特勒万岁”）那里获得健康不佳证明。霍斯特·李普曼就是一位这样的年轻人，他也是一位爵士乐迷。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当检查员到访他家时，他就装出一脸生病的样子。他因此不能离开自家附近的街道（因为健康不佳的年轻人无法获得通行证）。后来霍斯特·李普曼因为参加爵士乐活动被逮捕，他父亲请医生向盖世太保证明他身体太弱，承受不了入狱服刑。他因此获释。

中国也有此类不合作案例的间接证据。例如，1814年，中国皇帝颁发的敕令中有这样的记载：省级官员和地方官员（特别是那些负责管理户籍的官员）履行官方职责时疏忽大意已经成为常态。“官员们表面服从，实际上不理睬皇帝的命令……用敷衍的态度应对职责的要求。”

1930年代，日本占领当局在中国北方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希望该委员会能够成为他们经济发展计划的政治工具）。但是中国政府把该委员会当作自己和

日本占领当局之间的缓冲器。当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经济要求时，中国人不是简单地拒绝，而是采用谈判和拖延的手段：

当日本占领当局下令给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将军的时候，他不是直接抗命，而是回到家乡“去给祖先扫墓”。这种策略让日本人十分恼火，他们很快意识到，作为政治工具，冀察政务委员会达不到他们建立的初衷。

1942 年，重庆政府关闭了冰淇淋店和咖啡馆，禁止出售咖啡和汽水，得到的效果也是带伪装的不服从：

非常昂贵的星星咖啡馆改名为星星厨房重新开业。碟子、黄油板、水杯、刀叉和勺子都摆上桌子之后才上冰激凌，看上去像是吃完正餐之后吃甜食的样子。汽水装在汤盘里用汤勺喝。

中国士兵也学会了用类似的方法对待命令。1940 年 12 月，格雷厄姆·佩克在重庆观察到：

一队身穿衣衫褴褛的灰色棉布军装和草鞋的士兵正往山上“慢跑”，严格来说，他们是假装在“慢跑”，因为他们前进的速度一点也不比提着重物的家庭主妇更快。他们就像中国的所有士兵一样，喊着数字保持步调一致：“一、二、三……四！”军官叫他们快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按节拍喊得越来越快，但脚步的速度还和之前一样慢。

137. 拒绝解散集会和会议

拒绝官方或者非官方解散会议和集会的要求也是一种表达政治不合作的方法。这一方法有时会与民众不服从或者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紧密相连，但也并不总是如此。

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进行非暴力斗争期间，城镇会议和公众集会都曾经违抗总督和其他官员下达的解散令。其中一个案例描述了副总督哈钦森如何长期扰乱波士顿城镇会议和商人的活动。1770 年 1 月，副总督哈钦森派治安官到商人正在开会的法尼尔会议大厦宣读他的命令，“根据法律的权威，或者打着法律的幌子”指控会议是非法的，谴责商人会议是危险的和助长恐怖行为的，并且命令他们立即解散，“今

后不准再进行此类非法集会……”。商人们暂停了会议，通过投票一致认为会议合法，然后继续开会。

1789年6月23日，反对国王和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路易十六向三级会议代表发表演说后命令代表们休会。“国王退场的时候，贵族代表和大多数教士代表也跟着退场，但是平民代表依然沉默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平民代表表示，他们决定不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休会，而且“……没有人能够对聚集起来的国民发号施令”。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1848年5月15日，法国议会遭到入侵，入侵者企图迫使议会立即宣布支持波兰。议会在拒绝接受入侵者要求的同时，既没有休会，也没有把入侵者赶走。经历了这一幕的亚历西斯·托克维尔¹⁵⁹写道：“发生骚乱的整整四个小时里，议员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席位上，既不抵抗也不退让，沉默但坚定。”因为，投票赞成入侵者的要求会让议会显得软弱无能，投票反对它则会让议员们面临生命危险。“这种消极抵抗激怒了入侵者，狂怒就像从一个冰冷、平滑的表面掠过，不知该抓住什么……”最后入侵者大喊：“我们无法让他们投票！”一阵混乱之后，传来军队马上就要赶到的消息，入侵者宣布议会休会然后就撤离了。

在匈牙利新教徒反对奥地利宗教法和拒绝奥地利帝国控制的斗争中，跨蒂萨河教区的加尔文教派发挥了重要作用。1860年1月11日，加尔文教派委员会违抗政府的命令，在德布勒森市召开会议，五百名教会神职人员和成千上万名教徒出席了会议。教会历史学家伊姆雷·列维斯描述了这一事件：

开场祷告刚结束，奥地利帝国政府的代表站起来要求会议解散。会议主席彼得·巴洛格副主教询问出席者是否希望解散，人群发出巨大的咆哮：“我们要举行会议！我们不要解散！”然后会议继续进行。帝国代表无法忍受成千上万只愤怒的眼睛鄙视地看着他，于是起身离开。没有人伤害他。

拒绝解散的会议不一定是正式会议，有可能是公众集会或者临时抗议集会。例如，

159 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国第二共和外交部长、众议院议员。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闻名于世。——译者注

1959年2月17日，非洲尼亚萨兰科塔科塔地区，大约一百五十名至二百名非洲人前往警察局，抗议前一天发生的十起逮捕事件，要求警方也逮捕他们。抗议者拒绝了当地行政专员对逮捕行动的解释和接待代表团的提议，也拒绝了解散的命令。

“然后，他们遭到警方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采用了拒绝解散方法的变体。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莫斯科机场准备回国的时候，发现代表团成员弗朗齐歇克·克里格尔“失踪了”——克里格尔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常务委员会的自由派成员，也是一名犹太人，苏联官员特别讨厌他——于是，其余的代表团成员也拒绝离境，直到苏联官员把克里格尔交出来，才和他一起飞回布拉格。

138. 静坐

静坐是一种不合作行动，静坐的时候，行动者确实实地坐在街上、路上、地上或者地板上，拒绝自愿离开。静坐的时间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静坐可以是自发的行动，也可以是事先做出的决定，作为对要求解散游行或者其他示威活动的命令的反应。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严肃的象征性抵抗行动，与公民不服从某些法律的行动相结合。静坐也可以用于阻断交通、阻挡坦克，或者阻止其他人从事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静坐就变成了一种非暴力干涉方法（非暴力拦截或者非暴力阻碍）。近年来，静坐有在更广泛范围使用的趋势。

1960年4月末，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超过五百名示威者抗议法国未经审讯、听证就拘留六千名北非人，他们游行到巴黎万塞讷分类中心（拘留阿拉伯人的收容中心之一），然后在该中心前面静坐。在第一名示威者被警察带走后，新的示威者马上替补进来。警察不断将人带走，替补者接连不断地赶来。5月底，抗议队伍再次游行到内政部，遭遇警察阻拦后，他们改道至香榭丽舍大道附近静坐。

1961年秋天，苏联宣布要试爆一枚五千万吨的核弹之后，三百名反对核实验的挪威人在奥斯陆苏联大使馆外静坐。1962年5月，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约一千名学生进行静坐，抗议教育部禁止他们举行学生日庆祝活动的决定。

1964年6月19日，大约五百名年轻的苏联艺术爱好者在莫斯科曼格画廊为一位有争议的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诺夫举办作品展开幕式。当苏联文化部宣布，原定的作品公开讨论环节延期的时候，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拒绝离开。他们坐在被停了电的画廊大厅的地板上，先是齐声鼓掌，然后自己召开了作品讨论会。讨论进行了三个小时，一直到讨论结束后人们才离开。1965年2月24日，马德里大学学生发起争取独立学生会的运动，他们首先进行了一场沉默进军，然后在警方设置的路障前静坐。

1903年至1931年，印度独立运动期间，静坐方法的变体至少出现在两个场合：

1930年5月15日，突袭达拉萨那食盐厂¹⁶⁰期间，非暴力行动者在诗人沙拉金尼·奈都的领导下向食盐仓库前进。一名警长拦住沙拉金尼·奈都，对她说：“我们要留在这里进行非暴力抵抗……你们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双方静坐对峙了二十八小时后，警方的耐心耗尽了，于是开始使用暴力手段进行镇压。几个星期之后的孟买，大约三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组成的游行队伍受到武装警察阻止后当街坐下，警方也坐下与他们对峙了数小时。支持者送来食物和水，晚上下雨的时候，支持者还送来了毯子，示威者把支持者送来的东西递给阻止他们的警察以表达善意。最后，警方让步了，游行队伍变成了一场欢欣鼓舞的午夜进军。

139. 不配合征兵令和驱逐令

反对政府进行的各种类型的征兵令和驱逐令，可以用拒绝按命令登记、报到，拒绝执行驱逐进行表达。（对手进行驱逐的动机可能是想减少该地区的人口，可能是想赶走政治异议人士，可能为了强迫劳动，也可能为了消灭“低端”人口。）这种不合作可以是民众不服从，也可以是公民不服从。此处单独列出，是因为这一方法的重点不在于不服从本身，而在于拒绝与征兵或者驱逐计划合作。这种不合作可能包括若干种具体行动，而不仅限于不服从。

不配合征兵令的案例有很多。例如，1820年至1825年，匈牙利发生过大规模拒绝

160 甘地领导的一次非暴力行动，直接目的是反抗英国殖民当局制定的《食盐税法》。1930年5月15日，数百名非暴力行动者向古吉拉特邦的达拉萨那盐厂进军，遭到英国士兵的暴力镇压。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舆论对印度独立运动的关注，并使英国统治印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译者注

配合奥地利强制征兵令的行动。芬兰人在争取从俄罗斯帝国获得自治的斗争中，也曾拒绝征兵令。1901年，在俄罗斯将征兵令强加给芬兰的时候，“牧师拒绝在村里宣布征兵令，法官和律师拒绝适用征兵令，被征入伍者拒绝服从征兵令”。为了让征兵不那么令人反感，沙皇下令每次征兵只将百分之一的应征者（抽签决定）送进军队。伊诺·朱蒂卡拉¹⁶¹指出：

尽管如此，1902年征兵期间，适龄青年中有三分之二——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达六分之五——拒绝报名……

在接下来的两次征兵中，抵抗没有那么成功，但仍然迫使俄罗斯放弃在芬兰继续征兵。虽然芬兰人从兵役中解脱出来，但他们仍然必须向帝国国库支付一小笔税款作为补偿。

因此，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没有芬兰士兵参战，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中也没有芬兰士兵参与镇压。

1913年，新西兰人普遍拒绝应征入伍，许多人因此被关进拘留营服刑。1930年，大约五万名十四岁至十八岁的青年男子拒绝参军。

这种不合作方法也被用于反对征召劳疫和为了灭绝人口而进行的驱逐。在纳粹统治时期，就有犹太人拒绝按命令登记以逃避驱逐的案例。1939年5月，比利时有大约八万五千名犹太人，但只有大约四万二千人按照命令登记。杰拉德·赖特林格¹⁶²把这一巨大人数差异归因于拒绝登记。1943年12月，雅典大约有八千名犹太人，在纳粹占领军的行政机构犹太居民委员会命令犹太人登记的时候，只有一千二百人听从了命令。1944年8月，波兰罗兹犹太人区的居民不配合德国人的驱逐命令，拒绝到当地火车站或者中央监狱报到。1944年11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市所有犹太人都接到命令，要他们去布拉迪斯拉发市政厅报到，以便把他们运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斯利德集中营，只有五十人服从了这一命令，至少有六千人仍然藏身在地堡中。荷兰人反对纳粹的时候也使用过这一方法，大量老兵没有按照

161 1950年至1974年，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历史学教授，是公元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译者注

162 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党卫军：一个民族的不在场证明》、《最后解决》等著作。——译者注

命令前往指定地点报到（为了把他们驱逐到德国拘留），还有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拒绝登记为纳粹工作。德国人似乎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逮捕这些学生。

140. 躲藏、逃亡和使用假身份

躲藏、逃亡和使用假身份通常不是非暴力行动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它们也不是抗议或者抵抗。它们通常反映了人们的恐惧，这种恐惧会破坏有效的非暴力行动。然而，在以下环境中，这类行动也可以构成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作为大规模镇压浪潮的一部分，政府企图逮捕、拘留、消灭特定人群。它也适用于被当作人质，或者为了报复、强迫劳动、服兵役而被当局征用的人。当然，奴隶逃亡也是抵抗奴隶制的一种方法。在特定环境下，抵抗运动成员也可能采用这些方法。

在内战前的美国，从南方逃亡和帮助从南方逃亡的奴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反抗奴隶制的方法。据美国作家卡尔顿·马比报道：内战前的美国，大约有十万名奴隶成功逃亡，尽管联邦《逃亡奴隶法》¹⁶³要求归还逃亡奴隶，但该法实施后逃亡的奴隶比以前更多。

作为政治不合作行动，这些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荷兰广泛应用。据德容博士的研究，使用这些方法的不仅有需要假身份的抵抗团体成员，还有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德国占领当局征用作为劳工的普通人。约有二万五千名荷兰犹太人曾经躲藏起来。躲藏起来的人还包括被征用到德国去劳动的大量人口，例如荷兰军人，拒绝宣誓效忠新政权的学生，以及德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工人。1944年夏天，有超过三十万人需要躲藏、假身份证、食物和配给卡。

一些荷兰人用躲藏起来的方法对抗纳粹，比如那些因为拒绝宣誓效忠政权而被征用到德国去劳动的学生。德国劳动营的条件极端恶劣，导致很多人死亡。学生们找到一条从德国返回荷兰的逃亡路线。在战争结束之前，多数人都逃回了荷兰。

这些方法也是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对抗纳粹的常用手段。1940年5月，德国军

163 1850年颁布的美国联邦法律。该法规定，各州司法机关及地方政府必须竭力协助奴隶主追捕逃亡奴隶。任何白人通过宣誓即可确定某个黑人为其逃亡奴隶。凡以任何方式阻挠追缉或者庇护逃亡奴隶者可处以一千美元以下罚金，或者六个月以下徒刑。——译者注

队入侵比利时，该国大约三分之一犹太人逃到了法国。1940 年底，未逃走的五万二千名犹太人中，德国占领军只成功驱逐了其中二万五千人到波兰等国的集中营。1942 年 9 月，德国外交部代表巴尔根报告说，驱逐工作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规模逃亡和躲藏。许多犹太人藏在比利时人家里，使用假的比利时身份证，或者逃往法国。1943 年 12 月，雅典有八千名犹太人，12 月 18 日命令他们登记的时候，有大约六千八百人躲藏起来，只有几百名躲藏者后来被发现。1941 年至 1942 年，柏林犹太青年抵抗团体鲍姆小组的主要活动就是为获得雅利安假身份证和外国护照（大多是伪造的）筹款，这些文件帮助犹太人逃亡，或者帮助他们躲藏在柏林市郊。华沙估计也有二万五千名犹太人使用假身份证冒充雅利安人。波兰裔美国作家尤里·苏尔描述了波兰人怎样给从特雷布林卡灭绝营逃出来的希姆夏·波利亚凯维奇提供假身份证，假身份证上显示的是化名斯坦尼斯拉夫·福禄培尔——一个德国血统的波兰人。据估计，那些年有数百名犹太人一直生活在斯洛伐克，或者躲藏起来，或者使用假身份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裔加拿大人抵抗征兵的方法是让年轻人躲藏起来，并拒绝透露他们的下落。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登记入伍者下落不明，还有其他很多人从未登记。

141. 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

公民不服从是指有意、公开、和平地违反由于某些理由而被认为不正当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军队条令、警察命令等等。公民不服从是最激烈的政治不合作方式之一，它表达了以下信条：有时候，人们有道德责任不服从“人制定的法律”而服从“更高的法律”。从苏格拉底开始，宗教或者政治团体的成员就已经体验到了一种忠诚的冲突，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违背自己的信念，服从现政府的法律，还是忠于自己更高的信念，不服从这种法律。

有时候，人们呼吁公民不服从，是因为他们相信某个特定的法律是不正当的，制定法律的机构或者个人无权制定这样的法律。例如，1766 年 2 月，北美殖民地地方法官和伯吉斯议会议员，同时也是弗吉尼亚著名律师的埃德蒙·彭德尔顿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爵士，说自己目前正在考虑，法院应该通过什么方式不服从《印花税

法案》。法院可以停止办理案件，造成不使用印花税票的结果，法院也可以正常办理案件，但是违抗法律拒绝使用印花税票。埃德蒙·彭德尔顿说：“他曾经发誓依法断案，既然他认为议会无权通过《印花税法案》，那么他就不能把《印花税法案》当作法律。同时他也感到，如果他因为《印花税法案》而停止办理案件，也有违自己的誓言。”

在更现代的社会，公民不服从理论因亨利·大卫·梭罗¹⁶⁴的行动和他著名的《论公民不服从》一书得以改进和普及。然而，将公民不服从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行动手段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甘地。甘地写道：“不服从要想是文明的，就必须是公开的和非暴力的。”也就是说，公民不服从被认为是文明和不服从相结合的产物。公民不服从行动一般是在穷尽其他方法都失败之后，人们似乎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或者人们必须决定自己更高的忠诚在何处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这种类型的公民不服从行动是基于这一信念：服从会让一个人的行为不道德或者不公正，或者成为非法行为的帮凶。1954年，帕维尔·赫斯特在波兰艺术与文化理事会（该理事会罢免了其秘书长耶日·普特拉门特——此人曾代表共产党对艺术文化实施严格控制）会议上对这一观点做出了生动的表述。他说：“如果普特拉门特命令我从窗户里跳出去，而我跳了，那我们都有罪。他有罪是因为下了命令，我有罪是因为服从了命令。”这句话在波兰广为流传。

作为一种政治不合作方法，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可以由个人、团体、组织，甚至政府机构实施。公民不服从的目标可以是改变有关政权现行政策中的某一特定方面，也可以是改变某个被认为不道德或者不公正的法律或者法规（改革性公民不服从）。公民不服从可以在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巨变中作为破坏、瘫痪或者瓦解残暴的、不公正的政权，并代之以新制度的手段（革命性公民不服从），也可以用于反对非法的新政权（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捍卫合法的政权或者秩序（防卫性公民不服从）。这些分类可以相互融合。

164 美国作家、诗人、哲学家、废奴主义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瓦尔登湖》和《论公民不服从》。《瓦尔登湖》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的隐逸生活，《论公民不服从》则讨论面对政府和强权的不义，公民主动拒绝遵守若干法律的必要性。——译者注

甘地把公民不服从当作一种摧毁不公正法律的有效方法。但他也认为，公民不服从的用途要比这个目标广泛得多。他说“完全的公民不服从是没有暴力的起义”。

甘地认为，公民不服从可以：1)用于纠正当下的错误；2)作为自我牺牲的手段，以唤起人民对某些特定错误的觉悟或者良知；3)关注某个特定的问题，为更大的政治斗争做贡献。甘地认为，公民不服从对于专制国家是危险的，对于愿意顺应舆论意愿的民主国家则是无害的。甘地还认为，公民不服从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压制它的尝试都是“企图把良心关进监狱”。

公民不服从的案例有很多。例如，公布英国议会的辩论报告，就是由公民不服从行动确立的。1660年英国上议院的命令和1661年下议院的命令都禁止公布议会的辩论报告。1723年，下议院重申了这一禁令，1760年，下议院加强了这一禁令。

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亨利·吉普森写道：1768年，约翰·阿尔蒙¹⁶⁵开始发表关于议会辩论的详细报道，许多日报和周报也开始步其后尘。这导致1771年初下议院起诉了八家报纸。《米德尔塞克斯杂志》的印刷商约翰·惠布尔和《方志》的印刷商罗杰·汤普森因公开违抗议会的命令而被捕之后，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同情这两位印刷商的地方法官（其中一位是约翰·威尔克斯）驳回了案件。随后，下议院把两名地方法官（同时也是议员）监禁在伦敦塔：

这一事件激怒了民众。民众不仅示威反对腓特烈·诺斯勋爵¹⁶⁶，还反对国王。最终，两名印刷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报纸继续发表议会的辩论报道。

虽然禁止报道议会活动的旧决议并未正式废除，但是1771年在民意的压力下，议会实际上“以不继续对印刷商提起诉讼”的方式许可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的存在。

北美殖民地商人如果只是采用停止各种需要印花税票的活动来拒绝执行《印花税法》，那么他们采取的就不是公民不服从行动。如果他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但违

165 英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以争取获得发表有关议会辩论的报道权而著称。——译者注

166 1770年至1782年担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是美国独立革命时期英方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抗法律不使用印花税票，他们采用的就是公民不服从行动。

政府机构也可以进行公民不服从行动。例如，1774年8月20日，马萨诸塞湾省塞勒姆市违抗总督盖奇的命令，举行了一场正式的城镇会议。马萨诸塞湾省众议院开会计划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时候，总督盖奇派信使到会场宣布会议休会，但是议员们拒绝打开大门，直到会议结束。总督的信使只好在门外宣读解散会议的公告。

在北卡罗来纳省，总督马丁宣布禁止镇和县举行“非法会议”（尤其是计划举行的全省会议）。“该禁令和其他各省关于人民的组织和行动权利的行政禁令一样无效。1774年8月25日，在纽伯恩召集了全省会议，总共三十八个县中有三十二个县派代表参加，总共六个镇中有二个镇派代表参加，总督和地方议会毫无办法。”

1875年，在俄罗斯帝国，基辅附近奇吉林地区的贫穷农民在农奴制废除之后进行了一次公民不服从行动。贫农反对富农企图将拥有的大片土地合法化（这些土地是富农在废除农奴制的时候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的）。贫农们想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尽管遭到了严酷的镇压、鞭打和监禁，但是贫农们并没有使用暴力夺取土地，而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按照沙皇的意愿行事，拒绝在官方地契上摁手印，有些人则拒绝缴纳地租”。贫农们的行动最终失败了，他们甚至失去了自己已有的小块土地。

1914年至1915年冬天，爱荷华州苏城的八十三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因为违反举行街头会议的限制令而入狱。许多人为了打破这一禁令从全国其他地方赶来。

1930年代，俄亥俄州托莱多汽车工人罢工期间，罢工者无视禁令“安静自愿地束手就擒，填满了所有警车和监狱，让监狱系统不堪重负”。

1930年至1931年，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公民不服从行动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违法制造和公开出售食盐，公开出售和阅读遭禁的煽动性文章，违抗游行和集会禁令，不服从条例和警察的命令，有选择地违反法律。1952年，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期间，有超过七千人因从事公民不服从行动而入狱。南非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主要针对通行证法和种族隔离法，特别是铁路上的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3月，南非泛非主义大会号召非洲人把自己的通行证留在家里，向附近的警察局自首（要完全

保持非暴力），从监狱获释后继续重复这一过程。

1965 年，美国许多以捕鱼为生的印第安人进行了一场公民不服从行动，反对华盛顿州自然保护署有关禁止捕鱼的规定。采用的方法是“捕鱼示威”，捍卫自己在祖传的地点捕鱼的权利。这些权利最初不受限制，甚至得到 1854 年美国政府与印地安人签署的《麦迪森溪条约》和后来签署的其他条约的承认。印地安人的公民不服从行动由各个部落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制定计划，目的还在于反击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梅尔·托姆说：“我们决定采取直接行动。我们决定向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证明，印第安人是有骨气的。”印地安人在 3 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带着小船和被禁止的渔网（但是没有捕鱼执照）出发，前往奎利特河捕鱼。成百上千名印第安人在岸边观看。研究美国原住民历史的斯坦·斯坦纳写道：“部落很小”，“人们从未做过如此大胆的事。没有执照在保留地捕鱼是违反《狩猎法》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反抗这项法律让渔猎管理人怒火中烧。”他们的行动一直持续到 1966 年。

捕鱼示威结束之前，几百名印第安人增加到几千名。六条河上都出现了捕鱼示威，有数十人被捕，印第安人在州议会大厦前举行了几千人参加的抗议集会。他们在议会大厦圆形大厅的台阶上跳战阵舞，城市街道上有“条约跋涉”，还有穿过普吉特海湾六十英里的“独木舟跋涉”。来自全国五十六个部落的一千多名印第安人举行了一场集会，声援自己的印地安兄弟。

几位著名的非印第安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其中包括电影明星马龙·白兰度，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还有旧金山恩典大教堂的牧师约翰·亚里安。

虽然偶尔出现了零星的暴力（比如妇女和儿童投掷石块，亚基马部落的年轻男子带着来福枪保卫部落的渔民），但是捕鱼示威行动主要是非暴力的。梅尔文·托姆¹⁶⁷将其称为“现代史上第一次部落直接行动”。

第一次捕鱼示威过去两年半之后，美国司法部在华盛顿州高等法院“代表被禁止行

167 美国原住民权利运动领导者，1960 年代国家印第安青年委员会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使条约中所规定的捕鱼权利的部落”出庭。1968 年，该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印地安部落败诉。斯坦·斯坦纳引用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印第安学生帕特里克·哈密尔顿的话，说明了这场诉讼结束之后印第安青年的心情：

过去十年我们证明了公民不服从的力量。醒来吧！先看看你们对我们做了些什么，然后再判定违抗几条捕鱼法是不是合情合理。

（四）政府工作人员的行动

142. 政府工作人员选择性拒绝执行命令

政府工作人员——行政人员、官员、特工、军官、警官等——可以个人或者集体拒绝执行特定的指令或者命令，并且将其拒绝的决定告知上级官员。拒绝是明确和公开的，至少对于上级官员是这样，这是这种方法与第 143 和第 144 种等更隐蔽的方法之间的区别。选择性拒绝执行命令的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向公众宣布，也可以不向公众宣布。

这里给出的案例都与纳粹德国有关。例如，1942 年 3 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抱怨说，每次他要求实施严厉的“正义”措施，司法部负责此类事务的副部长施里戈伯格“总是以行动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我们的司法部无法理解如此显而易见的措施，仍然墨守成规”。后来纳粹修改了法律，增加了对付政府工作人员拒绝执行命令的条款。

1938 年底，德国弗兰肯大区的纳粹党决定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他们强迫本大区的犹太人签署文件，把财产无偿转让给弗兰肯大区、菲尔特市和其他机构。然而，一些法官质疑这一程序的合法性，拒绝进行财产登记，使财产转让无法完成。

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有时也会直接拒绝希特勒的命令。例如，1941 年，希特勒在视察位于俄罗斯边界鲍里索夫的中央集团军群总部时，与高级将领在战略和用兵方面产生了巨大分歧——希特勒要把兵力集中到列宁格勒和乌克兰，而他的高级将领们则计划把兵力集中到莫斯科战役。当元首命令调动两支坦克部队（分别由霍斯和古德里安指挥）到列宁格勒和乌克兰时，他“撞上了一堵拒绝的墙”，拒绝的理由

是这两支坦克部队需要二至三周进行休整。这两支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得到了自己同事（包括战争部和中央集团军群）的支持，他们“建立了针对元首的统一战线。并且告诉元首：不是他们不想执行命令，而是无法执行命令……”

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对希特勒入侵丹麦和挪威的计划将带来的军事风险感到震惊，“他们不顾元首的愤怒，断然拒绝参与先期准备工作。入侵丹麦和挪威的计划完全是由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规划的……”

负责驱逐丹麦犹太人的德国军官没有自己的警察队伍，也无法获得丹麦人的帮助，他们在从德国获得警察编制（丹麦没有德国警察）后，要求德国占领军提供人员。但是德国占领军在丹麦的最高统帅赫尔曼·冯·汉纳肯将军拒绝为驱逐犹太人调动军队，也拒绝颁布命令让犹太人到德国国防军办公室报到，以便将他们运往集中营。赫尔曼·冯·汉纳肯将军同意合作的方法是提供五十名士兵，在把犹太人装上船的时候封锁港口，他说这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不是让军队驱逐犹太人。

143. 阻断信息的上传下达

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悄悄阻断命令的执行，阻断将上级的命令向下传达，或者阻断将下级的信息向上传达，就可以限制统治者的实际权力。统治集团中不同层级的成员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严重干扰政权处理各种问题和危机的能力。阻断的信息可能涉及经济、供应和舆论等。这种方法还可能涉及拒绝告发秘密抵抗组织、抵抗计划和抵抗行动。

在纳粹德国，这种阻断信息的做法甚至以非常极端的形式进行。被认为忠诚的高官对他们知道正在密谋策划推翻和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保持沉默，甚至掩护密谋者，正如约翰·惠勒-本尼特爵士¹⁶⁸描述的：

……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将军和乔治·托马斯将军等部门首长坦率地对政权表达不满，甚至密谋策划让政权垮台。在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即使没有参与，至少也意识到存在颠覆的计划和活动。随着战争推进，有关颠覆计划和活动的谈论与日俱增，但他们从

168 英国历史学家，他关于德国军队的研究在英国史学界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未向安全部门告发。

就连本土军总司令弗里茨·弗罗姆都没有告发自己的下级奥布里希和施陶芬贝格的阴谋活动，虽然弗罗姆本人并不想直接参与他们的阴谋。陆军元帅凯特尔认为，战争部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就得知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但没有报告。

阻断信息的方法之一是不把命令传达给下级，使命令无法执行。例如，1939 年，德国将军密谋阻止德国军队进攻西方同盟国并入侵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的计划。作为迈向和平的一步，他们必须采取相当程度的不合作行动。约翰·惠勒-本尼特爵士写道：“德国将军们表示，如果总司令沃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密谋策划的参与者之一）直接下达命令，破坏德国军队的进攻计划，他们就会参与其中，参与的方法是不把希特勒进攻的命令传达给下级。”

至 1940 年，纳粹党外国组织的工作人员仍然被反复要求提交证明他们是雅利安血统的文件。“办公室的多数工作人员无视提交文件的命令，甚至不为无视命令的行为找一个借口或者做出解释。”

1941 年 5 月，希特勒发出臭名昭著的《政委令》，命令处决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俘虏的共产党政治家和领导人，包括战俘。一些军官拒绝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下级，降低了这一命令的有效性。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陆军元帅威廉·冯·里布和上将埃里希·霍普纳，甚至拒绝发布这一命令。德国作家瓦尔特·格尔利茨认为，《政委令》只得到了部分执行，此后，在东线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它逐渐被悄悄放弃，到 1942 年，它已经不再有效了”。

这种不合作方法也可以采用无视实际接到的命令，既不服从，也不公然拒绝服从。这种命令被无视，是因为拒绝合作的人不支持，但是也不直接反对。据报道，1950 年至 1963 年，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各种企业资金控制松懈的一个原因是工厂的负责人无视多数财政政策，另一个原因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不支持收紧资金控制。

1942 年 9 月 7 日，纳粹东部占领区部指示乌克兰的德意志帝国总督埃里希·库奇没收所有犹太人的财产，并且让乌克兰前官员和公务员执行这项工作。但是埃里

希·库奇无视这项命令。1943年3月16日，埃里希·库奇告诉东部占领区部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一命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无法执行的”。

144. 拖延和阻碍

行政官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表达政治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打着服从某项具体命令和政策的幌子进行拖延和阻碍。这种方法属于巴塞爾·李德·哈特爵士¹⁶⁹定义的“表面的默许掩盖下的不服从战略，表面的默许与不服从战略相结合……”。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礼貌拖延。巴塞爾·李德·哈特爵士指出，这种方法“比其它方法更容易持久广泛地坚持下去，以便向占领国做出最小程度的屈服，让对手的挫折感逐渐增加”。拖延和阻碍方法进行的时候“面带善意的微笑和一副由于不解和笨拙而造成善意的错误的样子”，会更加难以对付。表面上的支持和服从程度可能因情形而异。

除了最后一个案例，此处所提供的案例都来自纳粹政权（尤其是其官僚机构）内部，或者来自傀儡政权和亲纳粹政权内部。最后一个案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案例与其他案例有很大差异。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经常抱怨说，政府各部门——尤其是司法部——对于推进纳粹的措施缺乏领导能力和主动精神。1942年3月19日，戈培尔写道：

我们提出了许多改革、改进的法律草案，但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中央办公室正在进行静悄悄的破坏。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着那里，这种顽固不化的官僚主义真是难以对付。

戈培尔说服希特勒采取严厉措施，不仅对付司法部，也“对付某些坐在转椅上的将军，事实上是对付整个官僚机构”。将近一年之后的1943年3月，戈培尔说，希特勒同意了他提出的关于对同盟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多数建议，但是他补充道：“元首抱怨官僚机构总是对我们的措施进行抵抗。在被俘的盟军飞行员的待遇，开发核武器工程，反犹措施等具体事例中，这种抵抗简直无法容忍……”

169 英国军事记者、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学家。著有《大战略——间接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沙漠之狐隆美尔》等著作。——译者注

希特勒两次要求对盟军所谓的“恐怖飞行员”使用私刑，但是下级的拖延和阻碍阻挠了他。瓦尔特·格尔利茨将此描述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的一个具体案例——使用各种搪塞、拖延和推迟手段，阻止希特勒的极端意图：

……采取拖延战术的核心人物的唯一目的就是围绕特定的问题纸上谈兵，这种纸上谈兵会继续到这些事情被搁置，或者被希特勒忘记，或者他把兴趣转移到新的事情上为止。

1944年夏天，希特勒想要制定一个系统性的恐怖计划，用来对付被俘的盟军“恐怖飞行员”，在陆军最高指挥官凯特尔元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上将和帝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的联合努力下，这一计划被有效地拖延下来。拖延的做法是假装需要澄清“恐怖飞行员”在国际法中的概念，然后在备忘录和通信中不断延长讨论的时间。1945年3月，希特勒再次想要制定这一计划，尽管有马丁·鲍曼¹⁷⁰的帮助，但是他的这一意图再次被那些采取阻碍战术的高级将领挫败。在这两个案例中，希特勒的命令都没有传达下去。

纳粹德国没有发展出核武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参与研制核武器计划的科学家有意拖延和阻碍。德国科学家不仅拖延原子弹的开发，还分散对于这一想法的注意力。正如德国记者和作家罗伯特·容克描述的：科学家的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说制造原子弹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切实际的。科学家把有关研究的备忘录锁起来，向军事部门隐瞒他们马上就能制造原子弹的事实——与此同时，却假装积极合作。“他们知道公开罢工会带来危险，会让那些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人有机可乘。所以他们采用拖延和阻碍战术，只要这一战术有效，相应的风险就能得到解决。”

纳粹德国各种较为极端的反犹措施，尤其是与种族灭绝有关的措施，都遇到了明显的拖延和阻碍。这些拖延和阻碍显然不够普遍和有效，无法阻止整个行动。此处所举的案例，当然不是为了美化任何个人或者团体。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不合作行动确实发生了，而且确实拯救了许多犹太人的生命。这种拖延和阻碍不仅发生

170 德国纳粹党党务中心领导人。——译者注

在德国官僚机构、外交部和东部德国占领区，也发生在纳粹同盟国保加利亚、法国维希政府和意大利墨索里尼等政府内部。

1942年1月，纳粹召开了万湖会议¹⁷¹。在会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宣布，必须“处理”那些在强迫劳动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以免他们“繁殖新的犹太人”（也就是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方案》）。然后，在各政府部门，“一个阻碍浪潮开始发展壮大”，其目标非常有限——只是为这一政策争取一系列例外，防止它扩大到犹太人的异族配偶及其子女身上。

纳粹驱逐犹太人事务是由外交部下属的德国部负责的，马丁·路德是德国部负责人。纳粹的驱逐政策原本要把拥有某些国籍的犹太人排除在外，但是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要求马丁·路德准备一份驱逐所有国籍犹太人的可能性的报告。然后，埃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男爵（里宾特洛甫手下的外交部高官）把马丁·路德的报告发给了外交部法律部门的埃米尔·阿尔布雷希特，“希望把它埋在那里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应付德国部最常用的手段”。

虽然在《最后解决方案》的有关问题上没有完全无辜的人，但是东方总督辖区（属于东部占领区）的德意志帝国总督海因里希·罗斯确实为拖延和阻碍里加大屠杀¹⁷²做出了努力。1941年10月，海因里希·罗斯为了阻止利耶帕亚大屠杀¹⁷³，向东部占领区部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提交了报告。11月15日，海因里希·罗斯要求裁决他管辖下的犹太人是否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要消灭掉。肯定答复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收到。12月1日，他敦促民事专员阻止对从事重要工作的犹太人的处决行动。

在纳粹同盟国保加利亚、维希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内部也使用各种行政和外交的拖延和阻碍方法阻挠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例如，进驻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军在执行驱

171 决定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西南部万湖区的一个别墅中举行，会议落实了对犹太人进行有系统的大屠杀。——译者注

172 1941年7月4日，占领拉脱维亚的德国纳粹下令烧毁首都里加所有的犹太教教堂，数千名犹太人被烧死。——译者注

173 1941年12月，拉脱维亚警察开始大肆抓捕境内的犹太裔人，并将他们驱赶至拉脱维亚利耶帕亚海滨。在利耶帕亚海滨，约二千七百四十九名犹太裔人被杀戮。——译者注

逐犹太人的命令时，把从法国边境和沿海地区驱逐所有犹太人解释为只驱逐法国的犹太人。意大利第四军阻止了里昂行政长官关于逮捕格勒诺布尔地区二千至三千名波兰犹太人的命令，使他们避免了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处决的命运。当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就此向墨索里尼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墨索里尼回答，他支持里宾特洛甫的请求，但是他不会干涉意大利将军的行动，因为意大利的军官有着“不同的智力结构”。意大利警方在把犹太人赶出沿海地区之后，把他们安全地安置在旅馆里。希腊的意大利占领区和克罗地亚的意大利第二军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意大利式阻碍行动。

法国维希政府虽然要对许多生活在法国的犹太人的命运承担责任，但是行政和外交上的拖延和阻碍行动无疑也拯救了大量犹太人的性命。维希总理贝当、副总理赖伐尔及其下属官员和警察都对这一战术做出了贡献。“犹太事务专员从来不能确定维希政府是否支持他们，从正规的国家宪兵那里得到的合作也越来越少。”维希政府任命的第一位犹太事务专员泽维尔·瓦尔拉特反对任何驱逐法国犹太人（有别于外国犹太人）和强迫他们佩戴犹太徽章的做法——即使是在德国完全占领法国之后，佩戴犹太徽章的做法也无法在法国执行。波尔多的法国警察只逮捕和驱逐无国籍的犹太人（只有一百五十人）。因此，德国占领军负责为了种族灭绝而驱逐的系统负责人卡尔·阿道夫·艾希曼中校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必须完全放弃从法国驱逐犹太人的计划。维希政府副总理赖伐尔还拖延了德国人提出的“制定法令，剥夺1933年之后归化犹太人的法国公民身份”的要求，以免这些犹太人被驱逐。赖伐尔告诉德国人，制定该法令必须得到总理贝当的批准，但贝当厌恶剥夺妇女儿童通过归化获得法国公民身份的法令。赖伐尔还告诉德国人，自己已经丢失了法令草案的复本。这意味着，新草案提交内阁之前，需要三个月的等待期，以便犹太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在此期间，法国警察不会搜捕犹太人。研究《最后解决方案》的杰拉德·雷特林格写道：盖世太保突然变得“格外无力”，既得不到统帅部的支持，也得不到外交部的支持。希特勒一定是对灭绝法国的犹太人失去了兴趣。“希特勒从不在乎世界舆论，但是缓慢的阻碍行动却能完全破坏他的企图。”没有法国警察的合作，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搜捕，即使在1943年9月8日意大利人企图保护法国犹太人

的计划失败以后，也只有三批犹太人被驱逐出法国，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初几天，地下无线电台对于继续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政府，唤起人民非暴力抵抗占领当局和任何傀儡政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联占领军为了消灭无线电台造成的影响，用火车运输干扰设备（有些报道说是追踪设备）到布拉格干扰电台广播。1968年8月27日，布拉格《政治报》发表了一篇有关运输干扰设备的火车得到了怎样的“帮助”的报道。这篇文章是一位参加了这一行动的捷克斯洛伐克铁路工人撰写的：

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列火车在边界附近城市日利纳就应该被阻止。这列火车除了特别短，只有八节车厢之外，和其他火车没有任何区别。一开始，我们计划让它出轨。在奥洛穆茨附近，在超过了一列很长的货运列车之后，它“意外地”断成了三截，修理工作花了四个小时，严格按照各项规章进行，然后我累倒了。另一名维修工又花了四个小时修理。然后火车继续驶往特热博瓦，修理工作一直进行到霍采尼。我们想从那里把它开回波兰，但是苏联人有地图。

苏联人非常着急，因为他们已经吃光了两节特等客车车厢里的所有东西。到达莫拉瓦尼之前，我们把列车的电线拆下来，乱七八糟的扔在车厢里。又来了两个维修队，他们没法把电线安装回去。苏联人开始感到焦虑。他们想用蓄电池发动列车，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设备的各个零部件看来都运转正常，但列车就是无法开动。在帕尔杜比采，他们想用蒸汽做动力，我们告诉他们这是电气化列车。在普热洛乌奇，一段铁轨被拆掉了，一节车厢脱轨了，他们只好决定改道赫拉德茨。在斯特布罗瓦，又一节车厢脱轨了。这是一个单轨线路，因此我们无能为力。过了很长时间，六架苏联直升飞机带走了我们的调度作为人质。我们让十五列货运列车开在前面，布拉格车站没有足够的地方停下所有这些列车。我们的列车只能等待。每件事都耽误了。我自己和一辆完全空着的客运列车一起到达了科林。现在他们在易北河畔利萨附近的某个地方。但是我们这种好兵帅克式的把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8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报道，这列停在易北河畔利萨附近列车上的干扰设

备被装上苏联直升飞机运走了。

145. 普通行政部门的集体不合作

政府行政部门大多数行政人员可以拒绝与篡权者合作。篡权者可能是占领军政府，也可能是通过政变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团伙。

例如，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从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¹⁷⁴领导的政府手中夺取权力之后，立即遭到公务员的集体抵制。在公共福利部，除了四十人以外，其余公务员都罢工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政府行政部门的不合作行动也曾经挫败了1920年针对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

146. 司法不合作

这种不合作方法发生在司法系统的成员——法官、陪审员等——拒绝行使司法系统某些权力的时候。在有些案例中，尽管主审法官希望给政治犯定罪，但陪审团拒绝给政治犯定罪。在另一些案例中，法院裁决某个特定法律、政策违宪。或者，尽管公诉人提供了证据和理由，但法官仍然拒绝给嫌疑人定罪或者处罚。

为了应对篡权者对司法独立的干涉，整个司法机构还可以集体辞职。例如，1940年12月，为了抗议德意志帝国总督特博文关于“法院无权宣布德国占领军的法律违宪”之后，挪威最高法院法官集体辞职。

司法不合作也可以在司法系统内进行。有一个通过司法不合作废除法律的案例发生在公元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当时的法律规定，偷窃一定数量的财物（价值极小）就可以判处绞刑。为了避免将小偷处予绞刑，陪审团常常判决被偷财物的价值低于应判绞刑的价值一便士或者一先令——无论其实际价值如何。英国记者和作家阿瑟·库斯勒写道：

绞刑架的威慑对陪审团的影响比对罪犯更大。陪审团把这样的判决变成了常规：如果盗窃四十先令的财物是死罪，那就把盗窃财物估价为三十九先令。

174 俄罗斯政治家、革命家，1917年俄罗斯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他领导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成立了新政府，他担任政府总理。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他领导的政府。——译者注

1827 年，死罪标准提高到五英镑，陪审团就把偷窃财物估价提高到四英镑十九先令¹⁷⁵。

有些陪审团拒绝判决涉嫌某些财产犯罪——比如伪造钞票——的涉嫌人死罪。商人和银行家也纷纷要求废除死刑。1837 年和 1861 年，有关死刑的立法做了两次修改，最终废除了对于财产犯罪的绞刑。

有时候，司法不合作也涉及陪审团公开不服从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官指示。1670 年，威廉·佩恩和威廉·米德准备举行一次贵格派教友聚会。在将要举行聚会的房子被士兵封锁之后，威廉·佩恩在户外发表了演讲。随后，威廉·佩恩和威廉·米德因涉嫌非法集会和骚乱行为被逮捕——审判引起了很大关注，陪审团成员判威廉·米德无罪，判威廉·佩恩犯有在集会上发言布道罪——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这样的罪名，所以威廉·佩恩也无罪。陪审团拒绝说明威廉·佩恩发表讲话的集会本身是合法还是非法。在法官威胁要无限期监禁两名被告之后，陪审团再次做出同样的判决。然后，愤怒的法官对陪审团成员宣布：

先生们，你们不能解散，直到作出本法庭能够接受的判决为止。你们会被关在这里，没有食物、火、饮料，也没有香烟。因此，你们不要想濫用法庭权力。上帝作证，我们必须有一个有罪判决，否则你们就要挨饿。

被关押了两个晚上之后，陪审团仍然判决威廉·佩恩和威廉·米德无罪。最后，被告和陪审团成员都因藐视法庭而被罚款。一年之后，一个高级法院裁决陪审团没有错，关押他们是非法的。

147. 执法人员故意无能和选择性不合作

警察、士兵和其它执法人员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故意不全力赴，可能出于政治动机同情抵抗者，也可能出于厌恶镇压措施，选择性地拒绝某些命令，但规模十分有限，还不足以称为哗变。如果这种政治不合作方法得以实施，统治者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就会降低，镇压的效果就会削弱。

175 一英磅等于二十先令。——编者注

据沙皇秘密警察警备队首脑瓦西里耶夫的报告：“人们经常逃避”禁止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某些省份定居的法律，“当局允许数不清的犹太人居住在本应不对他们开放的城镇，警方对此视而不见”。

1930年，印度独立运动活动家非暴力突袭达拉萨那食盐仓库时，印度警察接到命令，要用警棍（包着钢片的沉重木棒）殴打行动者，但警察似乎并不十分乐意这么干。目击者韦布·米勒说：“多数时间，当地警察似乎不愿打人。当上级忙于其他事情的时候，警察就会松懈，当上级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才会对行动者进行威胁和殴打。”

1941年，在德国汉诺威，盖世太保头子鲁道夫·迪尔斯拒绝执行逮捕犹太人的命令后被撤职。在波兰，格拉夫·费伯-卡斯特尔曾拒绝向五百名犹太人开枪。他们拒绝执行命令后并没有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1942年9月，党卫军中将汉斯·劳特抱怨说，在荷兰搜捕犹太人几乎得不到荷兰警方的合作。

在挪威，警察和德国士兵有时会故意帮助犹太人逃跑，或者执行逮捕时做得比上级期望的要少。在一个案例中，一名挪威警察被派去逮捕一名犹太人，警察上门时碰巧这名犹太人外出了，警察就给他留下一张字条，说自己中午十二点会再来——这给被抓捕的犹太人留出了逃跑的时间。在早期的搜捕行动中，大多数犹太人都事先得到了警告。1942年11月26日，逮捕剩余的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之前，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挪威警察接到即将逮捕抵抗者的命令时，他们会通知抵抗者。还有些警察会在逮捕的前一天晚上亲自警告犹太人。1943年11月30日，奥斯陆大学许多学生遭到逮捕，被派到私人住宅去执行逮捕任务的德国士兵经常会采取这样的方法：敲开要逮捕学生的房门，如果来开门的人说通缉的学生不在家，他们就会转身离开，而不是进去搜查。

也有一些挪威警察公开拒绝合作和藐视命令。挪威警察拉尔斯·拉比-隆德（二战后先后担任过奥斯陆刑警局长和上诉法院法官）曾报告过各种此类不合作行为。

1940年4月6日，德国占领挪威首都奥斯陆当天，挪威法西斯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维德孔·吉斯林宣布自己担任国务部长，随即召见奥斯陆警察局局长克里斯蒂

安·维尔哈文，但是克里斯蒂安·维尔哈文局长没有去维德孔·吉斯林的办公室。第二天，维德孔·吉斯林给克里斯蒂安·维尔哈文打电话，问他为什么没有来。警察局长回答，如果维德孔·吉斯林想和他商谈事情，就请他来自己的办公室。吉斯林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年9月，德意志帝国总督特博文批准解雇并逮捕了克里斯蒂安·维尔哈文，将他关押在挪威格利尼集中营直到1943年，然后又将他关押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最后将他关押在巴伐利亚。直到1945年初，他作为瑞典伯爵福克·伯纳多特的谈判成果之一被释放。

不是所有挪威警察官员都以克里斯蒂安·维尔哈文为榜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所有高级警官，包括助理局长，以及百分之六十的普通警官和百分之四十的普通警察，都自愿加入了国民联盟。然而拉比-隆德认为，“占领当局无法依靠警察机关”。

1940年7月，警方接到命令，要行法西斯式敬礼，“警察反应十分激烈。在奥斯陆总部，准备执行任务的警察拒绝出门。在克里斯蒂安桑市，警察局长辞职之后——他是少数未加入国民联盟的高级警官之一，他的助理也辞职了。”随后，克里斯蒂安桑的警察局长遭到逮捕，但他仍然拒绝服从，后来他被驱逐到德国。

1941年秋天，奥斯陆刑事警察局三名助理局长拒绝执行没收挪威赫德突击队夜间起获的一批食物的命令。这三名助理局长因此被捕入狱，但不久就释放了。后来，他们在东挪威地区建立了警察秘密抵抗组织。

1943年6月，国民联盟的法西斯分子启动征募挪威公民劳工计划的时候，抵抗组织要求警察不要为这一征募劳工计划提供帮助。两个月后，奥斯陆助理警察局长居纳尔·艾利夫森因拒绝将两名少女抓来参加劳工计划而受到军事法院审判，并于1943年8月16日被处决。同一天，奥斯陆所有警察——大约六百至七百名——都被警察局长、国民联盟成员约纳斯·李召集开会。李告诉他们，居纳尔·艾利夫森被处决了，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签署一份声明，承诺将会服从命令。国民联盟成员立即签字，但非国民联盟成员只是列队走过要求他们签字的桌子。李警告他们，如果拒绝签字，明天就会被枪决，此后仍然有十四名警察拒绝签字。他们被德国人带走了，但并没有被枪决。

1943 年秋天，挪威警察秘密建立了一个抵抗组织，并且与军事抵抗团体米洛格合作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专门收集警察对抵抗组织进行突袭和逮捕的信息，他们还说服了一些为纳粹工作的警察保持“中立”。

148. 哗变

在不合作运动的高级阶段，对手的军队和警察都有可能哗变——断然拒绝执行镇压抵抗运动的命令。在其他情境下，如果军队起义，哗变本身也构成一种重要的——有时是支配性的——抵抗和革命的斗争方法。在本质上属于暴力的革命中，哗变之后的军队可能会站在革命者一边加入暴力斗争，而在本质上属于非暴力的运动中，哗变可以通过拒绝履行职能（比如把政权的意志强加于民众，或者发动针对外部敌人的战争）进行抵抗。拒绝履行职能可以增加反抗和不合作的力量，瘫痪政权的执法机关，摧毁政权的常规军事力量，从而使政权的统治能力陷入瘫痪。

1905 年俄罗斯革命期间经常发生哗变。1905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警备队前任首脑报告了圣彼得堡的一场哗变：

当局准备雇用哥萨克军队减轻警方压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暴动者曾经十分恐惧的哥萨克士兵，现在实际上和暴动者成为同伙，没有任何要对暴动者采取严厉措施的迹象。

俄罗斯革命期间（尤其是 1905 年 11 月至 1906 年中期），日俄战争结束后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国途中的俄罗斯军人经常违反纪律：

士兵不服从军官的命令，还与正在打破权威的中心地区（尤其是哈尔滨、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平民激进分子交朋友。他们藐视纪律的范围，从简单的不服从一直到相当严重的放肆行为——例如，一位将军辱骂了铁路工人，士兵们就把这位将军的车厢卸下，把他丢在半道上。

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发生的哗变充分展示了这种非暴力手段的特点。这里几乎人人都反对沙皇政权，在社会民主党人向成群的士兵发表演讲后，士兵纷纷拒绝履行军人职责。

1917 年二月革命期间，俄罗斯军队的哗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2 月 26

日，沃伦斯基团接到命令，向圣彼得堡兹纳姆斯基广场的非暴力示威者开枪。2月27日早上，他们的军官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刺客射杀。此后，“沃伦斯基团的军人朝天开枪，宣布支持人民起义。他们很快就和示威者混在了一起，成了五颜六色人群的一部分”。哗变很快扩散到了其他军队，在巡逻队解散回营房吃晚饭的途中，“他们和示威群众融为一体”。哗变的军人一般不会继续留在自己的军队，也不会使用军事手段反对政权：

街上的士兵不想让乱哄哄的人群知道自己所属军队的番号。他们把步枪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大衣上佩戴红丝带，然后加入示威，冲击警察局，打开监狱大门，在法院放火，或者参与其它形式的“不流血”的革命活动。

军队再也不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哪支军队。2月27日，战争部部长给沙皇发电报，说哗变和纵火范围不断扩大，圣彼得堡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完全失去了控制权，要求立即增派大量可靠的士兵。偶尔也有起义士兵把枪口转向自己曾经效忠的军队，比如在卢加发生的伏击事件。

1917年5月至6月，法国军队发生了大规模哗变，这是军人起义反对战争、反对军事僵局¹⁷⁶造成士兵巨大伤亡的信号。官方承认，法国作战部队几乎一半发生了哗变——或者称做“集体违纪”。美国作家理查德·瓦特写道：“起义开始，而且必然会继续下去。哗变是自发的，没有可实现的目标，缺乏有组织的领导，也没有个人英雄和罪犯。”

一开始哗变规模很小，哗变的士兵受到了惩罚。但是随着哗变人数大幅增加，法难责众。第一次哗变发生在第十八步兵团第二营。就在不到两周之前，该营六百名军人中有大约四百名伤亡，另外二百名没有受伤的士兵也患有严重的震弹症¹⁷⁷。两周后，该营接到命令，4月29日重返战场。于是该营的士兵哗变了。后来，该营的五名军人被判死罪——虽然他们并不是哗变的领导人——但哗变继续扩散。“几乎

176 1917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军于西线开展春季攻势，与德军在兰斯和苏瓦松之间进行会战，双方僵持一个月，法军在伤亡十万人后仍未取得军事进展，引起法国士兵骚乱，导致该次战役的策划者、上任不足半年的法军总司令罗贝尔·尼维勒将军被革职。——译者注

177 一种由战争造成的严重的心理创伤。——编者注

一夜之间，整个纪律基础消失殆尽。军官们突然发现，他们无法控制自己手下的士兵，只能在一群规模巨大混乱的，已变成暴民的士兵四周跑来跑去。”理查德·瓦特把这些哗变描述为：

……职业罢工。激发这场罢工的原因，是军人突然对自己的将军和他们的战略完全失去了信心，不愿再把性命托付给这些指挥官，感到这些指挥官对自己的痛苦漠不关心。

严重的伤亡和总司令罗贝尔·尼维勒将军发动的无法取胜的进攻是哗变的重要因素。1917年5月15日，对哗变和进攻的失败感到震惊的法国政府免去了总司令罗贝尔·尼维勒将军的职务，任命亨利·贝当将军接替他的位置。

1930年4月23日，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加瓦尔军团的士兵拒绝向白沙瓦的和平示威者开枪，因此遭到起诉。

（五）本国政府的行动

149. 准合法的回避和拖延

政府机关可能不会直接拒绝执行某些他们不愿接受的法律或者法院判决，而是会制定某些法律、法规，或者利用某些现实存在的不同标准，无限期回避或者尽可能拖延服从他们抵制的法律或者法院判决。这些方法与前面描述的拖延和阻碍很类似，不同的是，这一方法不是由个人或者团体实施的，而是由政府下级部门或者机构实施的。

美国从内战后重建时期结束，一直到本书写作为止，此方法一直普遍被南方种族隔离政府所使用。但是，这一方法并不只有南方种族隔离政府赋予它的那些用途。

《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各州无权拒绝给予黑人投票权，但是南方各州一直采用各种方法达到剥夺黑人投票权的目的。例如，1910年，俄克拉荷马州修改宪法，用文化水平测试作为公民拥有投票权的前提条件。同时，它又对哪些公民需要接受文化水平测试规定了重大例外：“1866年1月1日之前，在任何形式的政府统治下有权投票的人……以及此类人的直系后裔，不会因为无法通过文化水平

测试而被拒绝给予投票权……”（粗体为作者所加）。”布莱斯坦和弗格森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与法律》一书中写道：“换句话说，需要通过一个困难的文化水平测试才能获得投票权的，只有那些祖父曾经是奴隶的人。”这个“祖父条款”是一种剥夺公民权的手段，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违宪。1916年，俄克拉荷马州通过一条法律，要求所有到目前为止被拒绝给予投票权的人，必须在十二天之内登记。这条法令的意图也是限制黑人的投票权。因为各种“实际困难”会让许多贫穷的非裔美国无法在短期内进行登记。美国最高法院在关于这条法律违宪的裁决中写道：

《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既废止简单的歧视方式，也废止复杂的歧视方式”。

为达到阻碍黑人投票权的目的，南方各州还使用了其他合法和准合法的手段。1961年，北卡罗来纳州顾问委员会在《致美国民权委员会报告》中引述了五个县的黑人提交的宣过誓的书面申诉，称文化水平测试被用来当作一种歧视手段，是为了阻止他们登记成为选民。南方各州政府经常被指控，为了限制黑人投票权而专门颁布类似要求文化水平测试的法律。《致美国民权委员会报告》写道：“有人声称，文化水平测试应用于申诉者的方式不同于应用于白人申请者的方式，目的在于歧视申诉者，拒绝给予他们选民登记和投票的权利，这样做仅仅因为其种族。”1961年，北卡罗来纳州高等法院裁决，必须给其中一名申诉者提供另一次登记的机会，因为她接受的考试超出了法律的本意。

为了回避服从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禁止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南方各州也使用了若干合法和准合法的手段。例如，佛罗里达州《学生分配法》允许教育理事会制定规章，建立统一测试，以便“根据智力和学术能力对学生进行分类”，让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条件类似的）学生之间彼此平等的环境”。测试要考虑到“社会学、心理学之类无形的社会科学因素”，防止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出现任何“社会-经济阶级意识”。把学生分配到特定的学校，要考虑到学生的“心理、道德、伦理和文化背景”与那些已经分配到该校的学生类似。

北卡罗来纳州也通过法律，授权学校理事会把每个学生分配到特定的小学或者中学，对分配不满意的学生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和耗时的申诉程序。布莱斯坦和弗格森写道：这一法律“目的在于，原告必须穷尽了在州法院诉讼中所能获得的一切救济手

段，才有可能进入联邦法院的司法程序。”1956年5月，按照这一法律，一项代表某一地区所有黑人儿童提起的诉讼最终到达北卡罗来纳州高等法院，但是被高等法院驳回，理由是该法律规定只能提起个人诉讼，集体诉讼是不合法的。每名儿童必须单独重新提起诉讼。

150. 地方政府的不合作

在民众普遍反对中央政府，不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地方，如果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易受舆论影响，那么这些地方政府也有可能不与中央政府合作。研究美国历史的法国历史学家克拉伦斯·克兰·布林顿认为，这是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城镇会议和殖民地立法机关都是合法政府的组成部分，它们经常被革命者控制”。在这一时期，政府进行非暴力不合作最极端的案例发生在罗德岛。1765年9月，罗德岛省议会做出决议，要求该省官员无视《印花税法案》：

特此命令本殖民地所有授权任命的官员，继续用通常的方式履行各自的职务。

本议会将保护上述所有官员，不使他们由于依照本决议做出的行为而受到伤害。

根据罗德岛省议会决议，不仅罗德岛印花税票发行人辞职了，就连英国女王任命的罗德岛省总督也拒绝宣誓执行《印花税法案》。罗德岛殖民地法院虽然像往常一样运转，但不在文件上贴（法律要求的）印花税票。

1766年，根据《英国驻营条例》¹⁷⁸的要求，纽约议会必须制定有关英国皇家军队驻营条款，但纽约议会拖延了这项工作。纽约议会回复伦敦的英国南方事务部大臣说，这种条款的花费对殖民地及其人民过于繁重，“因此，我们谦恭地恳求阁下诚恳地对待我们的行为，此次不服从完全出于我们职责所要求的正义感”。

1768年9月30日，英国皇家军队占领波士顿后，波士顿议会用消极但是有效的抵抗对付入侵。英国历史学家乔治·特雷维利安写道：

军队要求地方议会给军人提供食宿。地方议会提醒他们，根据法律，只要城

178 制定于1765年，要求北美殖民地人民为英国军队提供食物和房屋。——译者注

堡里的军营还没住满，城市就没有义务提供住宿或者补给。地方议会和军官都知道，英军派遣部队到这里，不是为了保卫城堡（城堡矗立在海湾中的一个岛上），而是为了占领和干扰城市。

北美英军总司令盖奇将军到达波士顿时，看到他的士兵睡在搭在公用土地上的帐篷里，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他必须以极高的价钱租用私人住宅，英国国库不得不支付这笔费用。1775年独立战争开始前，殖民地城镇会议和省议会曾经多次带头发动各种经济抵制，这是殖民地与英国政府的斗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

美国政府建立后，面临一个关键宪政问题是，由谁决定一条法律或者一个行动超越了新宪法阐明的权力，或者违背了新宪法阐明的目的？虽然最高法院很快承担了这一职责，但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此确立了无效原则，即州级立法机关可以裁决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在该州无效。这就是著名的1798年《弗吉尼亚决议案》、1798年和1799年《肯塔基决议案》的基础。

由于新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这一反民主趋势使托马斯·杰弗逊得出结论：需要树立一道强有力的屏障，阻挡联邦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托马斯·杰弗逊与詹姆斯·麦迪逊参与起草了1798年《弗吉尼亚决议案》、1798年和1799年《肯塔基决议案》，并将这些决议案引入肯塔基州议会和弗吉尼亚州议会。1798年的《肯塔基决议案》宣布：

我们做出决议，若干州组成美利坚合众国，这种联合不是建立在对联邦无限服从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宪法原则之上。无论何时，只要联邦政府行使了未经授权的权力，其行为就是没有权威的、无效的和没有任何力量的……

1798年《肯塔基决议案》进一步主张，组成美国的各州必须能够裁决联邦政府何时超越了宪法，而不能由联邦政府自己裁决。

1798年《弗吉尼亚决议案》也主张，当联邦政府超越宪法赋予的权力时，“组成联邦的各州有权利，也有责任进行干预，以制止这一邪恶进程，并且把属于各州的权力、权利和自由，维持在各自的界限内。”1799年《肯塔基决议案》则主张，

如果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超出宪法规定的界限，会导致“州政府被消灭……”。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只应由联邦政府裁决的原则，会使联邦权力不断扩大，“不变成专制统治决不罢休……”

以上理论是 1828 年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采纳的无效原则的基础。当宣布废除当年的关税法时，他说：一个州有权宣布任何它所裁决违宪的法律在其边界之内无效。他认为这是州脱离联邦的替代方案，也是一种捍卫宪法的手段。后来，有些州把这一原则扩大到州政府有权脱离联邦。脱离本身并不是战争行为，只有在联邦军队和分离主义者士兵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时，脱离才会成为战争行为。（如果南方不存在奴隶制——这种制度无法通过非暴力手段捍卫——而是因为其他理由脱离联邦，那么理论上说，它可能已经取得成功。如果南方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奴隶制的社会，那么，采用普遍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就会让联邦军队难以镇压。）

1910 年，俄罗斯为了达到对芬兰施加更加严厉控制的目的，要求芬兰政府就其所提议的芬兰正式从属俄罗斯的新法案递交一份报告——而不是就该法案（接受还是拒绝）进行投票——芬兰国会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理由是，此类事务的立法权属于芬兰议会，而不属于俄罗斯政府。

1930 年至 1931 年，印度独立运动期间，艾哈迈达巴德市政委员会告诉英国官员，他们不能与即将开始的人口普查合作，因为印度人民普遍反对人口普查，印度国大党已经决定抵制人口普查。因此，就算他们进行人口普查，也得不到人民的充分合作。市政委员会代表人民，所以不应采取和民意相悖的行动。

（六）外国政府的行动

有关政府间的不合作行动应该有更详尽的分类，因为其中存在大量的变体。切记，此处介绍的 7 种方法实际上只是举例说明。这类方法的范围，从象征意义为主的相对温和的方法，到可能破坏正常国际活动和国家职能的更加极端的措施。《国际联盟盟约》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对任何违反《国际联盟盟约》，采取战争手段的国家实施全面的国际禁运——包括外交、政治、社会和经济禁运——切断一切往来。

151. 变更外交代表和其他代表

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表达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召回自己的外交官或者其他官员，但不中断外交关系，或者要求另一个国家更换他们的外交官。有时候，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派级别较低的官员担任驻另一个国家的外交使团的代表，表示对驻在国的蔑视。还有些时候，一个国家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关闭自己的某些外交机构，比如领事馆——也是在不中断外交关系的前提下。

一个国家也可以撤回外交官以外的官员。1948 年，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拒绝斯大林提出的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立即建立联邦的要求之后，苏联的报复措施是从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回军事顾问。

道格拉斯·布克爵士指出，一国政府也可能“因政治原因，比如不满意对方政府的政策，”要求对方撤回其大使。然后外交事务由一位级别低于大使的外交官处理。有时候，一国政府要求对方撤回大使的要求被对方政府拒绝，结果可能是“驻在国停止与该大使打交道，对方国家的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以断绝外交关系作为报复手段”。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英国驻西班牙大使亨利·布尔沃采取强有力的干涉措施，制止西班牙对自由派政客的镇压。西班牙要求英国召回亨利·布尔沃，遭到英国政府拒绝后，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华盛顿武官弗朗茨·冯·帕彭由于被指控卷入炸毁美国军火库的阴谋，被美国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德国政府将其撤回。外交官由于被指控有不正当行为而被要求派出国撤回的案例还有很多。

关闭领事馆也是常见的手段。例如，1941 年 5 月 21 日，美国商船罗宾·穆尔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之后，美国政府下令冻结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关闭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的所有领事馆。德国和意大利采取的报复措施是关闭了美国在其两国的领事馆。

1968 年 3 月，美国对瑞典政府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政策不满，将驻瑞典大使威廉·希思召回华盛顿与约翰逊总统协商。此后希思大使没有再返回瑞典，美国也没有派新大使接替希思的职务。1969 年 11 月，美国关闭了其驻瑞典第二大城市哥

德堡的领事馆，官方理由是削减外交开支。美国驻哥德堡领事馆是美国最古老的领事馆，1797 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美国新政府的国家后，由乔治·华盛顿政府建立。1969 年 1 月上任的尼克松行政当局曾一度谢绝任命驻瑞典新任大使。瑞典新任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认为，美国的这一政策相当“不切实际”，“如果华盛顿真想解释我们错在哪里，就应该有人来这里做出解释”。1970 年春天，杰罗姆·霍兰博士最终获得任命，成为美国驻瑞典大使。

152. 推迟和取消外交活动

各国政府如果对参加某些谈判、会议的另一国政府的行动或者政策不满，可以推迟或者停止此类外交活动。例如，戈登·克雷格¹⁷⁹描述了苏联的此类做法：把谈判延期数月甚至数年，有时还会改变谈判的层级（比如从大使级变成部长级，然后变成国家首脑级），其结果是，在宣传攻势的帮助下，问题危如累卵，最初的分歧变得模糊不清。戈登·克雷格举了几个案例：“1920 年代，欧洲与苏联就有关俄罗斯债务问题进行了反复和漫长的谈判，”结果是俄罗斯逃避还债而未受处罚。赫鲁晓夫担任总理时进行的有关柏林和德国问题的各种谈判，其结果也是这样。

1948 年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取消原计划在 4 月与南斯拉夫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修改苏南商业协议。

1960 年 5 月初，苏联宣布一架美国 U-2 飞机在从高空拍摄苏联时被苏联导弹击落。总理赫鲁晓夫谴责这是一架间谍飞机，要求美国惩罚对此事件负有责任的人。他说：除非美国政府做出充分的道歉，否则当时正在巴黎举行的苏、美、法、英高峰会议将无法继续进行。威尔弗里德·纳普写道：“5 月 16 日上午，在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之后，1960 年的四国高峰会议就此结束。”

1970 年 5 月 6 日，为抗议美国再次对北越进行为期五天的轰炸，北越代表团取消了在巴黎举行的第六十六次越南和平谈判大会，提出 5 月 14 日召开下次会议。北越发言人阮成黎把这一举动称作“一个政治决定”。同时，美国 and 南越代表团也没有立即接受 5 月 14 日作为下次会议的日期。这说明美国和南越也在采用类似的报

179 研究德国历史的苏格兰裔美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复手段。

153. 拒绝给予外交承认

各国政府通常会承认其他能够有效控制某一领土的政府，这一惯例有时会被拒绝给予外交承认所取代。拒绝承认的理由可能是反对该政府上台的方式，或者反对该政府的政治体制。例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拒绝承认墨西哥维克托里亚诺·韦耳塔军事政权，因为维克托里亚诺·韦耳塔推翻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领导的民主政权，并将关在监狱中的马德罗处死。威尔逊总统宣布：“我们的理想是让墨西哥有一个公正有序的政府，我热情支持该国绝大多数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

1932年2月，日本占领中国满洲，宣布成立伪满洲国。美国表示继续奉行胡佛-史汀生不承认原则——不承认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该公约禁止侵略战争）造成的国际格局的变化。虽然美国没有采用经济制裁和军事行动，但是拒绝给予满洲国外交承认。美国继续保留了在那里的领事馆官员和贸易关系，但那被视为美国向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的领事馆官员，而不是向伪满洲国派遣的领事馆官员。托马斯·贝利¹⁸⁰指出：1932年3月，国际联盟大会一致通过反对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的决议，几乎一字不差地遵循了胡佛-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认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发动侵略战争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许多年里，美国也一直拒绝承认苏联共产党政权，直到1933年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

美国长期拒绝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是使用这一方法的最著名案例之一。在这个案例中，外交不承认的目的是为了造成共产党政权垮台。正如1958年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的那样：“美国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不是永久的，总有一天会过去。拒绝给予北京外交承认是为了加速这一过程。”1958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政策：“外交承认，以及给予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席位，会提高各国共产党在远东的声望和影响，会让我们在那里的盟友失去信心，会让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取得成功。”

¹⁸⁰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著有许多历史专著，包括被广泛使用的美国历史教科书《美国盛会》。——译者注

以色列建国之后，阿拉伯国家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拒绝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此外，阿拉伯国家还使用了更加激烈的手段。例如，拒绝直接与以色列政府打交道，阻止以色列加入国际组织，对以色列实施经济禁运等等。

1956 年，匈牙利革命被苏联占领军镇压之后，西方各国政府对卡达尔·亚诺什¹⁸¹政权进行了外交抵制。这一抵制到 1958 年 1 月 1 日才开始松动。即使是在外交抵制松动之后，美国也只在布达佩斯保留了一名外交代办。匈牙利政治分析家费兰茨·瓦利写道：“苏联认为，美国完全拒绝承认革命后的匈牙利政府，是苏联武装干涉带给匈牙利人民痛苦消除的最大障碍。”

一个国家威胁长期不承认另一个国家政府的方法，也曾被用于挫败另一个国家的政变。例如，1920 年 3 月 16 日，德国普卡政变发生之后，英国驻德国军事使团的首脑、陆军少将尼尔·马康爵士告诉吕特维兹将军，英国永远不会承认吕特维兹帮助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卡普政权。英国历史学家惠勒-本尼特认为：“拒绝外交承认造成了卡普政权的完全崩溃。”

这种拒绝给予外交承认的一个变体是有条件地承认有关政府。英国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在《外交》一书中引用了如下案例：英国政府承认 1910 年成立的葡萄牙共和国，前提条件是新政权必须得到其国内民众大选的确认。

154. 中断外交关系

道格拉斯·布克爵士指出：中断外交关系“一般包括整个使团离开双方首都，但有些时候，离开的只有大使或者高级专员”，领事馆官员有可能被允许留下。如果一国全体外交人员都撤离，该国政府有可能会要求另一个盟国的外交使团代表其在该国的利益。尼科尔森指出：中断外交关系“并不总是战争的前兆，诉诸这种手段经常是为了表达深度的道德义愤。因此，1903 年 6 月 11 日，塞尔维亚亚历山大国王和翠格王后被政变军人杀死之后，英国公使撤离了贝尔格莱德。1922 年 11 月，发动起义的希腊军官普拉斯蒂上校处决了前总理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及其部长们

181 苏联入侵匈牙利后扶持的傀儡政权首脑。他 1956 年至 1988 年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并两度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译者注

¹⁸²之后，也发生了类似的外交关系中断事件。”1917年1月3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宣布要进行潜艇战，击沉交战地带的所有船只——包括中立国的船只——企图以此打破英国的封锁。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讲话，宣布终止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案例发生在1943年4月25日，这一天，德国宣布发现了波兰卡廷森林中的集体墓地——一万多名已经失踪两年的波兰军官被埋葬在这里。在英国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相信，是苏联犯下了卡廷大屠杀¹⁸³的罪行。在波兰国防部长要求由“适当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之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155. 退出国际组织

各国政府可以退出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和大会，或者退出国际组织的活动。动机可以是对该国际组织的政策表达不满，或者为了采取该国际组织不赞同的行动。例如，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宣布：由于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否认德国的平等权利，德国决定退出这两个国际组织。希特勒说，与从前的敌国达成和解的希望没有实现，德国人民未能恢复平等权利，因此德国不能再忍受屈辱。同一天，希特勒还宣布：将退盟决议提交11月12日举行的全民公投，公投日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字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

1950年，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活动——但没有退出联合国——以抗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继续由中华民国代表占据，而不是由已经控制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82 1922年9月11日，在普拉斯蒂上校的领导下，希腊军人发动起义，攻入雅典、占领全国，迫使国王下台，并成立了革命政府。同年11月，革命政府审判并处决了五名保王派政治家，包括前总理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译者注

183 又称卡廷森林大屠杀、卡廷事件或者卡廷惨案。是苏联在1939年入侵波兰后，在斯大林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于1940年4月至5月，对俘虏的波兰战俘以及知识精英进行的有组织的屠杀。遇害人数约为二万二千人。大屠杀主要发生在位于卡廷森林的科泽利斯克战俘营。1941年，德军入侵波兰，1943年，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集体墓地。德国的揭发，致使位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苏联官方一直否认卡廷大屠杀，直到1990年，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苏联官方才承认：内务人民委员会实施并隐瞒了卡廷大屠杀。俄罗斯联邦检察总长的一项调查证实，苏联应该为卡廷大屠杀负责。调查确认了一千八百零三名波兰公民的死亡，但是拒绝承认是战争罪行或者种族屠杀，并以屠杀参与者已经去世为由终止了调查。——译者注

的代表占据。威尔弗里德·纳普指出：1950年1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退出安全理事会之后，“雅科夫·马利克宣布，在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代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代表取代之前，他不会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与此同时，苏联代表退出了所有中华民国参加的联合国机构。”正因为苏联代表缺席安全理事会，才使得安全理事会能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通过对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

1964年12月1日，印马对抗¹⁸⁴期间，马来西亚入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后，印度尼西亚通知联合国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办公室，宣布退出联合国。尽管《联合国宪章》中没有规定退出条款，尽管联合国进行了各种恳求和私人会谈，但是1965年1月底，印度尼西亚仍然正式退出联合国，也退出了联合国的某些专门机构。

156. 拒绝某国加入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可能会拒绝某些国家的加入，拒绝的理由可能是政治敌对，不赞成有关政府等。最突出的案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里，联合国一直承认只台湾岛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拥有席位，拒绝共产党政府加入。1949年底，共产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对整个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国民党政府（中华民国）转移到了台湾。此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苏联代表一直企图把中华民国的代表团赶出去，但没有成功。1961年之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成为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多数而不是简单多数的批准。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联合国各机构一直拒绝让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代表在联合国拥有席位，一直到1971年，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才被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代表权取代。

157. 将某国开除出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有时会对违反其政策或者宪章的国家采用开除会籍的制裁手段。《国际联盟盟约》规定，任何成员国违背“国联的任何一条盟约”，都有可能被宣布不再是国际联盟成员。这一规定只使用过一次——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之后被国际联盟开除。1939年12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一致谴责了

184 1963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为遏止马来西亚建国而发生的暴力冲突。——编者注

苏联的入侵行动，并且宣布：“大会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四段第十六条作出裁决，苏联由于其行为，已经让自己置身于国际联盟之外。因此，苏联不再是国际联盟成员。”

《联合国宪章》第六条规定：“联合国之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将其从本组织除名。”这一条款是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¹⁸⁵期间，由苏联提议纳入《联合国宪章》的。苏联还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强烈支持这一提议。虽然曾经有过将南非和葡萄牙开除出联合国的建议，但这一条款至今从未真正使用过。

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铁托拒绝服从斯大林的领导，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将南斯拉夫开除了该组织。

最后，我们开始介绍非暴力行动中的第三个大类：非暴力干涉。

185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胜利在望之机，苏、美、英三国为协调战后国际关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会议。——译者注

三、非暴力干涉方法

介绍

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最后一大类是非暴力干涉。与非暴力抗议与说服、非暴力不合作中的方法不同，本大类中的 41 种非暴力干涉方法在某种意义上都对现状进行了干涉。这种干涉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它们可以中断，甚至破坏人们反对的既有行为模式、政策、关系或者制度，也可以建立人们喜爱的新的行为模式、政策、关系或者制度。在本大类的方法中，有些主要是为了促成第一种结果，有些主要是为了促成第二种结果。

与非暴力抗议与说服、非暴力不合作中的方法相比，非暴力干涉方法提出的挑战更加直接。如果能够成功，使用本大类方法取得的胜利，可能比使用前两大类方法来得更快。因为对手更难以长期容忍或者承受非暴力干涉行动造成的破坏效果。例如，虽然目标都是结束种族歧视，但静坐占领午餐柜台的干涉行动造成的破坏，显然要比纠察或者消费者抵制造成的破坏更加直接和全面。不过，非暴力干涉方法提出的挑战虽然更加明确和直接，但其结果也并不一定就能更加迅速取得成功。也正因为非暴力干涉行动的这些特点，其造成的第一种结果带来的可能是更加迅速和严厉的镇压——当然这也不一定意味着行动失败。

在多数案例中，使用本大类方法时，不必说服对手改变有关政策，而是通过诸如和解或者非暴力强制机制带来变革。不过，针对其中某些方法（尤其是心理干涉类的方法）的镇压，以及经常发生的针对另一些方法（尤其是身体干涉类的方法）的镇压，也可能促成对手的转化，或者至少促使对手不那么确信自己以前的正确性。

《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三册详细介绍了转化、和解和非暴力强制的发生机制。

与前面介绍的两大类相比，非暴力干涉方法更多是非暴力行动者主动发起的。这些方法既可以用于防守（通过保持独立的主见、行为模式、机构等，阻挠对手的攻击行动），也可以用于进攻（即使是在没有遇到任何直接挑衅的情况下，行动者也可

以为了自己的目标主动采取行动）。因此，这些方法不局限于对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

本大类的方法范围很广。我们根据非暴力干涉行动的主要表达方式给这些方法分为：心理干涉、身体干涉、社会干涉、经济干涉和政治干涉五个子分类。这与根据非暴力干涉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的分类不同。例如，一个社会干涉行动可能带来强烈的心理影响，一个心理干涉行动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一个身体干涉行动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等等。所有非暴力行动方法都可能带来某种心理影响。此处所提到的心理干涉，是指心理因素作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方法。

这五个子分类并不严格，某些方法也可以归为其他类别，尤其是在某一具体的冲突情境时。而且，不是每次使用这些方法都能实际带来干涉效果。某次行动在时间、人数或者重点上可能太有限、太弱或者太受限制，无法构成有意义的干涉，那么，这次行动就可能变成以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为主的行动。

（一）心理干涉

本分类介绍的 4 种心理干涉方法，在对待其所针对的个人或者团体的态度、预期的变革过程和实际的行为类型方面有显著差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干涉主要是在心理层面进行的，或者只是在心理层面进行的。

158. 把自己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

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严酷的天气里，是人们表达自我惩罚的方式之一。自我惩罚是自愿承受不适、羞辱、惩罚或者痛苦，目的是给他人施加心理、道德或者情感压力，劝说他们改变态度或者采取某些行动。除了本方法以外，其他表达自我惩罚的方法还包括我们已经介绍过的第 22 种方法脱衣抗议和第 23 种方法破坏自己的财产（某些杜科波尔教派曾经使用过），以及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的第 159 方法禁食。

把自己暴露在风吹日晒中的一个案例发生在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一位名叫陆嘉书（音译）的地方官处理一起兄弟纠纷。一位叫钱勇（音译）的人记载了这一案例：

有两兄弟互相恶斗，不肯和解。陆嘉书对他们说：“兄弟不和代表人伦丧失。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我没有把你们教育好，这是我的错。”然后他跪在炎炎烈日下暴晒。两兄弟大受感动，从此和睦相处。

提供这个案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沃尔夫拉姆·艾伯华教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本案的陆嘉书本可以严厉笞打两名被告——因为他们违背了孔子有关兄弟之情的习俗——这才是一名父母官的正常行为。但陆嘉书采取的方法不是深入调查案件，弄清谁是谁非，而是自己承担罪责让这对兄弟感到羞愧，让他们改正了自己的行为，而没有涉及预期中的暴力。

大约在 1880 年代，俄罗斯帝国赫尔松省农场的临时工人也采取了一种与陆嘉书类似，但要温和得多的行动，以抗议农场主提供的恶劣饮食。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¹⁸⁶描述了儿童时期在父亲的农场里看到的这一情景：

工人们离开田地，聚在院子里，躺在谷仓的阴影中，把布满裂缝、沾着草芒的赤脚举在空中挥舞，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父亲给他们拿来一些酸奶、西瓜，半袋子干鱼，他们就唱着歌回去工作了。

1972 年夏天，美国康涅狄格州丹伯里联邦惩戒监狱的囚犯，冒着危险爬到监狱建筑的斜屋顶上和水塔顶上表达抗议。

159. 禁食

禁食通常被视为一种心理干涉手段。放弃某些食物或者放弃所有食物的理由有很多，包括健康、宗教、赎罪、自我惩罚，以及希望实现某些社会和政治目标。最后一个理由与禁食的内容关联最大。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宗教、赎罪和自我惩罚的理由而禁食也构成非暴力干涉。禁食也可以只是一种道德抗议的方式。禁食又分为三种：道德压力禁食、绝食和非暴力不合作禁食。

¹⁸⁶ 苏联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十月革命实际的指挥者、苏联红军缔造者和第四共产国际精神领袖。列宁死后被排挤出苏共领导核心并流亡海外。1940 年斯大林派人在墨西哥城将其刺杀。——译者注

禁食的第一种是道德压力禁食，它的特征介于绝食和非暴力不合作禁食之间。它很可能无法完全满足非暴力干涉的要求，而是变成一种非暴力抗议与说服的方法（为了简单起见，禁食没有列入非暴力抗议与说服这一大类）。道德压力禁食通常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给他人施加道德影响，但是没有绝食具有的公开强制的意图，也缺乏甘地使用的非暴力不合作禁食具有的全面“转化”的意图。许多人认为，西方人无法理解禁食，但事实上，西方有许多禁食的案例。即使在不熟悉禁食这一方法的地方发起禁食，也经常得到出乎意料的支持。例如，1960年和1961年，英国核裁军运动活动家及和平主义者曾经认为，不应把禁食用于核裁军运动，因为英国人无法理解禁食的意义。然而，在1962年，当人们使用禁食的方法支持单边核裁军运动，以及为饥荒赈济工作筹款的时候，参与禁食的人数在当年和第二年都迅速增长，禁食行动得到了大量民众的理解和同情。

道德压力禁食的案例多种多样。圣帕特里克¹⁸⁷曾经禁食反对阿尔斯特¹⁸⁸的特里安国王，迫使他善待奴隶。还有一次，圣帕特里克为反对贝拉基¹⁸⁹异端，在某个城市禁食三天，迫使当地居民改信天主教正统派。

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中，也采取过许多次禁食行动。例如，1774年5月24日，弗吉尼亚省伯吉斯议会通过决议，把6月1日（《波士顿港口法案》¹⁹⁰生效日）定为禁食、耻辱和祈祷日。目的是祈求神的干预，防止“我们的公民权利遭到侵犯和陷入战争的灾难……祈求陛下和陛下的议会受到上帝的智慧、节制和公正的启发，不要继续实施给忠诚的美洲人带来毁灭的措施。”两天后，总督召见议员，并且宣布伯吉斯议会的决议“使用了高度有损陛下和英国议会声誉的言词”，

187 爱尔兰的守护圣者。他于公元432年将天主教传入爱尔兰。——译者注

188 古代爱尔兰的四个省份之一，公元四至五世纪曾因外敌进攻而解体。公元十四世纪臣服于英国国王。——编者注

189 公元五世纪初不列颠隐修士，他提出的贝拉基学说认为：人本来无罪，上帝赋予人选择善恶的能力，即自由意志——这正是人性尊严与价值所在。行善或者作恶取决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并不因亚当堕落而丧失。罪是对意志自由的滥用。他否认原罪，认为洗礼并非洗净原罪，而是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女，由认识善而产生向往善的意志。贝拉基学说被基督教正统派斥为异端，但对后世强调个人与人性的理论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190 1774年3月，作为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报复，英国政府颁布该法案。该法案规定：封锁波士顿港，断绝波士顿对外通商，直到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赔偿。——译者注

因此决定解散议会，防止议会继续采取“敌对”行动。

这个把禁食作为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案例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此前——1773年12月16日——一些波士顿人把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倾入波士顿港的海水中。作为对这一倾茶行动的回应，英国政府决定，于1774年6月1日关闭波士顿港，并为此颁布了《波士顿港口法案》。消息传到弗吉尼亚时，伯吉斯议院正在开会。托马斯·杰弗逊和一些年轻议员（包括帕特里克·亨利¹⁹¹、理查德·亨利·李¹⁹²等）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办。他们决定采取大胆而且明确的立场，支持马萨诸塞湾省。托马斯·杰弗逊写道：

我们确信，要把人民从昏睡中唤醒。我们认为，计划一个全体禁食和祈祷日可以最有效地唤醒人民。我们查阅了革命先烈和清教徒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然后迅速拟定了决议：把《波士顿港口法案》开始实施的6月1日定为禁食、耻辱和祈祷日，祈求上帝让我们免遭战争的祸害，鼓舞人民坚定支持我们，让国王和议会更节制和公正。

埃德蒙·伦道夫¹⁹³把“为了唤醒民众而禁食”的提议归功于托马斯·杰弗逊和查尔斯·李。起草决议的这些年轻人资历较浅，提交一个如此庄重的决议，可能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支持。因此，他们说服了年长的宗教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提交这个决议案。决议当天就无异议通过。议会休会之后，议员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全体一致同意，召开一个所有殖民地参加的美洲代表大会。然后议员们回到自己的选区去动员教士和民众的爱国热情。弗劳尔写道，6月1日到来的时候：

就像年轻的议员们预期的那样，伟大的禁食、耻辱和祈祷日让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热情开花结果。教士们以前从未，以后也很少像今天这样勇敢和直言不

191 美国政治家，美国革命时期卓越的领导人，曾两次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1776年至1779年、1784年至1786年）。1775年3月23日，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圣约翰教堂发表著名的演讲《不自由，毋宁死》。——译者注

192 美国政治家，以“李议案”闻名。该议案是他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殖民地独立于大不列颠的议案。他还是《邦联条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他曾担任大陆会议主席和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译者注

193 美国律师、政治家，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司法部部长和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讳。一位牧师大声疾呼：“自由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这种情感在大山大海之间回响。

托马斯·杰弗逊指出：“这一天给整个殖民地带来的影响就像闪电一样，唤醒了每一个人，让人们坚定了信心。”

1774年夏天，罗德岛也宣布设立禁食和祈祷日。1775年2月16日，马萨诸塞湾省议会也设立了禁食和祈祷日，要求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祈祷。与会者表示，矛盾不是发生在他们和国王之间，而是发生在他们和国王的政府之间。波士顿用“非常庄严”来评价这一天。在宗教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国王的军团在离教堂不到十码的地方敲起鼓，吹起横笛，企图干扰禁食和祈祷活动。

道德压力禁食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1962年4月，许多法国人为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而禁食。6月，法国和平主义者路易斯·莱科要求法律承认良心拒服兵役者而禁食。

达尼洛·道尔奇¹⁹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从事扶贫工作的时候，既进行过个人禁食，也发动过大规模民众禁食。1952年12月，一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道尔奇决定采取禁食行动，让人们关注西西里岛特拉佩托的贫困和失业问题。他禁食任何食物，直到为减轻饥饿募捐到一定数额的资金为止。1956年1月30日，达尼洛·道尔奇带领大约一千名失业渔民在海滩上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禁食行动，以唤起人们关注失业渔民的困境。这场禁食行动最终被警方驱散。1966年1月16日，达尼洛·道尔奇在西西里岛西部卡斯泰拉姆马雷德尔戈尔福一座传统西西里式住宅中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反对黑手党的禁食行动，号召人们摆脱恐惧。他认为，正是恐惧使“缄默法”¹⁹⁵得以存在，使警方无法收集黑手党的罪证。（卡斯泰拉姆马雷德尔戈尔福地区的议会代表马塔雷拉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长，被控与黑手党有关系。）据报道，禁食为民众批评当局的意愿带来了一场“革命”，也提高了民众反抗黑手党的意志。

1960年代，在南越佛教徒反对吴廷琰政权的斗争中，佛教徒也使用了禁食的方法。

194 意大利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以反对贫困、反对社会排斥和反对西西里岛黑手党而闻名。他被认为是意大利非暴力运动的重要人物，享有西西里岛的甘地之誉。——译者注

195 黑手党帮规，其中一条规定不向警方告密。——编者注

人们有时单独禁食，有时集体禁食，有时成千上万的人同时禁食，有时只有佛寺中的长老们禁食。1966年，德高望重的佛教僧侣释智广进行了连续一百天的禁食行动。释一行禅师指出：“禁食的目的是为了祈祷，为了净化人们的内心，坚定人们的意志，或者是为了唤醒人们隐藏在内心的觉悟和怜悯。”

禁食的第二种是绝食，绝食可以定义为拒绝进食，目标是迫使对手满足行动者特定的要求，但是并不企图转化对手或者让对手实现“内心的改变”。在这一点上，它与甘地使用的非暴力不合作禁食有显著区别。绝食可以在一段特定的时间进行，也可以无限期进行。如果特定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可以绝食至死。没有其他有力的抗议手段能够使用的监狱囚犯经常使用绝食的方法。

根据古代爱尔兰法律，受到伤害的人在其他一切手段都失败之后，有权利直接对作恶者施以惩罚。在有些案例中，用没收财产（比如牲畜或者其他财产）作为赔偿的和解协议达成之前，原告会在被告家门口绝食：

……如果被告是等级较高的人，原告是等级较低的人，那么在拿走物品作为赔偿之前，这一过程往往是必需的。原告送达通知之后，来到被告家门前，坐在那里，没有任何食物。欠债的人一般在绝食结束之前会屈服：或者还债，或者承诺解决问题。债主得到赔偿之后如果继续绝食，就会失去所有应得的赔偿……

一些研究显示，似乎只要债主或者原告绝食，欠债的人就不得不一起禁食。如果被告不肯屈服，人们会鄙视他：“他不做出禁食承诺，就是在逃避责任。逃避责任就不能从神或者人那里得到报答。”（《英国法》，I，113）。

也就是说，欠债的人会遭到全面的社会抵制。

这与印度的长坐绝食非常相似，克里希纳拉尔·斯里达兰尼¹⁹⁶这样解释长坐绝食：

在中世纪，放贷者无法按时收回贷款时，就会一动不动地坐在欠债人的家门前，不吃任何东西，直到欠债人还清欠款为止。由于这种情况总会聚集起一

196 印度诗人、剧作家和新闻记者。他参加了印度独立运动并被监禁，在此期间开始创作戏剧和诗歌。他用英语写了许多非小说类书籍。——译者注

群好奇的旁观者，欠债人与其处于随之而来的难堪境遇，不如尽最大的努力尽早还钱。宫廷诗人如果想迫使国王“像男人一样”战斗，也会使用类似的方法。如果国王由于怯懦或者其他考虑拒绝与入侵者兵戎相见，宫廷诗人就会坐在王宫门前绝食。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会迫使国王去战斗。

俄罗斯也发生过许多绝食事件。1875年夏天，关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政治犯进行了长时间的绝食。许多绝食者死亡之后，三科（警察的一个部门，拥有庞大的线人和特务网络）科长遭到报复性暗杀。1877年底，革命家谢尔盖·涅恰耶夫¹⁹⁷被单独监禁四年之后，为了要求监狱提供监狱图书馆没有的书籍，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地牢中绝食。彼得·克鲁泡特金¹⁹⁸曾经写道：1878年7月，哈尔科夫监狱中的六名囚犯在一次反对监狱极端恶劣条件的行动中“决心绝食致死”。他们拒绝注射喂食之后，监狱管理人员承诺让囚犯散步锻炼，摘掉生病囚犯戴的镣铐。但这些承诺没有得到遵守。“后来，在几名囚犯死亡，两名囚犯精神失常之后，其他囚犯获被允许在监狱的院子里看树。”彼得·克鲁泡特金还写道：1879年和1880年，彼得保罗要塞的囚犯“通过著名的绝食行动”赢得了每十四天一次的亲属探监的权利。“绝食期间，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特鲁别茨科伊堡的许多犯人坚持五、六天拒绝任何食物……”并且抵抗一切注射喂食的尝试。

1898年，被监禁在赫尔松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带领政治犯进行绝食行动，抗议警方的一项提议：如果少年政治犯的父母承诺抽他们一顿鞭子，让他们远离政治活动，他们就会被释放。托洛茨基认为，这是“对少年革命者的侮辱”。1922年初，二千名被捕的孟什维克在遭到流放到僻远省份的威胁时，有些人进行了绝食抗议，最后约有十二人被允许流亡海外。

然而，1936年秋天一次类似的行动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据目击者鲍里

¹⁹⁷ 俄罗斯革命家，因其对革命不择手段的追求——包括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而知名。著有激进书籍《革命者教义》。1869年，他在卷入一场谋杀前同志的案件后，逃离俄罗斯。1872年，他在瑞士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回俄罗斯后，被判处二十年监禁，最终死于狱中。——译者注

¹⁹⁸ 沙俄哲学家、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斯·波多拉克 1951 年提供的证词：沃尔库塔监禁的四百名托派¹⁹⁹囚犯和其他政治团体的囚犯进行了一次绝食行动。他们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察宣读了绝食宣言，称目前的政治制度是法西斯主义，并陈述了自己的要求。参加绝食的囚犯都待在自己的铺位上拒绝劳动。虽然有许多犯人同情他们，但是绝食者的人数逐渐减少。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多数人无法再抵抗强制喂食。最后大约四十名囚犯绝食至死。到 1937 年秋天，莫斯科派来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先将绝食领导人和其他许多囚犯关在一个军营里，然后将他们转移到二十英里外的一座废弃的砖房里，“砖房成为死亡隔离室”。1938 年 2 月底，大约七百名犯人关押在那里。第一次集体处决发生在 5 月 8 日至 9 日夜间，然后一直持续到杀死所有关在这里的囚犯为止。

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也进行过绝食行动。例如，1917 年 9 月底，被控“企图在平民中煽动不满”，并被判处在蒙乔伊监狱服一年苦役的爱尔兰义勇军成员托马斯·阿舍和克里义勇军成员奥斯汀·斯塔克组织了一场绝食行动，要求把他们当作政治犯对待，否则就释放他们。但是他们得到的回应是被强制喂食。一周后，托马斯·阿舍身体崩溃了，在被送进医院不到五个小时就宣告死亡。（第 45 种方法示威性葬礼中有关于他的葬礼的介绍。）

英国也曾使用过一些方法对付绝食者，包括用所谓的猫鼠行动对付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活动家。这种方法是将因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囚犯释放，当他们身体恢复后再将她们关起来。埃德加·霍尔特指出：“这一办法很有效……没有更多人死于绝食。”

1920 年 4 月 5 日，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爱尔兰蒙乔伊监狱大约一百名新芬党²⁰⁰囚犯开始绝食，要求把他们当作战俘对待，否则就释放他们。下议院领导人、掌玺大臣²⁰¹博纳·劳在下议院的发言表达了英国官方对这一挑战的态度：“如果这

199 也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流派。这一名称来自其最早的理论建立者、十月革命实际的指挥者、苏联红军缔造者、第四共产国际精神领袖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200 由阿瑟·格里菲斯于 1905 年建立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主张建立一个整个爱尔兰岛的共和国，包括北爱尔兰和目前的爱尔兰共和国。新芬党同时参与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议会选举并均有议会代表。——译者注

201 英国国务重臣。掌玺大臣起初负责君主的私玺（国玺由大法官负责）。出任此职者往往同时是内阁阁员。二次大战结束后，掌玺大臣者通常兼任上议院领导人或者下议院领导人。——译者注

些囚犯以为拒绝吃东西就会被释放，那完全是徒劳的。”但是在爱尔兰，绝食行动得到的支持者越来越多。爱尔兰工党号召4月13日进行总罢工，声援蒙乔伊的囚犯。罗马天主教教会高层也公开宣布“关注蒙乔伊监狱迫在眉睫的可怕悲剧，是他们的庄严职责。”十天之后，政府无条件释放了这些囚犯。就在同一年，爱尔兰科克市市长特伦斯·麦克斯威尼（新芬党成员）就没有这么走运，他因涉嫌煽动罪被英国政府逮捕，在禁食七十四天后死亡。

1944年10月，监禁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的若干名美国良心拒服兵役者因为参加反对假释制度的罢工而受到惩罚，为此，他们组织了一场接力绝食行动：每次五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事先不宣布）绝食，然后另外五个人接替他们继续绝食。

1958年5月，印度在根据一项“禁止出租房屋用于卖淫”的法案关闭妓院的时候，将近一万三千名妓女威胁要进行大规模绝食。1959年8月，一个与长坐绝食类似的案例发生在新德里一家工厂，原因是一名司炉因抗议工资太低，工作条件恶劣，在雇主的住宅外禁食至死。

禁食的第三种是非暴力不合作禁食，主要实践者是甘地。甘地把自己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禁食与他认为具有强制性的绝食区分开来。虽然有人指责甘地的禁食中存在强制成分，但甘地坚持说，其目标是转化。甘地认为，不合作主义者只有在用尽其他一切非暴力手段后才可以禁食。目的是通过自愿受苦，“刺痛”作恶者（可能是一个人、一群人，甚至是一百万人）的良心。非暴力不合作禁食可以在特定的时间进行，如果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可以禁食至死。

甘地给这种禁食制定了严格的限制。例如，使用它不应仅仅是为了对付某个人，而不管问题是什么。一般来说，一个人不会用禁食对付自己的对手，尤其在对手是陌生人，而不是自己的朋友时。甘地认为，作恶者和禁食者必须有密切的关系，有共同的感情，只有这样，这种自愿承担的痛苦才是合理的，才能起到预期的转化效果。不过，在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在对手的镇压和限制把其他途径都阻断的情况下，禁食也可以应用于其他人。例如，遭受不人道待遇的囚犯，可以为了摆脱不人道待遇而禁食，但不能为了被释放而禁食。在这两种情况下，禁食所反对的个人或者团体的“错误”都必须是严重的，必须对不合作主义者的生命有很深的影响。

甘地相信，一个人需要先进行大量的精神准备和仪式，才有理由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禁食，禁食到死只有在其他一切非暴力不合作方式都失败了之后才能使用。1918年2月至3月，甘地在艾哈迈达巴德工人罢工期间禁食。这次禁食是为了鼓励那些决心减弱的罢工工人，让他们坚守誓言，继续罢工，直到要求得到满足为止。1948年1月暴乱期间，甘地在德里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而禁食。甘地试图通过禁食，让全体印度人民重新获得有关生命价值的觉悟，唤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兄弟之情。这些禁食行动都具有甘地宣称的非暴力不合作禁食所具有的特征。

160. 反向审判

有时候，因政治、宗教或者其他理由而遭到审判的被告，在外部环境和心理干涉手段相结合的情况下，可以逆转控方和被告的角色，使被告变成控方，使审判变成反政府示威。被告可以利用审判宣传自己的信念、运动和对现有秩序的指控。这就是反向审判。

各种各样的政治案件都发生过这种角色逆转。在俄罗斯，针对革命者的1877年大审判期间，被告利用每一场审判用自己的行动唤起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其中第一场审判的被告是圣彼得堡喀山圣母广场的示威者，审判造成的结果是公众对受审者的巨大同情。第二场审判是3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五十人审判，观察者把被告比作早期的基督教殉道者。1877年到1878年，在圣彼得堡的一百九十三人审判中，被告将革命信息带到了“人民中间”。尽管有严格的审查，审判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部分来自被告之一伊波利特·尼基季奇·梅什金在法院上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讲。在另一场审判中，梅什金谴责法院是“一出无用的闹剧”，“比妓院还丢人现眼……”。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斯特普尼亚克-拉夫钦斯基²⁰²后来写道：“梅什金的演讲使这场审判彻底失败了。”

甘地受审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即使他对指控做有罪辩护，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他因为做了正确的事而有罪。例如，1922年，甘地因为在自己的刊物《青年印度》上发表了三篇煽动文章而被捕。审判期间发生了这样一幕：甘地要求法官或者

202 乌克兰革命者，因暗杀俄罗斯秘密警察负责人尼古拉·梅曾佐夫将军闻名。——译者注

辞职，或者判处自己最严厉的刑罚。甘地宣布：“对这样一个政府心怀不满是一种荣誉，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政府对印度造成的伤害比以往任何制度都更多。”

在德国鲁尔抗争期间，被占领国起诉的德国人也利用审判控诉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是不公之举。1923 年，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啤酒馆政变²⁰³失败之后，他也将审判他的法庭作为演讲的舞台，这使他在巴伐利亚前线之外第一次有了听众。希特勒的传记作者艾伦·布洛克说：“他在最后发言时完全控制了法庭。”1933 年，纳粹德国国会纵火案²⁰⁴审判期间，被告之一的共产国际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自己辩护，机智地反诘戈林，把他奚落得大发雷霆，成功地让自己和另外三名被告被判无罪。

只要案件涉及政治和道德问题，只要被告在公诉人面前能够夺回主动权，反向审判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方法证明，即使被告手里没有其他武器，简单的心理干涉手段也有巨大的潜力。

161. 非暴力骚扰

这种方法包括由各种行动组合而成的心理骚扰，把私下或者公开的压力集中到一个或者几个令人普遍痛恨的人身上。非暴力骚扰行动包括更加有力和坚持不懈地“跟踪”（一直待在该人身边）和“嘲弄”（喊出他的名字和对他的指控）——这两种方法的温和形式属于非暴力抗议与说服这一大类中的第 31 种方法和第 32 种方法，我们已经在前面做过介绍。非暴力骚扰也可以利用海报和报纸广告等大众传播手段来使用。非暴力骚扰也包括其他类似的手段。这种压力组合行动的目的，是迫使其针对的个人停止令人痛恨的行为或者行动，而不是改变他或者他们的个人观点和信念。美国作家卡尔顿·马比在利用非暴力方法反对美国奴隶制的著作《黑色自由》

203 1923 年 11 月 9 日晚上，纳粹党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计划推翻魏玛共和国。但政变失败，希特勒被判叛国罪。——译者注

204 1933 年 2 月 27 日晚上九点多，德国国会大楼发生爆炸，燃起大火。警察搜索现场时发现了失业的建筑工人马里努斯·范·德·卢贝。他是荷兰共产党人，不久前才到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国会议长戈林很快到达现场，戈林宣称这起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他们抓到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希特勒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年事已高的总统兴登堡签署《国会纵火法令》，取消大部分魏玛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国会纵火案是德国建立纳粹党一党专政独裁政权的关键事件。——译者注

中把这种方法称为非暴力骚扰。不抵抗社²⁰⁵成员、《解放者报》撰稿人查尔斯·惠普尔提出了使用这一方法的具体建议。惠普尔的建议吸收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²⁰⁶、温德尔·菲利普斯²⁰⁷和罗德岛废除奴隶制社的建议，并将其运用于对付北方各州的奴隶猎人——他们受雇抓捕逃跑的奴隶，并把抓到的奴隶归还给南方奴隶主。波士顿警戒委员会²⁰⁸部分采纳了这些建议。1850年至1851年间，惠普尔的建议发表在《解放者报》和其他废除奴隶制的报纸上。建议如下：

一旦奴隶猎人抵达任何一个城镇，所有公共场所都应该贴出有他们的名字，对他们外貌的描述，以及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的大幅传单。

应该劝说旅馆、寄宿公寓和餐馆的店主拒绝接待他们，因为他们从事声名狼藉的职业，就像扒手、赌徒或者盗马贼。

如果上述方法不成功，“陪伴委员会”的成员就应该和奴隶猎人入住同一家旅馆、公寓或者进入同一间用餐的餐馆。如果可能，房间和座位都要和他们正对面。

白天黑夜都要仔细观察他们的动向。只要他们出门，不管去哪里，每个人后面都要有两个坚定而且不带武器的人跟随，这两个跟随者要不时地指出他们是**奴隶猎人**。跟随者应该跟着奴隶猎人去每一家商店、办公室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如果奴隶猎人乘坐马车，跟随者应该坐另一辆马车跟着他。如果他乘坐火车，跟随者应该和他一起乘坐火车，让车厢里的旅客和他停留的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奴隶猎人。让他时刻感到人们知道他的目标，让他无法秘密行动。让他被憎恨他，而且有办法阻止他的人时时刻刻包围着。

美国作家卡尔顿·马比说，整个1850年代都有人根据这一建议和类似的建议，使

205 1838年9月，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波士顿成立的和平组织。——译者注

206 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和记者。1831年他创办了著名的反对奴隶制的《解放者报》，并在波士顿出版。——译者注

207 美国废奴主义者、美洲原住民权利倡导者、演说家和律师。——译者注

208 成立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废奴团体，目的是保护逃亡的奴隶免遭绑架被送回南方。该委员会援助了数百名逃亡奴隶。——译者注

用非暴力手段保护逃到北方的奴隶。例如，当一位马里兰州的奴隶主威尔逊小姐抵达费城，寻找自己逃跑的奴隶时，费城人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当宾夕法尼亚废除奴隶制社办公室的负责人、非暴力行动倡导者米勒·麦金听说她打算雇用一名当地的奴隶猎人时，就安排了一名废奴主义者假扮奴隶猎人去应聘。应聘者被雇佣后，马上将逃亡奴隶的名字告诉了米勒·麦金，米勒·麦金找到逃亡奴隶并将他藏了起来。麦金还准备了一张标题为“**当心奴隶猎人！**”的三平方英尺的大海报，张贴在各处。海报上面描述了威尔逊小姐的名字和她的特征，以及她来费城的目的。威尔逊小姐看到这些海报后放弃了对奴隶的追捕，回到了马里兰。

类似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波士顿。弗吉尼亚的奴隶主查尔斯·霍布森到波士顿追捕逃跑的奴隶亨利·朗霍恩时，废奴主义者用查尔斯·霍布森的名义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找奴隶的广告。广告上描述了霍布森的长相，说他住在特雷蒙特旅馆。废奴主义者还贴出了大约一百张海报，说霍布森正在城里追捕一名逃亡奴隶。霍布森气馁了，没有找到亨利·朗霍恩就匆匆返回弗吉尼亚。

不过，这些非暴力骚扰奴隶猎人的案例并没有得到大量效仿，这一方法也没有被大规模应用。

（二）身体干涉

非暴力干涉方法第二个子分类的主要特征，是用人的身体进行干涉，特别是进入或者拒绝离开某些对手不希望人们进入或者禁止人们进入的地方。

162. 静坐占领

在静坐占领行动中，行动者占据特定设施，在有限的时间内或者无限期地坐在椅子、凳子或者地上。静坐占领可以是单独行动，也可以是一系列行动，目标是打乱正常的活动模式，目的可以是建立新的活动模式——比如让特定设施开放给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人——也可以是进行与被占领设施没有直接关系的抗议。这一方法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经常被使用。

从概念上说，静坐占领方法并不新鲜。据美国作家卡尔顿·马比的报告，早在

1838 年，美国妇女废除奴隶制大会²⁰⁹就采用过静坐占领和占领公车座位的方法，但没有系统性的后续行动。1841 年 8 月，马萨诸塞废除奴隶制社召开会议期间，加里森派非暴力行动倡导者史蒂芬·福斯特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我们向白人废奴主义者推荐一个持久有效的废除‘黑人隔离区’座位的方法，无论是在教堂里、火车车厢里、公共马车里，还是在汽船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黑人隔离区’的座位，就坐上去。”马萨诸塞废除奴隶制社非暴力行动倡导者在这一决议案上发生了分歧，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对这一决议（虽然他参加了占领公车座位的行动）的反对，导致这一决议案未获通过。但是，它的方法后来实际上被用在了一系列占领公车座位的行动中。

1869 年底至 1870 年初，芝加哥发生了一次静坐占领行动。由于黑人的抗议行动未能废除种族隔离的《黑人法典》²¹⁰和教育隔离制度，黑人儿童仍然只能进黑人学校。一些黑人父母决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离自己家最近的学校（不管是不是黑人学校）。虽然这些学校不给黑人孩子分配教室，也不让他们上课，但是“这些黑人孩子每天都来，并且有秩序的坐到座位上”。校董事会做出部分妥协，允许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孩子进入这些学校。随后芝加哥的黑人占领了校董事会和市长办公室。最终黑人学校被废除了。因为种族隔离是当时的法律，所以这一方法也涉及公民不服从。

1938 年，明尼苏达州卡斯湖印地安人保留地的齐佩瓦族酋长们代表自己的族人，抗议印第安事务专员约翰·科利尔把印第安事务局总部从保留地搬到杜鲁斯市的决定。酋长们说，这一搬迁的做法违背了联邦关于印第安人自治的政策。抗议没有产生效果。于是，数百名涂了脸，身穿传统服装的齐佩瓦勇士和妇女向印第安事务总部进军，在建筑物周围击鼓起舞。其中一群齐佩瓦妇女进入印第安事务办公室，机构主管刘易斯·鲍尔萨姆闻讯而逃。随后，齐佩瓦勇士也进入办公室，他们坐在办

209 美国妇女废除奴隶制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838 年 5 月 9 日举行。来自十个州，代表二十五个废奴团体的一百七十五名妇女聚集在纽约市，讨论她们在美国废奴运动中的作用。玛丽·帕克担任会议主席。参加者包括有色人种妇女、奴隶主的妻子和女儿，以及经济地位低下的妇女。——译者注

210 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各州为继续奴役黑人而制定的各种法规的总称。1866 年密西西比州首先公布，继而南方其他各州纷纷效仿。主要内容有：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禁止黑人集会；黑人无占有土地的权利，须在种植园主规定的条件下劳动；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黑人犯有骚乱、斗殴、发表煽动性言论、表现侮辱性姿态等行为时，处以罚金或者监禁；逮捕流浪黑人等等。——译者注

公桌和档案柜前面，外面的人则组成纠察线。约翰·科利尔专员仍然坚持要把总部搬到杜鲁斯市去，但他的上级——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命令就此问题举行部落全民投票，并且承诺接受任何投票结果。

1960年，美国印第安切罗基族努力了六年，他们的孩子仍然不被获准进入北卡罗来纳州哈尼郡邓恩市邓恩高中上学，之后，他们采取了静坐占领行动。1960年至1961学年开始的时候，九名印第安学生到邓恩高中登记入学，遭到拒绝，学校让他们去专门为印地安人设立的高中报到，这意味着切罗基族的孩子每天上学要来回走七十英里。8月31日，七名印第安少年在两名成人的陪同下，在邓恩高中进行静坐占领行动。静坐占领行动的第三天，七名少年和五名成人因“非法入侵”被逮捕。在当局承诺1961年秋天会在邓恩市建一所印第安人学校之后，切罗基族人停止了静坐占领行动。邓恩市市长布雷洛克在回应全美各地声援切罗基族人的抗议时说，这一事件的责任不在邓恩市，当地非常愿意接受印第安学生。1961年6月，哈尼郡学校理事会宣布，下一学年将允许二十名印第安学生进入邓恩高中。

在美国，静坐占领被广泛用于打破餐馆和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政策。民权运动活动家使用这一方法占领种族隔离餐馆，直到占领行动者得到餐饮服务，或者餐馆关闭，或者活动家遭到逮捕，或者在约定的时间离开。

1940年代至1950年代，美国种族平等大会在北方各州和边界州²¹¹也使用了这一方法。从1960年初开始，种族平等大会将静坐占领行动大规模地、广泛地用于南方各州，第一次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的沃尔沃斯超市，是由北卡罗来纳农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进行的静坐占领行动。此后不久，整个南方的高中生和大学生都在午餐柜台发动了类似的静坐占领行动，最后发展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据南方地区委员会²¹²的报告，在七个月内，至少有七万名黑人和白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其中有三千六百人被逮捕。1961年12月11日，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禁止根

211 位于美国南北方交界的州，包括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密苏里州及肯塔基州。——译者注

212 1944年成立，总部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宗旨是避免南方的种族暴力，促进种族平等。为此目的，南方地区委员会开展了选民登记和政治宣传等行动。——译者注

据行为不检的法律，逮捕参加静坐占领行动要求获得平等服务的黑人。

这一方法也可以用于表达各种政治不满。例如，1964 年 12 月 3 日，支持加州伯克利大学言论自由运动的八百零一名示威者遭到逮捕，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支持被逮捕者，要求政治自由的静坐占领行动。1966 年 11 月，纽约市市立学院学生会发动了一场学生静坐占领行动，学生占领了学院行政办公楼，要求院方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学生参与学院行政决策的程度。1963 年 6 月，一场通宵静坐占领行动在波士顿学校委员会总部进行，目的是抗议该委员会多数成员拒绝承认学校系统存在事实上的种族隔离。

1964 年，主要由黑人组成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的代表要求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们称自由民主党支持民主党全国候选人。但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此后，在同情他们的其他州的民主党代表的帮助下，自由民主党的代表于 8 月 25 日和 26 日晚间会议期间，进入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厅，并且坐在了密西西比州代表团的座位上。会议主办方在使用武力驱赶他们失败后，“正式”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代表只好坐到别的地方去。

近年来，除了学生在大学里组织的静坐占领行动，市长和州长办公室也发生过静坐占领行动。但是这类行动没有在国会山和国会办公室发生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静坐占领国会山和国会办公室是“破坏政务程序”。

1964 年 3 月 19 日，在莫斯科，四十五名摩洛哥留学生在摩洛哥驻苏联大使馆外进行静坐占领和二十四小时禁食，抗议摩洛哥将所谓的反政府阴谋分子判处死刑和严酷的监禁。根据摩洛哥方面的请求，苏联警察把抗议学生从使馆前面赶走了。

163. 静站

非暴力行动者在被拒绝买票、入场、面试等情境下，安静有秩序的站在售票处、入口处、预约台、门口，就像正在等待买票、入场、面试一样，这就是静站行动。要求所有潜在顾客获得平等服务的美国民权活动家时常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进入电影院或者游泳池的时候。例如，在黑人被拒绝入场或者被拒绝买票的时候，所有直接行动者，包括被拒绝入场的人，都耐心地排队等待入场，拒绝离开，

直到所有人都得到平等服务，或者预先计划结束行动的时间到了，或者行动者遭到逮捕，或者要求进入的设施关闭为止。这一方法可以反复使用，直到政策改变，允许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使用该设施。

1947 年，静站曾被用于结束新泽西州栅栏游乐园游泳池的歧视行为。每到星期日，种族平等大会不同种族的成员“就会在被拒绝入场后，和平地在游泳池售票站前排队”。尽管他们多次遭到公园保安和警察的殴打、逮捕，但是整个夏天的所有星期日，种族平等大会的静站行动都在持续进行。有人声称，1949 年新泽西州之所以颁布《民权法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1947 年夏天新泽西的报纸刊登了大量警察对参加静站的行动者殴打和逮捕行为产生的结果。

1837 年，针对教堂内的种族隔离政策，行动者采用了一种静站的变体。《有色美国人》期刊告诉读者，如果有人不允许他们坐在教堂内专属白人的座位上，他们应该“站在过道里敬拜上帝，用这种神圣的策略让压迫你们的白人感到羞愧，让偏见逐渐消失”。

164. 占领公车座位

占领公车座位是一种用于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静坐占领方法。1960 年代，这种方法被普遍用于反对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黑人和白人在公交车或者其他车辆上坚持坐在与指定给自己使用的区域相反的地方。这种行动通常违反公交车公司的规定或者违反地方和州法律的规定。但在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一系列在公共场所采取种族隔离违宪的裁决后，占领公交车座位就成为迫使当地修改法律、政策，以符合联邦法律规定的行动。

1841 年，占领公交车座位行动开始于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当时，一些地方的交通工具上出现了种族隔离现象（但并不普遍），这些地方的少数黑人（比如马萨诸塞有百分之一，罗德岛有大约百分之三）受到严重的歧视。即使在坏天气里，黑人也可能被拒绝乘坐公共马车，或者被要求坐在露天的车顶上。在乘坐汽船的时候，黑人可能会被拒绝进入船舱，或者只允许在甲板上和牲口待在一起。新建的铁路也对自由的黑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允许南方的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一起乘车。据美

国作家卡尔顿·马比的报告，加里森派非暴力废奴主义者领导了反对这种种族隔离的行动。领导者包括威廉·克埃劳·加里森、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不抵抗社的约翰·科林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是一名奴隶，后来成为著名的废奴运动倡导者。

1841年6月至7月，年轻的大卫·鲁格尔斯（一名半盲的纽约黑人，也是民权运动活动家）在访问马萨诸塞期间，为占领公交车座位行动树立了榜样。在前往楠塔基特岛的汽船上，他坚持购买头等舱船票；在开往新贝德福德的火车上，他拒绝离开白人车厢。两次他都遭到了肢体攻击。大卫·鲁格尔斯坚持获得平等服务是基于他的信念：“我倡导平等自由的原则，所以我有责任言行一致，在任何时候都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新贝德福德市，黑人进行了一场抗议集会，集会由年轻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主持，随后，威廉·克埃劳·加里森、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大约四十名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登上一艘蒸汽船的下层甲板，前往楠塔基特岛。这是一艘实施种族隔离的船（黑人在上层，白人在下层）。当船长要求黑人去上层甲板，否则就拒绝启航的时候，这群人里有些人下了船。那些留下的白人和黑人都去了上层甲板，并且获得了船长的同意。马卡尔顿·马比写道：“汽船前往楠塔基特岛的途中，废奴主义者愉快地召开会议，继续抗议轮船公司即将日落西山的种族隔离政策。”

1841年，新英格兰铁路的火车上发生了一系列占领行动。有时是白人占领黑人车厢的座位，有时是黑人占领白人车厢的座位，有时是二、三个黑人和白人混合群体占领白人车厢的座位。在占领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经常遭到肢体攻击。行动者之一詹姆斯·巴法姆（一名贵格派基督徒）表达了他的看法：火车列车员对占领公交车座位行动者的攻击，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新的支持者。例如，在林恩，“甚至在塞勒姆，这种做法也像是上帝的审判，能够把人们从有罪的沉睡中唤醒”。人们觉醒了，开始谈论“占领公交车座位的行动者”遭到的“可耻”对待。人们组织了一场抵制实施种族隔离的马萨诸塞铁路公司的运动，敦促乘客选择没有实施种族隔离的铁路或者驿车服务。卡尔顿·马比写道：“我相信，如果没有占领公交车座位的戏剧性效果——列车员的暴力攻击行为加强了这种戏剧性效果——抵制很难发展到

如此大的规模。”从1842年4月开始的一年时间里，占领行动每周都得到了威廉·克埃劳·加里森创办的《解放者报》和《美国废除奴隶制年鉴》的强烈支持。这些非暴力行动产生的压力相结合，使新贝德福德铁路公司和东部铁路公司悄悄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1849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提到黑人进行的占领公交车座位的行动（黑人进入“白人专用车厢，遭到殴打，并且被拖出去”）时说，铁路公司之所以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是“因为铁路公司对他们实施的政策感到羞愧”。

几年后，占领公交车座位的行动也被运用到纽约和费城的公共马车上。1854年和1855年，发生了几名黑人——其中包括纽约德高望重的彭宁顿博士（长老会的黑人宗教领导人）的教会成员——坚决要求平等乘坐马车的案例。1858年，费城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著名黑人诗人和加里森派非暴力活动家弗兰西斯·沃特金斯坚持要求与白人乘客平等乘车的权利。内战期间也发生过类似的行动：一名黑人商人和他的妻子坚持要在车内而不是踏脚台上乘车。售票员愤怒地解开马，丢弃了车厢。

1871年内战之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刚刚获得自由的黑奴也进行了一场占领公交车座位的行动。这年1月，罗伯特·福克斯在乘坐公交车时，坚持要坐在白人区，拒绝离开，最后被司机扔下了车。此案起诉后，联邦地方法院做出了对罗伯特·福克斯有利的判决，然而公交车公司无视这一判决，继续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但黑人司机不再因为黑人拒绝坐在指定的地方而把他们从车上扔出去，而是停下车，直到黑人挪开为止。在联邦官员和白人律师的支持下，当地黑人发起了一场全面占领公交车座位的行动。5月，一个坐在白人区的黑人小男孩被一群白人乘客殴打和驱逐之后遭到逮捕，并被市法院罚了款。地方法官还对占领公交车座位的行动发出了警告。但是占领公交车座位的行动还在继续，黑人在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上占领“白人”的座位。然后司机会离开驾驶室，有时黑人就自己驾车。白人愤怒了，种族暴乱一触即发。肯塔基的温和派报纸和许多社区领导人谴责暴力争斗，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约翰·马歇尔·哈伦（从前的奴隶主）公开谴责了种族隔离政策，全国人民对肯塔基州发生的事件的关注也日益增长。有传言说，格兰特总统要派联邦军队到肯塔基州维持秩序。联邦法警和联邦检察官都支持黑人。最后公交车公司妥协了，路易维尔市所有城市交通公司都永久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

1946 年，最高法院裁决州际旅行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宪。为了验证这一判决的执行情况，1947 年，乔治·豪泽尔和贝亚德·鲁斯汀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由乘车行动，他们去南方各州乘坐州际公交车，用非暴力的方法坚持平等乘车的宪法权利。

1961 年，在美国种族平等大会以及它的前领导人詹姆斯·法玛尔的倡议下，新一波自由乘车运动²¹³启动。5 月 4 日，一个由白人和黑人组成的自由乘车运动团体乘长途公交车离开华盛顿特区，目的地是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市。这个团体遇到了一系列骚扰和逮捕，以及白人暴徒的殴打，但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赞助。5 月 28 日，自由乘车运动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停了下来(未能到达目的地——译者注)，参加者加入了杰克逊市正在进行的填满监狱行动²¹⁴。这一时期至少发生了十二次占领公车座位行动，有一千多参加者，分别来自四个主要团体。联邦法律规定，从 11 月 1 日开始，所有州际公交车上都要展示一条标语：“根据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命令，本车上的座位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和出生国。”第二年，这句话被印在了所有州际公交车的车票上，州际公交车站上也贴出了类似的标语。

165. 涉水示威

涉水示威是在使用沙滩（必须是向公众开放的沙滩。比如没有被栅栏围起来，也不需要买票进入的沙滩）遭遇种族歧视时使用的一种反抗方法。涉水示威的行动者只需不顾限制性习俗或者法律进入这一区域，正常使用沙滩和水域。例如，1961 年 7 月 16 日夏末，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²¹⁵芝加哥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七十五名

213 美国最高法院在波因顿案中做出判决，跨州旅行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宪后，美国民权活动家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最严重的美国南部，以检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落实情况。1961 年 5 月 4 日，第一批自由乘车者从首都华盛顿出发，乘坐多种不同公共交通工具进行长途旅行。自由乘车运动使南部各州无视联邦法律的种族隔离暴行——当地警察以擅入、非法集结、违反种族隔离法等罪名抓捕民权活动家。警察与 3K 党和其他白人至上主义者合作，任由白人暴力团伙攻击民权活动家而不加干涉——得到了全国的关注，为美国民权运动带来了积极影响。——译者注

214 1961 年 5 月 24 日，自由乘车运动的参加者乘长途公交车到达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后，当地警方立即因涉嫌违反当地种族隔离条例逮捕了他们。警方这一举动建立了一个自由乘车者模仿的反抗模式：人们乘车前往杰克逊市，并在那里被捕入狱，将监狱填满。——编者注

215 美国黑人民权组织，创建于 1909 年。其宗旨是保证每个人的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权利，消除种族仇视和种族歧视。——译者注

成员组成的一个跨种族团体，在芝加哥南岸²¹⁶密歇根湖彩虹沙滩上进行了一场涉水示威。这种进入和使用设施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没有被围起来的公共区域，这种方法相似但又不等同于第 170 种方法非暴力入侵。

166. 环行示威

环形示威是指行动者聚集在某些有象征意义或者与不满情绪有关的地方——比如对手的办公室——在事先计划好的时间内在那里停留。但是行动者不进行静坐或者静坐占领。在环形示威期间，人们可以在建筑物（或者其他地方）里面走动，也可以进进出出。这种方法能够实现直接对峙和干涉的目的，但是招致严厉镇压的可能性要比非暴力占领小。如果有大量的环形示威者，可能会妨碍建筑物里面的正常活动，但是有意妨碍其活动不是这一方法的目的。

1969 年 11 月，波士顿塔夫茨大学非洲裔美国人协会及其支持者曾经使用环形示威的方法，目的是要求校方在建造宿舍时雇佣更多的少数族裔工人。11 月 7 日星期五，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察特遣队抢先占领了建筑工地之后，非洲裔美国人协会在大学行政楼巴鲁大厦进行了环形示威。11 月 10 日星期一，环形示威再次发生。塔夫茨大学校友杂志《准则》报道了星期五的这次行动：

上午九点，大约四百名学生（五十名黑人，三百五十名白人）和少数教职员聚集在巴鲁大厦前进行了一场环形示威。示威者分成人数相等的四组，每组负责接近四名大学管理人员中的一名。大学管理方允许进行和平的环形示威。巴鲁大厦内外都没有警察，学生和平地占领了行政办公室，向管理人员质询了他们关注的问题。上午九点半左右，三百名学生挤满了巴鲁大厦建筑内的柯立芝厅，校长哈洛韦尔就校方的立场发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讲话。

学生们在大厦正常关门时间之前三十分钟撤离了巴鲁大厦。在环形示威期间，大厦内正常的行政工作“或者减速，或者完全停止”。

167. 祈祷示威

216 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因其位于芝加哥市南部密歇根湖滨而得名。——编者注

示威者进入或者试图进入习俗、政策禁止他们进入的教堂，平等地参加宗教仪式。在允许示威者进入但是座位按种族隔离开的情况下，示威者坐在留给其他种族的座位上。

1848年初，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敦促所有黑人放弃黑人教会，采用“大规模祈祷示威的方式”参加白人教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宣布：黑人“应该去那里，不按肤色入座，让牧师、长老和执事把自己拖出去。这一行为可以很快以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

据报道，在更早期的时候，费城、纽约和新英格兰部分地区出现过许多个人进行的祈祷示威案例。例如，1835年前的某个时间，在马萨诸塞州兰道夫，一个黑人家庭在白人浸礼会教堂买了一个长椅。一个星期日上午，当他们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发现长椅被挪走了，于是他们就坐在原来放长椅的那块地板上。下一个星期日，他们去做礼拜的时候，发现那块地板也被拿走了。1837年，白人废奴主义者刘易斯·泰潘访问纽约州马尔堡长老会，在最后领受圣餐的时候与黑人坐在一起，牧师看到大吃一惊，但后来还是决定，让所有人不分彼此，一起领受圣餐。

1838年，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名白人牧师与一名黑人女佣一起进入教堂，并且让黑人女佣和自己的妻子坐在一起，随后这名牧师被教友赶下讲坛。1840年，在纽约州杰纳西县，本州唯一一名废奴主义国会议员塞斯·盖茨与一位来访的黑人废奴主义者一起坐在教堂里属于他的长椅上，遭到当地报纸的谴责。报纸称塞斯·盖茨为合并者²¹⁷，尽管如此，塞斯·盖茨仍然再次当选国会议员。1840年，一位年轻的白人贵格派基督徒因为在教堂和黑人一起坐在分配给黑人的长椅上而受到谴责。白人教友告诉这位年轻的贵格派基督徒，他的行为是在“审判”那些分配座位的教友。在费城，新皈依贵格派的安吉莉娜·格里姆克和莎拉·格里姆克姐妹因为做礼拜时坚持要与黑人妇女坐在一起，遭到贵格派基督徒的责骂，她们则回答：“你们给我们的黑人姐妹‘戴上了耻辱的徽章’，我们有责任和她们分享。”1858年，罗德岛州纽波特市，一个以白人为主的浸礼会教堂拒绝把长椅续租给一名白人妇女，因

217 即主张将白人教堂与黑人教堂合并的人。——编者注

为她曾经邀请一个也是教会成员的黑人女孩和她坐在一起。于是，这名白人妇女带着一个折凳来到教堂，坐在她以前的长椅旁边的过道里。

19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南方的黑人企图进入白人教堂的时候，经常会跪在教堂的大门口祈祷。例如，1961 年 2 月的一个星期日，南卡罗来纳州石山市发生了该市第一起下跪祈祷示威。此后，黑人被允许进入三座白人教堂，但是还有两座白人教堂仍然禁止黑人进入。1963 年，民权运动团体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宣布：4 月 14 日复活节那天，黑人将大规模进入白人教堂做礼拜。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跪在教堂的台阶上祈祷。

168. 非暴力突袭

指行动者向特定的、具有象征意义或者战略意义的重要地点进军，并且计划占领该地点。这种方法通常属于公民不服从，有遭到警察和军队严厉镇压的风险。1930 年至 1931 年，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发生过多起有组织地占领国会办公室的突袭行动，也发生过一些没有组织的占领政府大楼的尝试。其中著名的案例是突袭达拉萨那食盐仓库。在连续数星期内，几乎每天行动者都排成有序的队伍向达拉萨那食盐仓库进军，计划占领该地点。非暴力占领食盐仓库是反抗英国殖民政府《食盐税法》的一种强度更高的方法，行动者遭到了严厉的镇压。

由于非暴力突袭的行动者不会使用暴力方法占领或者守卫这些地点，因此突袭的主要目的不是占领，而是挑战当局，象征性地违抗现有的法律。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在强度更高的非暴力行动阶段，大规模的行动者可以占领这些地点，并且有效地阻碍对手重新夺回它们——如果军队或者警察的镇压手段有限的话。

1770 年 1 月 18 日，波士顿的行动者在试图对付八名违反不进口协议的商人时使用过这一方法的变体——行动者试图突袭一批货物而不是占领一个地点。违反协议的商人拒绝将进口货物退回，也拒绝把进口货物交给检查委员会。据美国历史学家亚瑟·史列辛格报告：

一千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每个违反不进口协议的商人住宅或者商店进军。

行动者的发言人威廉·莫里内克斯要求商人将进口货物立即交给检查委员会

保管。只有一名叫加里的商人做出了让步。

169. 非暴力空投

指使用飞机、气球或者其他航空运输工具进入对手的领空——不进行或者不威胁进行任何暴力和破坏行动——向民众发送传单、食物和其他物资。（为打破封锁而投放物资的空投属于第 184 种方法反封锁。）有时候，这种空投传单的行动可以产生重要的心理影响。1920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卡普政变发生后，德国政府（被卡普政变推翻的合法政府，这时已经逃往斯图加特）的一架飞机出现在已经被政变分子占领的柏林上空，空投了一捆传单，标题为“**军事独裁的崩溃**”。据陆军中校古德斯皮德的报告：“在城内最繁华的地区，柏林人热情地抓住从空中飘落下来的传单，一边阅读一边欢呼，欢呼声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控制委员会的官员都跑到自己居住的旅馆窗前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非暴力空投有时是暴力行动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空投行动难以取得成效。1965 年 7 月底，美国飞机向越南河内市附近的村庄空投玩具和衣服，目的是向当地平民表达善意。几个星期后，美国飞机在北越民族解放阵线占领区上空盘旋，播放反映家庭生活音响的磁带，和一位越南妇女高喊“回家吧！”的恳求声。美国官员称这是“人道恐怖主义”方法。他们相信，这一方法会使很多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人成为逃兵。

170. 非暴力入侵

指非暴力行动者故意地、公开地进入被禁止进入的区域，以显示他们拒绝承认某些政权、机构在该地区的主权或者控制权，这一方法也可用于其他目的。非暴力入侵涉及公民不服从，有遭到严厉镇压的风险。1955 年，印度活动家大规模非暴力入侵果阿²¹⁸，向葡萄牙殖民政府对印度这一地区行使殖民统治进行挑战，这次行动是非暴力入侵的经典案例。1959 年，一些和平主义者试图进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附近的火箭发射场，还试图“收回”英国哈灵顿军事基地用作和平目的。

218 果阿是葡萄牙殖民者长期占据的印度领土。1955 年 8 月 15 日，三千名至五千名印度非暴力活动家试图进入果阿，但被葡萄牙警方暴力击退，造成近三十人死亡。——译者注

1960 年 1 月，非暴力行动者企图进入北非拉甘核禁区，阻止法国在此进行核试验。行动者原本打算实施非暴力拦截，但是他们未能接近真正的试验地点，所以这一案例因归类于非暴力入侵法国控制的区域。1958 年和 1962 年，美国反核武器活动家也试图进入核禁区，阻止太平洋上的核试验。

171. 非暴力拦截

指用自己的身体拦在对手和对手的工作或者活动目标之间，有时是拦在士兵、警察和他们要镇压的示威者之间，另一些时候是拦在车辆通行的道路上。这一方法与第 172 种方法非暴力阻碍的区别在于，非暴力拦截不构成无法制服或者逾越的实质性阻碍。例如，在非暴力拦截时，士兵、警察或者车辆可以从拦截者的身体上踩过去或者碾压过去，而在非暴力阻碍中则不能。非暴力拦截的目标是说服或者用其他方法劝服被拦截的对手（士兵、车辆驾驶员等），让对方停止不道德的或者非法的活动，至少让对方在继续这些活动时，不会对拦截者造成人道灾难。

由于此方法不是通过施加不可逾越的实质性障碍来实现可能的结果，因此，行动者人数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也可以躺在、坐在坦克和运送战争物资的列车前面，努力劝说驾驶员拒绝驾驶坦克和列车，而不是给那些躺在、坐在面前进行拦截的人造成伤亡。事实上，人数少反而能够增加拦截行动造成的心理或者道德影响。布拉德福德·雷托²¹⁹对个人非暴力拦截（伤亡风险最大，因为司机可能看不见，或者可能认为这个人是在虚张声势）和团体非暴力拦截（参加者伤亡风险较低）进行了区分，他指出：个人非暴力拦截可能更有力量。本节提供的非暴力拦截的案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干涉社会活动或者职务活动；干涉警察和士兵的行动；拦截车辆。

一个不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 1964 年 5 月 13 日，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示威者坐在挪威奥斯陆马德苏德体育场的网球场上，反对挪威队与南非队（全部由白人组成）在戴维斯杯网球赛中的比赛。此方法更常见的用途，是行动者拦截某些团体的工作或者其它活动。例如，1922 年，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参加罢课的学生坐在加尔各答

219 美国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非暴力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1965 年在纽约自由大学发表演讲《非暴力抵抗》而闻名。——译者注

大学门口，阻止前去上课的同学通过。示威者冒着被那些坚持要进入大学校园的同学踩踏的风险，敦促他们参加罢课。同样是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非暴力不合作者还使用类似方法阻止商店出售政府专卖的酒类，“说服”印度裔政府工作人员辞掉工作。印度妇女则使用此方法劝阻在政府工作的丈夫拒绝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195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袜厂工人躺在工厂门口的人行道上，迫使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做出选择，或者从他们身上踩过去进入工厂工作，或者参加罢工。

美国民权运动的行动者也曾使用非暴力拦截的方法，作为对雇主施加影响，迫使他们雇用更多黑人的强有力手段。1963年5月，种族平等大会费城分会和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在有就业歧视的建筑工地阻止白人建筑工人进去工作。

（在这个案例中，行动者和建筑工人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在旧金山，示威者使用拦截的方法最终与当地旅馆和汽车经销商达成了雇用数百名黑人的协议。反对雇佣黑人学徒的纽约市水管工会总部也曾遭到非暴力拦截，最终迫使水管工厂同意雇佣黑人学徒。有些行动者因参与非暴力拦截而被判处长期监禁，说明这种非暴力方法有可能遇到严厉的镇压。

在美国南方，非暴力拦截也曾被白人种族隔离分子用来阻止种族融合。例如，1964年夏天，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市，一对黑人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正准备进入当地一家咖啡馆时被一名律师挡在门外。第二天这一家黑人又来了，还带来了一份《民权法案》。这次店主拦在了门口，店主对他们尖叫，让他们滚开。这对夫妇后来告诉民权活动家，他们不会再去这家咖啡馆。

非暴力行动者也曾经使用此方法拦截警察或者士兵的抓捕行动。此方法还曾用于帮助逃亡黑奴。据美国作家卡尔顿·马比报告：1851年，在联邦《逃亡奴隶法》实施期间，波士顿一家咖啡馆的侍者沙得拉被逮捕，并被指控为弗吉尼亚的逃亡奴隶。他在法院受审期间，大约二十名至四十名黑人进入法院，在法院内大笑，推推搡搡，走来走去，掩护沙得拉逃跑，沙得拉最终逃到了加拿大。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称这一营救行动为叛国，参议员亨利·克莱认为法律应该对行动者进行严厉处罚。不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废除奴隶制团体指出，这一行动没有使用武器，也没有人受伤，著名废奴主义者加里森称这一行动是“手无寸铁的平等自由之

友”所为，是“以不造成伤害的方式，把被压迫者从压迫者手中解救出来的行动”。

1943年初春，保加利亚人得知纳粹正计划驱逐第一批犹太人的时候，首都索非亚的抵抗者发出呼吁，要求人民起来保护犹太人：

站在你们的犹太邻居家门前，不要让他们被武力带走！把孩子藏起来，不要把他们交给刽子手！聚集到犹太人区，证明你们和被压迫的犹太人团结一致！

1962年8月底至9月初，当阿尔及利亚各派势力之间发生对抗，使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受到内战威胁的时候，手无寸铁的民众用血肉之躯拦截在奥兰和君士坦丁之间的公路上，并且宣布：如果一方武装力量坚持要向另一方发起进攻，就让武装力量先来对付他们。在首都阿尔及尔布哈里堡，当地许多居民躺在公路中间，拦截在支持本·贝拉²²⁰和反对本·贝拉的军队之间，显示反对任何内战的决心。

1965年6月，越南反对派佛教徒坐在国家佛教研究所化道院的门前，用自己的身体拦截镇压佛教徒的军队进入。

非暴力拦截也被用于拦截车辆，比如运送货物的汽车、卡车、火车、建筑机械或者坦克。1963年2月11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大学生坐在皇家学院外面的公路上拦截车辆，目的是提醒大学生横穿马路很危险。在美国和英国，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有时带着婴儿和稍大些的幼儿）经常拦截公路和街道，要求政府安装红绿灯或者其他安全装置，保护儿童和其他人不受行驶车辆的影响。此方法也可以用于不同的议题，或者与其他方法一起使用。我们曾在第62种方法学生罢课中描述过这一案例：1963年，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家长们因为孩子上学要经过一条危险的、未加防护的沟渠而发起了罢课行动。为声援这一行动，五十名推着婴儿车和孩子的母亲拦截了沟渠上面一座桥梁的交通。

1963年，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一名失业的砌砖工人为抗议失业，和他的四个孩子手拉手组成了横跨一条繁忙街道的人体屏障。

1930年至1931年，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孟买一位名叫巴布·加努的年轻人拦截在

220 1962年至1965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统，被誉为阿尔及利亚国父。——译者注

一辆运送遭到抵制的布匹的卡车前面，试图阻止它前进，结果卡车从他身上开过去将他轧死。1958年8月，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四名非暴力行动者企图拦截一辆运送物资的卡车驶进附近一个导弹基地，结果造成其中一人重伤。1958年12月，英国斯瓦弗汉姆镇附近一个火箭发射场，行动者两次横躺在公路上拦截设备，迫使运输工人在停止工作和伤害示威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两起行动都没有人受伤，工作暂时打断，舆论大多同情行动者。

1958年，美国纽约州电力局计划淹没印第安人塔斯卡洛拉部落保留地中一千三百英亩土地做蓄水池。该部落成员在提起法律诉讼要求阻止没收土地的同时，发起了三场非暴力拦截行动阻止这项工作的进行。1958年4月，许多塔斯卡洛拉人带着“警告，禁止非法入侵印第安人保留地！”和“你们一定要拿走我们的一切吗？”等标语，站在或者躺在测量员和卡车前面，阻止他们进入保留地。州和县的警察以涉嫌非法集会和行为不检的罪名逮捕了三名示威领导人，其中二人被警方打倒并拖上警车。虽然拦截本身是非暴力的，但是警方与印第安妇女和儿童之间发生了一些扭打。5月，测量员再次进入保留地，塔斯卡洛拉人站在测量仪器前面，使测量工作无法进行。在推土机来清理土地的时候，塔斯卡洛拉人中的清理人员都拒绝这一工作，造成工程再次搁置。与此同时，律师格罗斯曼先生正在为他们的法律诉讼而战斗。美国作家和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向易洛魁族人致歉》一书中写道：“印第安人的拦截行动，以及格罗斯曼律师在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为他们辩护，这些都影响了舆论，也影响了纽约州电力局。”1959年，印第安人赢得了诉讼，判决禁止纽约州电力局继续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建造设施。

1964年4月7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所为进行更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新建的黑人学校受到抗议者的拦截。一辆当时正在躲避躺在前面的抗议者而倒车的推土机不慎将趴在后面地上的二十七岁的长老会牧师布鲁斯·威廉·克伦德轧死。随后发生了暴乱。

纳粹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小镇所有的年轻人都躺在附近的铁轨上，拦截一列运送犹太人的火车驶过。

1953年，东德耶拿市二万五千人进行集会，要求释放不久前在东德起义中被逮捕

的八名示威者。苏联军队试图用坦克驱散人群，但“人群拒绝让步”。据斯蒂芬·布兰特的报告：妇女们成排地坐下，迫使坦克停下来。示威者不用有轨电车阻挡坦克，把苏联军队拖了半个小时。最后，苏联军队向抗议人群头顶上方开枪将他们驱散。

172. 非暴力阻碍

非暴力阻碍和非暴力拦截类似，唯一的区别是，行动者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实质性阻碍。这种实质性阻碍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阻碍行动是由许多人一起实施的；二阻碍者所处的位置让原有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让车辆、警察、军队等无法继续前进，即使他们伤害或者杀害行动者，情况也不会改变。像非暴力拦截一样，这种方法也会有被捕、伤亡的高风险。这种阻碍一般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除非：1) 人数非常多，长期坚持，超出了对手能够而且愿意动用的人员、设备和武器的控制能力；2) 对手不愿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杀死所有阻碍者；3) 工人、执法人员、警察、军队同情或者开始同情示威者；4) 民众反对有关问题或者反对镇压阻碍者的示威足够强大，足以迫使对手放弃或者暂时停止令人反感的行动。

1850 年至 1852 年，美国废奴主义者对使用非暴力阻碍保护逃亡奴隶提出了各种建议。例如，罗德岛废除奴隶制社提出，对于那些已经颁发逮捕令，不可能把他们隐藏起来或者帮助他们逃跑的的奴隶，“应该有一个人员足够多而且有足够影响的和平委员会把他们包围起来，保护他们不受攻击和抓捕”。著名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提议，在逃亡奴隶已经被关起来的情况下，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人非暴力地包围关押逃亡奴隶的建筑，要求执法官“从我们的身体上踏过去”，以阻止奴隶被送回南方。《全国废除奴隶制标准期刊》刊登文章：一群和平而且愿意付出生命的人，能够保护一个逃跑的奴隶不受暴力伤害。我们号召这样的人“手无寸铁，但是决心不让一个奴隶被带走，除非踏过我们的身体”。这会是一场“革命行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高尚的行动，我们一点也不怀疑，这一定会是有效的行动。我们很难相信，武装士兵会骑马踏过和砍倒他们的公民同胞，让这些公民同胞带着平静但是绝望的决心死去”。

下面这些案例显示，非暴力拦截和非暴力阻碍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确定。

1956 年 12 月初，在匈牙利，当大批警察和士兵前往丹努比亚纺织厂逮捕三名工人委员会成员时，七百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堵住了工厂大门。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和士兵最终没能将这三个带走。1956 年，在日本砂川，一万多人占领了一个准备用作美国空军基地的地方。这一非暴力阻碍行动进行数日后，当局放弃了建造空军基地的计划。1963 年 7 月 22 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大约一千二百五十人参加了一次阻碍公共建设工程的行动，目的是让建设工程公司雇用更多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在这次行动中，有二百多名非暴力阻碍者被捕，其中包括至少十名牧师和教会神职人员。据《纽约时报》记者彼得·基斯报道：“在将近八个小时的时间里，一波又一波黑人和白人支持者冲到开进来的建筑车辆前面，坐在或者躺在道路上，每次十二个人。他们遭到逮捕，送进囚车带走。”

据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阿瑟·沃什科报告：1963 年秋天，因为担心州长罗斯·巴尼特藐视要求密西西比大学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庭命令而被联邦警察逮捕，成千上万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种族隔离分子坐在州长府邸周围，“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州长与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之间，进行了一场‘不那么暴力’的抵抗”。

173. 非暴力占领

非暴力占领可以用于非暴力入侵或者非暴力夺取土地的方法之后。被命令离开自己土地或者建筑的人也可以使用这一方法。非暴力占领可能涉及技术入侵和违反法律。公元 385 年复活节期间，米兰的安波罗修主教就曾经违抗罗马帝国要求把米兰的一座大教堂交给阿里乌斯派基督徒的命令，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非暴力占领。当时教堂已经被军队包围，但是安波罗修主教冒着入狱和死亡的危险进行了五天弥撒。最后，政府命令军队撤退。安波罗修主教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军队一听到撤退的命令，立即冲进教堂接受和平之吻。”

1928 年，印度巴尔多利运动期间，因为拒绝纳税而被查封土地的农民或者拒绝离开自己的土地，或者重新返回自己的土地，在上面耕地、种植作物。他们说，无论这些土地目前的法律地位如何，从道德上说这些土地仍然属于他们，他们有权把土地用于建设性目的。

1957年8月，大约二百名印第安莫霍克人在纽约猎人堡附近的斯科哈里河河岸居住下来，建了一座长屋（礼拜场所）和六座小屋（居住场所）。在圣劳伦斯海道²²¹修建的时候，他们被从自己家园驱赶了出去。莫霍克人声称，根据公元十八世纪签订的一项条约，他们对现在占领的这块土地拥有主权。他们不承认当地的驱逐令，也不会和地方和州的政府官员打交道。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意思是相当于一个国家——编者按），所以只和联邦政府打交道。

美国印第安人进行的最著名的非暴力占领行动发生在旧金山阿尔卡特拉斯岛²²²。

1969年11月9日，几名印第安人游过旧金山湾水域，登上阿尔卡特拉斯岛。十一天之后，另外一百多人加入进来。他们根据某些古老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主张对这一岛屿拥有所有权。这些古老条约规定，部落原始领土内所有废弃土地归原住民所有。印第安人希望把这一地点变成美国印第安人教育文化中心，并且通过占领该岛证明他们的决心。当局切断了水、电，占领者用两台出了故障的发电机和少量可以用罐子携带的饮用水度日。他们的占领行动得到了陆地上许多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的支持，这些人为占领者捐赠食物、衣物和药品。占领者在岛上建了一座小型学校，许多家庭开始在岛上长期定居。该岛成为新印第安人运动的中心。作为抗议美国政府在印第安人事务上的不当之举，这次行动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成功标志。阿尔卡特拉斯岛一直被占领者控制，直到1971年6月14日，联邦警察登上该岛，将印地安占领者带走。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占领军包围政府大楼的时候，政府官员和议员仍然留在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工作。《政治》杂志报道：

8月24日下午，政府大楼被封锁了，坦克的炮筒指向大楼，枪炮矗立在附近的科拉罗夫小公园，但政府还在运转。二十二名部长召开会议讨论并做出决策，向议会报告自己的工作，与党的新领导层保持接触。

221 一系列连接大西洋至北美五大湖的运河、船闸和航道，以圣劳伦斯河为名。海道全长三千七百公里，东起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和朗基尔，西至威兰运河伊利湖出口并包含该运河在内。美国和加拿大约四分之一人口居住在该流域。——译者注

222 又称恶魔岛，1933年至1963年，这里是联邦监狱，关押过许多知名的重刑犯。电影《勇闯夺命岛》曾在这里取景。——编者注

《政治》杂志还报道，国民议会第二十六届非常会议已经持续了四天：

国民议会大楼被占领军包围，但是代表们没有离开，他们把自己软禁在里面。共和国各地有将近二百名代表遵照常务委员会的召集前来，已占代表总数将近三分之二多数。第一天晚上，代表们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第二天晚上，他们得到了毯子，更重要的是，女士们得到了行军床。晚上，机枪齐射，国民议会大楼的窗子震得咯咯作响。但餐厅里的供应仍然令人满意……

无论是指向国民议会窗户的炮筒还是逮捕的威胁，都不能使代表们屈服。国民议会常务会议将会继续工作，直到找到某些解决侵略的方案为止。

（三）社会干涉

非暴力干涉方法第三个子分类的主要特征，是直接干涉社会行为模式、社会活动和社会制度。除了这里列出的 7 种方法之外，其他某些方法——比如静坐占领——也可以对社会进行干涉，但其主要形式属于身体干涉。

174. 建立新的社会模式

第 63 种方法社会不服从属于社会不合作这一分类。社会不服从包括不服从各种社会习俗、规则、规章、惯例或者行为模式，而社会干涉中的方法则是指为建立新的社会模式做出积极贡献的新的行为方式。这些新的行为方式可能是个人、团体的计划外行动，也可能是有组织的反对派团体的计划内行动。它可能涉及各种社会模式，但是我们很容易用一种社会模式举例说明：用平等和尊重的新的社会模式，代替不平等和仇恨的社会模式。1830 年代，美国白人废奴主义者和黑人交往——有时是自然而然地行动，有时是有意识的行动。当时，即使是在北方城市，黑人也时常遭到社会抵制。据美国作家卡尔顿·马比报告：在贵格派基督徒莎拉·格里姆克的建议下，美国妇女废除奴隶制大会于 1838 年通过一项声明：“……废奴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和受压迫的黑人一起出现在教堂里，出现在街道上，出现在汽船和马车上，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支持。去他们家拜访，也鼓励他们来拜访我们，我们要像接待白人同胞那样接待他们，以此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认同。”然而，有些废奴主义者不赞同这种做法，害怕这会引发针对废奴主义者或者黑奴的暴力行为。也有人认为，奴

隶制问题和种族偏见问题应该分开对待。在废奴主义者中，是否应该与自己不同肤色的人公开交往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以至于 1836 年美国废除奴隶制社²²³在这一问题上几乎发生分裂。

波士顿、费城、纽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废奴主义者都参加了与你同行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白人废奴主义者与自己不同肤色的人一起走在街上——通常是异性，有时还挽着胳膊——这种行为时常激怒其他白人。一位名叫柳克丽霞·莫特的废奴主义者一直坚持公开与黑人一起出行，1839 年，费城市长要求柳克丽霞·莫特不要这样做，因为当时一场反对黑人的暴乱一触即发，这样做会冒犯那些支持奴隶制的白人暴徒。在一次聚会之后，波士顿内科医生亨利·鲍迪奇邀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他一起沿着华盛顿街步行回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这是第一次有白人把他当人对待。1849 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他创办的刊物《北极星》上撰文写道：废奴主义者消除偏见的方法应该“就像偏见不存在一样行动，不顾肤色差异，和自己的人类同胞交往。我们已经为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决心不管冒什么样的危险，也要把这条路走到底”。

1840 年，美国废除奴隶制社在纽约召开年会期间，黑人和白人一起用餐，受到白人暴徒的骚扰。不过在 1847 年和 1858 年，类似的活动没有再受到干扰。白人和黑人私下也会违背“反对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平等禁忌”一起用餐。在一次贵格派基督徒教友年会上，艾萨克·胡珀为了反对贵格派教徒的偏见，邀请黑人贵格派基督徒大卫·马普夫妇和他一起用餐，并且告诉其他客人，如果他们不愿一起用餐，可以等他和马普夫妇用完餐之后再用餐，但最终没有人这样做。各种废奴主义者都曾在自己家里招待过旅行中的不同肤色的废奴主义者。在印第安纳州彭德尔顿，一位曾经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843 年巡回演讲期间接待过他的贵格派基督徒医生竟然被一群暴徒赶出了居住的镇子。即使在废奴团体内部，社会平等也没有完全被接受。例如，大约在 1835 年，唯一神教派传教士威廉·埃勒里·钱宁曾提议，废奴主义团体不应接受黑人作为其成员。这一提议没有被认可，事实上，许多黑人在全国废奴主义团体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但是直到 1840 年代至 1850 年代，黑人仍

223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亚瑟·塔潘创建的废除奴隶制社团。——译者注

然感到自己没有废奴主义团体完全接受。

废奴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了跨种族婚姻。这些婚姻明确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模式，违背了跨种族婚姻的社会禁忌。这种婚姻有时甚至是非法的。例如，马萨诸塞州直到1843年才废除有关法律。当时，跨越种族障碍结婚的男女，经常要面对多种压力和惩罚，包括被迫搬离自己居住的区域，受到社会排斥，肢体攻击和失业等。但是加拿大的白人女性经常与逃亡到那里去的黑奴结婚。美国内战期间，波士顿市的统计数字显示，某一年结婚的黑人中，有百分之十六的配偶是白人。

这一方法的一种变体，是个人坚持要求在公共设施——比如餐馆——得到平等接待。例如，1837年，《有色美国人》期刊的所有者菲利普·贝尔和总代理查尔斯·雷从纽约市出发，在乘汽船沿哈德逊河逆流而上的旅程中，拒绝在厨房喝茶，坚持要在餐室喝茶，哪怕他们不得不等到白人喝完茶之后再受到接待。菲利普·贝尔和查尔斯·雷表示：“作为黑人，我们不会自己贬低自己。”同样也是在哈德逊河的一艘汽船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坚持要像其他旅客一样用餐，结果受到被扔下船去的威胁。1857年，在克利夫兰参加废奴主义者大会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领导人苏珊·安东尼和其他代表，因为旅馆餐厅不允许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韦尔斯·布朗和她们一起进去而拒绝用餐，直到旅馆做出让步，承诺会议期间提供平等服务为止。

在印度，也有许多为了消灭不可接触者制度，实现社区团结而采取的类似行动。从1930年代开始，著名的甘地主义者、无神论活动家戈拉（婆罗门阶层）就曾在印度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跨种姓和跨宗教的餐会。参加餐会的每个人自己带食物来，做饭和吃饭的时候不考虑种姓和宗教禁忌（正统的印度教禁止跨种姓一起用餐）。有时需要做出特别的努力来克服较低种姓的印度人在与比自己更低种姓群体一起吃饭时的犹豫不决。作为一种结束不可接触者制度的手段，也有跨种姓婚姻的实践，甚至受到鼓励。例如，戈拉就鼓励自己的孩子跨越种姓障碍，和其他种姓的人，包括不可接触者结婚，他的孩子也确实这样做了。

175. 让设施超负荷

指故意增加服务需求，让服务需求远超其服务能力，让政府部门、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等运转变慢或者瘫痪。这种让设施超负荷行动，可能由消费者、公众或者政府部门、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的员工发起。目标包括要求改善服务，增加工资，也可能出于政治目的。

1965 年 11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立医院要求增加工资的住院实习医生发起了一个让设施超负荷行动，采用的方法是接收更多的病人住院，远远超过现有设施能承受的程度——即使不需要住院的病人也接收住院，以便住院实习医生们在与医院管理部门谈判时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四天之内，医院就住满了病人，这一行动使该市多花了大约二十五万美元。

美国波士顿市立医院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1967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波士顿市立医院的四百五十名住院实习医生宣布他们发起了让医院超负荷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增加工资。当时，一名住院实习医生的税后工资每星期只有六十美元。由于医生罢工有违自己的誓言，因此，他们替代罢工的方法是让医院住满病人。住院实习医生协会主席菲利普·卡贝尔医生说：“每个病人都得到了最好的照料”，代价是所有住院实习医生每天要工作二十四小时。“每位可以从住院中获益的病人都被允许住院，在完全康复之前，没有病人出院。”

这场让设施超负荷运转行动是模仿十八个月前洛杉矶县立医院的住院实习生采取的类似行动。事实上，5 月 13 日星期六，波士顿市立医院的住院实习医生就开始了让设施超负荷运转行动，他们把这作为一个未经宣布的实验。抗议开始时，医院有住院病人八百七十四名，到星期日，医院有住院病人八百九十名，到星期一，医院有住院病人九百二十四名，到星期二上午七点（宣布行动开始之后）医院有住院病人九百八十二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当医院有住院病人一千二百名以上时，洗衣房的服务就跟不上了，厨房也来不及供应食物，X 光和检验科会忙得不可开交，院方就会开始认真考虑我们的要求……”。到星期三上午，医院有住院病人超过一千名，到星期四，医院有住院病人一千零七十五名。让设施超负荷运转得到了波士顿其他医院住院实习医生和私立医院医生的支持。该行动只发生在波士顿市立医院，因为与私立医院不同，市立医院的住院实习医生负责收治住院病人。

5月16日星期二下午，管理部门采取了反制措施，宣布已经没有更多的床位提供给男性病人。当天晚上，住院实习医生们又收治了二名病人作为对管理部门的反驳。接下来，管理部门试图影响科室主任推翻收治决定，科室主任拒绝这样做，理由是住院的病人都得到了最好的照料。管理部门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否认他们有能力改变工资待遇。5月18日星期四傍晚，院方终于承诺调整住院实习医生的工资后，住院实习医生们自愿结束了这场行动。观察者认为，这是一个“支持提高工资要求的安全、有效的方法。”

这一方法的学生版本发生在1954年的日本。当时，某些私立大学的惯例是招收学生会超出学校教室的一定容量。因为校方认为，所有学生不会在同一时间上课。但是学生们组织了一个“联合出勤”行动，给大学的这一惯例施加压力。

176. 拖延示威

指尽可能慢速地办理合法的义务。这一方法与我们在政治不合作中介绍过的第144种方法拖延和阻碍不同之处在于，拖延和阻碍是政府工作人员采取的行动，目的是拖延和阻碍某些政策或者命令的实施。拖延示威是消费者或者顾客采取的行动，目的是社会性的，但是也可能包含经济性和政治性目的。1964年6月，美国种族平等大会曾经采用这一方法对付加州圣迭戈市美国银行。种族平等大会每位支持者在美银行用三十分钟时间完成一般只需大约三分钟就能办理好的业务。种族平等大会的目标是结束美银行在雇工方面的种族歧视。1938年，为了配合美国纽约市哈莱姆黑人社区的断电抵制行动（见第71种方法消费者抵制），成百上千用户前往电力公司办公室，每个人都用一分钱或者五分钱硬币支付电费。

177. 强行演讲

指行动者打断正在进行的会议、礼拜仪式或者集会，目的是发表与这些场合有关或者无关问题的观点。这一方法主要是一种社会干涉手段，但也包含心理干涉和身体干涉的因素。

乔治·福克斯²²⁴和早期贵格派基督徒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例如，乔治·福克斯在他

224 基督教贵格派创始人，英国重要的反对国教派人士。他的日记广为流传。——译者注

的日记中记录了 1649 年的某个星期日，他在英国诺丁汉圣玛利亚尖顶房屋（教堂）

²²⁵ “受到圣灵推动”，在牧师进行常规宗教仪式的时候他发表了演讲。

现在，就在我看着这个小镇的时候，最大的尖顶房屋——一个巨大的崇拜偶像的地方——撞击着我的生命。上帝对我说：“你必须大声反对那里的大偶像，反对那里的崇拜者。”我来到这里，这里所有人看上去就像休耕的土地，牧师站在讲坛上就像一大块泥土。牧师的演讲引用了圣彼得的话：“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是好的。”牧师告诉人们，经文是检验所有教义、宗教和观点的法官和试金石。现在，主施加在我身上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不得不大声说：“噢，不，不是经文”，是圣灵基督的门徒在圣灵的指引下写出了检验所有观点、宗教和判断的经文。当我在他们当中这样说的时候，警察把我带走，关进了监狱，一个臭烘烘的地方……

1651 年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英国约克郡克兰斯威克的一位朋友带乔治·福克斯去见当地牧师。在宗教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乔治·福克斯和牧师有一段对话：

牧师引用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一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我在圣灵的感召下对他说：“从讲坛上下来吧，你这个骗子和市侩，你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可是你给信众讲道，却从他们那里收三百英镑。你不脸红吗？’”牧师目瞪口呆，躲了起来。于是我有机会站到讲坛上讲话，我引导会众走向能够教导他们，给他们带来救赎的上帝的慈悲……

乔治·福克斯并不总是打断常规的宗教仪式，有时他会等常规宗教仪式结束后再对牧师和会众讲话，就像 1652 年他在唐克斯特所做的那样：

……牧师讲完道之后，我对他和会众讲了主命令我讲的话。他们非常愤怒，把我扔下楼梯，然后把我拉到市长和治安官面前。他们说，如果我再来这里，就要把我杀了……

225 贵格派的信条之一是不用敬语，他们称星期日为第一天，称教堂为尖顶房屋，称教会活动为聚会，等等。——译者注

美国废除奴隶制运动期间，行动者有时也会打断教会的礼拜仪式，谴责教会没有支持废除奴隶制。许多教堂拒绝为废除奴隶制会议提供场地。据美国作家卡尔顿·马比报告：

1841 年一个星期日上午，坚定的加里森派年轻活动家史蒂芬·福斯特走进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一家公理会教堂参加礼拜。在礼拜间歇，他站起来谴责教会支持奴隶制。牧师让史蒂芬·福斯特停止讲话，但是他继续讲，直到一些会众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出去。这天下午，史蒂芬·福斯特又回来参加另一场礼拜，并且再次未经许可发言。这次，他被会众扔下了楼梯，还因扰乱公共礼拜活动遭到逮捕。

废奴主义者在使用这一方法时十分小心谨慎，只要有可能，就会尽量用更让人愉快的方式进行演讲：

……乔治·福克斯和他的团队一般不打断礼拜仪式，除非他们经过努力，仍然无法得到演讲的许可，包括要求使用教堂场地召开会议。

178. 活报剧

活报剧是另一种社会干涉方法，包括扰乱正常秩序的小品、戏剧或者类似的表演。这一方法从 1960 年代末开始在美国使用。它可以用来打断发言、演讲，或者打断某些团体、机构的正常程序。（活报剧也可以是即兴表演的舞台剧，通常是政治主题。）

1960 年代末，最著名的反战领导人和反文化偶像之一杰里·鲁宾提供了两个活报剧的案例。1967 年底，华盛顿特区一所大学的校报编辑会议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对越南战争表明立场：

有人提出动议，搁置所有决议，不表明立场。动议通过了。突然，灯灭了，墙上出现一系列电影画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场面，越南村庄的燃烧场面，越南妇女哭泣和儿童被凝固汽油弹炸死的场面……。会议室回荡着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制止它！制止它！”

这时，一个手提式扩音器响起：“注意！我是华盛顿警察局哈格蒂中士。这

些影片是从北越非法偷运进美国的。我们已经没收了它们，并且逮捕了对此负有责任的人。现在你们离开这间屋子！我们将逮捕两分钟之后还留在这里的所有人！”

编辑们冲向大门，他们以为自己因为看了这部电影面遭到逮捕，他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纳粹国家。他们相信了这个场景。

杰里·鲁宾提供的另一个活报剧的案例发生在 1967 年 8 月，他和他的朋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使用这一方法谴责美国人对金钱的痴迷：

我们出现在窗台上的时候，股市完全停顿了。成千上万名经纪人停下了股票交易，向我们鼓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疯狂的景象啊——长头发的嬉皮士从上面低头看着他们。

我们把美钞从窗台上扔下去。空中到处飘浮着现金。股票经纪人就像野兽一样，互相推搡着，去抓这些钱。

我们喊道：“这就是一切，真正的钱，真正的美钞！但比亚法拉²²⁶的非洲人正在挨饿！……”

警察来了。警察抓住我们，把我们扔下窗台，拖进电梯。股票经纪人大声地“嘘”警察。

179. 替代性社会机构

非暴力干涉可以采用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替代性机构。当替代性机构的建立和成长与对手的机构形成挑战的时候，替代性机构就是一种非暴力干涉。替代性机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干涉。例如，与对手的机构形成竞争，部分或者完全替代对手的机构，为落实行动者的原则或者计划提供场所，提高其他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有效性。如果能满足前述条件，对手的机构就无法再将这一领域占为己有，行动者就能够通过替代性机构进行干涉。替代性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将在后面介绍（见第 190 种方

226 1967 年 5 月 30 日，分离主义者在尼日利亚东南部成立的一个未被普遍承认的国家。得名于其南边濒临大西洋的比亚法拉海湾。1970 年 1 月 12 日，该政权军事首领正式宣布有条件投降。——译者注

法至 192 种方法和第 198 种方法——编者注)，本方法介绍的重点是替代性社会机构，其中包括教育机构。

先简要说明为什么要建立替代性机构。例如，在一场长期的非暴力斗争中，要采取与对手的机构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对应措施，就是建立替代性社会机构、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为了让不合作行动产生效果，为了形成或者维持替代性社会秩序，就必须建立替代性机构。有时候建立替代性机构是为了满足被对手的机构忽视的需求。

公元十九世纪，匈牙利人在抵抗奥地利统治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自己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社会机构包括国家科学院、国家博物馆和国家戏剧院，经济机构包括农业联合会、国家保护联盟和商业公司。1905 年，爱尔兰的阿瑟·格里菲斯²²⁷为新芬党制定了类似的政策：为了让国家恢复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仿照匈牙利模式，在爱尔兰建立替代性教育、经济、政治和外交机构。甘地也发展了替代性机构的理论，将其作为建设性计划的关键内容。

抵抗运动也可以只选择发展少数几个替代性机构。例如，公元十九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和黑人牧师为了抗议种族隔离政策，退出了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教会。有些人建立了新的教会做为替代性机构。1821 年建立的非裔人美以美锡安会就是这样的替代性教会。

内战之前，废奴主义者除了私下教黑奴和自由黑人读书、写字之外，也专门为他们成立了一些新的学校，这些学校有时也会招收跨种族学生。在许多州，这种私下教学和成立学校都是法律禁止的。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市为了解散一个奴隶学校，成立了大陪审团，这个大陪审团认为：这所学校会启蒙“那些将幸福建立在无知上的人”。佐治亚州萨凡纳镇一名黑人妇女曾经在黑人学校非法教书超过三十年时间。在另一些案例中，教师会到私人住宅去教书。例如，弗吉尼亚州彼得堡市一名黑白混血儿每晚挨家挨户秘密地给黑人上课。1850 年代末，约翰·费牧师在肯塔基州成立了一所种族融合学校。学校建立之后，很快被支持奴隶制的白人暴徒烧毁。尽

227 新芬党创始人。是 1921 年在伦敦缔结《英爱条约》时的爱尔兰代表。1922 年 1 月至 8 月担任爱尔兰下议院主席。——译者注

管受到威胁，但是约翰·费牧师拒绝携带武器，哪怕是为了自卫也不带。虽然经常遭到围攻，但是他继续建立种族融合学校。在巴尔的摩市和首都华盛顿，暴徒砸烂了几所天主教会、贵格派教会和黑人教会出资成立的免费黑人学校的家具，烧毁了校舍，把一些教师赶出了首都。1850年代初，贵格派基督徒帮助默特尔蒂亚·迈纳²²⁸在华盛顿特区为黑人建立了一所师范学校，街上的白人男孩经常捉弄这所学校的黑人学生。有一天，一伙暴徒侵入这所学校的教室，默特尔蒂亚·迈纳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嘲笑他们，让他们感到丢脸。当这伙暴徒威胁要烧掉校舍时，她说，这样做并不能阻止她，因为另一座校舍很快会从烧毁的灰烬中建立起来，而且比原来的校舍更好。”1860年，有人纵火想烧毁学校，但学校幸存了下来。

学校是最常见的替代性社会机构之一。还有两个案例也涉及学校，不过这两个案例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波兰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独立于纳粹控制的替代性教育系统。1942年，仅在华沙地区就有超过八万五千名儿童在这个替代性教育系统设在私人住宅的秘密课堂接受教育。超过一千七百人在这里完成了高中学业，获得了毕业证明，战后可以换成正式文凭。

在美国南方，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也创建了替代性私立学校系统，用来对抗联邦法院要求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融合的判决。例如，1958年秋天，弗吉尼亚州政府试图使用州政府补助为私立学校的白人儿童交学费。联邦法院裁决，禁止用公款给私立种族隔离学校的教师发工资，以阻止用私立学校代替种族融合的公立学校的做法。

180. 替代性媒体和通讯系统

在政府广泛控制、垄断媒体和通讯系统的情况下，反对派团体可以建立替代性媒体和通讯系统，既可以打破政府对信息和思想交流的控制、垄断，也可以构成非暴力干涉。替代性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替代性通讯系统包括公共通讯系统和个人之间的通讯系统，用来替代受政府控制、垄断的邮政或者电话系统。根据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中的介绍，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属于抗议与说服这个大类别。但是当这些媒体发展成具有足够规模，能够挑战政府控制的媒体时，它就变

228 美国教育家和废奴主义者，她为反对种族主义而建立的黑人女子学校，后来发展成首都华盛顿唯一的公立大学——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编者注

成了非暴力行动者的有力工具，这一系统又可以帮助行动者使用其他方法进行抵抗和干涉。

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中介绍的某些纳粹占领国家的地下报纸，其规模足以构成替代性媒体系统。例如，在德国军队入侵荷兰的第二天，第一份手写的地下报纸就出现了，很快就有了更多手写或者打印的传单和报纸，这被称为“雪球信”（期望读者复制并传给朋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大型期刊也出现了，还发展到了非常大的发行量。《口号报》是第一个出版的地下报纸，一开始发行量有六千份，1944年发行量达到六万份，其每日新闻公报特刊的发行量达到将近十万份。1944年9月，《自由荷兰报》及其地方版的发行量达到十万份。《我将坚持》从一个很小的油印单张发展成周刊，1945年的发行量是四万份。《忠诚报》的基本发行量有六万份，它还有约六十个地方版和地区版。1945年1月，《忠诚报》所有版本和新闻公报特刊的总发行量大约为二百万份。1944年，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印刷的《真相报》周刊发行量达到十万份，《我们的人民》发行量达到十二万份。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地下期刊和报纸出版、发行，1943年5月，占领当局没收了收音机之后，期刊和报纸的发行量更是迅速增长，1943年出现了一百五十种独立报纸，1944年9月到1945年1月出现了三百五十种新闻小报，“累计发行量达到数百万份”。地下报纸形成了一个如此广泛的沟通政治思想，讨论抵抗战术和传播新闻的替代性媒体系统，打破了纳粹控制的媒体和经过审查的新闻报道的垄断地位。

替代性通讯系统更加专业化，在常规的通讯媒体（比如邮政服务、电话等）遭到拦截或者窃听的时候，向特定的个人或者团体传递信息和专门讯息。

我们在非暴力抗议与说服中简单介绍过替代性电台和电视台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占领后运转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这是到本书写作时为止，有关这种替代性广播系统在被占领国家运转情况的最新进展。事实上，它在这种情况下运转的时间要比人们想象的长得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很少关注让这种替代性广播系统持续运转几个月、几年所涉及的技术、组织或者其他需求。

（四）经济干涉

非暴力干涉也可以采取经济手段。不过，在本节的 12 种方法中，某些方法的效果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另一些方法的效果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通常还附带有政治结果。其中逆向罢工、留厂罢工、非暴力夺取土地、反封锁这 4 种方法兼有身体干涉和经济干涉的特征。出于政治动机的伪造、排他性购买、没收他国财产、国际市场倾销这 4 种方法的目的是破坏对手的经济，尤其是破坏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它们通常涉及政府的行动，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涉及私人机构的行动。最后 4 种方法主要是非政府性质的，涉及创建、改变或者增加替代性购买、销售、运输和生产能力。

181. 逆向罢工

指工作时间比实际需要的或者工资要求的时间更长，工作更辛苦，以支持自己增加工资的要求，让雇主难以拒绝这一要求。逆向罢工形式上是经济方面的，但其影响主要是心理方面的。逆向罢工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非暴力行动方式，1950 年前后（发生在意大利非暴力社会变革倡导者达尼洛·道尔奇在西西里领导的著名的逆向罢工之前）由意大利农业工人最先使用。

失业者也可以用逆向罢工的方法戏剧性地展示自己的工作需求。例如，1956 年，意大利西西里失业者在达尼洛·道尔奇的领导下使用这一方法：他们自愿修理一条公路，目的是唤起人们关注政府未能适当解决该地区严重的失业率，以及宪法对工作权的保障。达尼洛·道尔奇等人因逆向罢工遭到逮捕。

据美国种族平等大会前任领导人詹姆斯·法玛尔的报告：种族平等大会最近（没有给出具体日期）在芝加哥组织了失业非裔美国青年打扫贫民窟的行动，然后给市政厅寄去账单，列举了这项工作的花费（市政厅从未付款）。詹姆斯·法玛尔说，他们的做法是“未得到批准而从事公共服务”。

1968 年 8 月 25 日，苏联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第一个星期日，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机械厂之一摩拉维亚·科尔本-丹历公司的大多数工人（包括办公室职员）参加了一个班外轮班，他们将其称为杜布切克星期日，目的是通过建设经济（而不是罢工，因为罢工会伤害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苏联）来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合法的杜布切克政府。另一家压缩机厂也参加了杜布切克星期日行动，不过因为班外轮班的号召

传播得晚了，所有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员工参加。

逆向罢工虽然看似无害，对现有秩序也不会产生威胁，但是在意大利，逆向罢工的参加者会遭到逮捕和监禁，警察甚至会向他们开枪。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或许意大利的政府官员认为，逆向罢工比普通罢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182. 留厂罢工

留厂罢工是指工人停止工作，但是留在工作场所，拒绝离开，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在矿工使用这一方法时，称为井下罢工，因为罢工期间，矿工留在矿井下面。

对罢工者来说，留厂罢工有许多优点：工人能够控制生产工具，降低罢工破坏者继续生产的可能性。除非留厂罢工的工人遭到警察或者军队的攻击，否则罢工中发生暴力和破坏事件的可能性很低。

约瑟夫·雷贝克在《美国劳工史》一书中写道：“公元十九世纪，缝纫业女工至少进行过一次留厂罢工。”这一方法也曾在波兰、法国、美国使用过。有证据显示，留厂罢工在美国的发展受到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斗争的影响。

1930年代，留厂罢工在欧洲和美国广泛使用。1936年，俄亥俄州阿克伦市橡胶工人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留厂罢工。同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汽车工人也进行了一场留厂罢工。1936年10月，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市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因反对加快生产速度，也进行了留厂罢工。同年11月13日，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工厂的工人再次使用这一方法，目的是反对解雇工会会员。

约瑟夫·雷贝克认为：正是汽车工人产业联合会组织的反对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才使留厂罢工这一形式广为人知。“这场罢工的形式很新鲜，工人没有走出工厂，而是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事实证明，留厂罢工非常有效。”通用汽车公司谴责这一行动是非法侵犯财产，要把工人赶出去。公司切断了工厂的供暖，但工人仍然留在工厂里面。弗林特市警方发动了两次攻击，都被罢工者的暴力反抗击退了。工人们用咖啡杯、软饮料瓶、铁栓和铰链对付警察，用灭火水龙对付催泪弹。州长弗兰克·墨菲拒绝派遣国民警卫队把罢工工人赶出工厂。工人违抗

法院的撤离令，声称罢工的目的是要求通用汽车公司“遵守法律，进行集体谈判”。反对通用汽车公司藐视《瓦格纳法案》²²⁹，拒绝承认工会和集体谈判。1936年2月4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要求双方恢复谈判。一星期之后，谈判达成协议，公司承认工会，同意平等对等工会会员。

约瑟夫·雷贝克还举了一个案例：1937年4月，一场短暂的留厂罢工迫使克莱斯勒公司做出了让步。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橡胶、纺织、玻璃和其他许多产业的大约五十万名工人参加了留厂罢工。这些行动引起了雇主、媒体、公共部门、美国参议院、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强烈关注。产业工会联合会主要用这一方法对付那些无视或者违反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政策的公司。但是，至1937年夏天，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态度改变了，它认为，留厂罢工“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适当的”。此后，他们放弃了留厂罢工。193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禁止留厂罢工，认为它侵犯私有财产。

留厂罢工在美国主要用于在主张有关工资、工作条件和承认工会等要求时给资方施加压力。但是在墨索里尼掌权之前的意大利，这一方法的使用具有革命性质——工人要接管工厂，自己经营。这些案例有时包含暴力因素。

矿工进行井下罢工的案例也很多。1934年，匈牙利佩奇市矿工在矿井下进行了一场兼有井下罢工和绝食的行动。威尔士的煤矿工人也使用过井下罢工的方法，其中包括两个案例：1959年9月，南威尔士拉内利市附近的大山煤矿进行了井下罢工，有八名矿工参加。1960年3月，威尔士格拉摩根横石煤矿也进行了井下罢工，有三十七名矿工参加。

1953年6月东德起义期间，比特费尔德镇的工人使用留厂罢工做为非暴力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非常有效，它代替了街头斗争，避免与苏联军队和东德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宣布：“我们通过城市广播电台呼吁工人回到自己的工厂去，但不要恢复工作。”德国历史学家雷纳·希德布朗在评价这一方法在东

229 即1935年实施的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因由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起草而得名。该法保障私营部门员工有权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采取罢工等集体行动。该法案由第七十四届美国国会通过，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译者注

德起义中的整体使用情况时写道：“……在某些工厂，留厂罢工持续了数日之久，无人伤亡，甚至还使一些因为罢工而遭到逮捕的工友获得了释放。”

183. 非暴力夺取土地

指行动者用非暴力的方法征用和利用在法律上属于他人的土地，制造事实上的控制权的变更。行动者也希望这种变更在法律上被承认为所有权变更。这种行动通常是无地农民夺取他们以前耕种的大地主的土地。在有些情况下，被夺取的土地属于政府所有，或者是政府最近没收的土地——作为对民众抵抗政府（比如抗税）的惩罚。

非暴力夺取土地的发生条件有很大差异。有时行动是在政府的批准下，或者是在社会中强势群体的鼓励下进行的。世界各地都发生过此类行动。

从现有的夺取土地行动的记录中，我们很难确定某次具体的夺取土地行动是完全非暴力的，主要是非暴力的，还是与重大暴力行动相结合的。因此，在对这种案例做进一步研究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919年至1920年，意大利中部、南部和西西里地区都发生过农民夺取土地的案例。据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顿-沃森的报告，农民夺取土地的行动始于1919年8月，发生在罗马乡村地区。

黎明时分，一队队农民从村庄出发，打着横幅，奏着军乐，向他们要夺取的土地进军。他们在荒地上划出条块，然后开始垦荒，以便确立使用权。农民夺取的土地往往是数十年激烈争议的产权，农民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属于自己所有。9月，政府批准地方行政长官征用荒地，有需要的申请者如果组成合作社，地方行政长官就把征用的荒地分配给他们。1920年春，西西里天主教农民联盟经常在教区神父的鼓励下，组织大规模夺取土地行动。当时，政府只承认有足够耕种能力的农民提出的土地要求。通过夺取土地行动永久改变所有权的土地总量很小。

南美洲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和巴西等国家都发生过大量夺取土地的案例。1929年，哥伦比亚农民联盟在昆迪纳马卡省、托利马省和山谷省夺取土地的手段明显采用了防卫性暴力。农民联盟还在以前的比奥塔土地上（地处山区，

面积超过五百平方公里）建立了一个持续二十多年的独立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哥伦比亚法律规定，地主应支付报酬给改良土地的佃户。1933年，佃户在没有得到许可的土地上种植咖啡树，根据法律，如果地主不付钱给佃户，就无法重新拥有土地。在昆迪纳马卡省，农民夺取土地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并且保住了土地。不久以后，哥伦比亚国会通过《洛佩兹土地改革法》。根据《洛佩兹土地改革法》，农业信贷银行从产权所有者手中购买土地的产权，然后通过长期贷款把土地卖给实际占有土地的农民，通过这种方法把农民夺取大农场主土地的行动合法化。如果不是农民采取了行动，这一情况就不会发生。大约1961年，哥伦比亚五百至六百个农民家庭夺取了昆代地区废弃的大农场土地之后，这一地区和另外两个地区的政府土地改革机构把土地分给了大量的农民家庭。

据哥伦比亚经济学家米格尔·乌鲁蒂亚的报告：1967年前后，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农业联合会（隶属哥伦比亚工人联盟）发动的夺取土地行动，让成千上万农民拥有了事实上的财产权。这种夺取土地行动常常得到教会的认可，是在神父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有些案例中，地主把被农民夺取的土地赎账出售给农民，使非暴力夺取土地成为合法的行动。在另一些案例中，政府土地改革机构把被农民夺取的土地宣布为“土地改革”地区。还有一些案例中，“农民通过暴力保住了自己的土地”。

玻利维亚也发生过大规模夺取土地的行动，而且通常是在政府的鼓励下进行的。1945年，在全国农民大会上，激进民族主义政府的官员敦促印第安人加强自己的组织，为将来征用大庄园——大片土地的行动做好准备。但是后来，据爱德华·阿尔塞-洛雷罗的报告，在保守派政府统治时期，印地安人夺取高原上大庄园土地的行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1952年，当选的玻利维亚国民革命运动²³⁰执掌政权之后，废除大庄园制，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农会，将土地变成家庭自留地和集体土地。

土地以惊人的速度分配给印地安人，没有出现暴力，即使在《土地改革法令》颁布之前也是如此。在居住着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广袤地带，夺取土地的

230 玻利维亚政党，也是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的领导力量。它对该国大部分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

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其范围之大，稳定性之高，不需要在后来进行修正。

家庭自留地和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制度被家庭自留地和集体拥有大片土地制度所取代。爱德华·阿尔塞-洛雷罗指出：“这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也是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它消灭了大农场主阶级，把农奴变成了土地的主人和拥有共同利益的组织成员”。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²³¹认为，秘鲁库斯科地区农民夺取土地的行动，以及农民组织力量的增长，对该国1960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做出了贡献。据报道，总统贝朗德·特里“鼓励无地印第安人夺取未开垦的大农场土地，迫使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1962年至1963年，秘鲁中央高地胡宁大区和帕斯科大区的辛迪加运动²³²发展起来。据经济学家多琳·沃里纳的报告：这些辛迪加运动团体组织了“大量夺取或‘入侵’大农场的行动，这些大农场的拥有者曾经夺走印第安人的土地。（‘入侵’的意思是印第安人在这些有争议的土地上盖棚屋并且住下来。）”

1959年，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第二次掌握政权之后，立即开始分配公有土地，批准辛迪加团体组织的夺取土地行动。多琳·沃里纳指出：改革并不是由1960年的《土地改革法》启动的，“《土地改革法》只是规范了之前辛迪加组织接管土地的行动，并且提供了一个机制，让辛迪加将来可以通过这一机制向国家农业机构申请征用土地。……委内瑞拉是唯一一个由工会运动领导土地改革的国家……”

1963年至1964年，巴西发生了夺取土地的行动，尤其是夺取不可能遭到反对的废弃土地和无人居住的土地。帕拉伊巴河谷是许多夺取土地行动的发生地。多数时候，警方会把入侵者驱赶出去，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正如经济学家多琳·沃里纳的报告所述：“在某个案例中，入侵者得到了铁路工人辛迪加团体的支持，该团体宣称，如果把入侵者赶出去，他们就要进行罢工。于是州政府买下这块地产，并且把它分给了入侵者。”在农民试图夺取土地，或者夺取土地行动取得成功后，巴西政府土

231 美国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一书闻名于世。该书认为，公元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不同国家之间。——译者注

232 一种类似农会的组织。——编者注

地改革政策监管司也征用了某些地产，并将它们分给农民。1964年4月，巴西左翼总统古拉特被政变推翻。据报道，害怕土地改革带来的剧变是政府被推翻的原因之一。随后，积极参加土地辛迪加运动的领导人纷纷被捕入狱。

184. 反封锁

在国际冲突中，各国可能会通过封锁对手来施加政治压力。采用的方法包括不让某些“战略物资”进入，切断食品和其他必需物资的供应，或者二者同时进行。在遭遇封锁的情况下，冲破封锁，给中断供应的民众送去食品和必需品，就是一种经济干涉方法——反封锁。反封锁行动既可以由私人机构进行，也可以由政府机构进行。第三方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支持遭遇封锁的国家。如果是政府采取的行动，无论如何都会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使你用非暴力手段反封锁，对手也可能认为，如果己方继续封锁，你方会采取威胁或者军事手段支持反封锁。最著名的反封锁案例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柏林封锁²³³期间。苏联实施柏林封锁（1948年6月24日开始，1949年5月12日结束）后，英美及其盟国空军向柏林空运大量食品、燃料和其他必需物资。盟国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也没有进行军事威胁。因此，这一案例和禁运一样，都属于非暴力行动的范畴。

在柏林封锁期间，除了盟国实施空运之外，德国人也向柏林运送物资长达数月之久。菲利普斯·戴维森在《柏林封锁》一书中写道：

一些卡车司机设法避开苏联封锁，穿过东德，从西德向西柏林偷运物资。在西柏林，这些物资只卖略高一点的价格。夏季时，从西德其他地方偷运进来的新鲜蔬菜售价十分合理，以至于西柏林市政厅受到强大的压力，很难处理那些通过正常渠道在市场上销售的蔬菜。

整个夏天，西柏林人都能从苏占区东德获得食品和其他物资，虽然数量有限。

233 是冷战时期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冷战导致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苏联封锁了西方盟国通向西柏林地区的道路和铁路，意欲迫使西方国家同意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向整个柏林供应食物和燃料，从而实际上控制整个柏林。为了防止柏林落入苏联手中，英美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展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运输行动，为西柏林提供物资供给。英国皇家空军和刚成立不久的美国空军在一年内进行了二十七万八千二百二十八次飞行，向柏林提供了二百三十二万六千四百零六吨物资，包括燃料和食物。除了英美空军，还有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加拿大皇家空军、新西兰皇家空军和南非空军参加了空运。——译者注

人们每天用卡车、船舶、火车、地铁或者自行车运回木柴、煤块、土豆和杂七杂八的东西。

1948 年秋天，苏联当局准备堵上封锁中的漏洞。但是，大量物资由盟国空军空投下来。不仅有食品，还有煤炭、机器和发电设备。1949 年 4 月 16 日这一天就创造了空运记录，二十四小时之内空运了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吨物资。4 月这一个月空运的物资就达到二十三万五千吨。

185. 出于政治动机的伪造

指一个国家故意在另一个国家散布伪造的货币或者其他具有经济意义的证券。托马斯·谢林²³⁴写道“这样做或者是为了用伪币破坏经济”，“或者是为了让货币失去信用”。据默里·泰希·布鲁姆的报告：“从 1470 年开始，伪造敌国货币就成为多数战争中使用的战术之一。狡猾的米兰公爵加莱亚佐·斯福尔扎最先发明了这一方法，用于对付威尼斯共和国。”

据报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建议英国伪造德国马克，遭到英国的拒绝，但英国伪造了纳粹配给券，并且在 1940 年空投到德国。英国还伪造了纳粹占领下的法国邮票，供特工邮寄包裹、信件和宣传品。默里·泰希·布鲁姆的报告还写道：美国制造并散布了伪造的日元。但美国战略情报局前主任否认了这一说法。

1943 年之后，德国伪造、散布了各种面额的英镑纸币。其中伪造得最好的英镑用于中立国，也供德国间谍在敌国使用，第二等伪造英镑用来支付被占领国的合作者和卖国者，第三等伪造英镑空投到英国，用于破坏英国的金融系统。其他伪造英镑因质量太差而无法使用。伪造英镑还广泛散布在盟军占领的北非、葡萄牙和西班牙。1943 年 4 月，英格兰银行开始怀疑德国伪造英镑的阴谋。仅 1944 年，纳粹散布的伪造英镑就约价值二亿七千七百五十万美元。1945 年初，纳粹还制造了少量的百元美钞。

234 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他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与罗伯特·奥曼共同获得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186. 排他性购买

这一方法涉及“在世界市场上购买战略性商品，目的是让敌人无法得到它们”。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购买各种矿产，以确保轴心国得不到它们。

187. 没收他国财产

这一方法涉及扣押或者没收财产，包括“禁止使用银行账户或者经纪人账户中的有价证券，禁止向敌国支付利息或者股息，取消专利权或者版权等”。

1940年9月，日本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6月，日本向法国维希政府提出在法属印度支那设立更多基地的要求。1941年7月25日，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被冻结，英国和荷兰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当时，同盟国宣布对日本禁运包括石油在内的各种战争物资。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指出：“冻结财产对日本的打击一点也不比后来日本袭击珍珠港对美国的打击更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冻结敌国财产是一种例行做法。

1951年，伊朗摩萨台政府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之后，英国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的存款，使伊朗所有对外贸易陷入停顿。

188. 国际市场倾销

指故意以低于合理的价格在国际市场出售商品，目的是压低价格，减少另一个国家的收入。这种方法成本非常高，所以“并不十分常见”。威胁倾销农产品，对于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可能造成严重威胁。1950年代初，苏联试图在国际市场出售石油的时候，其他国家认为苏联的目标是破坏国际石油市场。有些国家还认为，苏联在1953年至1954年出售黄金是为了造成国际金融混乱。

涉及政府倾销的案例往往会产生更快、更完美的结果。然而，也曾有非政府机构计划在国际市场通过倾销破坏经济体系的案例，不过该计划最终未能实施。据非裔美国社会学家圣克莱尔·德雷克的报告：非洲人文明社²³⁵创始人马丁·德莱尼医生和

235 1858年在纽约成立的废奴组织。奴隶制废除之后，该组织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南方数百万自由黑人提供基本生活需求和兴办教育项目上。——译者注

亨利·海兰·加尼特牧师制定了一个通过在国际市场倾销棉花，结束美国奴隶制的复杂计划。1854 年移民大会授权马丁·德莱尼前往非洲，与约鲁巴（今天尼日利亚的一部分）的统治者签订一个提供土地给自由黑人定居的协议。该协议规定：让黑人到非洲将种植棉花的技术传授给非洲人，然后将棉花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国际市场，破坏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经济基础。其结果将是奴隶获得自由，棉布产品更便宜，非洲人获得技术和繁荣。这一计划得到了英国的财政支持，但是因美国爆发内战而终止。

189. 选择性惠顾

我们在第 71 种方法消费者抵制中曾提到，美国的非暴力运动活动家有时会敦促人们选择性光顾他们提名的商家，代替抵制其他商家，以规避某些州的反抵制法律。不过，选择性惠顾的用途要更加广泛，而且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使用这一方法是为了让那些实施人们赞成的政策的企业得到经济回报，尤其是在这种政策存在经济风险的情况下。

1834 年，威廉·克埃劳·加里森和一群废奴主义者乘坐一条在特拉华河上运营的没有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汽船，虽然这条船行驶比较慢，路线也不太直，但是威廉·克埃劳·加里森告诉船长，他们愿意惠顾这艘船，让他得到这笔价值二十七美元的生意，是因为他们鼓励种族融合。《解放者报》报道了威廉·克埃劳·加里森等人的观点：拒绝使用种族隔离的交通工具，选择种族融合的交通工具的做法如果“被废奴主义活动家广泛使用，那么每一个种族隔离的障碍都会很快拆除”。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摆脱另一个国家的统治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可以使用的经济手段包括购买本国种植和制造的产品。这常常涉及经济抵制，但是在某些重要方面又与经济抵制不同。选择性惠顾本国商家或者购买本国产品，其目标不仅是打击敌国经济（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遭到抵制的产品作为代替），也是为了建设本国经济。有时候，这被认为是迈向国家独立的必要步骤。

1775 年之前，选择性惠顾本国产品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765 年，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发动了一

场推广和发展替代性美洲产品的运动。虽然这一方法并不是丹尼尔·达拉尼最早使用的，但他的一本宣传手册为这场运动带来了动力。他在宣传手册中写道：“把这种方法大力应用于制造业，是英国政府压迫殖民地人民产生的后果，一定会对英国经济造成打击……”人们组织了各种社团，提倡生产和优先使用美洲制造的产品，还在报纸上刊登美洲产品的介绍。这些美洲制造的产品包括长柄大镰刀、铁锹、铲子、壁纸、酒类、补品、布匹和服装。选择性惠顾美洲产品的运动包括推广由本土种植和纺织的亚麻制品。生产亚麻制品的工厂在费城和纽约发展壮大。而在罗德岛，妇女们则自己纺织亚麻线。人们也推广茶叶的各种美洲替代品（鼠尾草、黄樟和香树脂），认为它们比茶叶更健康。为了不影响美洲羊毛的生产，人们不再食用羔羊肉。

印度独立运动期间，非暴力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提高印度的生产能力和使用印度产品的运动，也被称为斯瓦代希。斯瓦代希既有哲学分支，也有经济和政治分支。甘地把斯瓦代希当作一种经济抵制，有时——尤其是在早期——甘地把它当作一种报复英国殖民统治的手段。但是斯瓦代希也积极地推动印度的经济和独立，减少印度对外国的经济依赖。

美国的工会也常常敦促人们购买贴有工会标签的产品，作为支持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方法。哈里·惠灵顿·莱德勒²³⁶把工会标签定义为：“工会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它鼓励人们购买成立了工会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工会标签看上去有点像商标、徽章、纹章等，可以直接贴在产品上，或者在产品出售时展示，或者贴在包装上。它显示该产品是“成立了工会的企业，在符合工会要求的条件下，由工会工人生产的”。工会尤其会敦促参加了工会的工人购买贴有工会标签的产品。

1930年代，美国召开工会大会时，曾经使用工会标签点名的方法——朗读产品名单，让那些正在使用贴有工会制造的产品标签的代表站起来。使用工会标签的做法始于1875年，最初是由加利福尼亚雪茄厂工人用来说明他们的雪茄是由白人工人制造的。劳联-产联合并之后，创建的部门之一就是华盛顿特区工会标签部。该部负责提供有工会标签的产品名单。1970年，加利福尼亚葡萄种植园主和联合农场

236 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家、作家和杂志编辑。——译者注

工人工会签订工会合同之后，全国各地出售葡萄的箱子上是否会贴上工会标签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支持工会的消费者会根据是否有工会标签来决定购买哪些葡萄，抵制哪些葡萄。

190. 替代性市场

指将物资拿到非官方市场（非法市场或者“黑市”）进行交易。非法市场或者黑市通常与剥夺性的价格和自私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或者被占领时期。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建立买卖食品和其他各种物资的替代性地下渠道，也可以是一种经济干涉的方法。除了帮助满足民众的需要，让货物不被敌人控制之外，这一行动还可能有更广泛的政治意义。在反对一个企图控制全部经济生活的极权主义政权时，通过维持一个独立的市场渠道阻挠这种控制，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抵抗目标。

在德国占领挪威期间，替代性市场这一方法至少使用过一次。据詹姆森的报告：

这场运动的道德高度（价格合理，没有自私的目的——编者注）在黑市的经营方式上表现得非常清楚。食品生产者本该把自己所有的产品都交给政府的分配机构，但是事实上，他们扣留了许多产品在黑市上销售。这个秘密的黑市销售渠道价格只比官方定价稍微高一点，而且多数商品由雇主买下帮助雇员，由个人买下帮助被当局追捕者维持生活。实际上没有人从这些交易中谋取私利，因此，这一市场不像在其他被占领国那样具有打击经济的效果。占领一结束，黑市就停止运营了。

在没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这一报告是否过于笼统。但不管怎样，它证实了这一方法的潜力。挪威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埃尔林·彼得森教授在关于这一时期的生产（不仅限于食品）的更广泛的研究中指出，虽然人们说储存产品不让它们进入官方市场是为了挪威经济，但是“在许多案例中”，不让产品被德国人控制只是“道德借口”，主要目的仍然是从黑市获利。

191. 替代性交通系统

在非暴力运动抵制公共交通系统的同时，需要建立一个平行的替代性交通系统。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中就出现过替代性

交通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在抵制初期，交通问题让我们付出了大部分的精力。”1955年12月初，抵制行动刚开始的几天里，黑人出租车公司按照协议，以十美分的公交车票价搭载乘客。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出租车费不能低于四十五美分，因此，运动组织者需要做出其他安排。蒙哥马利的运动团体吸取了此前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公交车抵制行动的经验，迅速决定建立一个志愿者私车调配平台。1955年12月13日，这个替代性交通系统建立了四十八个调度中心和四十个搭车站。马丁·路德·金博士写说：短短几天内，这个系统就工作得惊人地好，它甚至让白人种族隔离分子印象深刻。第二年，这个替代性交通系统购买了十五辆新的旅行车。

蒙哥马利市政府官员和公交车公司显然认为，这个替代性交通系统本身就是严重问题。因此，替代性交通系统的车辆保险四次被取消。在市长盖尔的指示下，该市法律部门还提起了诉讼，企图禁止车辆调配平台的运行。但是在地方法院对车辆调配平台下达临时禁令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阿拉巴马州和当地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宪。

192. 替代性经济机构

虽然不是所有由非暴力行动者建立或者使用的替代性经济机构都构成经济干涉，但是，在冲突情境下，当经济机构本身被用来当作行使权力或者发挥影响力的手段时，就构成了经济干涉。替代性机构可能需要承担涉及生产、所有制或者分配经济产品的任务。其目标可能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

例如，当消费者或者生产合作社参与到与资本家或者国营企业的斗争时，或者当人们有意发展和扩大合作社，以取代现有的经济体制或者成为现有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时，合作社就构成了经济干涉。公元二十世纪初，瑞典的合作社在抵制麦淇淋（一种人造黄油——编者按）卡特尔工厂²³⁷的产品之后，卡特尔工厂仍然没有降低麦淇淋的价格。于是，合作社自己购买了一个小型麦淇淋工厂，后来又建立了一家更大的麦淇淋工厂，将自己生产的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在麦淇淋市场销售，结果麦淇淋的

237 一种企业垄断联盟。——编者注

价格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使瑞典消费者每年节省了大约二百万美元。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合作社还购买和新建了制造其他产品（灯泡、轮胎、肥料、陶器和建筑材料等）的工厂。通常情况下，合作社的产品只要占领市场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份额，垄断价格就会被打破。

1890 年之后，意大利罗马天主教一个名为国会工作的活动家组织的分支机构慈善和基督教经济团体试图建立“一个由合作社、农会、互助组织、保险和农村信贷机构结合的网络”。随着这一网络的扩大，它有可能变成“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经过经验检验的，从自由主义的废墟中兴起的新的天主教国家的框架”。到 1912 年，这一网络已经有三十六万个成员。

1967 年，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塞尔玛进军的前辈活动家组织了美国西南阿拉巴马农民合作社自产自销。迈克尔·迈尔斯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评论道：自产自销“打破了黑人农场主被剥削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债主可以直接拿走黑人农场主的产品去抵债，剥夺了黑人农场主对价格的决定权……”其他试图进行经济干涉的南方黑人组织还包括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穷人公司、南方合作社联合会和佛罗里达克劳福德维尔公司。这些组织的确增加了其成员的经济福利和自主权。

（五）政治干涉

非暴力干涉方法的最后一个子分类包括 6 种方法，从形式上说，这些方法显然是政治性的。前 4 种方法是个人、团体通过破坏政府的行政或者执法机构进行的干涉行动。第 5 种方法继续工作但不合作是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工作人员采取的干涉行动。最后一种方法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涉及公民改变效忠对象，转而效忠一个与现政府竞争的新政府。所有这些方法干涉的目的，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破坏对手政府的工作，甚至挑战对手政府的存在。

193. 让行政系统超负荷

指过度服从命令，给政府行政系统提供各种与其责任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信息；向政府行政系统进行过多的查询；向政府行政系统提出过多的建议、抗议，或者发出过多的声明，让政府行政系统超负荷。让行政系统超负荷的结果，可能使其持续运

转困难，或者减缓其处理正常工作的速度，降低其能力。在政府行政系统正在执行的法律、法规要求经常更新有关人员或者其他事务数据的情况下，或者需要遵守的复杂的规则、规章系统经常改变的情况下，这种行动尤其可能发挥作用。

1970 年春天，美国反战运动曾经运用过这一方法。当时，反战运动敦促人们服从所有政府有关个人信息的法律条款——这些条款通常会被运动参与者无视。《纽约时报》引用了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发言人特鲁迪·扬夫人的话：“《义务兵役法》要求登记者地址或者状态发生任何变化——宗教、精神状态和其他各种情况——都要在十天内告知兵役登记局。该法适用于 1922 年 8 月 30 日之后出生的所有男性，而不是只适用于二十五岁以下的男性。”因此，特鲁迪·扬夫人指出：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认真对待这一法律，把自己的每一个变化都告诉兵役登记局，即使那些已经超龄或者已经服完兵役的人。这也适用于所有成年男性的妻子、母亲、朋友等。你们应该提交文件证明登记者所有状态的变化。从行政上来说，兵役登记局无法反对人们对《义务兵役法》的绝对服从。

报纸引述一名兵役登记局发言人的话：如果成千上万超龄的男性都不折不扣地遵守该法律，“上帝救救我们吧”。此行动与第 111 种方法严守规则罢工非常相似。

1970 年 6 月，在美军入侵柬埔寨和随之而来的抗议发生后，马萨诸塞州兵役登记局的保罗·菲尼上校在一次采访中描述了像洪水一般涌入办公室的邮件：

今天我们收到一封邮件说：“我的状态改变了，我从一楼搬到了三楼。”明天我们收到一封邮件说：“我要去欧洲了。”几天后我们又收到一封邮件说：“我改变主意不去欧洲了。”

据一名官员估计，他们花费了一千个工时处理这些过量的邮件。为了迅速又合法地回复数量剧增的邮件，兵役登记局不得不订购了七十万张用来回复这些邮件的明信片。

194. 暴露特务身份

对付特务——秘密警察或者政治警察——的方法之一，就是发现他们并公布他们的名字，最好还能公布其他细节、照片等。这样做可以让这些便衣警察很难继续从事

特务活动。这种方法可以用在渗透或者企图渗透抵抗组织的特务身上，可以作为对他们实施暗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国的抵抗运动经常使用暗杀的方法）的替代性方法。

1969 年，反对监禁不成瘾药物使用者的《洛杉矶自由报》公布了超过五十名美国加州缉毒特工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该报认为，这是一项政治干涉行动，但政府官员则反对这一观点。加州总检察长从法院获得禁令，禁止公布更多州司法部门的“秘密”信息。被暴露的特工还对《洛杉矶自由报》提起了集体诉讼，要求赔偿二千五百万美元。总检察长则代表加州提出了另一项损害赔偿诉讼。

195. 填满监狱

在公民不服从行动中，入狱一般是和平违反法律、法规的次要后果，因为非暴力行动者将违反法律、法规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但有些时候，非暴力行动者也可能会把入狱当作他们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在许多人一起采取的行动中。行动者为了达到入狱的目的，可能故意不服从某一法律、法规，甚至主动要求警察逮捕自己，哪怕警察决定逮捕其他人，甚至哪怕要求逮捕的人并没有出现在公民不服从行动最初发生的现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填满监狱。

要求逮捕自己，通常发生在对已经被捕的同仁表达声援的情境下，但其意图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怕被捕，要求释放已经遭到逮捕的人，阻塞法院、填满监狱，或者为了加强抵抗、扩大对运动的宣传。1942 年，挪威的教师在进进行不合作斗争期间，傀儡政权领导人吉斯林在斯塔贝克学校对教师发表讲话时大发雷霆，并下令逮捕他们。第二天，吉斯林讲话时未在场的教师们也来到监狱，要求和前一天逮捕的同事一起入狱。

1959 年 1 月，支持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班达医生和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党的妇女前往松巴市政府大楼，等待宣布班达医生和总督的会谈结果。警方命令她们解散，但妇女们拒绝服从命令。她们继续前进，冲突接踵而来，妇女们遭到殴打，但她们仍然顽强地继续前进；

……最后，警方逮捕了几名妇女。其余的人进行抗议，并且坚持说，只要有

一人遭到逮捕，就必须逮捕所有人。于是警方逮捕了她们——一共三十六人。

1959 年，法国公民非暴力行动团体组织了一次行动，行动者前往托尔拘留营（关押未经审判、聆讯的北非非法移民的地方），要求把自己也关押进去，作为反对明目张胆的司法不公的见证人。

1961 年，为了响应反对公交车种族隔离而开展的自由乘车运动，南方地区委员会成员和许多志愿者一起开始填满密西西比州监狱的行动——这一行动“目标是让种族隔离政策变得代价高昂和麻烦不断，最终难以实施”。仅仅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像洪水般涌来的要求入狱的行动者就让执法和监禁的成本增加了一百多万美元。据参加过许多非暴力民权斗争的资深活动家詹姆斯·佩克的报告：1961 年 2 月，报社记者首次使用了填满监狱这个词，形容越来越多反对种族隔离的学生行动者“为了强调因反抗种族歧视而遭到逮捕的不公正，自愿选择待在监狱，拒绝缴纳罚款和拒绝保释出狱”。

1960 年 3 月 25 日，南非沙佩维尔枪击事件发生四天之后，年轻的泛非主义领导人菲利普·考萨纳带领一千五百名黑人从兰加地区向开普敦附近的警察局进军，拒绝携带法律要求的身份证，要求警察逮捕他们。但是警察局长把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他们和平地离开。

1962 年，英国百人会六名成员被捕和接受审判的时候，另外几名百人会成员投案自首，要求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他们。

1964 年 2 月，南罗德西亚的非洲妇女为了抗议政府没有为坦达自然保护区提供公路、桥梁和学校，拒绝按照政府的要求减少牲口的数量。在第一批一百七十二名被捕的妇女中，有一百五十人拒绝缴纳罚款，宁愿入狱服刑。第二批一百五十八名妇女被羁押等待判决期间，有三百名妇女来到米尤地方法院，要求也逮捕她们。紧接着又有另外三百名愤怒的妇女前来声援，提出逮捕她们的要求。

196. 公民不服从“中性”的法律

公民不服从通常是不服从那些被认为不道德或者不公正的法律，但有些时，非暴力行动者也会不服从或者无视那些被认为在道德上“中性”的法律。这种情况最有可

能发生在非暴力运动的高级阶段（比如印度独立运动期间），或者发生在政府的性质或者问题本身使人们不得不配合或者不得不服从与不满有直接关系的“恶法”的情况下。

所有现代国家都有这种“中性”的法律：其存在是为了帮助政府行使权力、管理公民和履行政府职能。通常没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本身是不公正或者残暴的。这些“中性”的法律常常是监管性的法律。虽然不服从这类法律不属于公民不服从的范畴，但是在某种极端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中，行动者也会违反这些“中性”的法律。因此，关键不在于人们不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行动者要通过不服从法律来反对政府，或者表达自己的不满。

甘地认为，这种类型的公民不服从在有些时候是有理由的，但他也认为，这是“一种最危险的武器”。他说：当对手陷入困境的时候，不应该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干扰对手，而应该推翻对手。但是如果人民认为政府已经变得十分不公，以至于公民没有任何义务服从它，公民行动的目的已经变成通过不合作和不服从摧毁政府的时候，这种公民不服从就是有理由的。在这种情况下，破坏这种法律不会伤害人民，只会使政府更难进行管理。而且，这种不服从法律的行为一经大规模实施，就会促成政府的瓦解。现实中的运动很少达到这一阶段，但是 1930 年至 1931 年，印度独立运动有几次非常接近这一阶段。

197. 继续工作但不合作

指在篡夺政权者通过政变或者外国政府通过入侵控制国家之后，公务员、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坚持履行合法的法律、政策和职责，无视或者违抗篡夺政权者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因此，这一方法不同于第 142 种方法政府工作人员选择性拒绝执行命令，虽然这两种方法有相似之处，但本方法的重点是继续履行合法的职责和工作。

有关这一方法的最清晰的理论说明，是特奥多尔·埃伯特博士在有关公民防卫战略问题（如何将非暴力行动用于国防）的研究中提出的。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按照法律和传统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被肉体消灭或者被赶走为止。”这涉及：

……在各个层面都要严格拒绝承认篡位者的合法性，拒绝服从其命令。誓死捍卫本国宪法和法律的合法地位。倘若是在遭到占领的情况下，每名议员、部长、公务员和普通公民，都要变成保卫自己工作场所的士兵。**总而言之，重点应该是坚定地延续原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不是辞职和罢工。**

因此，这一方法是“主动根据自己的法律职责继续延续其社会角色……”

人们应当无视占领当局的免职令，继续专心工作，直到身体受到限制无法继续工作为止。一名领导人被消灭或者被捕之后，他的合法代表应该接替他的位置。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其下属和助手就应当履行自己的职责。篡位者的任命应当被无视。

特奥多尔·埃伯特博士认为，这一方法“比罢工或者自愿辞职”更能给篡位者带来“技术上或者心理上的压力”，迫使对手不干涉合法的职位拥有者，否则就要面对更换整个行政机构的艰难任务（在地方一级尤其困难）。这一方法还能降低旷日持久的总罢工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混乱的风险，通过继续斗争证明冲突的目标：“确保社会有权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外界强制”。

1943年5月，荷兰政府在纳粹占领后宣布了一项政策指令，该指令与继续工作但不合作方法非常接近，但又不完全一样。这个指令是当时流亡英国的荷兰女王派驻乌得勒支省的前任特派员博斯·里德尔·范·罗森塔尔撰写的，发表在地下报纸上。沃尔姆布鲁恩将这一指令形容为：“一个有关军事占领时期公务员行为的指南”。该指令要求公务员：如果能为荷兰人民提供的服务比占领者提供的更多，就应该继续工作，否则就应该辞职。政府官员不要辞职，“等待自己由于未执行占领当局的‘非法’命令而被免职。”荷兰的合法政府是伦敦流亡政府，人们应该向它效忠。这指令还列举了不允许公务员向德国人提供哪些类型的帮助等等。

在纳粹占领下的挪威，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小规模继续工作但不合作行动。他们拒绝参加法西斯的教师组织，无视法西斯的规定，继续使用原有的教材授课，向学生解释什么是挪威人的高度责任感。

198. 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

指创建一个新政府，或者继续效忠一个与对手竞争的现政府。如果平行政府得到民众压倒性支持，或许能够取代对手建立的政府。替代性政治机构的这种极端情况，很少是有意发起或者建立的，更多是在民众抵抗或者革命斗争中意外获得的产物。与平行政府类似的案例也可能发生在被占领国的民众继续服从被侵略者废黜的合法政府，拒绝承认占领政府的合法性，拒绝服从占领政府。

当一场非暴力运动企图推翻一个政府而不是对它进行改革，并且已经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时候，运动就达到了高级阶段，就能够通过让旧政府失去民众的服从和合作威胁它的稳定。这时，如果要证明运动取得了成功，接下来就要采取措施，让民众转而效忠新政府（平行政府）。这既是抵抗者之间建立合作的自然结果，也是扩大对旧政府不合作和反抗行动的影响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主权就开始取代旧主权，一个新政治架构就开始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效忠。虽然这一趋势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出现，但抵抗者也经常有意识地建立一个平行架构来推进自己的政策。一个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的平行政府，可以接管政府的职能，并且最终消灭摇摇欲坠的旧政府。

这种现象曾经发生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并不是公元二十世纪革命的产物。例如，1575年至1577年，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就出现过平行政府的重要元素。在后来的各种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在发表独立宣言的时刻）和反对独裁体制的斗争中，也经常出现平行政府的特征。正如研究美国历史的法国历史学家克拉伦斯·克兰·布林顿指出的：“这是一个同时出现的机构或者机制，或者更进一步，这是通过一个与旧机构非常相似的机构发挥作用的机制。”

当一个与目前的机构相冲突的机构做出一个与目前的决策相冲突的决策，那就是双重主权。同一个社会出现两个政治系统，两个领导层和两套法律制度要求民众服从——不是在一个方面服从，而是在一整套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普通人生活的系统中服从。

……原有的政府发现，反对它的不仅是敌对的个人或者党派——而是一个与之竞争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组织得更好，人力资源配备更强，得到民众的服从更多。在一场革命危机中，他们自然而然、轻而易举就能接管现有政府

的权力。

从终极意义上说，两个平行政府之间的竞争结果，通常是由它们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服从的能力对比决定的。例如，1930年代末，日本占领军和中共边区政府都试图控制中国北方的时候，这种服从竞争就出现了：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府关心的更多的是创造新的政治权力基础，新的权利义务概念，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新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行使权力。

平行政府可以在暴力起主要作用的革命中建立，也可以在显然不存在暴力的冲突中建立。虽然新政权在胜利之后可能会继续使用暴力，但是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的出现并不天然与暴力有关，事实上，它几乎完全依赖于民众自愿撤回对旧政权的授权、支持和服从，将授权、支持和服从给予新政权。因此，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暴力行动方法，可以发生在暴力基本存在或者完全不存在的斗争中。

克兰·布林顿教授指出：平行政府和双重主权这一现象曾经发生在英国1640年代查理一世与长期议会的冲突²³⁸中，发生在1776年前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中，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中。

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中，各种平行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陆盟约》（1774年秋天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的非暴力抵抗计划，“是一个不进口、不消费、不出口协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各种替代性准政府机构也能起到平行政府的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亨利·吉普森指出：

虽然第一次大陆会议于1774年10月26日解散，但是大陆会议通过的计划就像国家最高法律一样，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这一计划实施的措施优先于

238 1630年代末，苏格兰人民不满英王查理一世的统治，爆发了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镇压起义，于1640年4月13日召开新的国会，但遭到工商业阶层和新贵族议员的抵制。抵制者要求进一步限制王权，允许工商业自由发展，遭到查理一世的拒绝。查理一世于当年5月5日解散了议会，史称短期议会。随着苏格兰起义军大举进攻，查理一世被迫于1640年11月3日重开议会，议会一直存在到1653年4月20日，史称长期议会——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标志。长期议会召开后，通过了《三年法令》，规定议会应定期召集，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将其解散等。经过多次斗争，查理一世无计可施。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王家军旗，宣布讨伐国会，挑起了内战。——译者注

各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措施或者声明，更高于英国议会通过的有关美洲的法律。大陆会议的代表高度一致地通过了《大陆盟约》，并且高度一致地执行它，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国的殖民统治至少在某些殖民地已经彻底崩溃。1774年12月24日，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在写给达特茅斯勋爵的信中说：《大陆盟约》正在得到“最严格地”执行，弗吉尼亚人民对“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的法律”严格“遵守的方式，从未给予过英国合法政府以及它所制定的法律”。邓莫尔补充道：

我想象不出，英国殖民政府对大陆会议做出的决定提出的异议（已经沦落到了如此虚弱无力的境地），除了遭受失望的耻辱，给敌人提供幸灾乐祸的素材，提高敌人对人民精神的影响之外，还能达到任何别的作用。

1775年9月23日，佐治亚省总督莱特用类似但是更极端的方法写道：“政府的权力完全被剥夺，落入了各类民间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控制中，它们正在实施最严重的暴政、压迫、侮辱……，人民没有起码的保护、支持，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10月14日，莱特补充道：“有害的思想传染了全省，无论是政府、法律，还是权威，都变得完全没有份量，或者干脆参与到剥夺政府权力的革命之中。”在某些案例中，原有的英国体制中的地方政府或者省政府的法律机关，变成了反对英国体制的平行政府的一部分。在另一些案例中，新的平行政府扮演了反对体制的角色。代议机构（比如某些省议会和大陆会议）和民间组织（比如自由之子）也成为平行政府的一部分。

平行政府通常是一场重大斗争中出现的许多方法和行动类型之一。但是在1841年至1842年罗德岛多尔叛乱期间，平行政府成为行动者反对现有秩序的主要方法。

1841年时，罗德岛仍然实施英王查理二世1663年颁布的宪章。根据该宪章，罗德岛议会的代表资格不得根据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而变化。更严重的是，选举权由公民拥有的财产数量决定，每五个成年白人男性中就有三个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其他种族更甚）。从1796年开始，人们反复尝试制定一部新宪法，重新分配议会席位，扩大选举权——即使选举权不能扩大到所有成年白人公民，至少也要稍微

扩大一点。但所有努力都被议会和拥有财产的公民挫败、阻碍或者无视。1841年1月，州议会回避扩大选举权的呼吁，同意成立制宪会议——但是制宪会议的代表名额分配与州议会完全一样，对选举权的限制也适用于选举制宪会议代表。州议会显然想让权力保留在原来那些人手里。但重新分配议会席位和扩大选举权这两项主要诉求进入了制宪会议讨论的议程。

1841年4月、5月和7月，争取选举权的活动家在普罗维登斯市和纽波特市召开了群众大会。7月5日，普罗维登斯的群众大会通过了一项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决议，并且表达了制定新宪法的决心。7月20日，大会宣布：“8月28日，所有定居本州的成年男性公民将选举制宪会议代表。10月4日，制宪会议(称为人民会议)将在普罗维登斯召开”。二万五千多名潜在的选民中(无论是否根据宪法被剥夺了公民权)有超过七千五百人投票选举出了一百八十名人民会议代表；11月中旬，人民会议制定了新宪法(称为人民宪法)，该宪法规定，所有定居本州的成年白人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重新分配了州议会代表名额；加大了立法和司法分支之间的独立；进行了其他一些改革。12月，在一次允许所有定居该州的成年白人男性公民参加的投票中，新的人民宪法以近一万四千票同意、五十二票反对获得了批准(超过一万名潜在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

但这还不是全部。早在1841年1月，州议会也召集了制宪会议(称为自由人会议)，宣布该会议在11月召开。1842年2月中旬，自由人会议完成了新宪法草案(称为自由人宪法)。新宪法草案也把选举权扩大到定居该州的成年白人男性公民，并且重新分配了众议院席位。但是，就在几个星期前的1月12日，人民会议已经宣布人民宪法生效。在支持人民会议和支持自由人会议的双方极端分子的夹击下，同样扩大了选民范围的自由人会议组织了另一个大约有一万六千七百人参加的对自由人宪法进行的公民投票，结果自由人宪法以七百票的微弱劣势未获通过。同时，州最高法院非正式地谴责了人民宪法为非法。3月，严厉的、压制性的《阿尔及利亚法》通过。这一法律规定，对任何不符合以前法律的选举参加者施以严酷的刑罚，包括叛国罪指控。因此，所有参加人民宪法选举的选民都面临惩罚。

争取选举权的活动家主张人民主权，宣称人民宪法的合法性。罗德岛州州长塞缪

尔·金向总统泰勒提出了申诉。4月11日，泰勒总统回信说，他不认为会发生革命起义，万一真发生起义，联邦将会向州政府提供援助。泰勒总统还说，他会对罗德岛州发生的冲突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他会继续承认罗德岛州现政府，直到该州当局和人民和平、合法地接受一个新政府。

4月18日，罗德岛公民根据人民宪法选举州级官员，包括新的参众两院议员。所有候选人都得到一致通过。争取选举权运动领导人——哈佛大学毕业生托马斯·威尔逊·多尔在州长选举中得到了略多于六千三百张选票，但这无助于确立他的权威。4月11日，总统泰勒给现任州长塞缪尔·金的回信，以及严厉的、压制性的《阿尔及利亚法》，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导致许多犹豫不决的选民转而支持塞缪尔·金的法律与秩序党。争取选举权的活动家执行新的替代性宪法和平行政府的决心被削弱了，甚至有一些被提名参加选举的活动家退出了选举。

4月20日，根据人民宪法进行的人民选举结束两天后，根据英王查理二世1663年颁布的旧宪章进行的选举开始了。塞缪尔·金州长击败了最初以略高于二比一的优势成为候选人的竞争对手卡彭特将军。约有七千名拥有财产的公民投了票。尽管人民宪法和根据人民宪法选举出来的替代性政府面临严峻挑战，但是塞缪尔·金的现政府在镇压对手的问题上十分谨慎。正如历史学家莫里指出的，现政府是在反对该州一百八十名最杰出的公民代表，而这些公民代表得到了至少一部分罗德岛公民的支持。现在，这些公民中有超过六千人因为在人民选举中投票而面临被起诉的危险。塞缪尔·金领导的现政府不确定州国民警卫队是否会支持他们。有迹象显示，双方都认为事态严重，并且都在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1842年5月3日，人民会议选举产生的州长托马斯·多尔和州议会议员在一小队国民警卫队的护送下，游行穿过普罗维登斯街道，举行了就职典礼。州长托马斯·多尔发表了就职演说。但是他们没有试图占领州议会大厦，也没有试图建立新的司法系统。莫里在历史著作《多尔的战争》中写道：占领州议会大厦是“一个和平而且轻而易举的任务”，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一个空置的建筑里开了两天会。议员们要求州长多尔知会总统、国会和各州州长：罗德岛州已经成立了新政府，废除了《阿尔及利亚法》和其他各项法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要求人民服

从新政府。然后新议会休会两个月。多尔后来写道：没有通过占领州议会大厦来取代现政府是“致命”的错误，“现政府已经失效，什么事也做不了。而新政府尚待建立”。

5月4日，按照英王查理二世1663年颁布的旧宪章选举出来的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人民宪法和托马斯·多尔领导的政府为非法。他们呼吁人民警惕支持多尔政府的“强大军事力量”（指该州国民警卫队，它宣誓服从兼任该州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的州长多尔，并且护送新政府成员参加了就职典礼），宣称罗德岛发生了“起义”，要求联邦政府干涉。

塞缪尔·金州长派代表团去见泰勒总统。托马斯·多尔州长也给泰勒总统写了信。但泰勒总统不想干涉罗德岛州的冲突。5月7日，在被塞缪尔·金领导的现政府通缉后，托马斯·多尔和他的同僚秘密前往首都华盛顿，为他领导的人民政府申辩。但托马斯·多尔等人的华盛顿之行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

在罗德岛，根据人民宪法选举出来的州议会休会不到一星期，就有大量政府工作人员被逮捕和辞职，人民政府处于瘫痪状态。

无论是在运动早期还是在这一关键阶段，多尔领导的人民政府似乎都没有考虑要进行一场不与塞缪尔·金领导的现政府合作，支持人民政府的非暴力运动。显然也没有考虑到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对罗德岛人民产生消极影响，或者带来联邦的干涉（就像泰勒总统在给塞缪尔·金的回复中指出的）。相反，多尔州长试图向坦慕尼协会²³⁹的民主党人寻求支持，还写信给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缅因州州长，希望在联邦干涉时能够得到他们的军事援助。

5月16日，托马斯·多尔州长抵达普罗维登斯，受到大约一千二百人的欢迎，其中四分之一欢迎者携带武器。斗争结果仍然未定，就连国民警卫队是否全体对他保持忠诚尚不确定，多尔就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在一次行动中，他和他的支持者未经战斗就夺得了两枚野战炮。塞缪尔·金领导的现政府要求普罗维登斯国民警卫队准

239 创建于1789年，起初是一个全国性爱国慈善组织。1820年代逐渐演变成纽约市民主党的核心机构。因其总部位于坦慕尼大厅而得名。——译者注

备就绪，还召集了驻扎在普罗维登斯以外的国民警卫队向该市集结。多尔决定先夺取该市军火库，再夺取兵工厂。他认为，如果不这么做，整个运动就会失败。

5月17日午夜时分，多尔的大约二百三十名支持者携带两门大炮在浓雾和一片混乱中包围了军火库，许多人涌上街头，铃声大作，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军火库指挥官拒绝投降，多尔命令大炮开火，或许是有人捣乱，或许是潮湿的大雾天气所致，他们点了两次火都没有将大炮点燃。如果多尔的大炮管用，如果全副武装守护军火库的军队还击，进攻者很可能全军覆没。随着凌晨的到来，多尔的支持者逐渐散去，天亮的时候，只有不到五十人还留在那里。八点左右，多尔收到一封信，说所有居住在普罗维登斯的人民政府官员都已经辞职。多尔在朋友的建议下逃走了。人民议会的议员拒绝接受军事行动。6月底，在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短暂地重振力量之后，多尔逃往新罕布什尔州。

虽然反对的声音仍然强烈，但是到1842年11月，一个新的罗德岛制宪会议召开了。州议会批准增加普罗维登斯和史密斯菲尔德两个城市的代表人数，并且允许所有本地出生的成年男性公民投票选举制宪会议代表。11月通过的新宪法于1843年5月生效。新宪法对州议会席位进行了有限的重新分配，选举权有所扩大，但是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多尔的支持者抵制选举，支持英王查理二世1663年颁布的旧宪章的顽固分子也反对新宪法，认为它太自由化。超过二万五千名选民中，大约有七千人在选举中投了票。1843年10月，多尔回到普罗维登斯自首，被判处终身监禁。一年之后，新任州长赦免了他。1851年，州议会恢复了多尔的公民权。尽管州最高法院提出抗议，但州议会仍然在1854年推翻了对多尔的叛国罪判决。

从非暴力行动的角度看，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公民大会和公民投票建立平行政府的方法，还告诉我们平行政府最初的运转方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可以如何通过非暴力方法进行后面的斗争。采用军事行动捍卫新宪法和新政府，寻求联邦政府的支持，在本案例中显然没有产生效果。这一案例还告诉我们，使用和威胁使用军事行动只会适得其反：可能会让那些中立者选择支持塞缪尔·金领导的政府，还有可能导致原本支持人民政府的民众撤回支持，让人民政府更加虚弱。

另外一些非常明确地涉及平行政府的案例，发生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从临时政府

和独立苏维埃手中夺取权力之前。而 1905 年俄罗斯革命中最著名的平行政府是圣彼得堡苏维埃。”

圣彼得堡苏维埃令人惊讶地成为了某种与政府竞争的权威。在首都混乱的形势下，工人会找苏维埃寻求建议和帮助。在工人生活区发布指示的也是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直接与首相协商交通和食品供应问题。政府必须通过苏维埃向邮政和电报工人下达命令。甚至连市杜马也必须执行苏维埃的指示——这一点在向罢工者家庭发放救济金的问题上最为明显。

至少在当时，政府默许了这种情况。但是，这种令首都陷入瘫痪的双重权力运行方式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后来，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受到审判时，他在法庭上说，圣彼得堡苏维埃“不多不少，就是革命群众的自治机构，一个**国家权力机构……**”

但是，这绝不是这场革命期间唯一的平行政府，地方自治议会常务委员会一度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所有地区都建立了独立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机关。例如，格鲁吉亚的平行政府一直坚持到 1906 年，蒙古的平行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在几个月内就获得了人民的服从，直到 1905 年底。尽管马克思早期写过关于平行政府的文章，但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想较少关心将平行政府作为革命的手段。1905 年革命之前，孟什维克党人阿克雪里罗德对此也做过重要讨论。

在人们没有预料，也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建立替代性主权和平行政府的趋势已经出现在大规模非暴力斗争中，比如在西方国家的总罢工和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希特勒也曾提到在罢工者中间建立控制性组织的问题：

控制性组织无论体现了行使权力和通过肉体强制人们服从权威的企图，还是体现了在进行经济不参与（比如罢工——编者注）的同时“维持秩序”的企图，都构成对政府职能的篡夺。例如，加入一个向平行政府效忠的独立警察机关，就是一种革命行动，如果全社区都参与，并且永久性参与，就构成一种真正的革命。这意味着社会机制围绕平行政府进行了新的社会整合。

威尔弗里德·哈里斯·克鲁克指出：1919年，温尼伯总罢工²⁴⁰期间，一个由一千人组成的公民委员会提供消防、供水和治安服务，这显然具有某些平行政府的特征。希特勒曾经研究过发生在美国西雅图总罢工期间和1904年意大利总罢工期间的类似案例。

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虽然不是一场推翻政府的革命性罢工，但是威尔弗里德·哈里斯·克鲁克总结道：

正如全国各地各种罢工委员会阐述和实践的那样，联合罢工委员会事实上成为一个与地方和全国政府竞争的平行政府的尝试。联合罢工委员会认为：工人应该自己负责发放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表示，坚决拒绝参与“和政府竞争的组织合作”。

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尤其是在1930年至1931年，形成过、或者接近形成过几次平行政府的雏形。1930年4月底，加尔瓦利军团²⁴¹的两个排拒绝帮助警方镇压非暴力行动者之后，军队从白沙瓦完全撤走。此后印度国大党实际控制了该市（包括发布指示和夜间巡逻）长达九天。据英国的一份报告：当地穆斯林非暴力组织上帝的仆人收取了原本由政府收取的土地收益金。在许多地方，过去的五人长老会恢复传统，取代了英国的司法制度。一个民族教育项目旨在取代英国殖民当局开办的学校。在有些城市，志愿者团体指挥交通和维持秩序。印度国大党孟买委员会为愿意合作的公民建立了自己的税收系统，甚至对那些背离其政策的金融机构处以罚款。

1930年斗争初期的孟买，目击者布雷斯福德写道：

人们很快意识到，孟买有两个政府。英国殖民政府是合法的权力机关，仍然得到欧洲人、穿英国制服的印度士兵和老一代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效忠。除此之外的孟买人都效忠英国陛下的囚犯圣雄甘地。印度国大党以圣雄甘地的名义统治这座城市。人们服从它发出的任何指示。印度国大党随时可以让数以万计高喊口号的男人和女人填满街道。它宣布罢市，就能关闭每家商店的百

240 1919年5月发生在加拿大温尼伯市的大罢工，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罢工之一，最终促进了劳动法的改革。——译者注

241 印度陆军装备最精良的步兵团之一。——编者注

叶窗。它宣布联合休业罢工（一种几乎每星期一次用来抗议政府某些行为的日子），整个城市就会静默，工厂都关上大门。只有得到印度国大党颁发的印在彩纸上的许可证，驾车者才能赶着牛车、载着货物，经过纠察队员守卫的哨卡。纠察队员在商业区每条街巷站岗，进入每间仓库和商店，检查每台棉压机。他们甚至没收商人偷运进来的违禁品。

建立平行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对旧政府提出挑战。按照甘地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暴力，他反复强调，任何平行政府都不应行使政府通常的强制性权力，而应该严格依靠非暴力方法和民众的广泛支持。

有关平行政府在非暴力斗争中的战略地位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较为缺乏，因此，这些各种各样的案例就显得尤其重要。非暴力斗争背景下的平行政府可能成为一种制度变革，这种变革即不意味着政变，也不是意味着抵抗运动的失败。

总结

未来对本书所列的 198 种方法进行任何修改，都会导致本书篇幅的扩大。与 1968 年版相比，现在这一版本的方法清单已经增加了四分之一，而与 1960 年第一版相比，1968 年版的方法清单也增加了一倍多。1960 年版的方法清单又比之前任何综合清单都更长。未来的研究将会给已经列出的方法补充更多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历史、地理和政治方面也将更具代表性。

这些方法或者是自发出现的，或者是为了满足当前冲突形势的需要发明的。人们会通过模仿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或许还会加以修改，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系统性地开发过以前从未使用，相信未来可以用于解决冲突的新方法。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有意识地开发非暴力行动技术。尤其重要的是，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新的政治形势和条件下。

本书详细考察了非暴力行动的实践者掌握的许多具体方法，就其中（至少）一方使用这一技术的冲突形势提出了单方面的观点。其中许多方法有限地落实了本书第一册提出的权力理论——所有政府和等级制度都依赖于其统治的人民的服从、帮助和合作，而且人民有独立意志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为体制做贡献和服从体制。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拒绝为体制做贡献和服从体制，那么政府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否则就会崩溃。

但是，政府和其他等级制度当然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面临要么是完全支持，要么是完全不支持的极端选择。最经常发生的是，他们得到部分人的支持。即使最后人民通过不服从、不合作和反抗摧毁政权，也只有在激烈的斗争之后才能实现。在斗争的过程中，政权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得到足够的支持，足以对非暴力行动者施以残酷的镇压。因此，我们不能只研究抵抗者怎样使用这些方法，也不能只列举这些方法，只研究其特征和应用。我们还需要研究在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心理力量，需要考虑抵抗运动与对手之间发生的权力关系上的极端而且往往非常迅速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本书还没有涉及在与使用暴力的对手进行的斗争中，非暴力行动的技术是怎样运作的，以及最终带来变革的方法。这是我们尚待研究的斗争中的技术动力学，变革机制，决定某场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以及介于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具体因素——也就是非暴力行动是怎样在斗争中发挥作用的。我们将在《非暴力的政治》（三）中研究这一主题。